



理论与历史： 对社会经济演化的一种解释

路德维格·冯·米塞斯 著

郑适萌、杨力行、陈磊 译

本书根据Liberty Fund, Inc 2005年出版“**Theory and History : An Interpretation of Social and Economic Evolution**”翻译，感谢Liberty Fund, Inc 提供英文原文。

目 录

绪 论.....	1
1. 方法论上的二元论.....	1
2. 经济学和形而上学.....	1
3. 规律性与预测.....	2
4. 自然法则的概念.....	2
5. 人类知识的局限性.....	4
6. 规律性和选择.....	4
7. 手段和目的.....	5
第一部分 价值.....	7
第一章 价值判断.....	7
1. 价值判断与存在命题.....	7
2. 价值判断与行为.....	7
3. 价值判断的主观性.....	8
4. 价值判断的逻辑及句法结构.....	8
第二章 知识与价值.....	10
1. 偏见学说.....	10
2. 公共福利与特殊利益.....	11
3. 经济学与价值.....	12
4. 偏见与不宽容.....	13
第三章 寻找绝对价值.....	14
1. 问题.....	14
2. 社会内部冲突.....	14
3. 关于所谓“中世纪的全体一致”.....	16
4. 自然法则的理论.....	17
5. 启示.....	19
6. 无神论的直觉.....	19
7. 公正的观念.....	20
8. 再谈功利主义.....	21

9. 关于美学价值.....	24
10. 寻求绝对价值的历史意义.....	24
第四章 否定价值判断.....	27
第二部分 决定论与唯物主义.....	28
第五章 决定论及其批评者.....	28
1. 决定论.....	28
2. 对意识形态因素的否定.....	29
3. “自由意识”之争.....	29
4. 宿命与宿命论.....	30
5. 决定论与刑罚学.....	32
6. 决定论与统计学.....	33
7. 人类行为科学的独立.....	36
第六章 唯物主义.....	37
1. 两种唯物主义.....	37
2. 分泌物的类比.....	38
3. 唯物主义的政治含义.....	39
第七章 辩证唯物主义.....	40
1. 辩证法与马克思主义.....	40
2. 物质生产力.....	41
3. 阶级斗争.....	43
4. 意识形态对思想的渗透.....	47
5. 意识形态之间的冲突.....	50
6. 观念与利益.....	52
7. 资产阶级的阶级利益.....	55
8. 马克思主义的批评家.....	57
9. 马克思唯物主义和社会主义.....	60
第八章 历史哲学.....	62
1. 历史的主题.....	62
2. 历史哲学的主题.....	63
3. 历史观点和历史哲学观点的区分.....	64
4. 历史哲学与神的意见.....	66

5. 行动型的决定论和宿命型的决定论	68
第三部分 历史的认识论问题	70
第九章 历史个性的概念	70
1. 历史的终极已知	70
2. 个人在历史中的作用	70
3. 群体思想的虚构	72
4. 计划历史	74
第十章 历史主义	76
1. 历史主义的含意	76
2. 对经济学的摒弃	78
3. 探索历史变迁的规律	80
4. 历史主义者的相对主义	81
5. 消融的历史	83
6. 复古	86
7. 经济史复古	89
第十一章 科学至上主义的挑战	92
1. 实证主义和行为主义	92
2. 集体主义教条	95
3. 社会科学的概念	97
4. 群众现象的本质	99
第十二章 心理学和人文心理学	101
1. 自然心理学和人文心理学	101
2. 人文心理学和人类行为学	103
3. 人文心理学作为一门历史学科	104
4. 历史与虚构	104
5. 合理化	107
6. 反省	108
第十三章 历史研究的意义与作用	109
1. 为什么需要历史学	109
2. 历史环境	109
3. 远古历史	110

4. 伪造历史	111
5. 历史与人文主义	112
6. 历史与侵略性民族主义的兴起	113
7. 历史与价值判断	113
第十四章 历史学的认识论特色	116
1. 自然科学中的预言	116
2. 历史与预言	116
3. 关于历史学的特殊理解	118
4. 人文心理学经验	119
5. 现实型和理想型	120
第四部分 历史的进程	123
第十五章 历史的哲学解释	123
1. 历史哲学和历史的哲学解释	123
2. 环境主义	123
3. 平等主义对历史的解释	124
4. 历史的种族解释	126
5. 西方文明的世俗主义	127
6. 反世俗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摒弃	128
第十六章 当今趋势和未来	131
1. 自由趋势的逆转	131
2. 财富与收入平等意识形态的兴起	132
3. 人类理想状态的幻想	136
4. 持续进步趋势的神话	138
5. “经济”自由的压制	139
6. 未来的不确定性	142

绪 论

1. 方法论上的二元论

凡人不知道宇宙及其所包含的万物呈现在超人智慧生物之前该是什么样的。或许这样的一个高级智慧能对一切现象给出一个连贯、全面的一元论的解释。至少迄今为止，人类在尝试跨越思想与物质、客体与主体以及整体与部分之间巨大鸿沟的时候总是可悲地失败。不过，如果把这种失败当作是二元哲学合理性的一种充分证明将是荒谬的。我们由此可以推论的只是：至少在目前，科学采取二元途径更多的是出于方法论上的设计而非哲学上的考虑。

方法论上的二元论避免了任何有关本质和形而上概念的命题，它只考虑以下事实：我们不知道外部反应（物理的、化学的、生理的）是如何影响人类思维、观点以及价值判断¹。这种无知将知识领域分割为两个单独的方面——外部事件领域，也就是通常所说的自然，以及人类思维和行为领域。

旧时代的人们用道德和宗教的观点来看待这个问题。唯物主义一元论因为和基督教二元论（造物主与被创造的万物、永生的灵魂与肉体凡胎）的不相容而被摒弃。决定论因为与道德的基本原则以及刑法典的不相容而被摒弃。这些争论中用以支持各种教条的绝大多数论据都无关本质，故而和今天方法论的观点不相干。决定论者只是一再重复他们的命题而不是加以证明；非决定论者驳斥决定论者的陈述，却又无法攻击到决定论者的弱点。冗长的辩论并无多大用处。

经济学这一门新科学的出现改变了争论的领域。政党向来积极抵制所有的实用性的结论，但实用性的结论恰恰正是经济学思维的必然结果。政党既然无法针对经济学所作的实用性结论的真实性和正确性提出任何站得住脚的反驳，于是就把争论的领域转移到认知论和方法论上。他们宣称，自然科学的实验方法是研究的唯一合适模式，源于感官经验的归纳法是唯一合理的科学推理模式。他们装作好像从来就不知道归纳法存在逻辑错误一样。对他们而言，不涉及到实验方法或是归纳法的一切都是形而上学，而形而上学在他们看来等于废话。

2. 经济学和形而上学

人类行为的科学源于人们为各自选定的目标而努力这一事实。但是这一事实却被各类的实证主义、行为主义、泛物理主义完全否认或有意忽略。现在，否认人们明确为某一目标而努力这一事实显然是不明智的。所以，只有在一种情况下，对人们行为取向目的性的否认才能成立，那就是，假定对目的和手段的选择只是表象的，人类行为最终是由生理反应决定的，而生理反应本身又完全是能用物理学和化学术语来描述的。

¹ “价值判断”在本书中对应的英文原文是“judgments of value”，但文中“valuation”一词也被用来指“judgments of value”，所以也译为“价值判断”。

即便是最狂热的“统一科学”²派的支持者，也会犹豫是否应该支持这样一种对他们基本论点的生硬表达。他们的谨慎不无道理。因为，在人类思想和物理或化学反应之间的因果关系被确定之前，这个实证主义的命题并非来自确定的科学实验，而只是源自形而上学世界观的一种认识论上的假定。

实证主义者告诉我们说，总有一天，会有一门新学科能够使他们如愿以偿，可以详尽地描述出在人体中“生产”出思想的物理和化学反应过程。让我们不要为这未来的事情在今天争吵。然而，显而易见的是，这样一个形而上学的命题无论如何也不能驳倒人类行为科学通过分析推理所得出的结论。基于情感上的原因，实证主义者不愿看到行动人³必然从经济学教导中而得出的一些结论。因为他们（实证主义者）既无法从经济学推理过程中找到任何破绽，也不能从最终的推论中发现问题，所以只好借助于形而上学的方法来诋毁经济学的认识论基础和方法论上的路径。

形而上学自身并无问题。人们离不开形而上学。实证主义者把“形而上学”视为“废话”的同义词是犯了一个可悲的错误。不过，并非任何形而上学的命题都是同分析推理的结论相矛盾的。形而上学不是科学，把形而上学的概念引入到对科学问题的逻辑检验中也是徒劳的。这一点对于实证主义的形而上学——它的倡导者称之为“反形而上学”——也是成立的。

3. 规律性与预测

从认识论的角度，自然的区别性标志是在一连串顺序现象之中包含着的可探知的、不可避免的规律性。而人类历史——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人类行为——的区别性标志则是缺乏这种普适的规律性。在相同的条件下，石头总会同样的刺激作相同的反应，我们能从这种有规律的反应模式中学到知识，并利用这种知识指导我们的行为以达到某些特定目标。我们对自然物体的分类以及我们给这些分类指定的名称就是源于这种认识的结果。石头会有石头的特殊反应，但不同的人对相同的刺激则有不同的反应，并且同一个人在不同的时刻或者说他现在同他先前或以后对同一刺激的反应也大不相同。要想找到一群反应一直相同的人是不可能的。

这并不意味着未来人类行为是完全不可预知的。人类行为通过特定的方式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预测的。不过从逻辑上和认识论上说，做这种预测的方法和范围与预测自然反应的方法和范围是完全不同的。

4. 自然法则的概念

经验总是关于过去发生的事情的知识。它所指的是“迄今为止”以及已经不再的——即针对那些已经湮灭在时间长河里的事件而言。

²统一科学 (unified science)，实证主义的基本信条之一，主要主张把调查对象还原成基础科学（通常是物理学）来研究。它和科学的统一性 (unity of science) 是不同的概念，后者是科学哲学的概念，主张一切学科都是一个统一的智力事业——科学——的一个部分。

³原文为“acting man”。在本书中“acting man”和米塞斯提出的另一个概念“acting individual”都译为“行动人”。对这一概念的理解可参阅米塞斯“Human Action”，第一章“Acting Man”。

认识到许多现象的连续与顺序⁴中存在规律性，并不影响我们把经验归于在过去一定时间地点和环境影响下发生的事情本身。对规律性的认识也仅限于过去事件。大多数经验告诉我们：在过去观察的所有例子中，确实存在可知的规律性。

远古以来，所有种族或文明都想当然的认为，过去观察到的规律性将来也会有效。这种因果关系范畴以及认为自然现象在将来会遵守和过去相同规律的观点是人类思维和行为（所遵循）的基本原则。我们的物质文明就是这些基本原则指导下行为的产品。技术设计使人们打消了过去人类行为领域内对这些基本原则正确性的疑虑。历史学也无可辩驳地告诉我们，直至今日，我们的祖先和我们自己做了明智之举，即采纳了这些基本原则。从真理概念的实用主义⁵意义上讲，这些基本原则是正确的，也是有效的，更确切地说，它们在过去一直有效。

暂且不论因果关系的问题具有形而上学上的暗示，我们必须认识到，自然科学是完全建立在一个假设基础上的：即在自然科学的研究领域，现象之间具有规律性的关联关系是一个常态。自然科学不仅仅是在寻找经常性的关联，而且要在所有观察的过去案例中探求一种常态的、无例外的规律性，并且这种规律性在将来的观察中也必须表现为相同的情形。当人们（自然科学工作者）只能观察到经常性的关联而无法找到无例外的规律性时，就像在生物学研究中经常碰到的一样，他们就会认为，那只是因为我们的研究方法不当才使我们暂时不能发现严格的规律性。

必须把“不变的关联”和“经常性关联”这两个概念区分清楚。在说到“不变的关联”时，指的是这种关联关系不会背离其规则的模式（即定律），被观察到的关联关系总是确定的，而且就人们可以确定的事物而言，不可能也不会发生偏差。而关于连续自然现象中“不可动摇的规律性”这一观念的最佳注脚莫过于“奇迹”的观念。奇迹是我们所知世界中正常情况下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它的发生无法用自然法则解释。如果听说发生了这类事情，人们一般会有两种不同的解释。不过，这两种解释在一点上倒是共同的——即自然法则是不可动摇的。虔诚的信徒说：“正常情况下奇迹绝不可能发生，只有上帝具有不受自然法则限制的能力，才能让奇迹发生。这是人类无法理解也无法说明的事情，是神的秘密，（所以）也是一个奇迹。”理性主义者却说：“这种事情绝不可能发生，所以也确实没有发生。那些人或者是骗子，或者看到的只是幻觉。”倘若自然法则的概念并不是指不可动摇的规律性，而仅指经常性的联系，奇迹这种说法也就不存在了。人们会简单陈述为：A经常导致B，但有时这个结果不会出现。

没有人会说，以45度角扔到空中的石头“常常”会落到地上，或者人们失去的肢体“通常”是不会再长出来的。因为，我们知道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面对的不是同一种联系的经常重复，而是有规则的重复。

⁴ 连续与顺序 (the concatenation and sequence)，指一些事物（现象）在存在上彼此联系和关联。规律性只存在于那些有连续与顺序关系的现象和事物之中，并且这种规律性是关于连续与顺序关系的规律性。

⁵ 实用主义 (pragmatism) 不同于本书中经常提到的另一个重要的哲学流派——功利主义 (utilitarianism)。前者强调事物的意义（真理）在于可观察（真实）的结果；后者认为所有行动须为最大多数人获得最大幸福。米塞斯认为功利主义的“功利” (utility) 也是一个由主观价值判断决定的。参见米塞斯 “Human Action” 关于 “utilitarianism” 的论述。

5. 人类知识的局限性

人类知识取决于人类的思维能力以及客体能在多大程度上激发人的感知。或许宇宙中有我们感官无法感知的事物，也有我们思维无法理解的关系。在我们所称的宇宙轨道之外还可能存在着其他的物质体系，我们对这些体系无从知晓，因为目前没有任何它们存在的迹象能以一种触及我们感官的方式进入我们的认知领域。也有可能我们观察到的自然现象之间关联的规律性不是永恒的，而只是暂时的，规律性只是宇宙历史中当前阶段（这一阶段可能会延续数百万年）的常态，也许有一天就会被另一种方式所取代。

这种想法以及类似的思想会促使一位谨慎的科学家在叙述他的研究成果时采取高度警惕的态度，也使哲学家在处理先验的各种因果关系以及一系列自然现象的规律性时更为克制。

人类先验的各种形式的思想和推理无法获得逻辑上的必然结论。希望以逻辑来证明逻辑原理自身的正确性和有效性是不合理的。但对这一切我们能说的只是，否认先验的思想和推理的正确性和有效性对人类思维而言又显然是荒谬的，因为在这种思维的指导下导致了人类成功的行为模式。

休谟的怀疑主义是对人们永远无法达到绝对确定性这一假设的反应。那些认为只有神意才能给人们提供完全的确定性的牧师是正确的。人类的科学探究无法超越人们感官不足和思维狭隘所设定的界限。没有一种推导能证明因果关系原则，也没有关于不完全归纳的扩充推论；唯一可以借助的是同样无法证明的陈述：在一切自然现象的关联中存在严格的规律性。假如我们不借助这个假设，所有自然科学的结论都会显得过于草率。

6. 规律性和选择

有关人类行为的一个主要事实就是，在现象的关联之中没有这种规律性。人类行为科学没有发现确定的“刺激-反应”模式并不是一个缺陷。原本不存在，如何被发现？

但自然界如果没有规律性，对于某类物体的反应也就无从谈起。这样人们就只能对各种物体分别进行单个研究，然后把所知的记入历史纪录。

为了论述方便，让我们假设我们称为“恒量”（constants）的物理量实际上是不断变化的，只是因为调查方法不当使我们感觉不到这种缓慢的变化。我们不考虑这种变化是因为它们对我们的环境没有明显的影响，对我们行为的结果也没有显著的作用。因而，我们可以说这些实验自然科学确定的量完全可以被视为“恒量”，因为在相当长（长得超出我们想象）的时间里，它们保持不变。

但是，对于人类行为领域内的量，不能用类似的方法来看待。这些量显然是变量。它们的改变直接影响我们行为的结果。我们观察到的每一个量都是一个历史事件，一个必须借助特定的时间和空间才能加以完全描述的事实。

计量经济学家无法否认这个事实，这个事实破坏了他们的论证基础，因而只能承认“行为恒量”并不存在。尽管他们企图引入一些从历史事件中武断选取的数字来作为“未知行为恒量”。这样做的唯一借口是，他们的假设“只是

在某一段时间里，这些未知数字保持很好的稳定性。”⁶“现在，至于这段假定某一数字不变的时期是否仍在持续或者数字的改变是否已经发生只能留待以后才能确定。总结一下，他们宣称在一个可能很短的时期内两因素数值之间存在近似稳定的比值，即计量经济学家称之为“合理”恒定值是可能的，尽管极为罕见。不过，这和物理学的恒量有着本质的不同。这是对历史事件的陈述，不是一个可以用于预测将来事件的恒量。

暂时搁置人类意志或自由意志的问题，我们可以说，人以外的其它实体按有规律的模式反应；人类本身则通过行为选择反应。人首先选择终极目的，然后选择达到目的的手段。行为选择取决于思维和观点。但至少在目前，自然科学对思维和观点还知之甚少。

在物理学中，以数学解释的方式来区分恒量和变量是有意义的；这种区分在每一例科学计算中也必不可少。经济学中各个量值之间没有恒定的关系。因此，所有可确知的数据都是变量，或换一种说法，皆为历史数据。数理经济学家反复说，数理经济学的困难在于变量太多。事实是，困难在于只有变量没有恒量。而在没有恒量的情况下来谈变量是无意义的。

7. 手段和目的

“选择”是从两个或更多的可能行为方式中挑出一个，并搁置其它方式的行为。每当人们面临无法兼顾的多种行为模式时，就必须选择。因此，生命也意味着无尽的选择行为。行为总是选择控制下的行为。

决定选择内容的精神行为或者涉及终极目的，或者涉及达到终极目的的手段，前者被称之为价值判断，后者是根据实际情况所作的技术上的决定。

从严格意义的术语上讲，行动人只以终极目的为目标，只为达到一种状态，这种状态比他在选择中所放弃的其它状态更适合于他。哲学家和经济学家把这一无可辩驳的事实描述为，人们会做出使自己更幸福的选择，因为人的目标就是幸福。⁷伦理学理论赋予幸福这个词一种纯粹正式的意义：幸福是唯一的终极目的，并且所有的其它事物和形式都只是实现这一最高终极目的的手段。不过，通常还有另一种不太确切的表达方式，人们也经常把那些能直接或间接产生满足感的手段称为终极目的。

终极目的的特殊性标志是，它们完全依赖个人的自我及主观的判断，而这种判断是不能被其他人检验和衡量的，更不能被其他人校正。每个人是他自己满足和幸福与否的唯一和最终的评判者。

虽然一般认为，这个基本认识和基督教的教条相悖，不过我们可以用早期基督教的信条中的一些例子来阐明这个观点的合理性。那些早期的殉道者为了赢得救赎和永恒的赐福，摒弃了别人眼里的最大快乐。他们不顾旁人的好意相劝，执意不肯为活命而向神圣皇帝的塑像膜拜，他们选择为追求而死，而不是

⁶ 参见 the Cowles Commission for Research in Economics, *Report for Period, January 1, 1948 - June 30, 1949* (University of Chicago), p. 7.

⁷ 没有必要再一一反驳那些提出了两千多年的攻击幸福主义、享乐主义、和功利主义的论点。关于这些论著中“快乐”和“痛苦”概念的表面性和主观性，参见米塞斯《人类行为》(Human Action)和路德维格·费尔巴哈《幸福主义》(Eudaonismus)当然，对那些认为除了性高潮、酒精等等的作用之外就没有“幸福”的人，则继续重复着旧的错误和扭曲。

为保存性命而失去天堂里的永生。一个人想要说服他的同胞不要殉道，该用什么样的说辞？他必须批驳福音书的要点（这是殉道者信仰的精神基础）以及教会关于这些要点的解释。这是试图动摇基督徒对赖以获得救赎和至福⁸的宗教信仰信心的一种尝试。如果这种尝试不成功，就不必多费口舌了，因为剩下的就是在两个极端结果之间作选择了，或者永恒赐福，或者长久遭罪。这样，殉道在殉道者的眼里就成了确保最高永恒幸福这一目的的手段。

只要人们敢于质问或检验某一个目的，他们事实上就已经不再把它视为目的了，而是把它当成获得更高目的的一个手段。终极目的是不受任何理性检验的，而所有的其它目的都具有临时性的特征。一旦目的被用于和其它的目的或手段比较权衡，目的也就成了手段。

人们根据产生一定效果的能力大小来判断、评价手段。尽管价值判断是个人的、主观的和决定性的，但对手段的判断本质上却是从实际情况出发，针对相关手段产生一定效果的能力的一种推断。关于手段产生效果的能力，人们也会有不同的意见和争执。现实中原本没有标准可用于评价终极目的。

选择手段是一个技术性的问题，同样，“技术”这个词也是广义的。选择终极目的是一件私人的、主观的、个体的事情。选择手段事关理性，选择终极目的则事关灵魂和意志。

⁸ “至福”和下文的“永恒赐福”都是指基督徒最大的幸福，指死后灵魂上天堂。

第一部分 价值

第一章 价值判断

1. 价值判断与存在命题

存在或不存在命题（肯定存在命题或否定存在命题）是描述性的。它们就整个或部分宇宙的状态做出某种陈述。对这些命题而言，真伪问题事关重大，不可和价值判断混为一谈。

价值判断是唯意志的，它们用以表达个人情感、口味或偏好。对价值判断而言，不存在真伪的问题，它们是终极的，无需任何证明。

价值判断是有关个人的内心的精神行为。同样，必须明确地把价值判断本身和个人用于向他人表达自己价值判断内容的句子（语言）区分开来。人有可能为某种目的而对自己的看法撒谎。我们可以这样描述这种状况：每个价值判断本身也是宇宙实际状态的一个事实，同样可以是存在命题的主题。“我喜欢贝多芬胜于喜欢雷哈尔”这句话涉及到了一个价值判断。如果把它视为一个存在命题，当我确实更喜欢贝多芬并且也作了相应选择，则命题为“真”；当我实际上更喜欢雷哈尔，但因为某种原因我隐藏了真实感情、口味或偏好，则命题为“假”。

与此类似，存在命题“保罗喜欢贝多芬胜过雷哈尔”可能是真，也可能是伪。就价值判断来说，真伪问题不存在。我们所指的价值判断就是如此，而不是向他人交流价值判断内容的句子。

2. 价值判断与行为

如果价值判断并没有促使做判断的人付诸任何行动，那就是纯理论的。有些价值判断只能是纯理论的，因为这些判断涉及的任何行为都超出了个人的能力。一个人可能更喜欢布满星星的夜空，但他无法把一个没有星星的夜空换成一个星光璀璨的夜空。

价值判断的重要意义恰恰在于它是人类行为的源泉这一事实。在价值判断的指引下，人会专注于以那些令他满意的事情来替代那些令他不满意的事情，会采取各种手段来达到他所要追求的目的。

因此，人类历史和现实就必然涉及到那些促使人们行动、指导人类行为的价值判断。如果不弄清行动人的价值判断，就无法发现历史的真相并作出说明。以历史学家的身份把自己的价值判断转嫁给个人不是历史学家的任务，（历史上）个人的行为才是研究的主题。作为一门学科，历史学仅仅做存在命题的论述。但是，这些命题经常会涉及到特定价值判断在行动人心理中的存在与否。历史学的特殊使命之一就是确定行动人价值判断的具体内容。

例如，从追溯印度种姓制度的起源到认识促使人们世代发展、进步以及维系这种行为方式的价值观就是历史学的任务之一。发现这个制度造成的后果以及这些结果如何影响了后代人的价值判断，将是历史学进一步要做的工作。但是历史学家不能将个人的价值判断转嫁到这个制度上，并且对这种制度加以颂扬或谴责，他必须把事物的进展和制度的相关性联系起来，他必须拿这个制度

同制度创造者和支持者的设计与意图相比较，并描述制度的影响及结果。他必须不断地追问，行为人所采取的手段是否适合获取他追求的目的。

事实上，很少有历史学家能完全避免将个人价值判断转嫁到研究对象上。不过，这一类判断仅仅是历史学真正任务的附带品而已。在表达这种判断时，历史学家其实是从他个人的角度在进行价值判断，而不是以历史学家的身份。

3. 价值判断的主观性

一切价值判断都是个人的、主观的；无外乎一些声称“我宁愿”、“我更喜欢”或“我希望”的论述。

任何人都不能否认，每个人在感受、口味、偏好上存在很大分歧，并且，即便是同一个人，在不同的时期对同一事物的评价也会不同。从这一点上讲，绝对的、永恒的价值是不存在的。

这并不意味着每个人都只需要通过自己的思考得出他的价值观。绝大多数人的价值观来自他们生存的社会环境，因为环境塑造了他们的人格，也教育了他们。很少有人具有背离传统价值观背景并建立自己是非对错尺度的能力。

价值判断主观性理论的意义在于，不存在这样一个标准，能使我们把任何一个终极价值判断驳斥为错、伪或是不正确，就像把一个存在命题驳斥为明显地错误一样。像争论存在命题的真伪一样去争论终极价值判断的真伪是徒劳的。一旦我们用争论的方式驳倒一个终极价值判断，我们实际上已经把它视为获得一定目的的手段，只不过我们是把讨论转移到了另一方面。我们不再把价值判断涉及的原则视为终极价值观，而只是视它为达到终极价值观的一个手段，现在，我们又面临同样的问题。例如，我们如果试图向一名佛教徒指出，按照他的教义行事将会发生灾难性的后果。但是他若反驳我们说，在他看来这些后果和不遵守他的行为准则带来的恶果相比，其实无关紧要甚至完全无害，如此而已。我们又能说些什么呢。佛教徒关于至善、至乐和永福的观点和我们不同，他不在乎那些批评者们所关心的价值观，而是追求一种不同于批评者的满足。

4. 价值判断的逻辑及句法结构

价值判断从做论述的人的角度来看待事物。它不是要表述关于事物本身的任何问题，它要表明的是人对宇宙中不同条件进行比较后的情感反应。

价值并非固有的，价值不存在于事物和环境之中，而是存在于价值主体那里。把价值单纯归于一件事物或环境是不对的。价值判断总是基于对某一事物或环境与另一事物或环境的比较。它对外部世界的不同状态进行评估，把一件事物或状态与另一件事物或状态进行对比，无论它们是真实还是虚幻的，然后依照评价者对它们的喜好程度进行排序。

也有可能作判断的个人认为被评价的两件事物或环境不相上下，他对选A或选B并不介意。这就造成了他在价值判断上的中立。这种中性的意向不会产生实质的行动。

有时，价值判断在表达上会有省略，需要听者适当加以补充才会具有意义。“我不喜欢麻疹”意思是“我喜欢没有麻疹甚于有麻疹。”这种不完整是省略含义的标志。省略总是以一种或明或暗的方式来表达欲摆脱某事物。这类判断的语法结构可能被定性为否定的。不过，试图依靠某些价值判断的外在形式推断出有关它们的内容，并以所谓否定论来谴责它们是徒劳的。每一个价值判断

都容许一种公式，在这公式中，价值更高的事物或状态通过肯定或否定的形式被逻辑地表达出来，尽管有时一种语言或许缺乏合适的术语。言论自由意味着对审查制度的摒弃和否定。但是，确切地说，言论自由意味着作者独自决定他作品的内容，与警察有权干预内容的情况截然不同。

行为必然涉及到为获得或保留高价值的事物而放弃低价值的事物。例如，为了得到一定量的劳动产品而放弃一段时间的休息。对休息的放弃是获得更高价值的事物或状态的手段。

有些人的神经是如此敏感，他们不能容忍有关人体生理事实以及人类行为的行为学特征的直白描述。这些人甚至恼火于这一说法——人必须在最高尚的事物、最崇高的人类理想和身体需求这两者之间加以选择。他们感到这种说法贬低了某些事物的崇高性。他们拒绝承认人的生活中会有些情况迫使他不得不在忠于崇高理想和吃饭这种动物本能之间进行选择的这一事实。

只要人需要在两件事物或状态之间进行选择，他的决定就是一个价值判断，即使他不使用通常表达这类判断的语法形式来表达他的判断。

第二章 知识与价值

1. 偏见学说

早在马克思把偏见学说纳入他的理论之前，就有了对经济学家偏见的指责。今天，偏见学说已经被作家和政客们普遍接受。虽然这些人在许多方面都受到了马克思思想的影响，但是不能简单地把他们当成马克思主义者。我们必须赋予他们的批评一种不同于辩证唯物主义背景下的含义。因此我们必须区分两种不同的偏见学说：马克思主义的和非马克思主义的。前者我们会在下文关于马克思唯物主义的批判分析里加以说明，本章只讨论后者。

两种偏见学说的支持者都知道，如果他们仅仅只以所谓的偏见指责经济学而放过其它的学科显然是站不住脚的。因此他们把偏见学说推广——不过我们不必在这里分析这个扩大了了的偏见学说。我们可以专注于这个学说的核心：经济学受到价值判断先入为主和偏见的感染，是必然做不到价值中立⁹的。所有为支持一般偏见学说而提出的论据也都用于证明经济学特殊偏见学说的论证之中；不过，为支持某种特定偏见学说而提出的论据却显然不适用于一般学说。

一些当代偏见学说的捍卫者试图将偏见学说与弗洛伊德的理论联系起来。他们说，他们看到经济学家的偏见不是“有意识的”偏见，他们并没有意识到他们的预见，也并没有刻意去寻求什么结果来证明预料中果然发生的事情是合理的。（只是）被压制的愿望，在不为思考者本人觉察的情况下，从潜意识深处的角落里对推理过程施加了干扰影响，并且把思考引向被压抑的欲望和冲动。

不过，认可哪种偏见学说其实并不重要，因为所有偏见学说都有同样的缺陷。

倘若批评者不能清晰地阐明他所谈及的学说的缺陷就指其为偏见，无论是故意的偏见还是潜意识的，都是不恰当的。一个学说是否具有完整性¹⁰才是最重要的，这一点是由分析推理确立的。即使有心理力量激励了作者提出了某理论，也不会对该理论的完整性和正确性有半点减损。指导思想家的动机在评价他的成就时是无关紧要的。今天的传记作家忙于把天才的作品解释为情结¹¹、性冲动以及性欲升华的结果。他们的研究或许对心理学，或更确切地说是对人类心理学¹²很有贡献，但是，这些对于评价传记主人公的功绩不会有任何影响。对帕斯卡¹³一生最复杂的心理分析也不能告诉我们他的数学和哲学理论是否具有科学上的完整性。

如果分析推理揭示了一个学说的缺陷和错误，历史学家和传记作家或许会试图把这归结于学说创造人的偏见。倘若对一个理论提不出什么反对的证据，激发理论创始人提出这个理论的动机也就无关紧要了，即便他是有偏见的。不过我们必须认识到，他的所谓由偏见产生的理论已经成功地抵挡了所有的反对理由。

⁹ 英文对应为 value-free，指社会学研究者在其研究中不带个人和社会的价值观念来观察社会事实。

¹⁰ 对应英文为 sound，指理论逻辑推理的严密。

¹¹ 英文对应 complexes，心理学术语，指一组相关的控制和抑制思想、感觉和行为特征或习惯的观念和冲动。

¹² 英文为 thymology，和广义的心理学相区别，参见第十二章 心理学与人类心理学。

¹³ 指法国数学家、物理学家和哲学家帕斯卡（1623—1662）。

指出一个思想者的偏见并不能代替以合理的辩论对他的学说加以批驳。那些以偏见之名对经济学家横加指责的人，只表明他们无法用批判分析的方法来驳倒经济学家的学说而已。

2. 公共福利与特殊利益

实施经济政策是为了达到一定的目的。经济学在处理经济政策时并不质疑行动人附加到这些目的上的价值观。经济学只关心两个问题：首先，涉及的政策是否适合（用于）达到那些政策推荐者和应用者的目的；第二，这些政策是否可能无效——这点对那些政策推荐者和应用者来说是不可取的。

许多经济学家（特别是过去的）用以表达他们研究结论的术语容易被曲解。在处理一定政策时他们采用的语言方式对那些考虑使用它来达到目的的人来讲是合适的，这是因为经济学家并无偏见，也不贸然质疑行为人对目的的选择，因而他们才采用一种把行为者的价值判断视为一种当然方式来表达他们的思考结果。人们使用关税手段或是颁布法令规定最低工资时是为了达到一定的目的。当经济学家认为这些政策能达到支持者预期的目的时，他们就会说这些政策是好的，这同医生把某种疗法称为好的是一样的，因为他应用这种医疗方法达到了医治病人的预期目的。

古典经济学家最著名的理论之一——李嘉图的比较成本理论¹⁴在一百四十年的时间里曾遭受了数以百计的激烈反对，但反对者们并没能提出能站得住脚的理论来驳斥它。如果我们可用这一事实来评价的话，我们足以对抗一切批评意见。李嘉图的比较成本理论远远不只是关于自由贸易和贸易保护的一个理论，它是涉及到人类在劳动分工状态下协作以及职业群体专业化和一体化的基本原理，涉及到人与人之间社会纽带的起源和进一步强化的理论，因此它应该被称为协作规律的一个命题。它对理解文明起源和历史进程不可或缺。和通俗的理解相反，它并没有直言自由贸易好，贸易保护不好。它只是证明贸易保护不是增加产品供给的一种手段。因而，它也不涉及贸易保护在达到其它目的方面（例如，提高一个国家战争中捍卫独立的能力）是否合适。

那些以偏见指责经济学家的人，批评经济学家热心服务于“利益集团”。他们认为由于经济学家自私地追求特殊群体的福利而损害了公共福利。请一定不要忘记，所有社会成员利益和谐（一致）意义上的公共福利思想是一个现代观念，而它正是源于古典经济学的教义。过去，人们认为在人与人之间和各个群体之间存在不可调和的冲突，一人受益必然会有他人受损；人只能通过损害他人的利益来使自己获利。我们可以把这种信条称为蒙田¹⁵主义，因为是蒙田在近代首先阐明了这种观念。它是重商主义的基本信条，也是古典经济学家批判重商主义的主要目标。古典经济学家以正确理解的（或长期的）¹⁶市场经济中社会全体成员利益的和谐理论与此相对。社会主义者和干涉主义者拒绝各种利益和谐的理论。社会主义者宣称，一个国家中各社会阶级利益之间存在不可调和的冲突；无产阶级利益要求以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而剥削者则要求维护资本主义。国家主义者宣称，不同国家的利益处在不可调和的冲突中。

¹⁴ 一般称为比较优势。1817年，李嘉图在他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中详细解释了比较优势的理论。下文的140年是指从那时到米塞斯写这本书（1957年）之间的时间。

¹⁵ Michel de Montaigne (1533-1592)，蒙田，法国文艺复兴时期思想家。

¹⁶ 参见下文第二章“知识与价值3 经济学与价值”中关于“长期利益”的解释。

显然，这些不相容理论的对立只能以逻辑论证来解决。但是和谐理论的反对者并没有打算把他们的观点拿出来供人检验。只要有人批评他们的论点，并试图证明和谐理论，他们就大叫“偏见”。恰恰是他们（而不是他们的对手——和谐理论的支持者）惯以偏见来责备别人这一简单的事实清楚地表明他们无法以推理的方法来驳倒对手的观点。和谐理论的反对者在分析相关问题时事先就认定，只有带偏见的邪恶利益的辩护者才会挑战他们社会主义或干涉主义教义的正确性。在他们眼里，仅仅凭某个人不同意他们观点这一事实就可以断定这个人的偏见。

这种态度，如果引向最终的逻辑结果，则意味着多逻辑论学说。多逻辑论否认人类思维逻辑结构的一致性，他们认为每一个社会阶级、每一个国家、种族或每一历史时期都有不同于其它阶级、国家、种族或其他时期的逻辑。因此，资产阶级经济学不同于无产阶级经济学，德国物理学不同于其他国家的物理学，雅利安人数学不同于闪族人的数学。

这里没有必要检查各种类型多逻辑论的实质¹⁷。因为多逻辑论做过的唯一事情就是宣称思维的逻辑结构存在多样性，但它从未指出这些差异存在何处，例如无产阶级逻辑和资产阶级逻辑区别在哪里。所有的多逻辑论者都以作者逻辑上说不明的特殊性来驳斥一定观点。

3. 经济学与价值

经典和谐学说¹⁸的主要论点来自短期利益与长期利益（指的是正确理解的利益¹⁹）的区别，让我们在优先权的问题上来检验一下这个区别的意义。

一部分拥有特权的人一定会从被赋予的特权中受益。那些受关税、补贴或其它现代保护主义手段保护的生产商，由于其特权而没有受到更有效率的竞争对手影响，他们利益的获取是以牺牲消费者的利益为代价的。但是除了这些生产商以外的其他人、纳税人以及受保护产品的购买者会认可这种少数人的特权吗？除非他们自己能从类似的特权中受益，他们才会保持沉默。这样，他们中的每个人作为消费者便丧失了他作为生产者获得的收益。此外，所有人都因为低效率的生产手段替代了高效率的手段而遭受了损失。

如果从这种长期与短期利益区别的角度来处理经济政策，就没有根据来指责经济学家的所谓偏见。经济学家谴责铁路工人“限产超雇”²⁰的做法不是因为这种做法牺牲了他更偏爱的别的群体的利益，而是因为铁路工人无法避免限产超雇成为一个通行的做法。所以，最终这种做法只能是既害人又害己。

当然，对那些不认可西方人认为理所当然的价值观的人来说，经济学家对社会主义和干涉主义的计划提出的反对理由无足轻重。对那些喜欢贫穷和奴役胜于物质财富以及物质财富所带来的一切的人来说，这些反对理由看起来都无关紧要。不过，经济学家反复强调他们是从公认的西方文明的价值观出发来处理社会主义和干涉主义的问题的。社会主义者和干涉主义者不仅没有（至少是

¹⁷ 参见米塞斯《人类行为》第三章“经济学与对理性的反叛”中对多逻辑论的分析。

¹⁸ 和谐学说 (harmony doctrine) 在米塞斯的经济理论中占有重要地位，它是米塞斯整个“自由主义”的基础。参见 Henry M. Oliver, Jr., “Von Mises on the Harmony of Interests”, *Ethics*, Vol. 70, No. 4. (Jul., 1960), pp. 282-290.

¹⁹ 正确理解的利益 (the rightly understood interests) 也是米塞斯反复强调的一个概念。功利主义哲学强调人首先要认识到自己“正确理解的利益”是什么。这个概念的提出同时也暗示了人往往不能认识到自己的利益所在。

²⁰ 英文为 featherbedding，工会要求资方限制产量并增加雇员的做法。

没有公开地) 否认这些价值, 而且还强调如果实现他们的计划, 将在这些价值方面比资本主义制度下获益更多。

大多数社会主义者和干涉主义者确实重视均衡所有人的生活标准。不过经济学家并不质疑其中隐含的价值判断, 他们所作的只是指出平等化不可避免的后果。经济学家并不认为社会主义者和干涉主义者的目的是错误的; 但他们要强调的是, 实现这个目的将带来的后果可能比不平等更糟糕。

4. 偏见与不宽容

显然, 很多人的逻辑能力受到了价值判断的影响, 偏见经常破坏人的思维。我们反对的是这样的一种流行观点, 认为处理经济问题必然会带有偏见, 并且认为无须揭示推理链中的谬误, 仅仅提到偏见就足以推翻一个理论。

偏见学说的泛起实际上意味着对偏见指责所针对的经济学教义“无可动摇性”的断然承认。这只是回复到我们这个时代的主要特色之一——对持异议者的不宽容和迫害的第一步。因为持异议者犯有偏见的罪, 所以清洗他们是对的。

第三章 寻找绝对价值

1. 问题

涉及价值判断时，我们会参考事实，也就是人们实际上用来选择最终目的的方式。尽管很多人具有相同的价值判断，尽管有一些是几乎为人们普遍接受的价值观，但明显的、不可否认的是，价值判断的传递具有多样性。

从远古时代开始，绝大多数人就达成了共识：和每个人处于孤立之境或是陷于彼此为敌、各自为战的结果相比，一个和平合作（至少也要在少数一些人之中形成）的结果更令人向往。对自然状态而言，人们更喜欢文明，因为为了尽可能的实现一些目的，例如延续生命和保持健康等，他们认为需要社会合作。但是，事实上（自古以来）一直有人并且现在还有人否定这些价值观，这些人更喜欢隐士孤独的生活而不愿生活在社会中。

显然，关于价值判断问题的任何科学处理都必须充分考虑这些判断的主观性和易变性的事实。科学寻求“是什么”的答案，并且试图以存在命题的方式来描述宇宙本来的样子。关于价值判断，我们所说的只能是它们由某些人做出，并且调查被这些价值判断指导的行为有哪些效果。超出这些界限一步就等同于用个人价值判断替代了实际知识。科学和我们有组织的知识体系只能告诉我们“是什么”，而不能告诉我们“应该是什么”。

主张存在永恒的绝对价值的理论认为发现永恒价值和发现物理学规律一样，都是科学或哲学研究的任务，这些理论一直否认存在于专门研究存在命题的科学领域和研究价值判断的哲学领域之间的区别。这些理论的支持者认为，存在一个绝对的价值等级。他们试图给最高目的即至善下定义。他们认为也应该按照与区分真与伪、对与错的存在命题相同的方式来区分价值判断的真与伪和对与错。²¹科学并不只局限于描述“是什么”。在他们看来，有另外一门完整的科学即伦理学这门规范的学科来展示真正的绝对价值，并为人们设立正确的行为标准。

在这种观点的支持者看来，我们时代的不幸在于人们不再认可这些永恒的价值观，以至于他们的行为脱离了这些价值观的指导；从前西方文明熏陶下的人们一致支持基督教伦理，那时候的状况要比现在好得多。

在下文中，我们将谈及由这种观点引发的一些问题。

2. 社会内部冲突

我们已经讨论过人们在价值判断和终极目的的选择上存在分歧，需要强调的是，许多被认为属于价值观上的冲突实际上是由选择达到某目的的最佳手段上的分歧造成的，冲突各方在目的上其实是一致的。关于这些手段是否适宜的问题需要通过存在命题而不是价值判断来解决。解决这一问题应用科学的主要任务。

因此在处理人类行为分歧的时候，必须弄清楚这种分歧是缘自于目的的选择还是手段的选择。通常要做到这点是很难的。因为相同的事物，对有的人来讲是目的，而对其他人来说又会是手段。

²¹ Franz Brentano, *Vom Ursprung sittlicher Erkenntnis*, 2d ed. Leipzig, 1921.

除了少数几个基本上可以被忽略的坚持持隐士观念的人之外，所有人都认为，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合作是达到个人目标的首要条件。这一无可否认的事实为人们进行政治讨论提供了一个共同的基础。所有现代人人种在精神和智力上的统一性也在以下事实中得到了反证——绝大多数人把社会合作这件事视作满足每个生命的生理需求、保存个人生命和健康以及繁衍种族的最佳手段。

社会合作的事实几乎被所有的人接受，我们可以将其视为一种自然现象。如果采用这种方式表达并断言有意识的协作符合人类的本性，那么也意味着理性是人的特征，由此我们又能认识到那个生成与发展的普适首要原则，即多样化和一体化²²，并且有意识的应用这个原则改进人们的处境。不过，人们不能把一个生物种内个体的合作也视为一种普遍存在的自然现象。对于生物的每一个种来说，维持生命的手段都是有限的。因此生物竞争在所有的物种中都普遍存在，在关键的“利益”上存在有不可调和的冲突。现存的生物中只有一部分能够幸存。由于同种生物中的一些成员攫夺了另一部分成员的生存手段，使得一部分生物在生存竞争中消失掉了。持续的生存竞争在每一个物种内的成员之间发生，这正是因为它们属于相同的种，彼此必须为同一种生存和繁衍的稀缺资源而竞争。只有人类通过理性以社会合作替代了生物竞争。当然，使得社会合作成为可能是因为在人们在劳动分工和任务专门化原则下能取得更高的劳动生产率，这是一种自然现象。不过，必须揭示这个原则，理解它对人类社会生活的意义，并有意识地把它作为一种生存竞争的手段加以利用。

社会合作的基本事实一直被社会达尔文主义学派及其批评者们曲解。前者认为人类之间的战争是一种不可避免的现象，而且任何试图维持国家之间长久和平的尝试都是违背自然的。后者反驳说，生存斗争不是同种动物成员之间的，而是不同种类动物成员之间的。一般来讲，老虎不攻击其它的老虎，而是采取最省力的方法，攻击弱小动物。所以，他们总结说，人类之间的战争，因为是相同种类成员之间的，所以是反自然的。²³

这两派都误解了达尔文关于生存竞争的概念。生存竞争并不仅仅指战争和打鬥。它隐含着生命在所有不利因素的影响下继续存活的顽强欲望。在生存资源稀缺的情况下，生存竞争在所有的生命个体之间存在，无论是否同种，只要是依靠相同的食物生存的生物之间都会发生生存竞争。老虎之间是否彼此相斗并不重要，一种动物的每一个个体成为其它个体的死敌，其原因仅仅是它们为了获取足够食物而成为了生死对头。在群居迁移的动物中，同一个冢内的蚂蚁、同一群蜜蜂、同一对父母孵出的雏鸟以及同一棵树上同熟的种子也存在这种无情的敌对关系。只有人类能通过有意识的合作在一定程度上摆脱这个规律的影响。只要有社会合作并且人口也没有超出最佳数量，生存竞争就会暂时停止下来。因此，在处理人类社会问题的时候参考动物和植物的规律是不恰当的。

²² “那个生成与发展的普适首要原则，即多样化和一体化”对应的英文是“the great principle of cosmic becoming and evolution, viz, differentiation and integration”。按照米塞斯在“Human Action”（4th edition, p145）中的论述“Principle of the division of labor is one of the great basic principles of cosmic becoming and evolutionary change.”，此处的“differentiation and integration”（多样化和一体化）指的是劳动分工，和下文提到的“劳动分工和任务专门化原则”相同。

²³ On this controversy see Paul Barth, *Die Philosophie der Geschichte als Soziologie* (4th ed. Leipzig, 1922), pp. 289 - 92

然而，人们在社会合作上的共识并没有导致在一切人际关系上的共识，在几乎所有人都同意把社会合作视为实现所有人目的（无论什么目的）最重要手段的同时，大家对在多大程度上进行社会合作最易于达到目的、以及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利用社会合作这两个问题存有分歧。

那些我们称之为和谐主义者的人，把他们的观点建立在李嘉图的协作定律和马尔萨斯的人口定律之上。同他们的批评者所持的观点不同，和谐主义者并不认为所有人在生理上是平等的。他们充分考虑了先天的生理差异在不同种族的人以及同种族的个体之间都广泛存在这一事实。李嘉图的定律表明，合作在劳动分工的原则下对所有参加者都有利。对每个人来说，与其他人合作都是有益的，即便与他合作的其他人在许多方面——智力和体能、技巧、勤奋以及道德品质上都不如他。从马尔萨斯的理论我们可以推导出，在一定的资本货物以及如何最佳利用自然资源的知识供给下存在一个最佳的人口规模，只要人口还没有超过这个规模，新增加的人口只会改善而不是破坏现有人们的合作情况。

在反和谐主义者的理论中，必须区分出在各种国家主义和种族主义学派中的两种不同的推理路线。一种认为在各种群体之间，例如国家或种族之间必然存在不可调和的对抗。在反和谐主义者看来，只有群体内部成员之间才存在利益共同体。每个群体和每个群体成员与其他群体及其单个成员之间在利益上的对立是不可调和的。所以，不同群体之间“自然”会有无休止的战争。各群体之间的自然的战争状态有时会因休战而中断，但这只是一种虚假的和平。有时在战争中也会有一个群体和另一些群体的合作，这种同盟只是政治上的权宜之计。长久看来，它们并不影响各种利益之间的自然冲突。在与同盟集团合作击败一些敌对集团之后，联盟中的优势群体会转而攻击先前的盟友，消灭它们并建立起自己的世界霸权。

国家主义和种族主义的第二种教条被它的支持者认为是从第一种教条推导出的一个合理结论。在他们看来，人类的环境陷于永远无可调和的冲突之中，首先是不同群体之间彼此争斗，然后，当主要群体取得最终胜利之后，在它与被奴役的其他人群之间会有持续的斗争。因此这个至高的精英群体必须随时准备战斗。首先是击败敌对群体，然后再镇压奴隶们的反抗。永久的备战状态要求把社会按照军队的方式组织起来。军队不是旨在为国家²⁴服务的工具；而是社会合作的最重要的部分，其它社会制度处于它的从属地位。个人不是一个共同体²⁵的公民；他们是武装力量的士兵，必须无条件的服从最高指挥官的命令。他们不享受公民权利，只承担军事义务。

因此，即使绝大多数人把社会合作视作满足一切目的的最重要手段，这一事实也没有为人们达成关于目的或手段的广泛共识提供一个基础。

3. 关于所谓“中世纪的全体一致”

在分析永恒的绝对价值的时候，我们必须提出的一个问题是，是否存在这样一个历史时期，在这个时期西方各民族因接受了一个统一的伦理规范体系而变得团结一致？

²⁴此处对应英文是 body politic，和下文的共同体（commonwealth）都可理解成“国家”，但是，这个国家不是通常理解的国家机器（警察军队等），而是组成国家的实体人民。

²⁵ commonwealth，指通过民众契约授权形式组成的政治实体。

公元四世纪之前，基督教教义的传播是通过人们的自愿皈依来进行的。从那以后，仍然有自愿皈依的个人和民族。但自从狄奥多西大帝²⁶时代开始，武力就在基督教的传播中充当者主要角色。异教徒和异端们被武力胁迫接受基督教的教义。在许多世纪里，宗教问题是通过大大小小的战争来解决的。军事行动决定国家的宗教归属。东方的基督徒被迫接受默罕默德的教义，而欧洲和美洲的异教徒却被迫接受基督教信仰。世俗权利在宗教改革派和反改革派之间的斗争中推波助澜。

当异教和异端被火与剑消除之后，中世纪欧洲曾经有过宗教的统一。整个西欧和中欧都承认罗马教皇为教宗。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所有的人具有相同的价值判断和行为原则。中世纪欧洲很少有人按照福音²⁷的训示生活。这在“关于骑士准则的真实基督徒精神”以及“支配骑士行为的宗教理想主义”等领域已多有著述。然而，却很难想象有比骑士准则更不符合《路加福音6:27-9》²⁸教义的。事实上，英勇的骑士并不爱他们的敌人，也不为那些诅咒他们的人祝福。并且，若人打他们的右脸他们绝不会把左脸也让人打。天主教会曾经有权阻止学者作家挑战教皇和公会²⁹制定的教条的权力，也曾有能力让世俗统治者屈从它的政治要求。但是，它唯有通过赦免大多数（如果不是全部）违抗了福音原则的俗人，才能维护自己的地位。决定统治阶层行为的价值观和教会鼓吹的截然不同，农民也没有按《马太福音6:25-8》³⁰的教导去做。当然，还有那些法庭和法官，全然不顾马太福音里的教训“你们不要论断人、免得你们被论断”³¹。

4. 自然法则的理论

自然法则理论的提出是寻求绝对永恒价值标准最重要的尝试。

各种哲学和法学学派都提出了“自然法则”这个术语。不少学说为证明他们的假设而诉诸自然。许多明显错误的论点也贴着自然法则的标签抛头露面。而要驳倒这么多学说的共同谬论并不困难。难怪一提到自然法则，许多思想家就会警觉。

不过，如果忽视所有的学说都包含着一个既不被无根据的奇想也不被批评影响的合理观念这一事实，将是一个严重的错误。早在古典经济学家发现人类行为领域内的各种现象中存在明显规律性之前，自然法则的拥护者们就隐约意识到了这一无可回避的事实。他们最终从自然法则名目下各种令人眼花缭乱的学说中形成了一系列无可挑剔的定理。其一，认为事物存在一个自然赋予的秩序，如果人要达到自己的目的，就必须根据这个秩序调整自己的行为；其二，人要认识这种秩序唯一的手段就是依靠思考和推理，现存的社会制度无一例外

²⁶Theodosius I (347-395)，罗马帝国皇帝，379-395在位。他在380宣布基督教为国教。

²⁷福音(Gospels, 字面意思是good news, 即“好消息”)，关于耶稣生平，传教活动，受难与复活的文字。通常说的福音书(或四福音书)是指新约圣经中的四部书：马太书、马可书、路加书、约翰书。这四部书也被称为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约翰福音。它们被认为是基督教义的基础。福音在很多时候也被用来泛指基督教义或基督信仰。

²⁸路加福音6:27-9:爱你的仇敌，善待恨你的人。为诅咒你的人祝福，并为虐待你的人祈祷。人若打你的一边脸，把另一边脸也给他打。

²⁹英文对应为council，教会领袖们聚集商讨重大事项的会议。

³⁰马太福音6:25-8:所以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甚么、喝甚么，为身体忧虑穿甚么。生命胜于饮食么，身体胜于衣裳么？你们看那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你们的父尚且养活它，你们不比飞鸟贵重得多么？你们哪一个能用思虑、使寿数多加一刻呢。何必为衣裳忧虑呢？你想野地里的百合花、怎么长起来，它也不劳苦、也不纺线。

³¹马太福音7:1-5:你们不要论断人、免得你们被论断。因为你们怎样论断人、也必怎样被论断。你们用什么量器量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为甚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却不想自己眼中有梁木呢。你自己眼中有梁木、怎能对你弟兄说、容我去掉你眼中的刺呢。你这假冒为善的人、先去掉自己眼中的梁木、然后才能看得清楚、去掉你弟兄眼中的刺。

都要接受分析推理的检验和评价；其三，没有用来评价任何个人或群体行为模式的标准，但却存在一种评价行为后果的标准。自然法则的终极逻辑结论，无可避免地指向理性主义和功利主义。

但社会哲学在走向这个必然结论的过程中被许多难以排除的障碍所阻挡。在这一过程中，无数陷阱和羁绊限制了哲学家。研究这些理论演化的兴衰应该是哲学史的任务。在我们的研究中，只需涉及两个问题。

在理性的教导和教会的教条之间曾经存在过对抗。一些哲学家打算把绝对的权威归于教会教条。他们宣称，真理和确定性只能在启示³²中发现。人的理性会犯错误，并且人永远也无法确定他的思索是否已被撒旦引入歧途。另一些思想家不接受这种解决对抗的办法。在他们看来，预先摒弃理性是荒谬的。理性同样来自于上帝，是上帝赋予了人理性，所以教会教条和正确的理性教导之间不会有真正的矛盾。哲学的任务之一就是展示这两者最终是一致的。经院哲学的中心问题就是论证人类理性在没有启示和圣经的帮助下，仅仅利用推理就可以证明启示教条的绝对真理。³³在信仰和理性之间不存在真正的冲突，自然法则和神的法则并没有分歧。

然而，这种处理问题的方式并没有消除对抗，它只是把对抗转移到了其它的领域。冲突不再是信仰与理性之间的，而是托马斯主义³⁴哲学与其它哲学之间的了。我们可以把创造论、道成肉身³⁵、三位一体等纯正的教条搁置在一边，因为这些与人际关系的问题没有直接联系。但是，在许多其它问题上，多数（如果不是全部）基督教会和宗派并不打算向世俗的理性让步，也不接受从社会功用的角度提出的神学观点。因而基督教神学对自然法则的认可是有条件的。它认可的是不反对基督教义的那一类自然法则，而涉及的教义则由教会和宗派各自的理解而定。这种认可并没有承认理性的最高地位，它和功利主义的原则是不相容的。

阻碍自然法则向一个统一的、综合的人类行为体系演化的第二个因素，是关于所有人在生理上都平等的错误理论。在对支持合法歧视和等级社会的那些观点加以批判时，许多倡导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人做过了头。他们宣扬“人类婴儿出生之时，不管各自的遗传，都和福特³⁶一样平等”的观点，这就否认了个体存在生理差异的明显事实³⁷，以至于影响了整个自然法则哲学的声誉。由于自然法则学说坚持这种生理平等的理论，因而把所有支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的合理论点都抛在了一边。同时也给那些宣扬合法歧视个人或群体的理论留下了传播的余地。歧视理论排挤自由社会哲学，导致仇恨和暴力、对外战争和内部革命，并使人类倾向于接受侵略性的国家主义和种族主义。

自然法则理论的主要成就在于它摒弃了有时被称为法律实证主义的学说，这种学说认为，成文法的最终来源在于立法者的军事优势，这些立法者能够用武力去征服任何违抗法令的人。而自然法则认为成文法可能是一种坏的律法，并且，通过和坏的律法比较，它把好的律法归因于源于神或是自然。不过无可

³² revelation 神学概念，指神意或神的真义的显现。

³³ Louis Rougier, *La Scholastique et le Thomisme* (Paris, 1925), pp. 102-5, 116-17, 460-562.

³⁴ 托马斯·阿奎纳 Thomas Aquinas (1225-1274) 中世纪神学家和经院哲学家。出身意大利贵族，天主教多明我会士。他的哲学和神学体系叫做托马斯主义，十九世纪末由教皇利奥十三世正式定为罗马教廷的官方哲学。主要著作有《反异教大会》和《神学大全》。托马斯认为人无须神启自身具有获得神学知识的能力，他把理性分析引入了神学。

³⁵ Incarnation [神学] 道成肉身：上帝之子耶稣由玛丽亚孕育并且耶稣是真正的神和真正的人的基督教教义。

³⁶ 指亨利·福特 (1863-1947)，福特汽车公司的创始人。

³⁷ Horace M. Kallen, "Behaviorism," *Encyclopaedia of the Social Sciences* (Macmillan, 1930-35), 3, 498.

否认的是，如果没有军事优势，即使是最好的法律体系也无法付诸实施。但自然法则的哲学家在明显的历史事实面前视而不见，他们拒不承认他们眼中的正义事业之所以能取得进展只是因为其支持者击败了邪恶事业的支持者而已。基督信仰的成功要归功于一连串的胜仗和运动，从大大小小的罗马元首和皇帝之间的战斗³⁸，到打开向东方传教大门的传教运动。美国独立事业的成功要归因于国内起义军和法军击败了英国军队。但不幸的事实是，战神总是站在拥有更多兵力的一方，而不是正义事业的一方。如果不认同这一点，则意味着相信武力冲突的结果是一场战斗考验，最终上帝总是会把胜利授予正义事业的斗士。但是这一假设将消除自然法则学说全部精髓的影响，因为自然法则的基本观点就是在当权者制定、颁布、执行的律法之外，有一个“更高”的律法根植在人性的最深处。

然而，自然法则学说的缺陷和矛盾不应当成为我们承认它核心内容的合理性的阻碍。在成堆的幻想和武断的偏见之间，隐藏着这样一个观点，即一个国家的每一条有效的法律都应该公开接受理性的检验。在这种检验的适用标准问题上，过去这一学派的代表者只有模糊的概念。他们诉诸于自然，并且不愿承认善恶的最终标准必须在法律产生的效果中寻找。最终，功利主义完成了自希腊诡辩家³⁹开始以来的智力演变。

不过，功利主义和其它任何一种自然法则学说都没有（也不能）找到一种能消除敌对价值判断之间冲突的办法。把自然奉为正确与错误的最高仲裁者是毫无意义的。因为自然并不能向人类清晰地展示它的计划和意图。因而借助自然法则是无法解决争端的，它只能以对自然法则理解的争议替代对价值判断的争议。同时，功利主义完全不涉及终极目的和价值判断问题。它总是只涉及手段。

5. 启示

诠释宗教的权威性和真实性源自上帝意愿向人类的传达。神的启示给予了信徒无可争议的确定性。

然而，人们在对真理的内容以及正确的、正统的解释上面存有很大的分歧。在各种信仰和教义之间，在对所有宗教情感的高贵、庄严和崇高的认识上都存在不可调和的冲突。即便能在历史真实性和诠释的可靠性上能取得一致，但各种注经解释的准确性问题依然存在。

每一种信仰都宣称具有绝对确定性。但是，没有一个宗教派别能够以一种和平手段让反对者自愿放弃谬误转而接受真正的教义。

如果不同信仰的人们聚在一起讨论他们的分歧，他们将无法找到对话的基础，而只能宣称，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⁴⁰所以，只要人们在判断效果的适用标准上存在分歧，启示这个功用主义的装置就会毫无用处。

宗教的绝对永恒价值无法消除价值判断的冲突。它只能引向宗教战争。

6. 无神论的直觉

³⁸ 指罗马帝国内部争权夺势的战争。

³⁹ Sophists, 职业哲学家或教师，尤其指属于公元前5世纪的一群专攻辩证法、辩论术以及修辞法的希腊哲学家，他们常以其精彩巧妙和似是而非的辩论而闻名。

⁴⁰ 马太福音 7:20: “所以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意思是通过行为来检验信仰。

另一些理论试图在不涉及到神的存在的情况下发现绝对价值标准。许多人尝试用一个新的信仰来替代旧的信仰，他们断然否定一切传统的宗教，并声称他们自己的教义是“科学的”。他们声称已确切地知道引导宇宙发展的神秘力量已经为人类所掌握。他们创造了一种绝对的价值标准，按照这种价值标准的要求，人类必须遵循的路线是“善”，而其它任何事物都为恶。在他们的词汇中，“进步”是善的同义词，“反动”是恶的同义词。不可避免的进步必然战胜反动，因为人不可能改变神秘的原动力⁴¹所指示的历史进程方向。这便是卡尔·马克思的形而上学，当代自封的进步主义信仰。

马克思主义是一个革命的学说。它明确宣称原动力的计划将通过内战实现。它暗示最终在这些战争中，正义的也就是进步的事业必定成功。而后，所有关于价值判断的冲突便会消失。随着对反对者的清除，绝对永恒价值无可争议的至高地位将会被建立。

这种解决价值判断冲突的方式当然并不新鲜。自上古时期起这种手段就为人所熟知。杀死不信教的！烧死异端！唯一新鲜的事实是，如今这个理论贴着“科学”的标签被推销给公众。

7. 公正的观念

驱使人们寻求绝对不变的价值标准的动机在于这样一个假设：和平协作只有在那些持有相同价值观的人们之间才是可能的。

显然，假如绝大多数社会成员不认为社会协作是达到所有目的的手段，那么社会协作就不会演化和延续至今。在追求保存生命和维护健康、最大限度地消除不安的努力过程中，每个人都把社会视为一种手段，而非目的。当然在这一点上，人们也没有完全达成一致。不过，我们可以忽略禁欲者和隐士的反对意见，这倒不是因为他们人数很少，而是因为他们的（禁欲和隐居）计划不会因为（其他）人们为了追求各自的目标而在社会中合作而改变。

在社会组织的最佳方式这一问题上，不同社会成员之间存在广泛的分歧。不过这个分歧只同手段有关，与终极目的无关。因此在讨论相关问题时，可以完全不涉及价值判断。

当然，几乎所有人在以传统方式指导处理伦理规则时都专横地批评了这一说法。他们声称，社会制度必须公正，他们仅仅根据社会制度达到一定目的的适应性来判断其是低级的，而不管从任何其它角度看来这些目的是否有价值。首先要关心的是公正。这种思想的极端形式可以在以下名言中找到：正义不惜代价⁴²，即使毁灭世界，也要伸张正义。多数公正原理的支持者会因为其过分、荒谬和似是而非而摒弃这个格言。不过，这个格言和绝对公正的武断概念相比只是略微更加惊人，而不是更荒谬。它清楚地暴露了直觉伦理学所用训练方法的错误。

这门规范的准科学的程序是要从直觉中推导出一些规则，好像这些规则作为行为的指导不会影响获得任何其它有价值的目的。伦理学家们不必因为他们的假设一旦实现所带来的必然后果担心。这里我们无需讨论一些人的态度，这些人或者（无论是否有意选择）显然只是把公正当成借口，或者只是掩饰他们的短期利益；也不必揭露诸如公平价格和平等工资等流行概念所包含的拼凑

⁴¹ 英文为“prime mover”，本为神学用语，指上帝是一切运动和生命的创造者。此处指推动历史发展的动力。

⁴² 原文“fiat justitia, pereat mundus”，也译作“世界毁灭，正义犹行”。

起来的公平概念的虚伪性。⁴³而那些在论述中赋予公正最高价值、并把这一准绳用于衡量所有社会制度的哲学家们倒不属于这一类欺骗者，他们并没有通过宣称只有他们才是正义的、公平的、善的，并把所有的反对者描述成非正义事业的支持者，以这种方式来支持自私群体的利害关系。这些哲学家们是柏拉图主义者，他们相信有一个永恒的绝对公正的观念存在，而人的责任就是遵照这个观念来组织整个人类的社会制度。人们对公正的认识是内心的召唤也是直觉给予的。这个学说的支持者们没有过问如果实施他们所谓的公正的计划将会有什么后果。他们暗自假定，要么这些后果会是有益的，要么人类注定是要忍受即使十分痛苦的公正的后果。更糟糕的是，这些道德先生们没有注意到如下事实：一方面，人们在解释内心召唤时既会存在分歧；另一方面，又不存在和平解决这种分歧的方法。

所有这些伦理学说都未能理解到这一点，即无论是暂时的还是从逻辑上讲，在社会纽带和活动（即社会的存在）之外，“公正”这个称号是毫无意义的。一个假想中的孤立个人在生物竞争的压力下必定把所有其他人都视为死敌，他唯一关心的是保全他自己的性命和健康。他不必在意他的生存会给其他人带来什么样的后果，他不需要公正，他只对个人的健康和安全感感兴趣。但是在与其他人的社会协作中，个人被迫放弃那些和社会生活不相容的行为。而唯有此时，什么是公正与什么是不公正的区别才会出现。公正必然涉及到社会人际关系，它是对个人有益并且也不影响其他人的东西。例如在人们使用某些药物时要遵循的一些规则，这便成为了卫生学的内容。

（判断是否）公正的终极尺度是对保存社会协作有益处。适于保存社会协作的行为是公正的，有害于社会协作的行为是不公正的。依据一个武断臆测的公正观念作前提假设来组织社会是不可能的。对社会的组织只能从最大限度地实现人们在社会协作中得到预期收益的角度来进行，即社会效用是唯一的公正标准，也是立法的唯一指导。

因而，在自私自利和利他主义之间、经济学和伦理学之间以及个人利益和社会效用之间都没有不可调和的冲突。功利主义哲学及其最杰出的产物——经济学，把这些明显的对立物简化为短期和长期利益的对立。倘若全体社会成员在“正确理解的利益”上不能达成一致，社会将无法存在，更谈不上延续。

处理社会组织和社会成员行为方面的问题只有一条途径，那就是人类行为学和经济学的办法，其它的方法在阐明这些问题时都无能为力。

法学上把公正的概念用于合法性，也就是从一个国家有效法令的角度来认识的合理性。它的意思是说公正源自现存的法律⁴⁴，在提议立法和制定法律时，法学对法律“应该是什么样子”无话可说。制定新法和废除旧法是立法机构的任务，它的唯一标准就是社会效用。

立法者从律师那里只能得到法律技术上的帮助，而不是法规思想上的。

关于“应该怎样”的科学——规范科学并不存在。

8. 再谈功利主义

功利主义哲学在应用于社会问题时的主要观点可以概括如下：

⁴³ See Mises, *Human Action*, 1st ed. 1949, pp. 719 - 25; 4th ed. 1996, pp. 724 - 30.

⁴⁴ from existing law 来自现有法律

在其它条件相同时，通过按劳动分工原则的社会协作，人的努力可以获得比孤立个人条件下更大的单位投入产出。人的理性可以认识到这一事实并对其行为做出相应的调整。因此，社会协作就成了几乎每个人达到一切目的的主要手段。人类有着特殊的共同利益，这要保持并强化社会纽带，并取代无情的生物竞争，而生物竞争是动植物生存的显著标志。人作为一种社会动物，他不再受必然的自然法则的驱使而把自己所有的同类视为死敌。对动物而言，同类每一个新成员的诞生都意味着在生存的斗争中多了一个新对手。

对人而言，在达到最佳人口之前，新成员的增加对他追求物质福利的事业是一个改善而不是破坏。

人尽管取得了很多社会成就，但在生物学上仍然是哺乳动物。他最急迫的需求是衣、食、住。只有当这些需求得到满足之后他才会关心其它的需求，特别是人类特有的需求或被称为人类的特殊与高级需求。通常，至少在一定程度上，这些需求的满足也取决于各种实际物质资料的供应。

对于行动人而言，社会协作只是一种手段而不是目的，所以社会协作不需要事先在价值判断上达成一致。事实上，几乎所有人都追求一定的目的，追求被那些象牙塔内的伦理学家们贬为低级和平庸的快乐。另一个事实是，在人们的动物身体的需求最先得到满足之前，不可能去追求那些哪怕是最高尚的目的。生活在社会之外的人无法进行哲学、艺术和文学等最伟大的探索。

伦理学家把那些寻求事物自身价值的人称赞为高尚的人。理查德·瓦格纳⁴⁵宣称“德国人就是探求自身价值”，纳粹恰恰采用了这个格言，作为他们信条的一个基本原则。现在，被作为终极目的追求的事物，要根据完成它所获得的直接满足程度来进行评价。简略地说就是“为本身的缘故而追求”而无妨。瓦格纳的警句可以简化为一个真理：终极目的是目的，而不是达到其它目的的手段。

伦理学家们更是攻击功利主义，把它指责为（伦理）物质主义。这里，他们同样曲解了功利主义学说。功利主义的精髓在于他们认识到，行为总是在追求由人们所选择的一定目的，因而评价行为的标准只能是它取得的效果如何。道德规范的作用是保存世界，而不是毁灭世界。我们可以将它应用于引导人们去忍受不受欢迎的短期效果，以避免产生更不受欢迎的长期效果。但是伦理学家绝对不能仅仅为了服从来自直觉的武断教条而推荐有可能产生的令他们自己也不想要的行为后果。“正义不惜代价”的准则是荒谬的，一个没有充分考虑行为后果的伦理学说只能是幻想。

功利主义并非教导人们只追求感官的快乐，尽管它意识到不少人正是这样做的。功利主义无意沉迷于价值判断，它强调社会协作对大多数人而言只是达到目的的手段，消除了把社会、国家、民族或其他任何社会实体作为终极目的、而个人则是社会实体的仆人的观念。它批判了普救说⁴⁶、集体主义及极权主义哲学，在这个意义上，可以把功利主义称为个人主义哲学。

集体主义学说没能看到社会协作只是人们达到一切目的的手段。它假定在集体和个人利益之间总存在着不可调和的冲突，在这种冲突中，它总是无条件地站在集体一边。（这种理论认为）单独的集体真实存在；个人的存在以集体

⁴⁵ [“To be German is a thing to be sought for its own sake.”] In *Deutsche Kunst und Deutsche Politik*, *Samtliche Werke* (6th ed. Leipzig, Breitkopf and Hartel), 8, 96.

⁴⁶ universalism, 一种宗教和神学理论，一般认为所有人和造物都和神（上帝）有关系，并会被神接受。

的存在为条件。集体是完美无缺永远正确的；个人是卑鄙、顽固的。个人的固执必须由权威人士来加以控制，神或自然把管理社会事务的责任托付给了后者。使徒保罗说，权力来自于神。⁴⁷无神论集体主义者说，权力来自于自然或指导整个宇宙万物运行的超人因素。

这里立刻就产生了两个问题：第一，如果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真的无法调和地彼此对立，社会怎能运行？只可能假设个人会在武力的监控之下才不会公开反抗。但仅仅使用强迫是无法确保他们积极协作的。如果在一种生产制度下唯一的工作激励来自于对惩罚的惧怕，那么这种制度是难以为继的。事实上，这就是奴隶制度作为一种生产管理制度灭亡的原因。

第二，倘若集体不是个人达到目的的手段，倘若集体的兴旺需要个人作出牺牲，而这种牺牲超出了社会协作带来的优势，那么是什么促使集体主义的拥护者把集体的利益放在个人的意愿之前优先加以考虑？除了个人的价值判断，其它的论据能否支持对集体的推崇？

当然，每个人的价值判断都是个人的。如果一个人赋予集体利益比个人利益更高的价值，并做出具体行动，这只是他个人的事情。如果集体主义哲学家按这样的思路进行，我们并不反对。但是他们另有说法，他们把他们个人的价值判断提升到绝对价值标准的神圣地位。他们要求其他人放弃按照自己意愿做出的价值判断，无条件地接受那些被集体主义赋予绝对永恒正确性的准则。

当我们反思各种集体主义的党派为获得个人的绝对效忠而彼此争斗时，集体主义观点的无意义和武断性就更加明显。即使集体主义在他们各自的理想中使用相同的词汇，各个理论家和领导人对其头脑中集体概念的基本特征还是存有很大的分歧。被拉萨尔⁴⁸称为神并赋予了无上地位的国家，还有黑格尔与斯泰尔崇拜的集体主义偶像——霍恩索伦王朝并不一样。人类作为一个整体是唯一的合法集体，还是各个国家都是一个合法的集体？瑞士德语区所忠于的瑞士联邦是一个集体，还是包括所有讲德语的人们的社会共同体是一个集体？所有主要社会实体例如国家、语言群体、宗教团体、政党组织等都被提升到超越其它集体之上的最高集体的崇高地位，要求每个思想健全的人放弃全部的人格，屈服于它。但是一个人只能对一个集体放弃自主权，无条件地屈服于它。人们只能借用相当武断的决定来选择应该屈从的集体。集体主义的信条必定是排他的、极权主义的。它要求信徒全身心的投入，不允许任何其它的集体来分享这份忠诚。它寻求建立唯一的、最高的价值体系。

当然，只有一种方法可以使某人自己的价值判断至高无上，那就是他必须让所有的反对者屈服。这就是所有各种集体主义者的代表们正在努力奋斗的事情。他们最终推荐使用暴力，无情地消灭掉被他们谴责为异端的人。集体主义是战争、偏狭以及迫害学说的根源。如果任何一种集体主义的信条实现了它的企图，所有人，除了大独裁者之外，都会被剥夺基本的人权。人们会成为魔鬼手中没有灵魂的走卒。

自由社会的特征在于尽管事实上社会成员在许多价值判断上存有分歧，但社会依然能运转。市场经济中，商业不仅满足多数人的需求，同时也为少数人服务，只要他们的数量满足经济生产的最低要求。尽管哲学论著读者甚少，尽

⁴⁷ 罗马书 13:1: 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

⁴⁸ Ferdinand Lassalle 芬迪纳德·拉萨尔（1825-1864），德国法理学家及社会主义活动家。

管大众更喜欢其它的书或者根本就不读书，但哲学论著依然能出版，只要预期能收回成本。

9. 关于美学价值

对绝对价值标准的追求并不限于伦理学领域。它也与美学价值有关。

在伦理学上，只要人们都认为保存社会协作是达到各自目的最重要的手段，就能找到选择行为准则的共同点。因此，实质上任何关于行为准则的争论都只涉及到手段而不是目的。可以从这些准则是否适合社会和平运行的角度来评价它们，即使是直觉主义伦理学的忠实支持者，最终也必须借助根据对人类幸福的影响来评价行为的方法。⁴⁹

美学的价值判断有所不同。在这个领域，缺乏类似于“社会协作是达到任何目的最重要的手段”之类的普遍共识。这里，所有的分歧都和价值判断有关，没有人关心选择什么手段去实现那些达成共识的目的。但是，调和价值判断的冲突是不可能的；没有一个标准可以用来矫正“我喜欢它”、“我不喜欢它”的结论。

人类内在的，把思想和行为的各个方面实体化⁵⁰的“不幸”倾向，导致人们试图给美下定义，并把这个武断的概念当成一个尺度。然而，除了“使人喜悦的事物”之外，并没有一个可接受的关于美的定义。美并无标准，并且，美学也不是一门规范科学。除开历史和技术上的评论之外，职业艺术、文学评论家能说的也就是他喜欢或不喜欢一件作品了。而这件作品可能会激发他发表渊博评论和撰写专题论文，但他的价值判断仍然是个人的、主观的，并且不一定能影响其他人的价值判断。有识别能力的人会感兴趣地注意到，一位有思想的作者所讲的某件艺术作品给他留下的印象。不过，一个人的价值判断是否会受到其他人的影响，只取决于他自己的辨识能力，无论别人（其他人）是如何地优秀。

对艺术和文学的欣赏需要具有一种特定的品质和对公众的敏感性。品味只对少数人是天生的，其他人则必须培养他们在文艺欣赏上的才智。一个人要成为一位鉴赏家，必须学习和经历很多事情。但是，即使一名专家以见闻广博出众，他的价值判断仍然只是个人的、主观的。在这一点上，最杰出的批评家，还有最负盛名的作家、诗人和艺术家，在鉴赏传世杰作时彼此分歧极大。

只有虚伪的学究才会认为，有一个绝对的规范可以鉴别出什么是美、什么是丑。他们试图按照他们的设想，从过去的作品之中找到一个未来的作家和艺术家应该遵守的规则。不过，天才从不买学究的帐。

10. 寻求绝对价值的历史意义

⁴⁹ Even Kant. See *Kritik der praktischen Vernunft*, Pt. I, Bk. II, Sec. I (Insel-Ausgabe, 5, 240-1). Compare Friedrich Jodl, *Geschichte der Ethik* (2d ed. Stuttgart, 1912), 2, 358. 即使康德。见《批判现实的原因》Pt. I, Bk. II, Sec. I (岛出版, 第5版 240-241页) 弗里德里希 比较约德尔《伦理史》(第2版, 斯图加特, 1912年), 第2页, 35-38页

⁵⁰ Hyostatize 使实体化, 使具体化, 实体化 (hyostatization, also known as Reification or concretism) 指的是把抽象的事物当作具体、真实事物或物理实体来对待或描述的谬误或混淆。

对价值的辩论，不是一场只有吹毛求疵的教授们才感兴趣的学术争论，它涉及到人类生活的一些关键问题。

被近代理性主义所取代的世界观不能容忍价值判断上的不同意见，单纯的异议被视为傲慢的挑衅——对某人个人感情的致命侮辱。漫长的宗教战争随之而来。

尽管在宗教事务中仍然残留有一些不宽容、顽固和对迫害的贪求，但近期内宗教热情不会引发战争。我们时代的好斗精神来自于另一个源头，即企图实现国家极权以及剥夺个人自主权。

事实上，社会主义和干涉主义计划的支持者们之所以推荐这些手段，只是为了达到和社会其他成员共同的目的。他们认为，按照他们的原则组织起来的社会能最好地提供给人们努力要获得的物质财富。难道我们还能想象出比马克思所讲的“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高级阶段”更好的社会形态吗？

然而，社会主义者在试图证明他们的理论方面是完全失败的。针对社会主义计划中的一些小难点，即使在马克思那个时代就有人提出了有根有据的反对意见，马克思一片茫然，不知如何反驳。正是在这方面的无助促使他发展了他的理论的三个基本学说。⁵¹当后来经济学证明社会主义体制因必然缺少经济计算的手段，而无法作为一个经济制度运行时，所有支持这场伟大变革的辩论顿时土崩瓦解。从那时起，社会主义者就不再把希望寄托在他们辩论的力量上，而是转而依靠民众的愤怒、嫉妒和仇恨。今天，即使最老练的“科学”社会主义也全部依靠这些感情因素。当代社会主义和干涉主义的基础是价值判断，社会主义被赞扬为唯一公平的社会经济组织形式。所有的社会主义者，包括马克思主义者和非马克思主义者，鼓吹社会主义是唯一符合一个武断的绝对价值观尺度的社会制度。他们宣称，这些价值观是所有正派人，尤其是在近代工业社会中占多数的工人们唯一的价值观。这些价值观之所以被认为是“绝对”的，因为支持的是多数人，而多数人总是正确的。

在对政府问题的认识上有一种表面而肤浅的观点认为，自由和专制的区别在于统治和管理制度的外在特征，也就是行使社会威压和强迫工具直接控制权人数的多少。这种数字标准是亚里士多德著名的关于各种政府形式分类标准的基础。君主政治、寡头政治以及民主政治的概念仍然是保持着这种处理问题的方式。然而，它的不当是如此明显，所有哲学家都难免会提到因为同它矛盾而被视为荒谬的一些事实。例如，一个广为希腊作家熟悉的事实就是，独裁者经常，甚至规律性地，受到群众的支持。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它是民治政府。现代学者用“专制政治”（Caesarism）这个词来形容这种形式的政府，并一直把它看作特殊环境下的一种例外形式。但是，他们却无法令人满意地解释出是什么导致了这种特殊情况。然而，只要似乎能解释法兰西第二帝国这个近代欧洲历史的例子，在政府形式问题上被传统分类方式迷惑的人们，就会默认这个肤浅的解释。只有当人们面对“无产阶级专政”、希特勒、墨索里尼、布隆以及其他希腊暴君的现代继承者的残暴时，亚里士多德的学说才最终崩溃。

两百年前，大卫·休谟的不朽著作《论政府的首要原则》开启了真正区分自由与奴役的道路。在书中，休谟教导说，政府总是少数人管理多数人的政府。因而权利最终总是在被管理的人这一边；对管理者而言，唯有从舆论可以得到支持。这一认识及其逻辑结论，完全改变了关于自由的讨论。机械的、算术式

⁵¹ Mises, *Socialism* (Indianapolis, Liberty Fund, 1981), pp. 5 - 6.

的观点被抛弃。如果公众舆论最终决定政府结构，那么它也是决定自由或是奴役的力量。实际上，只有一种因素能够使人民失去自由，那就是专制的舆论。争取自由的斗争最终不是反抗暴君或寡头们，而是反抗舆论的专制。这不是多数人对少数人的斗争，而是少数——有时是只有一个人的少数对多数人的斗争。最糟糕、最危险的专制统治形式是不宽容的多数人的专制统治。这是托克维尔⁵²和米勒（John Stuart Mill）得出的结论。

在关于边沁⁵³的论文中，米勒指出了为什么这个杰出的哲学家没能看到问题的实质，以及为什么他的理论被一些最伟大的人物接受。米勒指出，边沁生活在“一个反对近代欧洲贵族统治的时代”，他那个时代的改革家们“惯于看到处处都有大多数人受到政府的不公正压迫、蹂躏和被忽视（后者是最好的情况）”。在这样的时代，人们容易忽略，“一切持续进步或保持强大的国家，都是因为对统治权利存在有组织的反抗，而无论这个统治权利是什么性质的...”几乎所有历史上最伟大的人物组成了这种反抗的一部分。在这种斗争无法继续的地方，在参与斗争的一方因完全胜利而中止并且又没有新的竞争出现的情况下——社会或者僵化成如近代中国似的停滞，或最终解体⁵⁴。

边沁政治理论的许多合理部分被他同时代的人所忽视，也被后代所否认，最终没能产生实际影响。但是他在区别专制和自由问题上的错误理论却被多数19世纪的思想家毫无保留地接受了。在他们的眼里，真正的自由意味着不受约束的大多数人的专制。

由于缺乏逻辑思考的能力以及对历史和理论的无知，许多受人崇拜的“进步”思想家放弃了启蒙运动的精髓理念，包括思想、言论以及交流的自由。他们中并非所有人都像孔德⁵⁵和列宁一样直白地表达自己的意见。但是，他们都宣称，自由只意味着表达正确观点的权利，而不是表达错误观点的权利。实际上，这已经把思想和意识自由的理念变成了相反的东西。这并不是教皇庇乌九世为回归偏狭和重新迫害异议者所铺路的纲领，而是社会主义者的著述。在自由理念的短暂胜利之后，作为自由哲学的实现和补充，作为未完成革命的终结，作为对个人的最终解放，奴役戴着众多伪装面具卷土重来。

绝对永恒价值观的概念是这个极权意识形态不可或缺的要害，由此确立了一个新的真理概念，真理就是当权者宣称为真实的事物。持异议的少数人因为拒不接受多数人的意见，因而显得不民主。而用以“清算”这些反叛的无赖的任何手段都是“民主的”，因而在道德上也是正确的。

⁵² Alexis-Charles-Henri Clérel de Tocqueville (1805-1859)，法国政治思想家和历史学家。

⁵³ Jeremy Bentham (1748-1832)，英国法理学家、哲学家，法学和社会改革家。

⁵⁴ “John Stuart Mill on Bentham”，ed. by F. R. Leavis under the title *Mill on Bentham and Coleridge* (New York, Stewart, 1950)，p 85-87.

⁵⁵ 奥古斯特·孔德 (1798-1857)，法国哲学家，社会学、实证主义的创始人。

第四章 否定价值判断

在对待价值判断时，我们把它们视为不可还原为其它事实的最终事实。我们并非主张把价值判断当作人所发出并用做行动指南的、独立于所有宇宙其它条件的事实。如果这样认为，那将是荒谬的。人是宇宙中的一部分，是宇宙中各种力量运作的一个产物，并且所有人类的思想 and 行为如同星辰、原子以及动物一样，都是自然的元素。它们都根植于一切现象和事件无情的锁链之中。

把价值判断视为终极已知，意味着人类思维无法把价值判断还原为自然科学可以处理的事实和现象。我们不知道外部世界的一定条件是如何激起了人类大脑的特定反应，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不同的人以及同一个人在生命中的不同时刻会对相同的外部刺激有不同的反应。我们找不到外部事件和人脑由此产生的思想之间的必然联系。

为搞清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对支持相反观念的学说加以分析。我们必须对各种唯物主义加以分析。

第二部分 决定论与唯物主义

第五章 决定论及其批评者

1. 决定论

无论宇宙和本体的真实性质是怎样的，人都只能认识到他的思维逻辑结构所能理解的内容。理性作为人类科学和哲学的唯一工具，并不能传达绝对知识和最终的智慧，思索终极的事情是徒劳的。对人来讲已经是极限，无法再做进一步分析也无法还原为更基础的事物，对另一种更高级的智慧来说也许并非如此。对这一点，我们无从知晓。

人无法领会绝对虚无和从虚无中创造出事物⁵⁶的概念，创造的概念超出了人的理解。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⁵⁷的神，被帕斯卡在他的回忆录里贬为属于“哲人和学者”的神，但对虔诚的信徒来说，是一个有生命的图像并且有确切的意义。然而那些致力于构建出上帝、上帝的属性以及上帝在世界事务中的操行概念的哲学家却陷入了无法解决的矛盾和悖论之中。凡人能清晰界定并定义其本质和行为方式的上帝将不同于先知、圣徒和神秘主义者的上帝。

人类思维的逻辑结构把决定论和因果关系范畴强加在人身上。正像人所看到的一样，宇宙中无论发生什么事都是力、能量和事物性质演化的必然结果，而这些都是万物之源的x初始时期就已经存在。宇宙万物都是相互联系的，所有的变化也都是事物内在力量的结果，没有一个变化不是前一个状态的必然结果。所有事实都依赖并取决于它们的原因，不可能背离事物发展的必然进程。永恒的规律主宰着一切。

在这个意义上，决定论是人类探求知识的认识论基础。⁵⁸人甚至无法想象出一个不确定的宇宙图像。在这样的一个世界里，可能无法觉察任何具体物质和它们的变化，那将是一个无意识的混沌。任何事物都无法确定也无法和其它事物区分开来，没有事物是可以预料和预言的。在这种环境之中，人就像处于一个讲陌生语言的人群之中一样无助。无法计划任何行为，更谈不上执行了。人之所以为人，是因为生活在规律性世界之中并且具有理解因果关系的思维能力。

任何认识论上的思索必然导向决定论，但是接受决定论又会引起一些看起来无法解决的理论难题。尽管还没有一种哲学理论能驳倒决定论，然而在有些问题上，人们无法用决定论取得一致意见。因为人们相信决定论必然最终会导致荒谬，所以猛烈地攻击它。

⁵⁶ 指的是圣经（创世记）中的上帝从虚无中创造出万物。对事物本源的探索必然会涉及到最初“无中生有”的问题。

⁵⁷ 亚伯拉罕是以撒的父亲，以撒是雅各的父亲。雅各是以色列人的祖先。因亚伯拉罕与上帝立约，所以以色列人成为神的选民。（见创世记 12-35 章）

⁵⁸ “La science est déterministe; elle l’ est *a priori*; elle postule le déterminisme, parce que sans lui elle ne pourrait être.” Henri Poincaré, *Dernières pensées* (Paris, Flammarion, 1913), p. 244. [“Science is deterministic, *a priori*; it needs determinism because without determinism science could not exist.”]

2. 对意识形态因素的否定

由于决定论完全意味着一贯的唯物主义，许多思想家认为它严格否认事务进程中存在任何精神作用。按照这种理解，因果关系意味着机械的因果关系。一切变化都是由物质的实体、过程和事件产生的。思想⁵⁹只是在一种物质因素产生一种确定的物质效果的过程之中的一种中间状态，它们并不独立存在。它们只是反映产生出它们的物质实体的状态。没有思想的历史，也没有受思想指导的行为的历史⁶⁰，只有产生思想的真实的物质因素的发展历史。

从这个完整⁶¹的唯物主义理论的角度来看，历史学家和传记作家惯用的方法将被作为唯心主义的荒谬行为而遭摒弃。从早先的其它思想中寻找现在某些思想的发展是徒劳的。例如，描述17世纪和18世纪的哲学思想如何从16世纪的哲学思想发展而来，这是“不科学的”。“科学的”历史应该描述每个时代的哲学理念是如何必然从这个时代的现实物理和生物条件下生长出来的。把圣奥古斯丁的思想的发展描述成从西塞罗到摩尼、然后从摩尼的教义到天主教义的精神过程也是“不科学的”。“科学的”传记作家一定要揭示导致哲学思想必然产生的相应的生理学过程。

有关唯物主义的分析将是下面章节的任务。这里我们只要确认决定论本身并不意味着对唯物主义观点的任何让步这一事实就足够了。对于思想独立存在，一个思想对另一个思想的出现会有贡献并彼此影响等显而易见的事实，决定论并不否认。它不否认精神的原因，也不把历史贬为一个形而上学的唯心主义的幻想。

3. “自由意识”之争

人们在彼此不相容的行为模式中选择。自由意志学说认为，这种决定基本上是不确定和非外因引起的，也不是一些先行条件不可避免的结果。更确切地说，选择决定是人们内心倾向的表现，是无法磨灭的精神自由的证明。这种精神自由是人的本质特征，人因此在宇宙之中被提升到一个独特的位置。

但决定论者把这个学说驳斥为“虚幻的”。他们认为，人自我欺骗以使自己相信是他在做选择。（实际上）不为个人所知的某事物指挥着人的意愿，他还以为那是自己头脑对各种可能选项的利弊权衡了一番才做出的决定。他没有认识到事物的先行状态已经给他强加了一条确定的行为路线，没有办法可以逃出这种强制。从这个意义上讲，人不能行动，他是行动的对象。

这两种理论都没能给予思想所起的作用以应有的关注。人的选择是由他所采纳的思想决定的。

发生的任何事情都是事物的先行状态的必然结果，决定论者的这一断言是对的。人在生命中的任何时刻所做的一切都取决于他的过去，也就是，他的生理遗传以及在过去他所经历的一切。然而由于人们对思想产生的方式一无所知，这个论点的重要性就被大大地削弱了。决定论如果以唯物主义为基础或是和唯

⁵⁹ 指的是和物质相对的，人脑活动的产物。

⁶⁰ 如果思想不能独立存在，只能反映出物质状态，当然也就没有思想的历史；不能指导行为，也就没有受思想指导的行为的历史。

⁶¹ 英文对应为 consistent，完整的，或直译为“连贯一致的”，指一种理论能自圆其说，不存在前后矛盾。

物主义关联起来就会站不住脚。⁶²但如果没有唯物主义的支撑，决定论实际上什么也没说，并且也肯定无法再坚持对历史方法的抵制。

自由意志学说在指出人类行为和动物习性之间存在根本差异上是正确的。动物对一时的生理冲动无法控制，人却能在不同行为模式之间选择。人甚至在满足最迫切的自卫的本能和致力于其它目的之间进行选择的能力。实证主义者的所有讽刺与嘲笑也不能抹杀的事实是：思想是真实存在的，并且也是塑造事物进程的真正因素。

人类思想成就的分支——那些指导个人行为的观念以及价值判断——是无法追溯到起因的，在这个意义上，它们就是终极已知。我们得借助“个性”的概念来处理这些问题。不过，我们使用这个概念绝不是说思想和价值判断是以一种自然发生的方式突然跳出来的，也不是说它们和之前宇宙中已经存在的事物毫无关联。我们只是确立一个事实，即我们对人体内部对物理和意识形态环境状态做出反应而产生思想的精神过程一无所知。

这个认识是自由意志论中仅有的一丝真理。然而，那些试图驳斥决定论以及营救自由意志这个概念的热情尝试与个性问题无关。正如人们所相信的那样，它们（这些尝试）是被决定论必然导向的实际后果——宿命论的静寂主义⁶³以及道德责任的免除⁶⁴所促使的。

4. 宿命与宿命论

神学家的说教是，上帝永远以他无所不知的能力预测宇宙将发生的事情。他的预见能力是无限的，并且这种预见能力不仅仅是因为他知道决定一切事物生成规律的结果。即使在自由意志⁶⁵存在的宇宙也是一样——无论自由意志是什么——他的预见能力是完美的。他能完全正确地预见任何个人将会做出的一切武断决定。

拉普拉斯⁶⁶曾自豪地宣称他的体系不需要借助上帝存在的假说。但他还是把他本人塑造成“半人半神”形象，并将其称之为超人智慧。这个假定的大脑，仅仅因为熟知所有永恒不变的、控制一切（包括精神的和物质的）事物发生的规律，就得以预先知道所有的事和物。

上帝的无所不知通常都被想象成一本记录了所有未来事物的书，所有事物发生时都将和这本书里描写的完全一样，和这个记录描述不一致的事情是不可能发生的。无论凡人采取什么措施企图带来一个不同的结果，但该发生的一定会发生。因此，公认的宿命论认定，人类的行为是无意义的，如果万事万物最终必然归向一个预定的结果，为什么还要自寻烦恼呢？

宿命论和人类本性是如此地相悖，极少人愿意认同它所得出的全部结论并以此来相应调整他们的行为。关于最初几个世纪的阿拉伯征服者的胜利是因为莫哈默德宿命论教义的说法只是一个神话。穆斯林军队的领导们在难以置信的

⁶² 参见下文第六章唯物主义。

⁶³ 静寂主义 Quietism，指十七世纪欧洲的一种基督教哲学，参见维基百科 <http://en.wikipedia.org>，Quietism 条。

⁶⁴ 个人道德责任的免除是决定论的一个必然逻辑结论，亦即在决定论的前提下，个人不必对任何行为承担道德责任。

⁶⁵ 自由意志 (free will) 是哲学思想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对这个问题的思考和意见分歧是决定论和非决定论的焦点。神学上的自由意志一般指，虽然神是全知全能的，但是他并不干预个人的意志和选择，也就是说人是有自由意志的，并且有选择善与恶的自由。

⁶⁶ Pierre-Simon, marquis de Laplace (1749-1827)，法国数学家、天文学家，《天体力学》的作者。

短时间内征服了大部分地中海地区。他们对阿拉⁶⁷并没有宿命论的信心，而更相信他们的神青睐强大的、装备精良、指挥有素的军队。不是对宿命的盲目相信，而是其它原因激起了撒拉逊武士的勇气。尽管阻止了撒拉逊人前进的查尔斯·马太尔（Charles Martel）以及狮子伊索瑞恩（Leo the Isaurian）⁶⁸军队中的基督教徒不相信宿命论，但是他们依旧如穆斯林一样勇敢。后来，弥散在大部分伊斯兰民族中的停滞不前也不是他们宗教的宿命论导致的，而是专制麻痹了臣民的进取心。压迫大众的残暴的独裁者一点也不死气沉沉、无精打采，他们在不知疲倦地追求权利、财富和享乐。

占卜者宣称他们至少掌握了几页那本记载了所有将来事件的天书上的知识。但是，这些预言者没有一人能拒绝行动主义，并要求自己的弟子们安静地等待预言实现的日子。

马克思主义提供了最好的例子。它宣传的是完全的宿命，但却还致力于以革命精神鼓动人们。倘若无论人怎么做，一切都将无可避免地按照一个预定的计划发展，革命行动又有什么作用？如果按照无可动摇的自然法则，社会主义无论如何都注定要实现，为什么马克思主义者还要忙于组织社会主义政党并积极破坏市场经济的运行呢？宣称社会主义政党的任务不是实现社会主义而仅仅是催生社会主义的诞生，其实是个蹩脚的借口。同样，助产士也改变了事物的进程，倘若没有她的干预，事物会是另外一个样子。如果不是这样，孕妇不会要求她的帮助。然而，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的实质教义仍然排除了任何政治或意识形态的事实会影响历史事件进程的假定，因为后者完全被物质生产力的演变所决定。产生社会主义的是“资本主义生产内部固有规律”运行的结果⁶⁹，思想、政党、革命行动仅仅都是上层建筑；既不能延迟也无法加速历史的脚步。当它出现的物质条件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子宫里成熟后，社会主义就会不早也不迟地实现。⁷⁰如果马克思言行一致的话，他不应该从事任何政治行为，⁷¹他应该安静地等待“资本主义私人所有制丧钟敲响”的那一天的到来。⁷²

在处理宿命论时，我们可以忽略占卜者的断言。决定论同算命者、读水晶球者、占星家的艺术以及“历史哲学”派更自命不凡的作品完全没有关系；它不预言未来事件。它断言宇宙之中所有现象的连续⁷³中存在规律性。

⁶⁷ Allah, 伊斯兰信仰的唯一真神。

⁶⁸ Charles Martel (686-741) 法兰克国王，领导军队在 732 年的图尔斯 (Tours) 之战中获胜，阻止了穆斯林在伊比利亚半岛的北进。Leo the Isaurian (685-741) 拜占庭帝国皇帝，领导军队在抵抗穆斯林军队 717 年到 718 年对君士坦丁堡长达 12 个月的围困中获胜。迫使穆斯林军队放弃了攻占君士坦丁堡的企图。

⁶⁹ Marx, *Das Kapital* (7th ed. Hamburg, 1914), I, 728. [Eng. trans. Marx, Karl. *Capital: A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Friedrich Engels, ed. N.Y.: Modern Library (Random House) n.d. (Charles H. Kerr, 1906), p. 836.]

⁷⁰ 参见下文第 7 章 辩证唯物主义 2 物质生产力, 3 阶级斗争。

⁷¹ Neither would he have written the often quoted eleventh aphorism on Feuerbach: “The philosophers have only provided different interpretations of the world, but what matters is to change it.” According to the teachings of dialectical materialism only the evolution of the material productive forces, not the philosophers, can change the world.

⁷² Marx, *Das Kapital*, as quoted above. [p. 837.]

⁷³ concatenation, 指事物(现象)彼此联系、关联。参见绪论部分脚注 4 “连续与顺序(the concatenation and sequence)”。

那些认为要驳斥宿命论必须采用自由意志学说的神学家大错特错了。他们关于上帝无所不知的描述有一个重大缺陷，他们的神只会知道成熟的自然科学教科书上的东西，而不知道人们心里在想什么。神没法预见有一些人会因为支持宿命论的理论，而只是紧握双手⁷⁴，懒散地坐等他——他却（错误地）没有料到这些人会沉溺于听天由命式的无所作为——把事物施舍到他们的头上。

5. 决定论与刑罚学

人们对决定论实践效果的误解，是一个经常介入到有关决定论的纷争中的因素。

所有非功利主义的伦理体系都把道德法则视为手段和目的的关系之外的东西。道德法典不涉及人类的福利和幸福、自身利益以及对人生目的的俗世追求。它受不同规律的支配，以一种不依靠人类思想也不在乎人类感受的力量来约束人。有人相信这种力量就是上帝，有人认为是祖先的智慧，还有人认为这是活在每一个正派人良心里面的一个神秘的声音。谁违反了这部法典的规则就是犯了罪，他将因犯罪而受到惩罚。惩罚并不服务于人类目的，通过惩罚罪犯，世俗或神权当局只是脱卸了道德法典及其设计者交给他们的责任。因此，无论他们的行为会产生什么后果，世俗或神权当局注定要惩罚过失与犯罪。

现在关于罪行、过失及惩罚的概念与决定论的理论并不相容，如果人类的一切行为都是它们起因的必然结果，如果个人不可避免地按照先行条件所规定的方式来行动，也就不再会有犯罪的问题。如果惩罚一个仅仅做了永恒的宇宙规律所决定的事情的人，将是一个多么傲慢的推定啊！

以这些为根据批评决定论的哲学家和律师，没能看到关于全知全能上帝的理论将把他们引向用来反对哲学决定论的相同结论。如果上帝是全能的，他不乐意看到的事情绝不会发生。如果他是全知的，他知道在任何一种情况下将要发生的所有事情，无论怎样，人都不应该对命定发生的事情负责任。⁷⁵年轻的本雅明·富兰克林“从想象的上帝品质”论述道：“因为他无限的智慧，在创造和统治世界时，他知道什么是最好的；他必然倾向无限的美好；既有无限的权利，他必定可以行使他的权力。所以，世上的一切都是正确的。”⁷⁶事实上，所有以形而上学或神学为依据、试图证明社会有权惩罚那些对社会和平协作造成危害行为人的理论，都会受到那些针对哲学决定论的相同的批评意见。

功利主义伦理则从不同的角度看待惩罚问题。罪犯受到惩罚不是因为他是坏的并应该接受惩戒，而是惩罚会使他或其他人不再重复相同的犯罪。惩罚不是一种报应和复仇，而是一种防止未来犯罪的手段。立法者和法官不是一个形而上学的报复性的正义的代理人，他们的主要任务是保护社会的平稳运行而不

⁷⁴ 双手紧握也是基督徒和一些其他信徒祈祷的姿势。

⁷⁵ See Fritz Mauthner F., *Wörterbuch der Philosophie* (2d ed. Leipzig, 1923), I, 462-7.

⁷⁶ Benjamin Franklin, *Autobiography* (New York, A. L. Burt, n.d.), pp. 73-4. Franklin very soon gave up this reasoning. He declared: “The great uncertainty I found in metaphysical reasonings disgusted me, and I quitted that kind of reading and study for others more satisfactory.” In the posthumous papers of Franz Brentano a rather unconvincing refutation of Franklin’s flash of thought was found. It was published by Oskar Kraus in his edition of Brentano’s *Vom Ursprung sittlicher Erkenntnis* (Leipzig, 1921), pp. 91-5.

受反社会个人的侵扰。这样才有可能在涉及决定论问题时不会对刑法典的实际后果存有无意义的顾虑。

6. 决定论与统计学

在十九世纪，一些思想家认为统计学无可辩驳地摧毁了自由意志学说。这种观点认为，统计学展示了一定人类行为，例如犯罪和自杀等发生的规律性。并且这种所谓的规律性在阿道夫·凯特尔（Adolphe Quetelet）⁷⁷和亨利·托马斯·巴克勒（Thomas Henry Buckle）⁷⁸那里被解释为严格意义上的决定论正确性的经验证明。

然而，人类行为的统计学真正展示的不是规律性而是不规律性。在巴克勒推理中起到了如此显著作用的犯罪、自杀及健忘行为的数字每年都各不相同。这些数字每年的变化通常都不大，在数年内的一段时间里常常（但并非总是）表现出一定增大或减小的趋势。这些统计只表示历史变化，而不是自然科学意义上的规律性。

对历史的特定理解可以帮助解释为什么过去会发生这种变化，并预计未来可能会发生的变化。而这些涉及到价值判断决定的终极目的、选择手段的推理和知识、以及个人的人文心理学特性。⁷⁹对历史的理解必定不可避免地或早或晚到达某个只与个性有关的那一点。从开始到结束，对所涉及问题的处理注定要遵循详细审查每一样人类事务的路线；它必须是目的论⁸⁰的，并且和自然科学的方法有根本的不同。

但是在巴克勒所处的环境下，他被实证主义的顽固遮蔽了目光，急于提出了他的理论：“在一个已知社会状态下，一定数量的人必定会结束自己的生命。这是一个一般规律；至于谁会犯下此罪的这个特殊问题当然取决于特殊规律；然而，这些特殊规律整体上也必须服从它们从属的大的社会规律，大规律的力量是如此地无法抵挡，以至于对生命的爱或对另一个世界的恐惧都不能阻碍它的实现。”⁸¹巴克勒的规律看起来很明确，在表达上毫不含糊。可事实上，他的理论由于包含了“一个已知社会状态”这个句子而把自己完全否定了。即使是巴克勒的崇拜者也把这个句子称为“错误的含糊”⁸²。因为巴克勒没有提供确定社会状态变化的标准，他的表达既不能通过经验证实也不能被证伪，所以缺乏自然科学规律的区别性标志。

在巴克勒提出理论以后很多年，一些著名的物理学家开始假定一些（甚至所有的）力学规律可能只是统计学上的特征。这个学说被认为同决定论和因果论相矛盾。稍后，当量子力学极大地扩大了“仅仅”统计学上的物理学范围之后，许多作者抛弃了所有指导自然科学达几个世纪之久的认识论原则。他们说，在宏观层面上我们观察到一定的规律性，这些规律性在过去被解释成对自然法

⁷⁷ 阿道夫·凯特尔（1796—1874）

⁷⁸ 亨利·托马斯·巴克勒

⁷⁹ 参见第十二章 心理学与人文心理学。

⁸⁰ 目的论（teleology），研究设计与目的的哲学流派，认为一切事物都是为了一个最终的目的而被设计或指引，一切存在都有内在的目的或最终原因。

⁸¹ Buckle, *Introduction to the History of Civilization in England*, J. M. Robertson, ed. (London, G. Routledge; New York, E. P. Dutton, n.d.), ch. 1 in I, 15–16.

⁸² J. M. Robertson, *Buckle and His Critics* (London, 1895), p. 288.

则的一种证明。实际上，这些规律性是对偶然事件统计学补偿⁸³处理的结果。大规模的明显因果关系排列要用大数法则来解释。⁸⁴

现在，大数法则和统计补偿只在存有常态的大规模规律性和一致性的领域有效，这种一致性具有一种能够抵消任何小规模水平所存在的不规律性和异质性的特性。如果一个人看到的偶然的事件总是以某种方式互相补偿，以至于在对大量的此类事件的重复观察中显现了一种规律性，那么意味着此类事件遵循着一定模式并因此不再被视为是偶然事件。我们谈到自然法则的时候指的是在现象的串联与序列中存在规律性，如果一组微观事件总是产生一定的宏观事件，那么这种规律性就存在。如果在微观领域里没有规律性，在宏观领域也不会显现出规律性。

量子力学应付的是这样一个事实：我们不知道在一个单独的例子中，一个原子将如何运动。不过，我们知道什么运动模式可能会发生，以及这些模式实际发生的比例。虽然，完美的因果关系定律的形式是： A “产生” B ，但还有一个稍微逊色的表达方式： A 在所有情况下有 $n\%$ 的可能 “产生” C ， $m\%$ 的可能 “产生” D ，如此等等。或许，今后可能把这个稍微逊色的形式中的 A 分解为一些互不相同的元素，对每一个元素都会根据完美形式分配一个确定的 “效果”。不过，这是否能发生和决定论的问题没有关系。不完美的定律也是因果定律，虽然它揭示了我们知识上的缺陷。并且，因为它是既展示知识又展示无知的特殊形式，因而也开拓了应用概率计算的新领域。我们知道，对一定问题来说，只与整类事件的行为有关，我们知道 A 类事件会按已知比例产生一定效果。但是，我们所知的只是个体 A 是 A 类中的一部分。这个知识与无知的混合物的数学形式是：我们知道个体 A 可能 “产生” 各种后果的概率。

物理学新决定主义学派没能看到的是，命题 “ A 在 $n\%$ 情况下 ‘产生’ B ，其它情况 ‘产生’ C ” 在认识论上与命题 “ A 总是 ‘产生’ B ” 没有区别。前一个命题的不同之处只是在 A 的概念上包含了两个元素： X 和 Y ，这是因果规律的完美形式应该必须区分的。但是（这一命题）并没有提出偶然性的问题。量子力学不是说，单个原子像顾客在饭店点菜或选民投票那样行动。它说的是，原子总是遵循一定的模式运行。另一个事实也可以证明这一点，它关于原子的预计不涉及特定的一段时间或是特定的宇宙中的位置。如果单个原子不是不可避免地完全按照自然律法来运行，一般来说，在没有时间和空间参考的情况下人们是不可能和原子的行为打交道的。我们可以用 “单个” 这个词来形容原子，但是我们决不能把用在人类和历史事件那种意义上的个体特征归给一个 “单个” 原子。

在人类行为领域，决定主义哲学家利用统计学来驳斥自由意志学说，并证明人类行为中的决定主义。在物理学领域，新的非决定论哲学家使用统计学驳斥决定论学说并证明自然界的不可预知性即非决定论。双方的错误均在于统计学意义上的混淆。

⁸³ Compensation, 补偿, 数学上为了解题而在等式的两边同时加减某个数字的做法。统计学上的补偿处理可以强化 “规律性”。

⁸⁴ John von Neumann, *Mathematische Grundlagen der Quantenmechanik* (New York, 1943), pp. 172 ff.

在人类行为领域，统计学是历史研究的一种方法。它是对一定地域一定人群在一段时间内的历史事件的一种数字描述，它的意义恰恰在于它描述的是变化而不是一成不变这一事实。

在自然领域，统计学是归纳研究的一种方法。它在方法论上的正当性和意义在于对自然之中存在规律性和完美决定论这一坚定信仰。自然法则被认为是永久的，它们在每一个事件中都完全发挥作用。在一件事中发生的也必定会出现在类似的事情中。因此统计资料传达的信息在它所涉及的那些类型的现象上具有普遍有效性，而不仅仅只和一定历史时期及一定的地理位置有关。

不幸的是，这两种完全不同的统计学被混为一谈。而再把概率论的概念搅合在一起之后问题变得更复杂了。

为解决这一系列错误、曲解以及矛盾造成的困难，让我们首先强调一些不言自明的道理。

就像上文指出的那样，人类的大脑无法想象任何没有原因导致的事件。如果正确分析，运气和偶然事件的概念最终在宇宙事件的进程中并不存在，它们和人类的知识、预感以及行为有关。它们是属于人类行为学内涵的，而不是存在论的。

把一个事件称为偶然的并不是否认它是先前事态的必然结果；偶然事件（这个名称）只是意味着我们凡人不知道它是否会发生。

我们关于自然的概念涉及一系列现象的连续与顺序中可以探知的、永久的规律性。自然界无论发生什么，都能被自然科学理解为是相同规律作用的结果，并会一再重复。自然科学意味着对这些规律的认识。另一方面，人类行为的历史科学涉及的是我们的智力无法理解的一种普遍规律的事件。它们即使在处理大众、民族、种族以及整个人类事务时，仍然要涉及到个人以及单独事件，涉及到个性以及无可逆转的事件变迁。自然科学在审视曾经发生过的某一事件，如地理变迁或某一生物的演化时，视其为普遍规律作用的一例。但是，历史科学无法把事件追溯为永久规律的作用。因而，在处理一个事件时，主要兴趣不在这个事件和其它事件可能具有的共同特点上，而在它独有的特征上。历史科学处理刺杀恺撒事件时，不是研究暗杀，而是研究对一个叫凯撒的人的暗杀。

认为一个真正自然法则其有效性只限于一定的时期的观念是自相矛盾的。不论是从对日常生活的随意观察还是刻意安排试验得出的经验，都是源于单个的历史案例。但是受到不可缺少的先验决定论指导的自然科学⁸⁵，则认为规律在每一个案例中都必须得到证明，并且用归纳推理加以推广。

当前量子力学领域的认识论状况可以这样恰当地来表述：我们知道原子运动遵循的各种模式，并且我们知道实际运动中每种模式所占的比例。这将把我们的知识状态描述为一个经典的概率实例。我们知道整个种类的行为，关于这个种类单个成员的行为，我们只知道它们是这个种类的成员而已。⁸⁶把处理人类行为的术语应用于这类问题既不恰当又容易产生误导。伯特兰·罗素采用了这种比喻：原子“将会”怎样，它有“一整套替代方案”以供选择，它有时选这

⁸⁵ 先验决定论 (aprioristic determinism) 对自然科学而言是不可缺少的。

⁸⁶ On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class probability and case probability, see Mises, *Human Action*, 4th ed. 1996, pp. 106 - 13.

种，有时选另一种。⁸⁷如果我们把罗素的书以及其它作品的倾向考虑进来，就很容易发现他选择如此不恰当术语的原因。他想要消除行为以及人类行为和人类事件这两方面的差异。在他的眼里，“我们和石头之间的差别只是程度上的差别”。因为“我们对刺激做出反应，石头也会，虽然只需更少的刺激就能让它们反应。”⁸⁸罗素忽略了石头与人“反应”方式的根本不同。石头按照一个永久的模式反应，我们把这种模式称为一个自然法则。人不以这种统一的方式反应，正如人类行为学家和历史学家所说的，人以个体的方式反应。没有人能够把不同的人分成不同的类别，让每个类别的成员按照相同的模式行事。

7. 人类行为科学的独立

人们在决定论与非决定论的古老对抗中使用的措辞并不恰当。它并不能很好地描述争论的实质。

对知识的探求总是和事件的连续以及对造成变化的因素的认识相关。在这个意义上，自然科学和人类行为科学都属于因果关系和决定论的范畴。倘若对通常所称的因果关系没有一个真正的一一实用主义意义上的一一洞察力来作指导，任何行为也不会成功。行动（即手段和目的）的基本范畴预示了原因和结果的范畴。

人类行为科学必须摒弃的不是决定论，而是实证主义和泛物理主义对决定论的扭曲。人类行为科学强调一种事实：思想决定人类行为，但是在当前人类科学的状态下还不可能把思想的出现和变化还原为物理、化学或生理因素。而正是这种不可能性构成了人类行为科学的独立。或许有一天，自然科学可以揭示出牛顿（身）体内产生出地球引力理论的物理、化学以及生物的过程。但在那一天到来之前，我们必须满足于将思想史研究作为人类行为科学的一部分。

人类行为科学绝不排斥决定论。历史学的目标是充分描绘出产生一定事件的有效因素，历史学完全为因果范畴所指导。回顾历史，其实不存在偶然事件的问题。在处理人类行为时，偶然事件的概念总是用来指人对未来的不确定性以及对未来事件的特殊历史理解的局限性，它指人类在寻求知识上的局限性，而不是指宇宙或宇宙的某一部分的一种状态。

⁸⁷ Bertrand Russell, *Religion and Science*, Home University Library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36), pp. 152 - 8.

⁸⁸ Ibid. p31.

第六章 唯物主义

1. 两种唯物主义

当代语言中的“唯物主义”这个术语具有两个完全不同的内涵。

第一个内涵所指的是价值观⁸⁹。它刻划了那些只要物质财富、肉体满足以及感官愉悦的人们的精神状态。

第二种内涵是存在论的。它以宣扬一切人类的思想、观念、价值判断以及意志都是人体内物理、化学以及生理过程的产物这一学说为特点。因此在这个意义上，唯物主义否认了人文心理学以及人类行为科学、人类行为学、历史学的意义，而认为唯独自然科学才是科学。本章我们只涉及到这第二个内涵。

唯物主义的理论从来没有被证明过或是被详述过，唯物主义者所做的无非是一些类比和隐喻。他们把人类大脑的运行与机器的运转或是生理学过程相比较，而这两个类比都无关紧要，没有什么解释力。

机器是人制造的装置，它是一个设计的实现，并完全按照设计者的计划运行。使它运行生产出产品的不是来自它内部的要求，而是制造者希望通过制造它来达到的目的。是制造者和操作者创造了产品，而不是机器。把任何行为归于机器都是拟人论和泛灵论。机器无法控制自己的运行，除非人启动它并保持它的运行，否则它自己是无法运行的。机器只是一个被人利用的、没有生命的工具，一旦操作者停止操作它马上就得停止。那些采用机器隐喻的唯物主义者首先需要解释的是，谁制造了“人”这个机器，谁操作“它”？在谁（什么人？）的手里“它”是一个工具？除了“是造物者”外，在这个问题上很难找到其它的答案。

把自动机械装置称为自动是一个习惯，这种习惯也是一个隐喻。计算机不会做计算，而是操作者通过发明者设计的这个精巧工具在计算。机器没有智力，它既不能思考也不能选择，更不能为了实现追求的目的而采取手段。所有这些，只有人才能完成。

生理学的类比比机械的类要比要明智一些。思考过程不可分离地和生理过程联系在一起。只要生理学观点仅仅强调这一事实，它就不是隐喻的；但是它说明不了什么问题。因为，问题恰恰在于，我们对构成产生诗歌、理论和计划的过程的生理现象一无所知。病理学提供了大量大脑受伤引起的智力完全或部分受损的信息，解剖学也提供了大量关于大脑分子化学结构及生理学行为的信息。但是尽管生理学知识取得了很大的进展，我们对思想与肉体问题的所知并不比那些最早思考这一问题的古代哲学家们要多。他们所提出的理论既没有被新的生理学知识证明也没有被证伪。

思想与概念不是幻影，它们是真实的事物。虽然没有形状也不是实体，但是它们是影响有形的、实际存在的事物的因素。它们是人体内未知程序产生的，只能通过创造者或其他人类身体的相同类型的程序才能被感知。因为它们所提供的刺激和带来的变化都是依赖于思想的出现，所以可以称它们为创造性的以及原创的。关于一个思想的生命和它存在的影响，我们可以确定我们对它们作

⁸⁹ 这一意义上的 materialism 通常译为“物质主义”，以和“唯物主义”相区别。

何希望。关于思想的诞生，我们只知道它是由某一个人产生。我们无法把它的历史追溯到更远。一个思想的出现是一项创新，是添加到世界上一个新的事实。因为我们知识的缺乏，对人类思维而言，个人就是以前没有存在过的新事物的源泉。

令人满意的唯物主义学说必须能够描述产生一定思想的那些事件的次序。它必须解释为什么人们在一定问题上能或不能达成一致意见。它还要解释为什么一个人能解决一个问题而别人却解决不了。但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唯物主义学说尝试过这样做。

唯物主义的拥护者一心要指出所有为解决思想与肉体问题而提出的其它理论的缺陷，他们尤其热心于反对神学解释。然而，驳斥一种理论并不能证明任何其它与之相对的理论的合理性。

或许对于人类智力来说，思考自身的本质和起源是一个太过鲁莽的冒险，或许正如不可知论者所说，凡人永远不会知道关于这些问题的知识。但即便如此，也不能证明实证主义者把这些问题指责为“无意义”和“荒谬的”就是合理的。仅仅因为人类智力无法令人满意的回答一个问题，并不能证明这个问题就是荒谬的。

2. 分泌物的类比

有一种臭名昭著的唯物主义理论，声称思想与大脑的关系同胆汁与肝以及尿液与肾的关系是相同的。⁹⁰通常，唯物主义者思想家对他们的言论更谨慎一些。不过，他们的观点本质上和这个富有挑战性的声明都是一回事。

生理学上把化学成分正常的尿液和其它类型的尿液区别开来。尿液背离正常成分说明身体体质或身体器官的功能存在某种背离正常健康的状态，这种背离也遵循一种有规律的模式。尿液化学成分的变化可以相应反映出身体的一定反常或病理状态，而吸收一定的食物、饮料和药物也会在尿液的成分中带来相应的变化。对健康的人来说，那些一般被称为正常的尿液都具有相同（在细微变化范围内的）的化学性质。

思想和概念则不同。对它们而言，没有常态或背离遵循一定模式的常态的问题。身体的某些伤害或吸收某些药物与饮料会阻碍、扰乱大脑的正常思维。不过，即使这些扰乱对不同的人也不是完全一样的。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想法，没有唯物主义者能把这些差异归结为一些可以用物理、化学或生理学术语来描述的因素。当我们问为什么一些人投共和党的票，而另一些人投民主党的票时，任何引用自然科学及这些科学涉及的物质因素来解释的企图都是徒劳的。

迄今为止，自然科学还没有发现可以把观念与思想的内容归于其存在或缺失的肉体或物质特征。事实上，在自然科学里，甚至不存在思想和观念内容的多样化问题，它们只能处理影响或修改感官知识的对象。但是，思想和观点并不直接影响感觉。它们的特色是内涵，而对于认识内涵来说，自然科学的方法是不恰当的。

观点彼此之间互相影响，它们还为新观点的产生提供刺激，它们取代或转变为其它观点。唯物主义对涉及这类现象的解释是一个借用传染概念的隐喻。

⁹⁰ C. Vogt, *Klerglaube und Wissenschaft* (2d ed. Giessen, 1855), p. 32.

这个比较是肤浅的，没有什么解释力。疾病通过细菌和病毒在人体之间传染，但没有人知道思想通过什么因素能够使其从一个人传递给另一个人。

3. 唯物主义的政治含义

唯物主义起初是一种反对对人类和基本自然的原始二元论解释的学说。根据这种二元论信念，活着的人是由两个可分离的部分组成的：一个必死的肉体和一个不朽的灵魂。死亡把这两部分分离。灵魂转移到活人看不到的地方，在世俗力量之外，在死者的领域内继续着一种影子似的存在。例外情况下，灵魂可以短暂地重现于活人的感知世界中，或者一个活人可以暂时造访死人的领地。

这些拙劣的陈述被宗教教条和唯心主义哲学升华。虽然对灵魂领域以及其居民的原始描述无法经受得起批判性的检验，并且很容易被驳斥为荒谬，但是先验推理和自然科学都无法中肯地驳倒这些精致的宗教信条。历史可以推翻许多神学著作的历史叙述，不过，高级的批判并不影响核心的信仰，理性既不能证明也不能证伪基本的宗教原理。

不过，在法国十八世纪发展起来的唯物主义并不仅仅是一个科学原理，它也是反对古代政治陋习的革新派人士词汇的一部分。法国王朝的高级教士只有极少数不是贵族，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对宫廷阴谋的兴趣要大于对履行他们神职责任的兴趣。他们“应得的”不得人心使得反宗教趋势大为流行。

如果不是涉及到政治争端，关于唯物主义的争论本该在十九世纪中叶平息下来。人们应该已经认识到当代科学对阐明或分析产生一定思想的生理学过程并无建树，也不能确定未来科学家在这个任务上是否能取得更大的进展。唯物主义教条本该被视为关于某个问题的猜测，至少目前看来人们无法在已有的知识范围内对这问题提供满意的答案。它的支持者本来不能再把它当作一个无可辩驳的科学真理，也不可以再把它的批评者们斥责为蒙昧主义、无知和迷信。不可知论本来会取代唯物主义。

但是，在多数欧洲和拉美国家，基督教会（至少在一定程度上）与反对民意政府以及自由制度的势力合作。在这些国家，人们如果要致力于实现一项大体上和杰弗逊与林肯理想一致的计划便难免攻击宗教。唯物主义论战牵涉到的政治涵义阻止了它消亡的步伐。不是出于认识论、哲学、或科学的考虑，而是单纯出于政治上的原因，促成了挽救政治上十分便利的口号——“唯物主义”的最后一搏。曾繁荣于十九世纪中叶之前的那类唯物主义开始谢幕，让位于不可知论，即便是赫克尔⁹¹那种颇为拙劣天真的著述也无法复活它之时，卡尔·马克思发展了一种叫做辩证唯物主义的新学说。

⁹¹ 艾伦斯特·赫克尔 (Ernst Haeckel, 1834~1919) 德国生物学家、自然学家、哲学家、医生、教授、艺术家。他为了宣传进化论，发展提出了一整套生物从原子、分子、细胞到动物的演变理论。他还使用了其它脊椎动物的胚胎图片来和人类的胎儿图片进行对比，以证明进化论的观点。但是，赫克尔的研究在当时即被人指出粗制滥造。当代生物学者也指出赫克尔的脊椎动物胚胎图片有部分是无中生有的。参见 http://en.wikipedia.org/wiki/Ernst_Haeckel

第七章 辩证唯物主义

1. 辩证法与马克思主义

卡尔·马克思和弗雷德里希·恩格斯的辩证唯物主义是我们时代最流行的形而上学学说。它是今天苏维埃帝国以及所有这个帝国外马克思主义学派的官方哲学。它支配着许多不认为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的人，甚至许多自认为是反马克思主义及反共产主义的学者和政党的思想。多数我们同时代的人一提到唯物主义及决定论想到的就是这个学说。

在马克思年轻的时候，两种教义彼此对立的形而上学学说在德国思想界占据着统治地位。一种是黑格尔的唯心论，这是普鲁士国家以及普鲁士大学的官方理论。另一种是唯物主义，这是致力于革命推翻梅特涅⁹²政权体系以及正统基督教和私有财产的对立派理论。马克思试图把这两种理论揉为一体，以证明社会主义“按照无可动摇的自然法则”注定要实现。

在黑格尔的哲学中，逻辑、形而上学、以及存在论本质上是相同的，真实存在的过程是思考逻辑过程的一个方面。在通过先验思考领会逻辑规律的过程中，大脑获得了现实的正确知识。除了逻辑学习所提供的路径之外，没有别的通往真理的道路。

黑格尔逻辑的特殊原则是辩证方法。思考分为三步过程，从命题到反命题，也就是命题的否定，再从反命题到综合，也就是否定之否定。相同的“命题、反命题以及综合”这三步理论原则在真实存在中自我证明。因为宇宙中唯一真实的事物是感性（理智或精神）。物质的实质不在它自身。自然物体也不是为它们自身。唯有感性是为它自身。除了理性和神的行为之外，以哲学的观点看来，现实就是看起来似乎真实但本身并不真实的腐败或无生命力的事物。⁹³

在这种黑格尔唯心论和任何唯物主义之间是不可能有什么妥协的。然而，在十八世纪40年代黑格尔哲学在德国享受的威望的蛊惑之下，马克思和恩格斯不敢过分偏离这种他们及其同时代同胞唯一熟悉的哲学体系。他们不够大胆，不像数年之后，即使在普鲁士的人们也敢完全抛弃黑格尔哲学。他们更情愿以黑格尔的继承者和改革者而不是以破坏偶像的反对者面目出现。他们自吹改变提高了黑格尔辩证法，把它完全打乱了，或者说让它站住脚了。⁹⁴他们没有意识到，把辩证法从唯心主义的土地上连根拔起又移植到一个标榜为唯物主义和经验主义的体系里去是毫无意义的。黑格尔一直假定逻辑过程在通常所称的现实发生的过程中能得到如实地反映。在应用逻辑先验地解释宇宙的问题上，他并没有自相矛盾。但是，对一个偏好幼稚的现实主义、唯物主义以及经验主义的理论则是另一回事，对于这样的一个理论，一个不是源于经验而是源于先验推理的解释方案并无用处。恩格斯宣称：辩证法是关于一般运动规律、外部世界以及人类思维的科学；两套实质上相同的规律在人类思想有意识地应用它们时却表

⁹² Klemens Wenzel, Prince von Metternich, 梅特涅 (1773-1859), 奥地利帝国外交大臣 (1809-1848) 和首相 (1821-1848)。梅特涅在19世纪下半页被视为压制进步的代名词。

⁹³ See Hegel, *Vorlesungen über die Philosophie der Weltgeschichte*, ed. Lasson (Leipzig, 1917), pp. 31-4, 55.

⁹⁴ Engels, *Ludwig Feuerbach und der Ausgang der klassischen deutschen Philosophie* (5th ed. Stuttgart, 1910), pp. 36-9.

现出形式上的不同，而本质上，并且迄今在人类历史的很大程度上，它们以一种无意识的方式声称它们自己是无穷尽的明显偶然事件系列之中的外部必要性。⁹⁵恩格斯说，他自己从来没有怀疑过这一点。他承认花了八年中的大部分时间专注于数学和自然科学，这样做是受到一种愿望的驱使，那就是要从特殊科学中详细检验辩证法的有效性。⁹⁶这些研究带给恩格斯令人吃惊的发现，他发现“整个地质学都是一系列的否定之否定。”蝴蝶“通过对卵的否定从卵里钻出来...当它们死的时候又一次地否定”等等。大麦的正常生活是：“大麦粒...被否定并且被大麦植株取代，对谷粒的否定...植物生长...结实再一次产生大麦粒并且一旦成熟，麦穗就枯萎，被否定。这个否定之否定的结果使我们再一次有了大麦粒，然而不再是单粒的而是数以十倍、二十倍或三十倍增多的。”⁹⁷

恩格斯没有意识到他只是在玩文字游戏，把逻辑术语用于实际现象只是不必要的消遣。关于现象、事件以及事实的命题可以被肯定或否定，但不是现象、事件及事实本身。不过，如果有人刻意使用这种不恰当的、具有逻辑错误的隐喻语言，那么把蝴蝶称为对卵的肯定而不是否定也没有什么不合理的。蝴蝶的出现，难道不是卵的自我主张，难道不是固有目的的瓜熟蒂落，难道不是它短暂存在的圆满，难道不是它所有潜力的实现？恩格斯的方法是用“否定”这个词替换“变化”这个词。不过，没有必要再详述把黑格尔的辩证法整合到一个并不支持黑格尔基本原理——逻辑和存在论的同一性的哲学体系中的谬误了，并且这个哲学体系根本上也不否认任何东西都可以从经验中习得的观念。因为实际上，辩证法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建筑中仅起到装饰作用，而对推理过程没有实质影响。⁹⁸

2. 物质生产力

马克思唯物主义的本质概念是“社会物质生产力。”生产力是产生所有历史事实和变化的推动力。在社会必需品的生产过程中，人们进入一定的生产关系，这是必然的，并且不依赖于他们的意志，但它（生产关系）同物质生产力发展的主要阶段相对应。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组成“社会经济结构，司法、政治等上层建筑建立在这个真实的基础之上，并会产生与之对应的一定形式的社会意识。”物质生活的生产模式决定了一般社会、政治、精神（智力）生活过程（在每一表现形式中）。人的存在不是人的意识（观念和思想）决定的，与之相反，而是人的社会存在决定了他们的意识。在一定的发展阶段，社会物质生产力与现有生产关系，或者，仅用司法上的表达，财产关系（产权法社会体系）在它们运行的框架之内产生了矛盾。这些关系从生产力发展的表现变为生产力发展的束缚。然后社会变革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改变，整个巨大的上层建筑或快或慢地发生着转型⁹⁹。回顾这种改变时，人们必须自始至终地区分生产经济条件的物质方面的变化（这些是可以用自然科学手段准确调查

⁹⁵Ibid., p. 38.

⁹⁶ Engels, *Herrn Eugen Dührings Revolution in Science (Anti-Dühring)*, (London, Lawrence & Wishart Ltd., 1934).

See Engels, September 23, 1885, preface, p. 15.

⁹⁷ Ibid., p. 152.

⁹⁸ E. Hammacher, *Das philosophisch-ökonomische System des Marxismus* (Leipzig, 1909), pp. 506-11.

⁹⁹ 马克思所用的词“*Umwälzung*”在德语中相当于“revolution”。英文版这里用的是“transform”。

的)和司法、政治、宗教、艺术¹⁰⁰或哲学等——简言之意识形态上的——形式(的变化)，对后一种变化，人们意识到了里面的这种冲突并且要彻底地解决问题。这种转型时代不能再根据它的自我意识来评判，就像不能根据一个人心中的自我形象来评价他自己一样。人们必须在物质生活的矛盾之外，在现有各种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冲突之外来解释这种意识。任何社会形式在其框架有足够空间供所有的生产力发展之前不会消失。并且在生存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之中孕育成熟之前，新的、更高级的生产关系也不会出现。因此人类从不给自己安排无法完成的任务，进一步的观察总能发现，新的、更高级的生产关系只在它赖以存在的物质条件已经产生或至少正在形成的过程中才会出现。¹⁰¹

有关这个理论最值得注意的一个事实是，它没有提供它的基本概念——“物质生产力”的定义。马克思从来没有告诉我们他头脑里的物质生产力是怎么回事。我们必须通过他理论的一些偶然历史例证来推测，其中最显著的例子可以在他1848年法国出版的专著《哲学的贫困》中找到。在这本专著中他写道：手工作坊产生封建社会，蒸汽工厂产生工业资本主义。¹⁰²这意味着生产中使用的实际技术知识的状况或工具以及机器的技术质量被认为是物质生产力的本质特征，这些也唯一地决定了生产关系及整个“上层建筑”。生产技术是真实的事物，是最终决定人类生活社会、政治以及智力表现形式的物质存在。这个解释被所有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提供的其它例子以及每一项技术进步在他们思想上引起的反应完全证实。他们热情地欢迎技术进步的到来，因为他们坚信每一项这样的新发明的产生，都会使他们社会主义的希望越来越远。¹⁰³

在马克思之前以及之后，曾经有许多历史学家和哲学家强调过生产技术手段进步在文明史中起到的突出作用。纵观过去150年出版的流行历史教科书，就能够发现它们的作者及时地强调了新发明及其带来的变化的重要性。他们对“物质福利是一个国家道德、智力以及艺术成就不可或缺的条件”这句话的真实性从来就没有过异议。

但是，马克思所说的含义却是完全不同的。在他的理论里，工具和机器是最高的事物、“物质”的事物，也就是物质生产力。其它的一切是这个物质基础必然的上层建筑。这个基本论题面临着三个无可辩驳的反对理由。

第一，一项技术发明不是物质的事物，它是思想过程、推理以及构思新观点的产物。工具和机器可以被称为“物质的”，但是创造工具和机器的智力工作却肯定是精神上的。马克思的唯物主义没有把“上层建筑的”以及“意识形态的”现象追溯到“物质的”根源。它把这些现象解释为一种本质上精神的过程，即发明造成的。它把产生所有其它社会及智力现象的独一无二的的能力归于这个精神过程，并错误地将其描述为一种最初的、自然赋予的物质事实。但是，它没有尝试解释这种发明是如何传递的。

¹⁰⁰ The German term *Kunst* includes all branches of poetry, fiction, and playwriting.

¹⁰¹ K. Marx, *Zur Kritik der politischen Oekonomie*, ed. Kautsky (Stuttgart, 1897), Preface, pp. x xii.

¹⁰² “Le moulin à bras vous donnera la société avec le souzerain; le moulin à vapeur, la société avec le capitaliste industriel.” Marx, *La Misère de la philosophie* (Paris and Brussels, 1847), p. 100.

¹⁰³ Marx and some of his followers at times also included natural resources in the notion of material productive forces. But these remarks were made only incidentally and were never elaborated, obviously because this would have led them into the doctrine that explains history as determined by the structure of the people's geographical environment.

第二，仅仅只有发明以及技术新工具的设计是不足以制造出它们的。除技术知识以及计划之外，还需要从先前节约积累而来的资本。通向技术进步的每一步都以必需的资本为先决条件。今天称为欠发达的那些国家都知道提高他们落后的生产设备需要什么。制造所有他们想要得到的那些机器的设计是现成的，或者短时间内能完成。只是因为缺乏资本让他们停滞不前。但是，储蓄及资本积累是以一个可以储蓄及投资的社会结构为先决条件的。因此生产关系不是物质生产力的产品，而是，正相反，它们是物质生产力存在不可或缺的条件。

当然，马克思不得不承认资本积累是“工业生产革命最不可缺少的一个条件之一”¹⁰⁴。他最宏大的论述《资本论》中的一部分提供了一个资本积累完全扭曲的历史。但当他谈论他的唯物主义理论的时候，他忽略了他对这一问题的全部论述。于是，工具和机器好像成了自然发生¹⁰⁵创造出来的一样。

此外，我们不能忘记，对机器的利用是以劳动分工之下的社会协作为先决条件的。在完全缺乏劳动分工或劳动分工处在基本状态时，机器是无法制造出来的，也无法投入使用。

劳动分工意味着社会协作，也就是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社会纽带。（因为）物质生产本身只能在先前已经存在的社会纽带中出现，那么，如何能够通过追溯物质生产力来解释社会的存在呢？马克思不能理解这个问题。他指责普鲁东不懂历史，后者把使用机器描述为劳动分工的结果。他批评说，先有劳动分工再使用机器的观点是对事实的歪曲。因为机器是“一种生产力”，不是“社会生产关系”，不是一类“经济范畴”。¹⁰⁶这里，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坚持谬误毫不退缩的固执的教条主义者。

我们可以把马克思的理论归纳如下：起初，有“物质生产力”¹⁰⁷，也就是人类生产的技术设备、工具和机器。不容许对它们的起源发问，它们就是这个样子。到此为止，我们必须假设它们是天堂上掉下来的。这些物质生产力迫使人们进入一定的生产关系，这是不受人的意志支配的。这些生产关系进一步决定了社会司法、政治上层建筑以及宗教、艺术和哲学思想。

3. 阶级斗争

正如下面将要指出的那样，任何历史哲学必须证明，指引一切人类事务发展进程的最高力量，是如何促使个人完全按照注定会导向预定目标的方式行动的机理。在马克思的体系中，阶级斗争的理论原本是用来回答这个问题的。

这个理论的内在缺陷是它论述的是阶级而不是个人。必须说清楚的是，个人是如何被促使按照这样一种方式行动，以至人类最终达到生产力想要它达到的状态。马克思对此回答说，阶级利益的意识决定了个人行为。不过有待解释的是，为什么个人偏爱他所在阶级的利益胜过他本人的利益。我们可以暂时不追究个人是如何得知他所在阶级的真实利益的。但是，即使马克思也得承认个

¹⁰⁴ Marx, *La Misère de la philosophie* (1847), English trans., *The Poverty of Philosophy*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n.d.), p. 115.

¹⁰⁵ 自然发生，英文对应 spontaneous generation，指生命起源于无生命有机物的学说。此处意为没有源头的，凭空而来的。参见《创世记》对生命起源的解释。

¹⁰⁶ *The Poverty of Philosophy*, pp. 112 - 13.

¹⁰⁷ 《圣经·创世记》第一句说“起初，上帝造天地”，这里用“起初，有‘物质生产力’”这个相同的句式暗指这个论断和《圣经·创世记》的论断本质上是相同的。

人利益与他所在的阶级利益之间存在冲突。¹⁰⁸ 他把那些有阶级意识，也就是把阶级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前的无产阶级和那些没有阶级意识的区分开来。他把唤醒那些没有自发的阶级意识的无产阶级作为社会主义政党的目标之一。

马克思混淆了社会等级和阶级的概念，把问题搞乱了。在身份和社会等级差异存在的地方，除开最有特权的人之外，每一个社会等级的所有成员都有着共同的利益，也就是消除他们社会等级法律上的限制。例如，所有奴隶在废除奴隶制度上因有共同利益而团结。但是，在法律上所有公民都平等的社会里没有这种冲突存在。没有逻辑上的理由反对把这样一个社会的成员分为不同的阶级。尽管可能选择区分的标志是武断的，任何阶级划分在逻辑上是允许的。但是，把资本主义社会的成员按照他们在社会劳动分工框架中的位置分阶层，然后把把这些阶层看成和身份社会的社会等级一样是无意义的。

在身份社会里，个人从父母那里继承他的社会等级资格，他一生保持社会等级不变，并且他的子女生来就是这个等级的成员。只有在例外情况下，人们才能幸运地进入到更高的社会等级。对大多数人来说，出生不可更改地决定了他们的人生地位。马克思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划分的阶级是不同的。在他那里阶级资格是变动的，阶级从属并不是世袭的。可以说，它是通过全体公民每天重复的投票来分配的。公众消费和购买决定谁应该拥有和运营工厂，谁应该在剧院表演中扮演角色，谁应该在工厂和矿井劳动。富人变穷，穷人变富。财产继承人和那些靠自己致富的人都必须坚持努力保卫自己的财产，对抗现有企业以及野心勃勃的新来者的竞争。在不受限制的市场经济中，不存在特权，没有对既得利益的保护，没有阻止任何人追求任何回报的障碍，通向马克思主义的每一个阶级的途径对每个人都是开放的。每个阶级的成员彼此互相竞争；他们没有以一个共同的利益作纽带团结起来，也没有联合起来对抗其他阶级——捍卫一个被那些不公正对待的人想要废除的共同特权，或者试图废除一项那些从中得利的人想保留的制度限制。

放任主义的自由主义者宣称：倘若确立身份特权和限制的旧律法被废除，也没有采用相同性质的新做法——例如关税、补贴、歧视税收、以及给教会、工会等非政府机构的威逼胁迫的特权，所有公民在法律面前是平等的。人们的抱负和雄心不因法律桎梏而受限制。每个人可以自由地为任何社会地位或是他个人能力所匹配的职位而竞争。

但共产主义者否认这是（法律面前平等的自由体制下组织起来的）资本主义社会运行的方式。在他们的眼里，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赋予了所有者——按马克思的术语是资产阶级或资本家一种实质上无异于封建贵族曾经拥有的特权。“资产阶级革命”没有废除特权和对人民大众的歧视。马克思说，它仅仅以一个新的统治剥削阶级——资产阶级替代了旧的统治剥削贵族阶级。被剥削阶级——无产阶级没有从这次变革中获利。他们换了主人，但是他们仍然受压迫和剥削。需要一场新的最终的革命，来废除将会带来阶级社会的生产资料私人所有制。

¹⁰⁸ Marx' s *Communist Manifesto* has been reprinted many times including in the Eastman anthology: Max Eastman, ed. *Capital: The Communist Manifesto and Other Writings*, pp. 314–55. “This organization of the proletarians into a class, and consequently into a political party, is continually being upset again by the competition between the workers themselves” (p. 331).

这个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理论完全没能考虑到身份社会或等级社会与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区别。封建所有制通过征服或征服者的赠与得以确立。撤回赠与或被更强大的征服者征服则会结束这种关系。它是“神恩赐”的所有权，因为它最终来源于军事胜利，而无论是谦卑还是自负的君王都会将胜利归于上帝的特别干预。封建财产权的所有者并不依赖市场，他们不为消费者服务。在他们的财产权范围内，他们是真正的统治者。而市场经济的资本家和企业家则是大不相同的，他们通过提供给消费者的服务来获利和增加财产，并且他们只能通过日复一日地提供尽可能好的服务来保有财产。比喻性地把一个成功的意大利面条制造商称为“意大利面之王”无法消除这个差别。

批驳经济学家对市场经济工作方式的描述是一项无望的任务，马克思从来就没有尝试过。他所做的只是积极展示资本主义在将来必然走向非常不得人心的情形。他描述道，资本主义制度必定无可避免地导致：一方面财富集中于人数不断减少的资本家手中，另一方面绝大多数人陷入愈来愈严重的贫困。为完成这个任务，他从谬误的工资铁律¹⁰⁹开始论述。根据这个规律，平均工资率是生活资料也就是保证劳动者基本生存和养育后代所要求的必需量。¹¹⁰这个所谓的规律早就被完全证伪了，即便是最固执的马克思主义者也抛弃了它。但是，即使为了讨论的缘故假定这个规律是正确的，非常明显的是，以它为基础也绝对无法推导出资本主义的发展将导致雇佣劳动者越来越贫困的结论。假如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工资率总是如此之低，以至于已经达到了生理学上的极限，进一步的降低工资率将会导致整个雇佣劳动阶级被消灭，那么《共产主义宣言》所提出的劳动者随着工业进步而“越陷越深”的理论就无法成立。和马克思的所有其它论点一样，这个证明是矛盾和弄巧成拙的。马克思曾吹嘘发现了资本主义发展的内在规律，他认为其中最重要的内容就是雇佣劳动者大众越来越贫困的规律。正是这个规律导致了资本主义的最终崩溃和社会主义的出现。¹¹¹当这个规律被视为谬误的时候，马克思的经济学体系和他的资本主义发展理论就彻底垮台了。

顺便提一句，我们不得不接受的一个事实是，自从《共产主义宣言》和《资本论》第一卷出版以来，在资本主义国家雇佣劳动者的生活标准以前所未有、梦想不到的方式得到了提高。马克思歪曲了资本主义制度每一方面的作用。

所谓雇佣劳动者越来越贫困的必然结果，是所有财富集中在一批人数不断减少的资本家剥削者手中。在处理这个问题时，马克思没能考虑大商业单位的发展并不一定涉及到财富集中到少数人手中这一事实。大商业企业几乎无一例外的是有限公司，因为它们规模太大，单个人无法完全独自拥有。商业单位的增长远远超过了个人财富的增长。有限公司的资产并不等于其股东的财富，这些资产的相当一部分，等价于其优先股、已发债券和已筹贷款的部分，实际上属于（不是法律上的所有权概念意义上的）别人，也就是债券、优先股的所有者以及债权人。当这些有价证券为储蓄银行和保险公司持有，贷款从这些银行和公司获得时，实际所有者则是对这些银行和公司有要求权的人。同样，一个

¹⁰⁹ The iron law of wages, 马尔萨斯和马克思的经济理论之一，认为在资本主义中存在着工资被压到维持生存水平这样一个不可避免的趋势。

¹¹⁰ Of course, Marx did not like the German term “*das eiserne Lohngesetz*” [“the iron law of wages”] because it had been devised by his rival Ferdinand Lassalle.

¹¹¹ Marx, *Das Kapital*, 1, 728. [English trans. *Capital*, Charles H. Kerr, 1906. Modern Library, pp. 836-37.]

公司的普通股票往往不会集中在一个人的手中。通常，公司越大它的股票持有者分布就越广。

资本主义生产本质上是满足人民群众需求的大规模生产。但是，马克思总是被一个不真实的观念——工人的艰辛仅仅只为了上层社会无所事事的寄生虫的福利——所困扰。他没有看到工人自己消耗了到目前为止产出的全部消费品的大部分，百万富翁们只消耗了被称为国民生产总值的几乎可以被忽略的一小部分。所有的大公司的分支直接或间接地满足了普通民众的需求，奢侈品行业从来没有突破小规模或中等规模的界限。大公司的发展本身就证明了一个事实：大众而非富豪才是主要消费者。那些把大公司现象置于“经济力量集中”这个醒目标题之下的人没有意识到，经济力量属于消费的大众，工厂的繁荣正是依赖于他们（大众）的惠顾。处在购买者的位置时，雇佣劳动者是“永远正确”的消费者。但是，马克思宣称，资产阶级“无法在他的奴隶制度下保障奴隶的生存。”

马克思从历史发展的驱动力——物质生产力——必定带来社会主义这一事实推论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因为他全神贯注于黑格尔类型的乐观主义，在他的思想里已经没有进一步证明社会主义优越性的需要了。对他而言，社会主义作为晚于资本主义之后的阶段，显然也是一个更好的阶段。¹¹²怀疑它的优越性也就是彻底地亵渎它。

这里还有待说明的是大自然把资本主义转变为社会主义所使用的机理。大自然的工具有阶级斗争。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工人越陷越深，他们的痛苦、压迫、奴役以及屈辱加剧，他们被迫反抗，并且他们的反叛将建立社会主义。

这个推理的整个链条被以下事实的确立破坏：资本主义的发展并没有使雇佣劳动者日益贫穷，恰恰相反，他们的生活标准得到了改善。当雇佣劳动者得到更多更好的食物、住房、衣服、汽车、冰箱、收音机、电视机、尼龙以及其它合成产品时，为什么还会不可避免地被反抗？即使为了辩论的目的，我们承认工人被迫反叛，为什么他们的革命剧变仅仅是为了建立社会主义？能促使他们寻求社会主义的唯一动机只能是确信他们在社会主义之下比在资本主义之下过得更好。但是，一心要避免涉及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问题的马克思主义者，并没有给出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优越性的任何证明，他们只是不断重复这个循环推理：作为历史发展的下一个阶段，社会主义注定要到来。而社会主义作为比资本主义更后的一个历史阶段，它必然比资本主义更高级更好。它为什么一定要到来，那是因为劳动者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注定日益贫困，他们将反抗并建立社会主义。可是，除了确信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好之外，还有什么动机能推动他们一定要致力于建立社会主义？并且，社会主义这种优越性是马克思依据社会主义到来的不可避免性而推论出来的。到此，循环论证就完成了。

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背景中，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是被无产阶级致力于实现社会主义这一事实证明的。哲学家、空想主义者如何想的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无产阶级的看法，这是历史赋予了塑造未来使命的那个阶级。事实上，社会主义的概念并不是起源于“无产阶级思想”。没有一个无产阶级或是无产阶级的儿子给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贡献过任何实质性的思想。社会主义智力上的父亲是知识分子即“资产阶级”的子孙。马克思本人是富裕律师的儿子，他就读的是

¹¹² 关于这个推理的谬误，参见第八章 历史哲学。

德国高级中学¹¹³，那是所有马克思主义者和其他社会主义者都公开指责为资产阶级教育制度主要分支的学校。他的家庭资助他完成了所有的学业，他并没有靠打工上完大学。他娶了一个德国贵族的女儿，他的妻子的兄弟是普鲁士内务大臣及普鲁士警察总长。在他的家庭里有一个女仆海林娜·德慕特¹¹⁴，这个女仆一生没有结婚，跟随马克思的家庭到处迁徙，是个典型的受剥削的女佣人。她的挫折和不健全的性生活在德国“社会”问题小说中被反复地描写。恩格斯则是一个富有的制造商的儿子，并且他本人也是个制造商。他因为他的情人玛丽没有受过教育并且血统“低”而拒绝和她结婚¹¹⁵。他还享受英国贵族式的消遣，诸如骑马、猎犬之类。

工人从来就没有对社会主义热心过。他们支持工会运动，工会运动对更高工资的争取被马克思蔑视为无意义。¹¹⁶他们寻求一切政府干预商业运行的措施，而马克思视这些为小资产阶级的愚蠢。他们反对技术进步，在最初以破坏新机器的方式，后来用工会压力以及强制接受限产超雇¹¹⁷的手段。工团主义（工人强占他们工作的企业为已有的运动）是工人自发创造的。而社会主义则是具有资产阶级背景的知识分子带给大众的。身着时尚晚礼服的绅士淑女聚在伦敦的豪华住宅和维多利亚“社会”时期乡间别墅里吃吃喝喝时，策划了使英国无产阶级皈依社会主义信条的计划。

4. 意识形态对思想的渗透

马克思从假定的阶级利益不可调和的冲突出发，推导出了他关于意识形态对思想的渗透理论。在阶级社会中，人天生就不适于构思能充分、真实地描述现实的理论。因为他的阶级从属、他的社会存在决定了他的思想，他智力劳动的产品要受到意识形态的影响和扭曲。思想不是事实，而是意识形态。意识形态这个术语在马克思主义者那里是一个错误的理论，但是，正是因为它的错误性，它是为其作者所属阶级的利益服务的。

这里我们可以忽略掉这个意识形态理论的许多方面。我们无需重新反驳多逻辑论学说，这个理论认为不同阶级成员思维的逻辑结构不同。¹¹⁸我们还可以进一步承认，即使阶级利益和一个思想家的个人利益相冲突，思想家主要关心的仍然只是促进他所属阶级的利益。我们可以最终放弃质问这个教条：没有无私寻求真理 and 知识这回事，而且所有人类对真理 and 知识等的探究都是唯一地受为行动成功提供智力工具这一实际目的的指导。即使能驳斥从这三个方面的观点所得出的一切无可辩驳的反对理由，意识形态理论还是站不住脚。

¹¹³ gymnasium, (德国或欧洲其它某些国家的) 大学预科, 准备进大学的高级中学。

¹¹⁴ Helene Demuth (1820-90), 马克思的女管家, 17岁(1837年)即进入了马克思之妻(Jenny Marx)娘家做女仆, 后随Jenny(1843年)嫁入马克思家, 终生未嫁, 但于1851年产下一男婴。虽然恩格斯公开承认他是Helene所生男孩的父亲, 但并没有多少人相信。一般认为Helene Demuth既是马克思的管家、朋友, 也是他的情人。

¹¹⁵ After the death of Mary, Engels took her sister Lizzy as mistress. He married her on her deathbed "in order to provide her a last pleasure." Gustav Mayer, *Frederick Engels* (The Hague, Martinus Nijhoff, 1934), 2, 329.

¹¹⁶ Marx, *Value, Price and Profit*, ed. E. Marx Aveling (Chicago, Charles H. Kerr & Co. Cooperative), pp. 125-6.

See Mises, *Human Action*, 4th ed. 1996, p. 91.

¹¹⁷ Feather-bedding: 限产超雇, 要求资方超雇雇佣工人或限制产量, 以保证安全法则或工会法令。

¹¹⁸ Mises, *Human Action*, 4th ed. 1996, pp. 72-91.

无论人们如何看待实用主义者对真理解释的适当性，显然，至少真理的一个特征性标志是——以它为基础的行为可以取得预期的结果。从这个意义上说，真理有效，谎言无用。如果我们假设（和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一致）理论化的目的总是取得行动的成功，那么就必然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一个意识形态的理论为什么以及如何（更确切地说，在马克思主义看来是假的）会比一个正确的理论对一个阶级更有用？毫无疑问，对力学的研究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受现实原因推动的。人们想要利用力学原理来解决各种工程问题。正是对这些实际结果的追求促使他们寻求一种正确的，而不仅仅是一个意识形态的（错误的）力学科学。无论人们怎样看待这一点，错误的理论不可能比正确的理论更好地为一个人、一个阶级或整个人类服务。马克思怎么会想到提倡这么一个理论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牢记，促使马克思从事写作事业的动机是什么，那就是一种为实现社会主义而战的激情。但是马克思很清楚，他无法就经济学家对一切社会主义计划进行的毁灭性批评提出任何站得住脚的反对理由。他确信由古典经济学家发展的经济理论体系是无懈可击的，并且没有意识到有人已经对这个体系内的基本定理提出了严肃的质疑。和同时代的穆勒（John Stuart Mill）一样，他相信“价值规律中已经没有任何东西留给现在或将来的作者澄清了，关于这个学科的理论已经完成。”¹¹⁹当1871年卡尔·门格尔和威廉·斯坦利·杰文斯的作品开创了经济研究新纪元的时候，马克思作为一名经济问题作家的职业生涯实质上已经结束了。《资本论》第一卷早于1867年出版，其它卷的手稿业已完成。没有迹象显示，马克思曾领会过经济新理论的内涵。马克思的经济理论本质上是亚当·斯密以及李嘉图理论的断章取义地重复。斯密和李嘉图从来没有机会批驳社会主义理论，因为社会主义理论是在他们过世以后才提出来的，所以马克思放过了他们。但是他把满腔怒火发泄在那些试图批判地分析社会主义计划的斯密和李嘉图的后继者身上，他嘲笑这些人，并把他们称作“庸俗经济学家”以及“资产阶级的马屁精”。并且，为了诋毁他们，他拼凑了意识形态理论。

这些“庸俗经济学家”，由于其资产阶级背景，天生地不能胜任发现真理的任务。他们的推理产生的只能是“意识形态的”，也就是马克思讲到的“意识形态”，一种服务于资产阶级利益的对真相的扭曲。没有必要用分析推理和批判分析来批驳他们的逻辑链，只需揭露他们的资产阶级背景以及由此必然出现的理论上的“意识形态”特征就足够了。因为他们是资产阶级所以他们是错误的。无产阶级无需对他们的思考有一丁点儿重视。

要掩盖这个理论是为了诋毁经济学家而特别发明的这一事实，有必要把意识形态理论提升到一个适用于所有时期的、所有学科的一般认识论规律的崇高地位。这样，意识形态理论就成为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核心。马克思及其信徒集中全力为这个拼凑的理论辩护和论证。他们坚持谬误毫不退缩，他们从“意识形态的”观点解释所有的哲学体系、物理学和生物学理论，解释所有的文学、音乐以及艺术。不过，他们当然没有为自己的理论学说指定一个纯粹意识形态的特征，在这一点上他们是不够一致的。他们暗示，马克思主义信条不是意识形态。它们是来自未来从阶级斗争桎梏中解放出来的无阶级社会的知识预言，不受阶级冲突的束缚，因而将能够构思不受意识形态污染的纯正的知识。

¹¹⁹ Mill,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Bk. III, ch. 1, § 1.

这样我们能理解把马克思导向他的意识形态理论的人文心理学动机。然而这依然没有解答，为什么对事实的意识形态扭曲比正确的理论更有利于某一阶级的利益的问题。马克思从来没有冒险解释这个问题，可能是他意识到了任何尝试都将会使他陷身于无法解脱的荒谬与矛盾的困境中。

无需强调“一个意识形态的物理、化学或医疗理论比一个正确的理论更有利于某个阶级或个人”这种主张的荒谬性。对马克思主义者就资产阶级的孟德尔、赫兹、普朗克、海森堡以及爱因斯坦等科学家所提出科学理论的意识形态特征问题发表的声明，人们可以保持沉默或忽略。只须审视一下所谓的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意识形态特征就足够了。

在马克思看来，古典经济学家的资产阶级背景促使他们提出一个体系，这个体系在逻辑上必然导向为资本家剥削者不合理的要求提供辩护。（在这一点上马克思是自相矛盾的，因为他从相同的体系中得出了相反的结论。¹²⁰）那些能够明显推导出对资本主义的辩护的古典经济学家的理论也是遭受马克思最猛烈攻击的定理：人们福利生产所依赖的物质要素的稀缺性是人类存在的一项不可避免的、自然赋予的条件；没有一种社会经济组织制度能够创造出一种每个人都能按需分配的充裕状态；经济衰退周期的重复并不是不受限制的市场经济运行的固有的性质，而是与之相反，是政府用降低利率以及以通货膨胀和信用扩张制造经济繁荣来干预经济的必然结果。但是，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我们必须问，这种对资本主义的辩护于资本家又有何用？根据马克思的观点，资本家不需要为一个对他们自己有利的欺压工人的制度作任何辩解。他们也无需使自己的良心安宁，因为按照马克思的理论，每个阶级在追求自己自私的阶级利益时是冷酷无情的。

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观点来看，这样的假设，即起源于“错误意识”并因此扭曲了事情的真实状态的意识形态理论，给剥削阶级提供了服务，用来诱骗被剥削阶级并使之温顺和屈从，进而维持（至少是延长）不合理的剥削制度，也是不能允许的。因为按马克思的说法，一定制度的生产关系的持续时间不依赖于任何精神因素。它唯一地被物质生产力的状态决定。如果物质生产力改变，生产关系（即所有权关系）以及整个意识形态上层建筑必须也发生改变。这种转变不能通过任何人为的努力来推进。因为正如马克思所说，“任何社会形式在其框架宽阔到足够提供所有生产力发展之前不会消失，并且在其赖以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子宫中孕育成熟之前，新的、更高级的生产关系也不会出现。”¹²¹

这个观点绝不仅仅是马克思的随意评论，这是他的一项基本的理论要点。基于这个观点，他声称自己的理论是科学社会主义，以和他的前辈的纯粹的空想社会主义相区别。在他看来，空想社会主义的特征性标志在于他们相信社会主义的实现取决于精神的和智力的因素。你必须说服人们相信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然后人们才会用社会主义替代资本主义。在马克思眼里，这个乌托邦信条是荒谬的。社会主义的到来绝不依赖于人的思想和意志，它是物质生产力发展的结果。当时机到来之时，当资本主义达到了成熟之时，社会主义就会到

¹²⁰ 马克思本人也是有资产阶级背景的经济学家，但他提出的是批判资本家的理论体系，所以米塞斯说他自相矛盾。

¹²¹ Marx, *Zur Kritik der politischen Oekonomie*, p. xii (see above, pp. 72 f.).

来。它既不会早到，也不会迟来。即使资产阶级设计出极尽精巧的意识形态来，那也是徒劳；它们不能延迟资本主义制度崩溃的那一天的到来。

或许有些想要挽救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概念的人，会这样争辩说：资本家对他们的社会角色感到羞愧。他们对成为“强盗式资本家、高利贷者、以及剥削者”以及投机倒把的行为感到有罪。他们需要一个阶级的意识形态以便恢复他们的自负。但是，他们为什么要脸红呢？根据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观点，他们的行为没有什么好羞愧的。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看来，资本主义是人类历史发展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阶段。它是最终导向社会主义福祉的一连串事件中的一个必要环节。资本家履行其所作所为，仅仅是历史过程中的工具而已。他们只是在执行那些根据人类发展预定计划非做不可的事情。他们服从不以人类意志为转移的永恒规律，他们无法改变自己的行为方式。他们不需要任何意识形态——任何“虚伪的觉悟”来告诉他们自己是正确的。按照马克思主义理论，他们就是正确的。如果马克思始终如一地坚持自己的逻辑的话，他就应该劝勉工人：不要谴责资本家；通过“剥削”你们，他们做了对你最好的事情，他们正在铺设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

无论人们如何思索这个问题，都找不到任何理由来解释，为什么一个意识形态对事实的扭曲会比一个正确的理论对资产阶级更有用处。

5. 意识形态之间的冲突

马克思说，阶级意识产生阶级意识形态。阶级意识形态为阶级提供一种关于现实的解释，并且同时教导其成员如何为本阶级的利益而行动。阶级意识形态的内容只被物质生产力发展的历史阶段和这个阶级在现阶段历史中的作用决定。意识形态并不是一个任意思维的产物，它是思想家所属阶级的物质条件反映到头脑中的结果。因此意识形态不是一种以思想家的个人想象为条件的现象，它被现实（即思想家的阶级状况）所约束。因此，同一阶级所有成员的意识形态都是相同的。当然，不是每个阶级成员都能写作并发表他的想法，但是属于这个阶级的所有作者会持有相同的观点，并且所有其他这个阶级的成员都同意这些观点。马克思主义没有给同一阶级内不同成员能在意识形态上严重分歧的假设留下任何空间。一个阶级的所有成员中只有一个意识形态存在。

如果一个人表达的意见和一定阶级的意识形态不符，那是因为他不属于这个阶级。完全没有用分析推理驳斥他观点的必要，揭露他的背景和阶级从属就足够了。这样就解决了问题。

但是，如果一个具有无产阶级背景和工人阶级成员身份的人不能和脱离正确的马克思主义信条的行为作斗争，他就是个叛徒。无法想象他会真诚地摒弃马克思主义，作为一个无产阶级，他必定像无产阶级那样思考。一个内心的声音以明白无误的方式告诉他，正确的无产阶级意识形态应该是什么。他不诚实地无视这个声音并且公开发表异端观点，他就是个流氓、叛徒，是一条藏在草中的蛇¹²²。在同这样一个叛徒作斗争时，一切手段都是允许的。

马克思和恩格斯作为两个具有毫无疑问的资产阶级背景的人，策划出了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形态。他们从来不像科学家——诸如拉马克、达尔文、孟德尔以及魏斯曼那样冒险和反对者讨论他们的理论。在他们看来，他们的对手要

¹²² 原文为 a snake in the grass, 指隐藏的敌人, 防不胜防的敌人。

么是资产阶级白痴¹²³，要么是无产阶级叛徒。一名社会主义者一旦偏离一寸正统教义，马克思和恩格斯立即猛烈地抨击他、嘲笑他并侮辱他，把他描述为一名无赖和邪恶腐败的怪物。恩格斯死后，“什么是、什么不是正确的马克思主义最高仲裁者办公室”被托付给了卡尔·考茨基。到1917年，它又传到了列宁手中，并成为苏维埃政府首脑的一项职责。马克思、恩格斯和考茨基只能满足于攻击他们反对者的品质，而列宁和斯大林则能把反对者从肉体上消灭。后来逐步地，他们开除了那些曾经被所有的马克思主义者（包括列宁和斯大林自己）认为是伟大无产阶级事业战士的那些人，包括考茨基、马克斯阿德勒、奥拓鲍尔、Plechanoff¹²⁴，布哈林(Bukharin¹²⁵)，托洛茨基，Ryazanov¹²⁶，拉达克(Radek¹²⁷，Zinoviev¹²⁸，以及许多其他人。那些他们能抓到的人被投进监狱，经受拷打，最终被杀害。只有那些有幸居住在被“富豪民主反革命分子”统治国家的人得以生存，并被允许善终。

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看，有充足的理由支持多数人的决策。如果对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正确内容产生了怀疑，无产阶级中的多数人所持有的观点就会被视为真实反映真正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观点。因为马克思假定绝大多数人是无产阶级，这也就等同于把在意见冲突中做最终决断的能力授予了成年人公民权下选举的议会。虽然拒绝这样做将会粉碎整个意识形态理论，但是无论马克思还是他的继承者从来都不打算就多数选举发表他们的意见。终其一生，马克思不信任群众，并且对议会程序和投票决策高度怀疑。他对1848年6月的巴黎革命很热心，一小撮巴黎人在这次革命中反叛选民普选产生的议会所支持的政府。1871年春的巴黎公社，又是巴黎社会主义者反叛法国压倒多数的人民代表正式建立的政权，则更符合他的胃口。在巴黎公社里面，他发现他理想的无产阶级专政——一群自行任命的领导人的专政——实现了。他试图说服西欧和中欧所有国家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不要把他们的希望放在选举运动上，而是革命方式上。在这方面上，俄国共产党是他忠实的信徒。受列宁政府的支持，1917年经全体成年公民选举产生了俄国议会，尽管在执政党对选民的暴力威压之下，它只有不到百分之二十五的共产党议员。有四分之三的人民投票反对共产党。但是，列宁用武力驱散了议会，强有力地建立了少数人的独裁统治。苏维埃政权的首脑成了马克思党派的教皇。他的这一官方头衔是源于他通过血腥内战击败了对手这一事实。

因为马克思主义者不承认观点分歧可以通过讨论和说服或多数投票来解决，所以除了内战之外没有别的解决方法。所以一个好的意识形态（也就是真

¹²³ E. g., “bourgeois stupidity” (about Bentham, *Das Kapital*, I, 574), “bourgeois cretinism” (about Destutt de Tracy, *ibid.*, 2, 465), and so on. [See p. 54; quote re Bentham on p. 668, n. 2, bottom line; Eng. trans. re Bentham *Mod. Lib.* I, 668, n. 2. Quote re Destutt de Tracy in *Kapital*, 2, 465.]

¹²⁴ Georgi Plekhanov (1857-1918)，俄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他因和布尔什维克意见不同而未参加十月革命后的苏维埃政府，后因疾病死于芬兰。

¹²⁵ Nikolai Ivanovich Bukharin (1888-1938) 俄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苏维埃早期领导人，共产国际的早期领导者，他曾是斯大林的亲密朋友，于30年代大清洗中逮捕，后被处决。

¹²⁶ David Borisovich Ryazanov (1870-1938) 前苏联马克思主义者和马克思理论学家，于1938年被斯大林处决。

¹²⁷ Karl Berngardovich Radek (1885-1939) 前苏联社会主义者，共产国际的早期领导者，于30年代大清洗中被控叛国罪，被判刑10年，后被内务部特工处决在监狱里。

¹²⁸ Grigory Yevseevich Zinoviev (1883-1936) 俄国革命家，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苏维埃早期领导人，曾是斯大林在托洛斯基斗争中的盟友。斯大林掌权后即被边缘化，30年代大清洗中逮捕入狱，后被处决。

正适合无产阶级阶级利益的意识形态)的标志,就是它的支持者成功地征服和清洗他们反对者的事实。

6. 观念与利益

马克思暗自假设:一个阶级的社会条件唯一地决定这个阶级的利益;并且,在对于什么样的政策能最好地服务这些利益的问题上是毫无疑问的。阶级无需在各种政策之间选择,历史形势已经给它规定了特定的政策,没有任何其它的选择。由此得出结论,阶级不需要行动,因为行动意味着在过程的各种可能途径上进行选择。物质生产力通过阶级成员这个媒介发生作用。

但是,马克思、恩格斯以及所有其他马克思主义者在跨出认识论的界限,并开始评论历史和政治问题时就忽略了他们这一体系的基本宗旨。然后,他们不仅指责非无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敌意,而且批评他们的政策无利于提高他们自己阶级的真正利益。

马克思最重要的政治小册子是1871年出版的《法兰西内战》。这本册子猛烈地攻击法国政府,(因为)这个受国家绝大多数人支持的政府一心要镇压巴黎公社的反叛。马克思毫无顾忌地中伤那个政府中的所有领导人,称他们是骗子、造假者、以及盗用公款者。他还指责儒勒·法弗尔(Jules Favre)“和嗜酒狂妻子非法同居在一起”,加利菲特将军(General de Gallifet)¹²⁹从他妻子的所谓卖淫行为中获利。简而言之,这个小册子开创了一种社会主义媒体诽谤战略的模式。当小报媒体采纳了这种模式后,马克思主义者愤怒地批评这是资本主义最恶劣的赘疣。然而,尽管这些诽谤性的谎言理应遭到谴责,但它仍可以被解释成在抗击资产阶级文明不平息的战争中的游击战术。不过,这至少和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原则不相容。不过,从资产阶级的立场质疑资产阶级政策的私利是另一回事。《内战》断言,法国资产阶级的政策揭露了它自己的意识形态,其唯一的目的就是“延缓阶级斗争”的本质教义。从此,资产阶级的阶级统治再也无法“藏在民族主义的制服里面了”。从此,在工人和他们的剥削者之间再也不存在任何关于和平或休战的问题了。战斗将继续,工人们的最终胜利无可质疑。¹³⁰

必须注意到,这些评论是在考虑了这样一种形势后作出的:大多数法国人民必须在无条件向一小撮革命分子投降或是与他们作斗争之间做出选择。无论是马克思还是任何其他人都没有指望一个国家的大多数人会毫无抵抗地向少数人的武装侵犯屈服。

更重要的事实是,在这些评论中,马克思认为法国资产阶级采取的政策在事情的发展过程中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在这一点上,他和他所有的其它观点又自相矛盾。在《共产党宣言》中,他宣告无论资产阶级采取什么防守策略,阶级斗争将是不可调和的、无情的。他从剥削者和被剥削者的阶级形势中推论出这种斗争的不可避免性。在马克思主义的体系里,没有给这种假设留下任何的空间,即资本家采取的政策能以任何方式影响阶级斗争的出现和结果。

如果一个阶级,例如1871年的法国资产阶级,处在选择不同政策的位置上,并且通过它的选择影响到了事情的发展是真实可能的,那么相同的情况也适用

¹²⁹ 普法战争中的法军骑兵将军,他的骑兵在色当突围战中全军覆没,直接导致了法国皇帝拿破仑三世的投降。

¹³⁰ Marx, *Der Bürgerkrieg in Frankreich*, ed. Pfemfert (Berlin, 1919), p. 7.

于处在其它历史情况下的其它阶级。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所有马克思唯物主义的教条就被粉碎了。那么，“阶级形势会告诉一个阶级什么是真正的阶级利益以及什么样的政策能最好地服务这些利益”这个说法就是不正确的。并非只有对真正的阶级利益有利的意见才会得到那些管理阶级政策的人的赞成，有可能不同的意见指导了那些政策，并因此对事情的发展产生了影响。但是，这样一来，历史中重要的事情就并非只是利益了，观点也并非只是仅仅受这些利益决定的意识形态和上层建筑了。为筛选出真正有利于本阶级利益的观点，审视观点便成为一种必须。用逻辑推理的方法讨论冲突的观点便成为必然。马克思试图用以取代这种冷静权衡一定观点利弊的方法的拼凑之物——意识形态理论——就破产了。那被马克思试图以“不科学”加以禁止的、通向检验社会主义优缺点的道路就重新打开了。

马克思的另一篇重要论述，是他1865年的论文《价值、价格和利润》。在这篇文章中，马克思批判了工会的传统政策。他认为工人们应该抛弃保守主义的座右铭“一天的公平工作，换一天的公平工资！”并应该在他们的旗帜上写上革命的口号：“废除工资制度！”¹³¹这明显是一个关于哪种政策能最好地服务工人阶级利益的争论。在这件事上，马克思没有像往常一样把他的无产阶级反对者打上叛徒的烙印。他含蓄地承认，即使在工人阶级利益真诚虔诚的拥护者之中也会存在不同的意见，并且这种争论必须以辩论的方式解决。或许进一步考虑后，他自己发现了 he 用来处理这个问题的方式和他所持有的教条不一致，因为他并没有出版这篇于1865年6月26日在国际劳动者同盟全会上宣读的文章。这篇文章直到1898年才由他的一个女儿首次发表。

但是我们审查的主题不是马克思没能一贯地坚持他自己的理论以及他滑向了与他理论相矛盾的思维方式。我们必须检验马克思理论的合理性，并且必须在此转向“利益”这个术语在他理论背景中的特殊内涵。

在此问题上，每个人以及由每个人组成的团体也是如此，总是致力于以一个对他更好的形势取代一个不太满意的形势。在不考虑任何其他人的意见对这两种形势限制的情况下，我们可以说在这个意义上他在追求自己的利益。但是，什么是更有利的情况以及什么是不太有利的情况，则是由行为入自己决定的，是行为入从各种可能解答中选择的结果。这也是一种价值判断，是由个人关于这些不同状态可能对他本人福利施加的影响的观点决定的，最终取决于他附加到这些预期效果上的价值。

如果我们认识到这一点，还宣称思想是利益的产品就是一种不明智的行为了。因为思想已经告诉一个人什么是他的利益。在以后的日子里，回顾他的过去行为，他可能认为自己曾经犯过错误，用其它的行为模式本来会更好服务他自己的利益。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在他行动的关键时刻就没有根据自己的利益行动，他只是根据当时他认为会最好地服务于他利益的情况选择行动。

如果一名未受影响的观察者去看另一个人的行为，他可能会想：这个家伙错了，他所做的不能服务于他认为的个人利益，另一种行为方式将会更适合达到他致力于要达到的目的。在这个意义上，今天一个历史学家可以说，或者一个明智的当代人在1939年可以说，在入侵波兰这件事情上，希特勒和纳粹犯了一个错误：入侵其实损害了他们要达到的自身利益。而只要这种批评仅涉及手段而不涉及行动的终极目的就是切合实际的，终极目的的选择是一个只依赖

¹³¹Marx, *Value, Price and Profit*, pp. 126-7.

于作判断的个人评价的价值判断。其他人对此所能说得只能是：我会做一个不同的选择。如果一个罗马人对一个将要被斗兽场的野兽撕碎的基督徒说：向我们神圣皇帝的雕像鞠躬和敬拜可以最好地服务你的利益，基督徒会回答道：我的根本利益是服从我信条的规定。

但是马克思主义作为一门自称“掌握了人们注定会争取的目的”的历史哲学，以一种不同的内涵使用“利益”这个术语。它所指的利益不是人在价值判断基础上的选择，而是物质生产力要努力获得的目的。这些生产力致力于建立社会主义。它们把无产阶级当作实现这个目的的一个手段。超自然的物质生产力追求它们自身的利益，独立于凡人的意愿之外，无产阶级只是它们手中的一个工具。阶级行为并非自己的行为，而是物质生产力在把阶级当作一件没有自己意识的工具使用时表现出来的行为。马克思所说的阶级利益实际上是要求从“发展的桎梏”中解放出来的物质生产力的利益。

这种利益当然不依赖于普通人的观点。唯一决定它们的是马克思的观点——这个创造了物质生产力的幻影和物质生产力的利益的半人半神形象的人。

在现实、生命以及人类行为的世界中，不存在在时间上和逻辑上先于观点、不依赖于观点的利益。人认为他的利益是什么，取决于他个人的观点。

如果说社会主义将会最好地服务于无产阶级利益这一命题有什么道理的话，那就是无产阶级个人努力要达到的目的，通过社会主义能得到最好的实现。但这样的一个命题要求证据，以一个武断的人为的历史哲学体系来替代这种证据是徒劳的。

但对马克思来说，这些从来都不是问题，因为他只相信人类的利益是唯一并完全地取决于人类身体的生物特性。就像他所看到的，人只对获取最大数量的有形财物感兴趣。在商品和服务的供应上没有质的问题，只有一个数量的问题。需求不依赖于思想，而只依赖于生理条件。被这个偏见所蒙蔽，马克思忽略了一个事实，那就是，如何决定生产什么样的商品本身就是生产中的一个问题。

的确，当动物和原始人类挣扎在饥饿边缘的时候，除了可获得食物的数量之外，什么都不重要。但无需指出，这一点对人而言情况是完全不同的，即使在那些文明的最早阶段。文明人也面临在满足不同需求以及满足同一需求的不同方式之间选择的问题，他的利益多种多样，并且他做决策的观点会影响他所作的决定。给一个想要一件新外套的人一双鞋，或是给想听贝多芬交响乐的人一盒火柴，他们的利益都没有满足。正是各种观点造成了人们的利益完全不同这一事实。

顺带提一下，这个对人类需要和利益的曲解，使得马克思和其他的社会主义者无法理解自由和奴役的区别，也无法区分一个人自己如何决定消费他的收入的情形和一个人由父亲式的权威人士提供他需要的物品的情形。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消费者选择并因此决定商品生产的数量以及质量。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政府当局管理这些事情。在马克思以及马克思主义者的眼里，这两种满足需求的方法没有实质的区别；谁选择并不重要，“微不足道”的个人为自己选择或是当局为国民选择。他们没有意识到政府当局选择的不是个人想要得到的，而是按照政府的观点个人应该得到的。如果一个想要《圣经》的人得到了一本《可兰经》，他就不再是自由的了。

不过，即使为了讨论的缘故，我们承认在人们要什么样的商品以及用最有利利的技术来生产商品的问题上存在不确定性，在短期利益和长期利益上也存在

冲突。而这里，还是观念决定决策，是价值判断决定附加到当前商品还是未来商品的价值中的时间偏好¹³²的量，决定一个人是应该消费还是积累资本，资本损耗或资本积累应该控制在什么样的程度上？

马克思不去思考这些问题，而是满足于他自己的教条：社会主义将是人间天堂，每个人都会得到他所需的一切。当然，如果人们以这个教条为基础，就可以宣布，在社会主义下每个人的利益，无论什么利益将会得到最好的满足。安乐乡¹³³里的人们不再需要任何思想，也不再借助任何价值判断，不再思考也不再行动。他们只需张开嘴巴，让烤熟的鸽子飞到嘴里去。

在现实社会里，社会条件是科学探索真理的唯一对象，思想决定人们如何去认识什么是他们的利益，独立于思想的利益根本就不存在。利益是思想决定的，自由人不根据他们的利益行动，而是根据他们相信能促进自身利益的思想行动。

7. 资产阶级的阶级利益

卡尔·马克思思想的一个出发点就是这样一个教条：资本主义在对工人阶级完全不利的同时，又是维护资产阶级的阶级利益的；而社会主义在阻碍资产阶级的无理要求的同时，对整个人类也是非常有益的。这些思想是法国共产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提出来的，通过1842年施泰因¹³⁴的宏篇巨著《当前法国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为德国大众所知。马克思毫不迟疑地接受了这个理论以及其全部含义。他从来没有想到，它的基本教义需要证明，它所用的概念需要一个定义。他从来没有给社会阶级、阶级利益以及阶级利益冲突的概念下过定义。他也从来没有解释过为什么社会主义比其它任何制度能更好地满足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以及整个人类的真正利益。直至我们这个时代，这种态度一直是所有社会主义者的特征性标志。他们只是简单地、想当然地认为社会主义的生活将是幸福的。无论是谁如果胆敢追究原因，根据这一点要求就可以暴露出他是一个被贿赂的、剥削者自私的阶级利益的辩护者的真面目。

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教导说，催生社会主义到来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本身内在规律的运行。在无情的自然法则的作用下，资本主义生产产生了否定它自己的因素。¹³⁵ 因为任何社会形式在其具有足够的空间供所有的生产力发展之前不会消失¹³⁶，资本主义在社会主义出现之前必须充分发展。因此，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看，资本主义的自由发展（不被任何政治干涉所打乱）对无产阶级的阶级——我们应该说，“正确理解的”或长期的——利益是非常有益的。《共产党宣言》说，在资本主义成熟以及随之而来的崩溃过程中，劳动者“越陷越深”，“成为乞丐”。但是，从永恒的角度¹³⁷、从全人类的目标以及无产阶级的长期利益的观点看来，这种“巨大的痛苦、压迫、奴役、屈辱以及剥削”，实际上可

¹³² time preference 时间偏好，经济学中，消费者选择当前消费商品（服务）或以后消费，这种时间上的差别就是时间偏好。

¹³³ 原文是 land of Cockaigne. Cockaigne 和 Atlantis 以及 El Dorado 都是西方传说中的乌托邦之地。Cockaigne 来自中世纪法语，意为“plenty”。

¹³⁴ Lorenz von Stein 洛伦茨·冯·施泰因（1815~1890）德国经济学家，社会哲学家。他先于马克思应用黑格尔的辩证法到公共管理和国民经济领域。

¹³⁵ Marx, *Das Kapital*, I, 728. [Eng. trans. vol. I, p. 837 (See *Socialism*, p. 498 n.)].

¹³⁶ See above, pp. 71 and 85.

¹³⁷ *sub specie aeternitatis*: under the aspect of eternity, 斯宾诺莎的名言，从永恒的观点来看每一件事。

以被看作是通向永恒幸福道路上的一步。一味地——必然是徒劳的——试图在资本主义框架内通过改革来改善雇佣劳动者条件的努力就显得不仅无益，而且明显同一——正确理解的——工人阶级利益相矛盾。这样，马克思就否定了工会为增长工资和缩短劳动时间的努力的意义。马克思主义政党中最正统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在八十年代德意志国会投票时反对了俾斯麦著名的有关社会政策的一切措施，其中包括最引人注目的特色——社会保险。与此类似，在共产党人看来，美国新政只是一个通过延迟其崩溃以及社会主义太平盛世出现、来挽救垂死资本主义的命中注定的方案。

因此，如果雇主反对通常所说的亲劳工的立法，他们并没有犯下反对马克思所认为的无产阶级真正利益的罪行。恰恰相反，他们通过实质上把经济发展从无知的小资产阶级、官僚、以及诸如费边主义者之流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和人道主义、假社会主义者试图减慢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帮助了社会主义和劳动者的事业。正是剥削者的自私反而成就了受剥削者和整个人类的福利。马克思如果遵循他自己的思路到最终的逻辑结论，他该不会受到诱惑去附和曼德维尔¹³⁸的“私人的恶德和公众的利益”观点，或者附和亚当·斯密关于富人“被看不见的手指挥”，按一种他们“毫无意图、毫不知晓的方式在促进社会利益”¹³⁹的观点？

然而，马克思总是在他的推理内在矛盾变得十分明显之前就急于结束。在这一点上，他的追随者照搬了他们老师的态度。

资产阶级、资本家和企业家认为这些自相矛盾的马克思门徒们对保存自由放任主义制度感兴趣。这些门徒们反对减轻数量最多、最有用以及最受剥削阶级人民的命运痛苦的一切尝试，因为这种尝试试图要阻止社会进步，（那些人）是想要扭转历史车轮的反动分子，当然是毫无希望的。不论人们对那些报纸、政客以及政府每天周而复始的热情鼓噪如何看待，也无法否认它们和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不相符合。从一个始终如一的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看来，所谓亲劳工立法的拥护者是反动的小资产阶级，而那些马克思主义者称为劳工迫害者的人则是即将到来的至福进步的先驱。

在对经济问题完全无知的状态下，马克思主义者看不到今天的资产阶级、那些已经是富裕资本家及企业家的人，他们作为资产阶级并不自私地想要保存自由放任政策。在自由放任政策下，他们的显赫地位每天都会受到野心勃勃的不名一文的新来者的威胁。限制那些有才能的新贵的法律对消费者的利益有害，但是它们保护着那些已经取得了经济地位的人不受入侵者的竞争。通过增加商人获利的难度以及对利润征收更高的税收，阻止新来者进行资本积累，从而消除了驱使老企业在为消费者服务上作最大努力的动机。从马克思的观点看，庇护低效率（企业或个人）免受高效率者竞争的措施以及致力于降低或征用利润的法律是保守的，更确切地说是反动的。它们将会阻碍技术进步和经济发展，保护低效率和落后。倘若新政在1900年而不是在1933年实施，美国消费者会失

¹³⁸ Bernard Mandeville, 或 Bernard de Mandeville (1670- 1733) , 英国哲学家, 政治经济学家。他的名著《蜜蜂的寓言》提出了著名的“私人的恶德, 公众的利益”(Private vice, public benefit) 的观点。他的思想得到了亚当斯密的发展, 对后世奥地利学派的影响也很大。

¹³⁹ Adam Smith, *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 Pt. IV, ch. 1 (Edinburgh, 1813), (Liberty Fund, 1982), pp. 184-5.

去很多他们在今天享用的、由在这个世纪最初几十年里不起眼小企业成长为全国大企业以及大规模工业生产的公司提供的商品。

在对大企业以及对小企业发展壮大的这种仇恨中，它促使公众对工业问题的误解达到极致。在马克思主义的迷惑之下，公众舆论认为“大”是经济中的至恶之一，并支持旨在通过政府行为遏制或伤害大公司的每一个计划。没有人理解，只有行业中的大公司才有可能给大众提供今天美国普通人都离不开的那些产品。为满足少数人的奢侈品，在小店子里生产就可以了；大公司才能满足多数人对奢侈品的需求。那些咒骂大公司的政客、教授和工会头目，实际上是在为较低的生活标准而战，他们根本就没有促进无产阶级的利益。并且，从马克思主义教条的观点看，他们也恰好是改善和提高工人条件的根本敌人。

8. 马克思主义的批评家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唯物主义与古典唯物主义根本不同，它把人类思想、选择和行为描述成被物质生产力（工具和机器）所决定的事物。马克思和恩格斯没能看到工具和机器本身也是人类思维活动的产品。即便他们试图把一切精神和智力现象（他们所称的上层建筑）描述成由于物质生产力产生的努力得以成功，他们也只是把这些现象追溯到本身也是精神和智力现象的事物。他们的推理是循环的。他们所称的唯物主义事实上根本就不是唯物主义，它只给所涉及的问题提供了一个口头上的解决办法。

有时，即使马克思和恩格斯也意识到了他们理论的根本不足，当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总结他朋友取得成就的精华时，他完全没有提到物质生产力。恩格斯说：

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自然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那就是历来为纷繁芜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必要食物的生产以及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随之达到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为基础，人们的国家制度、是与非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也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解释，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做得相反。¹⁴⁰

当然，没有人比恩格斯更能胜任给辩证唯物主义提供一个权威解释的工作，但是如果恩格斯在这个诤告里（不提唯物主义的做法）是对的，那么整个马克思唯物主义也就消逝了。它可以缩减为一个从亘古就人人尽知、无人反对的常识，它表达了与“生活第一，哲学第二”这个陈旧的格言相同的意思。

作为一个争论的诀窍，恩格斯的解释效果非常好。一旦有人开始揭示辩证唯物主义的荒谬和矛盾，马克思主义者就会反驳：你否认人首先要吃饭么？你否认人要求提高他们生存的物质条件么？既然没有人否认这些常识，他们就下结论说马克思唯物主义的所有教义都是颠扑不破的，并且许多伪哲学家没能看破这个不合逻辑的推论。

马克思愤怒攻击的一个主要目标是霍亨索伦王朝统治下的普鲁士国家。他仇恨这个政权不是因为它反对社会主义，而恰恰是因为它倾向于接受社会主义。

¹⁴⁰Engels, *Karl Marx, Rede an seinem Grab* [“Remarks at His Gravesite”], many editions. Reprinted in Franz Mehring, *Karl Marx* (2d ed. Leipzig, 1919, Leipziger Buchdruckerei Aktiengesellschaft), p. 535.

在他的对手拉萨尔¹⁴¹考虑是否通过和俾斯麦领导的政府合作来实现社会主义时，马克思的国际劳工同盟就寻求替代霍亨索伦王朝的位置。因为普鲁士新教教会受政府支配并且由政府官员管理，马克思也从没有试图辱骂基督教信仰。在那些知识分子率先皈依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就像俄国和意大利，反基督教更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在俄国，教会对政府的依赖比在普鲁士的情况更加严重。在19世纪的意大利人眼里，对反天主教的偏爱是反对恢复教皇的世俗统治以及反对分裂刚赢得的国家统一的标志。

基督教教会和宗派没有反对社会主义，他们逐步地接受了它的基本政治和社会理念。今天，除了极少数人外，他们公开抵制资本主义，宣扬社会主义或干涉主义政策——这些政策必然无可避免地导致建立社会主义。但是，当然没有任何基督教会会默许一个敌视基督教并致力于压制基督教的社会主义派别，教会毫不留情地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反基督教观点，他们试图把他们自己的社会改革和马克思主义的纲要区别开来。他们认为马克思主义固有的邪恶性在于它的唯物主义和无神论。

然而，宗教维护者在与马克思唯物主义的战斗中完全没能抓住重点，他们中的许多人把唯物主义视为一种宣扬人只应该为满足身体需要以及享乐欢宴的一生而奋斗，并且应该不为任何其它事情发愁的伦理理论。他们所提出反对这种伦理唯物主义的理由不涉及到马克思主义理论，也不涉及到上述争论的问题。

那些挑检出诸如基督教信条的兴起、十字军东征、宗教战争等特定历史事件，然后耀武扬威地断言无法对这些事件提出唯物主义解释的人，针对马克思唯物主义提出的反对理由也并不高明。任何条件的改变都会影响对各种物质的需求和供给结构，并因此影响一些群体的短期利益。因此可能表现出一些群体短期获益而另一些群体在短期内受损害。因此，马克思主义的倡导者总能将这同阶级利益挂钩，并宣称由此提出的反对理由无效。当然，这种证明历史唯物主义的解释正确性的方法是完全错误的。问题不在于群体利益是否受影响；至少在短期内它们是必然会受影响的。问题在于为有关群体利益的斗争是否是讨论中事件的原因。例如，军火工业的短期利益是否助长了我们这个时代的好战性以及战争？在处理这类问题时，马克思主义者从来不提既有利益的支持方就必然有利益的反对方。他们本应解释为什么后者没能胜过前者。但是马克思主义的“唯心主义”批评家过于迟钝而不能揭露出辩证唯物主义者的任何谬误。他们甚至没有注意到马克思主义者只把阶级利益解释用在处理一般谴责为恶的现象上，从来不用在处理所有人都赞同的现象上。如果一个人把交战归于军火资本的诡计，把酗酒归于酒商的阴谋，那么把清洁归于肥皂商的计划以及把文学和教育的繁荣归于出版印刷业的操纵也是合情合理的。但是，马克思主义者和他们的批评者都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这之中一个突出的事实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变迁理论从来没有接受过任何审慎的批评，它能成功是因为它的对手从来没有揭露它的谬误以及内在的矛盾。

在把马克思主义和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混为一谈的这一通常做法上，可以看出人们是如何完全误解马克思唯物主义的。实际上，无法想象出比这两个理论之间更大的差异来。唯物主义致力于把精神现象还原为物质原因。恰恰相反，精神分析则把精神现象当作一个独立的领域来处理。传统精神病学和神经学试图以身体的某些相关器官一定的病理条件作为原因解释所有的病理情况，而心

¹⁴¹ Ferdinand Lassalle (1825 —1864) 拉萨勒，德国犹太裔法学家，社会主义活动家。

理分析成功地证明了身体的反常状态有时是精神因素造成的。这个发现是沙可¹⁴²和布洛伊尔¹⁴³的成绩，而在弗洛伊德伟大成就的基础之上，发展出了一套综合的系统理论。心理分析和所有唯物主义派别都是相对立的。如果我们不把它当作纯知识的一个学科，而是一种治疗疾病的方法，那我们应该把它称为一门人类社会学的医学学科。

弗洛伊德是个谦逊的人。他没有就他的贡献的重要性作过分的夸耀。他在涉及哲学以及他自己没有就其发展做出贡献的知识学科时非常谨慎，没有冒险批评任何唯物主义形而上学的命题。他甚至承认有一天科学可能会成功地给精神分析涉及的现象提供一个纯生理学的解释。只是在这发生之前，精神分析对他来说是科学上合理的和实践上不可或缺的。他在批评马克思唯物主义时同样谨慎。他直率地公开承认在这个领域他没有资格。¹⁴⁴但是，所有这些没有改变心理分析途径在本质上完全和唯物主义认识论不相容的事实。

精神分析强调利比多 (Libido) 即性冲动在人类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这个角色以前被心理学和其它所有学科忽略了。精神分析还解释了这种忽略的原因，但是，它绝没有断言“性”是人类唯一寻求满足的欲望，而且一切精神现象都是由它而引起的。它对性冲动的注意力源自于这一事实，心理分析起先是一种治疗方法，并且它涉及的大多数病理情况是因为对性欲的压制而造成的。

有些人把精神分析和马克思主义联系起来的原因是两者都和神学观点不符。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各神学流派和不同的宗教团体均接受了对弗洛伊德理论的不同评价。他们不仅仅抛弃了他们以前对待现代天文学、地质学以及生物结构演化理论的极端反对态度，他们还试图把精神分析结合到牧师神学的理论和实践中来，把精神分析研究看作是牧师职业训练的一个重要部分。¹⁴⁵

在今天的形势下，许多教会权威的维护者在对待哲学和科学的问题上茫然不知所措。他们谴责那些他们可以、甚至应该赞成的事物。在反对伪理论时，他们采用站不住脚的反对理由，这使那些原本能看清楚这些理论所含谬误的人，反而在头脑中增强了相信被攻击的伪理论是合理的倾向。因为无法发现伪理论的真正缺陷，这些宗教的拥护者可能最终以支持这些理论结束。而这说明了在当今存在的一个奇怪的事实，即基督教作品中采用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理论的趋势。因此，一名长老会神学家，Alexander Miller 教授相信基督教“能认真对待历史唯物主义的真理以及阶级斗争的事实。”就像他之前许多基督教宗派的著名领导已经做的那样，他不仅暗示教会应当采纳马克思政治学的基本原理，还应该“接受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社会学的基本要素”。¹⁴⁶把尼西亚信经¹⁴⁷和一个宣扬宗教思想是物质生产力的上层建筑的理论揉合在一起是多么的奇怪！

¹⁴²让-马丁·沙可 (Jean-Martin Charcot, 1825—1893 年)，法国神经学家。

¹⁴³布洛伊尔 (Josef Breuer, 1842—1925)，奥地利心理学家，精神分析法的奠基者之一。

¹⁴⁴Freud, *Neue Folge der Vorlesungen zur Einführung in die Psychoanalyse* (Vienna, 1933), pp. 246–53.

¹⁴⁵Of course, few theologians would be prepared to endorse the interpretation of an eminent Catholic historian of medicine, Professor Petro L. Entralgo, according to which Freud has “brought to full development some of the possibilities offered by Christianity.” P. L. Entralgo, *Mind and Body*, trans. by A. M. Espinosa, Jr. (New York, P. J. Kennedy and Sons, 1956), p. 131.

¹⁴⁶ Alexander Miller, *The Christian Significance of Karl Marx* (New York, Macmillan, 1947), pp. 80–1.

¹⁴⁷Nicene creed 尼西亚信经是公元 325 年由宗教大会确认的基督教信仰的宣言，为天主教、东正教和新教多数教派所遵从。

9. 马克思唯物主义和社会主义

像许多失落的知识分子以及大多数同时代的普鲁士贵族、公务员、教师和作家一样，马克思被一种对商业和商人的狂热仇恨所驱使。他转向社会主义是因为他认为它是可以施加给那些可恨的资产阶级的最严厉惩罚。与此同时，他意识到社会主义唯一的希望在于避免进一步的讨论它的优缺点，必须诱使人们不问它的效果就在情感上接受它。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马克思改造了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他母校的官方信条。黑格尔曾冒称他自己有向大众揭示上帝隐秘计划的本领。马克思博士没有理由要向后退缩，没有理由不把来自一个内心声音的好消息告之大众。这个声音宣告，社会主义注定要来到，因为这是人类命运选择的进程。沉溺于辩论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生产方式可能带来的好处或坏处毫无用处。只有当人们能够在社会主义和某种替代制度之间自由选择时，这种争论才有意义。除此之外，作为在历史发展连续阶段中的后来阶段，社会主义也必然是一个更高级更好的阶段，而对社会主义带来好处的所有怀疑都是无效的。¹⁴⁸

描述人类历史进入社会主义就达到最高和最终阶段的历史哲学方案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也是卡尔·马克思对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主要贡献。和包括黑格尔在内的所有相似的方案一样，这也是直觉产生的。马克思把它称作科学，因为在他的时代这是一个理论所能获得的最高荣誉了。在马克思之前的时代，人们不习惯把历史哲学称为科学，从没有人把“科学”这个术语用在但以理的预言、圣约翰的启示，或是弗洛拉的约雅敬的著作上面¹⁴⁹。

因为相同的原因，马克思把他的理论称为唯物主义的。在马克思迁到伦敦之前所生活的左翼黑格尔主义的环境中，唯物主义是公认的哲学。哲学和科学不容许除了唯物主义教条之外的任何关于思想——肉体问题的分析，这一点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不想被团体开除的作者必须避免让人怀疑对“唯心主义”有任何让步。因此，马克思急于称他的哲学为唯物主义的。事实上，就像上面指出的那样，他的理论完全不涉及思想——肉体问题。它没有提出“物质生产力”是如何出现的，并且它们是怎样变化以及为什么而变化的问题。马克思的理论不是唯物主义的，而是一个对历史的技术解释。从政治的观点看，马克思把他的理论称为科学的以及唯物主义的，此举非常高明。这些谓词给它带来了别处无法获得的声誉。

顺带提一下，必须注意到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试图确立他们对历史的技术解释的正确性。在他们作家职业生涯的早期，他们清晰地阐明了他们的理论，质疑上文引用过的例如关于手工作坊和蒸汽工厂的声明之类的陈述。¹⁵⁰在以后的日子里，他们变得更加保守和谨慎。在马克思死后，恩格斯偶尔甚至向“资产阶级”以及“唯心主义”观点做出显著的让步。但是，马克思或恩格斯以及他们众多的追随者从来没有试图对从一定的物质生产力状态产生一定的司法、政治、以及精神的上层建筑的运行机理给予任何解释。他们著名的哲学充其量不过是对一个尖刻的纲要的一种不连贯的阐述。

¹⁴⁸ 参见第八章历史哲学。

¹⁴⁹ 但以理的预言和圣约翰的启示分别见圣经《但以理书》、《启示录》，弗洛拉的约雅敬（Joachim of Flora, 1132-1202），神学家。

¹⁵⁰ 参见第七章 辩证唯物主义 2 物质生产力。

马克思主义的辩论风格非常成功，并为社会主义革命招收了大量的伪知识分子士兵。但是，他们没有对经济学家所说的社会主义生产模式的灾难性后果加以驳斥。马克思把对社会主义制度作为一种运行的乌托邦进行分析视为禁忌。按照他的说法，那样做是不科学的。并且，他和他的继任者对所有违反这个禁忌的人都加以诋毁。然而，这些策略没有改变这样一个事实，即马克思对社会主义讨论的全部贡献只是揭示了其内心的声音告诉他的东西——人类历史发展的终点和目的是没收资本家的财产。

必须强调的是，从方法论的观点来看，马克思唯物主义并没有实现唯物主义哲学声称所需要实现的目标，它没有解释思想和价值判断是如何从人类大脑产生的。

揭露一个站不住脚的理论并不等同于证实与之相对的理论，因为许多人忘了这个明显的道理，所以这里有必要陈述一下。对辩证唯物主义的驳斥当然意味着马克思主义者对社会主义的辩护无效。但是，它没有断言社会主义无法实现，没有断言社会主义将摧毁文明并导致灾难，以及社会主义的到来并非无可避免的真实性，这些命题只能通过经济分析来确立。

马克思以及所有那些同情他的理论的人已经意识到对社会主义的经济分析将显示出亲社会主义论点的谬误。马克思主义者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并顽固地拒绝听取批评意见，因为他们出于情感原因需要社会主义。

第八章 历史哲学

1. 历史的主题

历史的对象是人类行为，也就是个人以及群体的行为。它描述人们生活的环境以及他们对这些环境的反应方式。它研究的对象是人类价值判断、这些判断指导下人们追求的目的、为了达到这些目的人们采取的手段以及他们行为的结果。历史涉及的是人们对他所处环境状态有意识的反应，这些环境包括被他的前辈以及同时代的人的行为所决定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

每个人都生存在一定的社会及自然环境中。个人并不是简单的、笼统的、能被历史抽象对待的个体。个人在他生命的任何时刻都是他先辈曾经历过的以及他本人迄今为止面临过的所有经验的产品。一个真实的人作为家庭、种族、人民以及时代的一员而活着。同时也是一国的公民、社会团体的成员以及某个行业的从业者。他有时候受到一定的宗教、哲学、形而上学以及政治思想的影响，他的行为受到他通过环境获得的意识形态的指导。

然而，这些意识形态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们是人类思想的产物，当新思想成为旧观点的一部分或替代了被抛弃的观点的时候，意识形态就会改变。在寻求新观点的起源时，历史只能追溯到它们是人的思维所产生的，无法走得更远。历史研究无法逾越的历史终极已知是人类思想和行为。历史学家可以把思想追溯到先前发展的思想，他可以描述注定会引起行为反应的环境条件。但对一个新思想和新的行为模式而言，他只能说，它们产生于一个人大脑的一定空间和时间，并被其他人接受。

一直有人尝试把思想的诞生解释为出自“自然”的因素。思想被描述为地理环境、人们居住地物理结构的必然产品。这个理论明显和现有知识相矛盾。许多思想是被人的自然环境刺激引起的反应，但是，这些思想的内容不是环境决定的。对相同的自然环境，不同的个人以及群体以不同的方式作出反应。

其他人尝试过用生物因素来解释思想和行为的多样性。人种细分为具有不同遗传生物特征的种族群体。历史经验没有排除一些种族群体的成员在构思合理思想上比其他种族成员更有天赋这一假定。然而，需要解释的是，为什么一个人的思想与他相同种族的其他人会有不同？为什么兄弟之间彼此相异？

而且，文化落后是否决定性地显示一个种族群体的永久低劣则更是一个问题。使人类与动物相似的祖先转变为现代人的演化过程，持续了逾几十万年的时间。从这样（几十万年）的角度来看，一些种族没能达到其他种族在几千年前达到的文化水平，这一事实并不是很重要。有些个人虽然身体和智力发展比一般人要慢，但是后来他们要比大多数正常发展的人要优秀得多，相同的现象发生在整个种族上也不是不可能的。

对历史而言，没有什么能超出人们的观点以及受这些观点驱使去追求的目的的范围。如果历史学家谈到一个事实的意义，他总是会提到行为人对这个他们必须生存和行动的处境的解释，或者提到其他人对这些行为结果的解释。历史涉及的最终原因总是个人和个人群体追求的目的。除了行为人对他们自己的人类利害的观点判断并附加给事件的意义及感觉，历史不承认在事件的进程中有任何其它的意义及感觉。

2. 历史哲学的主题

历史哲学从不同的观点看待人类历史。它假设上帝或自然、或某个其他超人实体依照天意指导着事情向着一定的、不同于行为人追求目的的目标发展。事情发展的先后次序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天意的方式不同于凡人的方式。短视的个人自我欺骗，以为他的选择和行为都是出于自己的考虑。实际上，他在不知不觉中必然按照一种最终会实现天意计划的方式行动。历史进程有一个由天意决定的明确目的，和人类的意志无关。它是一段通向预定终点的进程。历史哲学的任务是从这个目的的角度来判断历史的每一阶段。

如果历史学家谈到进步和后退，他指的是人们有意识地在行为中追求的一个目的。在他个人的术语中，进步意味着达到了一个行为人认为比先前状态满意或更满意的结果。在历史哲学的术语中，进步意味着在通往天意设定的终极目的的道路上前进。

每一种历史哲学都必须回答两个问题：第一，追求的最终目的是什么，并且通过什么途径去达到目的？第二，通过什么手段来诱导或迫使人们追求这个目的？只有当这两个问题得到完全解答了，理论体系才是完整的。

回答第一个问题时，哲学家要归诸于直觉。为了确证他的猜测，他可能会引用前辈思想家的观点，即其他人的直觉思考。哲学家的最终知识来源总是表达天意的预言，并通过哲学家的直觉能力显示出来，而这对那些门外汉则一直是隐藏的。面对关于他的猜测的正确性所提出的反对意见，哲学家只能答复道：一个内心的声音告诉我，我是对的，你是错的。

大多数历史哲学不仅指出历史发展的最终结果，而且还揭示人类要达到这一目标注定经过的道路。它们列举并描述从最开始到最终过程中连续的状态、阶段或中间位置。黑格尔、康德以及马克思的理论就属于这一类。另一些认为上帝有意将某个特定的任务托付给一定的民族或种族。例如费希特¹⁵¹理论中德国人的任务，以及现代种族主义者解释中北欧人和雅利安人的角色。

就对第二个问题的答案而言，有两类历史哲学需要区分。

第一类认为神挑选了一些凡人作为执行他的计划的特殊工具。神挑选的领袖被赋予了超人的能力。他是神的全权大使，他的使命是引导无知的群众走上正确的道路。他可能是一个世袭的国王，或一个自然夺权的平民，而盲目邪恶的暴民出于嫉妒和仇恨会把他称为篡位者。对神赐能力的领袖只有一件事是重要的：忠实地执行他的使命，无论他可能被迫使用什么手段，他总是高于一切法律和道德规则的。他所做的总是正确的，并且他的反对者所做的总是错误的。列宁的理论属于这一类，他在这方面偏离了马克思的理论。¹⁵²

显然，哲学家并不把神赐能力领袖的职位加给每一个宣称自己受到召唤的人。他在合法的领袖和冒名顶替者、在神派来的预言家和生于地狱的诱惑者之间加以区分。他只把那些带领人民走向神设定的目标的英雄和预言家称为合法的领袖。因为哲学家在目标上意见不一，所以他们在区分合法领袖和魔鬼化身也有分歧。他们在对恺撒和布鲁特斯，英纳森特三世和弗里德里克二世，查尔斯一世和克伦威尔，波旁皇族和拿破仑¹⁵³这些人的评价上也并不一致。

¹⁵¹Fichte Johann Gottlieb 费希特 (1762-1814)，德国哲学家，德国唯心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

¹⁵²参见第七章辩证唯物主义 2物质生产力。

¹⁵³ Caesar and Brutus, Innocent III and Frederick II, Charles I and Cromwell, the Bourbons and the Napoleons

不过他们的分歧并非到此为止。由于个人野心导致了在竞争最高职位的不同候选人之间的敌对，凯撒和庞贝，兰开斯特王朝和约克王朝，托洛茨基和斯大林之间的分裂并不是意识形态信念造成的，他们之间的敌对是因为他们追求同一职位而只能有一个人得到这一职位这一事实。现在，哲学家必须在不同妄求者之间进行选择。既然哲学家冒称自己有以上帝的名义宣判的权利，他们就需要支持一个妄求者并谴责他的敌对者。

第二类历史哲学对这个问题有另一个解决方案。在他们看来，神意借助巧妙的设计得以显现。神意在每个人的头脑里灌输特定的推动力，这种推动力的作用必然导致上帝计划的实现。个人以为他以自己的方式为自己的目的奋斗，但是，在无意中他却为实现上帝想要获得的目的贡献了他的力量。这一类包括康德的历史哲学。¹⁵⁴它后来被黑格尔重申，并且被许多包括马克思在内的黑格尔主义者采纳。正是黑格尔杜撰了“理性的诡计”这个词组。¹⁵⁵与从直觉而来的理论争论是没有意义的，历史哲学的每一个理论体系都是一种既不能被证明也不能被证伪的武断猜测，没有理性手段可以用来支持或驳斥一种依据内心声音提出的理论。

3. 历史观点和历史哲学观点的区分

在十八世纪前，大多数涉及一般人类历史以及不仅仅限于具体历史经验的论著都以一个特定的历史哲学角度来解释历史。这种哲学很少进行清晰地定义，也没有详细说明。它的原则被视为是理所当然的，并在人们对事件的评论中得以暗示。只是到了启蒙时代，才有一些杰出的哲学家抛弃了传统的历史哲学的方法，并不再思考隐含的指引事物发展的上帝的目的。他们开创了一门新的社会哲学，它和被称为历史哲学的学科完全不同。他们从行为人追求目的的角度来看待人类事件，而不是从神或自然意志的角度。

这个意识形态领域根本性变革的重大意义可以借亚当·斯密的观点来做最好的说明。但是为了分析斯密的观点，我们必须先提到曼德维尔。

旧的伦理理论几乎一致性地谴责私利。他们易于发现农夫的私利是可以宽恕的，并且经常设法原谅甚至赞扬国王扩张的贪婪。但是他们坚决反对其他人渴望富裕和财富。谈到登山宝训¹⁵⁶，他们颂扬克己和冷淡对待既会被虫子咬也会被锈损的财富¹⁵⁷，并给私利打上了应受谴责的罪恶的烙印。曼德维尔在他的《蜜蜂的寓言》中尝试驳斥这一理论。他指出，私利以及渴求物质财富这些一般被标志为罪恶的东西，实际上是带来富裕、繁荣和文明的动力。

亚当·斯密采纳了这个观点，他研究的不是要根据传统模式来发展一种历史哲学。他并没有声称猜出了上帝为人类制定并通过指导人们的行为来予以实现的目标，他也没有做任何关于人类命运的断言以及任何历史变迁不可避

¹⁵⁴Kant, *Idee zu einer allgemeinen Geschichte in weltbürgerlicher Absicht*, Werke ((Inselausgabe, Leipzig, 1921), 1, 221-40.

¹⁵⁵Hegel, *Vorlesungen über die Philosophie der Weltgeschichte* ;, 1, 83.

¹⁵⁶ Sermon on the Mount 登山宝训，新约《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七章，耶稣上山到下山前的讲话，内容主要是关于教义和伦理的。

¹⁵⁷ 《马太福音 6: 2 》：只要积攒财宝在天上，天上没有虫子咬，不能锈坏，也没有贼挖窟窿来偷。

免到达的终点的预言。他只想决定并分析他那个时代，分析帮助人们从先前年代的贫困状态发展到更令人满意的状态的一些因素。正是在这一点上，他强调“如果留意观察，自然的每一个部分公平地显示它的作者神意的关照”以及“即使在人的软弱和愚蠢之中，我们还要赞美上帝的智慧和仁慈”的事实。富人，为追求“满足自己虚无的、贪得无厌的欲望”，“被看不见的手引导”，以这样一种方式，他们“在没有打算、毫不知情时促进了社会利益，并且提供了繁殖种类的手段。”¹⁵⁸因为相信上帝的存在，斯密难以避免地把一切世俗的事物上溯到神以及上帝的看顾之下，正像后来巴师夏谈到上帝的手指一样。¹⁵⁹但是，在以这种方式谈到上帝时，他们俩都无意就上帝想要在历史发展中实现的目的作任何断言。他们著作中涉及到的目的是行为人所追求的，而不是上帝追求的。他们暗指的预定的和谐并不影响他们的认识论原则以及他们推理的方法。这种顾及上帝的方式，只是一个用来调和他们在科学研究中使用的纯粹世俗程序和他们的宗教信仰的手段。他们从虔诚的天文学家、物理学家以及生物学家那里借鉴了这个权宜之计，那些人藉此可以在研究中不偏离自然科学的经验方法。亚当·斯密之所以要寻求这种调和是因为这样的事实：传统的伦理学标准和术语把人们改善自身物质条件的欲望谴责为邪恶的，而斯密和他之前的曼德维尔一样，无法摆脱这个束缚。这样他面临着一个悖论：通常被谴责为邪恶的行为如何能够产生通常被赞为有益的结果？功利主义哲学家找到了正确的答案。那些结果有益的事物绝不能被斥为在道德上是恶的，只有那些产生坏的结果的行为才是恶的。但是功利主义的观点并不流行，公众舆论仍然坚持曼德维尔之前的观点。它并不赞成商人通过为消费者提供最能满足他们愿望的商品而获得成功。它对贸易和工业获得的财富不以为然，认为只有当财产所有人向慈善组织捐赠财富以赎罪时才能得到宽恕。

对于不可知论者、无神论者、以及无神论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没有必要提到斯密和巴师夏的“看不见的手”。那些批驳资本主义为一种不公正制度的基督教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把利己主义描述成上帝为实现他的目的而选择的一种手段是一种亵渎。神学上对斯密和巴师夏的看法对我们这个时代已经不再有任何意义。但是，基督教教会和各宗派可能会在将来某一天发现宗教自由只能在市场经济下才能实现，从而不再支持反资本主义的思潮。到那时，他们将不再否定私利，或者会重新采纳斯密等杰出思想家的建议。

意识到几乎每一个历史哲学理论所暗示的阶段理论，与历史学家尝试把完整的历史事件划分为几个不同的时期或时代之间的区别，和意识到历史哲学与从十八世纪发展而来的新纯粹世俗社会哲学的本质区别一样重要。

就像已经提到的，在历史哲学的背景中，不同的状态或阶段是通向完全实现上帝计划的终极目标的中间阶段。对许多基督教历史哲学而言，这种模式已经被《但以理书》的四个王国¹⁶⁰设定了。现代历史哲学从《但以理书》中借鉴了人类事务的最后阶段的概念、以及“一个永恒的、永远不会消逝的领土”的概

¹⁵⁸ Adam Smith, *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 Pt. II, Sec. III, ch. 3, pp. 105 6 and Pt. IV, ch. p. 185 (Edinburgh, 1813), I, 243, 419 20.

¹⁵⁹ Bastiat, *Harmonies économiques* (2d ed. Paris, 1851), p. 334. Eng. trans. *Economic Harmonies* (Princeton, D. Van Nostrand, 1964; FEE, 1968), p. 318n.

¹⁶⁰ 但以理 (Daniel)，公元前 6 世纪犹太人先知，圣经《但以理书》为他所作。他在《但以理书》第二章中替巴比伦王解梦的话被基督教神学家解释为预言四个王国 (巴比伦、波斯、希腊和罗马) 的依次兴衰。神学家以此鉴证人类的发展兴衰在宇宙主宰 (上帝) 的掌握之中。

念。¹⁶¹无论黑格尔、康德以及马克思如何不同意但以理，也无论他们彼此之间分歧多大，他们都接受这个概念，这是所有历史哲学的必需元素。他们或者宣称终极阶段已经到来（黑格尔），或者声称人类刚刚进入这个阶段（康德），或者每天都期盼这个阶段的到来（马克思）。

历史学家划分的历史时代具有不同的特征。历史学家并没有宣称他们知道未来的任何事情，他们只研究过去。他们的历史时期划分计划旨在给历史现象分类，而没有任何假定要预测未来事件。许多历史学家随意把综合史或专门史——像经济或社会史或战争史——压缩成人为的、更细的分支的做法有严重的缺陷。它成了历史研究的一个障碍，而不是一种帮助，并且经常受到政治偏见的鼓动。现代历史学家都忽略了这种时期划分方案。但是，对我们有价值的，只是确立历史学家关于历史时期划分的认识论特征并不同于历史哲学的阶段方案这一事实。

4. 历史哲学与神的意见

19世纪，在达尔文之前，三个最流行的历史哲学理论——黑格尔、康德以及马克思——是启蒙运动进步观点的一种改编。¹⁶²并且，这种人类进步的理论是从基督教哲学的救赎中改编而来的。基督教神学把人类历史看作三个阶段：人类堕落之前的极了时代，世俗的堕落时代，以及最终天国的到来。倘若放任不管，人类没有办法赎清原罪获得拯救。但是仁慈的上帝引导人进入永恒的生命。尽管人现世的朝圣有许多挫折和困难，但人们有希望获得一个受祝福的未来。

启蒙运动改变了这个方案以使它同科学的观点一致。上帝赋予人理性并引导人走向完美之路。在黑暗过去，迷信、暴君以及牧师的邪恶诡计束缚了人类最宝贵的天赋的发挥。但是最终，理性打破了桎梏，开辟了一个新的时代。从此，每一代人都会在智慧、美德以及成功地改善世俗条件上超越前辈，通向完美的进程将永远持续下去。理性，在被解放之后获得了应有的地位，且将永远不会回到黑暗时代分配给它的不恰当的位置上了。所有反启蒙运动分子的反动冒险注定会失败，进步的趋势是不可抵挡的。

只有在经济学家的理论中，进步的概念才有一个确定、不含糊的意义。所有人都为生存和生存物质条件的改善而奋斗。他们想活着，并好好活着。在使用“进步”这个术语时，经济学家并没有表达价值判断。他只是从行动人的角度来评价事物。他把事物按照在他们眼里显现的情况称为更好或变糟。因此，资本主义意味着进步，因为它给持续增加的人口带来了物质条件的逐步改善。

¹⁶¹ 《但以理书》7章14节：“得了权柄、荣耀、国度，使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侍奉他。他的权柄是永远的，不能废去，他的国必不败坏。”

¹⁶² The Marxian system of philosophy of history and dialectic materialism was completed with the Preface, dated January 1859, of *Zur Kritik der Politischen Oekonomie*. Darwin's *The Origin of Species* appeared in the same year. Marx read it in the first part of December 1860 and declared in letters to Engels and Lassalle that in spite of various shortcomings it provided a biological foundation (“*naturhistorische Grundlage*” or “*naturwissenschaftliche Unterlage*”) for his doctrine of the class struggle. *Karl Marx, Chronik seines Lebens in Einzeldaten* (Moscow, Marx-Engels-Lenin Institute, 1934), pp. 206, 207.

它给人们提供了一些他们从前没有过的满足，并且也满足了他们的某些雄心壮志。

但是对大多数十八世纪的世界改良论的拥护者来说，这个经济学家进步观“卑鄙的、物质的”内容是可憎的。他们发展了一个关于现世天堂的模糊美梦。在改良论的拥护者看来，这个天堂中人的条件非但不乐观反而是消极的：他们描绘了一幅图画，其中没有现实环境中那些令他们不满意的事物，没有暴君，没有压迫或迫害，没有战争，没有贫困，没有犯罪。人们都自由、平等，友爱。所有的人都幸福，和平与统一，并且在兄弟般的爱的沐浴下合作。因为他们假定自然是丰富的，所有人都是善的，并且是讲道理的，所以他们认为除了人类社会以及政治组织内在的缺陷之外，不会有那些他们认为邪恶的事物的存在。所需要的只是进行宪法改革，用好的法律替代坏的法律。所有反对这个理性支配的改革的人都被认为是毫无希望的堕落的人、公共福利的敌人，是要被好人从肉体上消灭的人。

这个理论的主要缺陷是，它没有理解由经济学家提出、并由资本主义私人企业为先驱来付诸实施的自由制度。那些对自然以及对处于自然状态的人的有福条件倾倒的卢梭信徒们，没有注意到生活资料是稀缺的，并且在自然状态下人是极端贫困和不安全的这一事实。他们把商人尽量满足人们需求和愿望的努力贬低为贪婪和掠夺的自私。新的经济管理方式注定要为史无前例的人口增长提供空前的生活标准的改善，作为它到来的目击者，那些卢梭信徒们却沉浸在回归自然，或回到所谓的早期罗马共和国正直、简单生活的白日梦之中。在制造商正忙于改善生产方式为大众消费生产出更多更好的产品的时候，卢梭的追随者却在高谈阔论理性、美德和自由。

谈论纯正、简单的进步是徒劳的。首先，一个人要明确地指出选择要获得的目标。只有在此之后才可以把通向这个目标的道路上的前进称为进步。启蒙运动的哲学家在这点上是完全失败的，他们没有就他们头脑中目标的特征说出任何确定的东西。他们只是把这个未能充分描述的目标赞美为一种完美状态，说它的实现是善的。可他们在使用“完美”和“善”这些概念时，表述是相当模糊的。

与古代悲观主义和那些把人类历史进程描述为从过去的神话时代的完美情形逐步堕落的现代作者相比较，启蒙运动展示了一个乐观的景象。就像上面已经指出的，它的哲学家从他们对人类理性的信心中得出了对趋向完美的进步的必然性的信仰。借助于理性，人从经验中不断学习。每一代人都从先辈那里继承智慧的宝藏，并且有所增加。因此，后代必然超越他们的先辈。

但这个观点的拥护者没有想到，人不是一贯正确的，并且理性在选择追求的终极目标和为达到终极目标采取的手段时，都可能犯错。他们的有神论信仰暗示了他们对全能的上帝指引人类走正确道路的仁慈的信心。他们的哲学消除了“道成肉身”以及其它所有基督教教条，只剩下一条：救赎。在造物主必然致力于逐步改善这一事实中，神的伟大得到了自我证明。¹⁶³

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吸收了这些观点。理性统治世界，并且这个知识和上帝统治世界的见识是等价的。历史哲学的任务是辨别上帝的计划。¹⁶⁴黑格尔对历史事件的发展以及人类未来显示出的乐观主义的根本基础在于他对神的无限仁慈

¹⁶³ 造物主和造物主相对，指人类。这里的逻辑是：人是神创造的，人不断自我完善，神的伟大得到证明。

¹⁶⁴ Hegel, Vorlesungen über die Philosophie der Weltgeschichte, 1, 4, 17-18.

的坚定信心。神是真善。“哲学认识没有力量能超过善，也就是神的力量，并且没有什么力量能阻止神坚持他的意见，神最终是正确的，人类历史仅仅是上帝的计划。”“神统治世界，他治理的内容，他计划的实现，就是人类历史。”

165

但在康德以及马克思的哲学中，没有给神和他无尽的仁慈留下空间。在黑格尔的体系中，谈论人类对条件越来越满足的必然进步是有意义的。神决定了人类事务的每一个后来阶段应该是一个更高级更好的阶段。不能希望从全能、无限仁慈的上帝那里得到其它的安排。与此不同，无神论的康德和马克思却不应该简单地假设时间的前进必然会朝着更好的条件并且将最终朝向一个完美的状态。他们必须证明进步和改善是不可避免的，并且堕落到一个不满意的状况是不可能的。但是，他们从来就没有着手于这样一个证明。

如果为了讨论的缘故，我们准备默认马克思武断的预言——社会将“按照无可动摇的自然法则”¹⁶⁶朝着社会主义发展。可是，依然有必要检视社会主义是否被视为一个可行的社会经济组织制度，以及它是否并不意味着割断社会纽带、回归原始野蛮以及所有人将陷入贫困和饥饿的问题。

马克思历史哲学的目的是为了平息经济学家对他的批判声音。马克思指出，社会主义是下一个也是最终一个历史进程的阶段，因而也是一个比先前阶段更高级更好的阶段；它甚至是人类最终的完美状态，人类历史的终极目标。但是，这个结论是一个无神论历史哲学框架中的不合逻辑的推论。通向救赎不可抗逆的趋势以及建立永恒至福的完美状态是一个不同寻常的神学观点。而在无神论体系的框架中，它仅仅是一个武断的猜测，没有任何意义。没有神就没有神学，一个无神论的历史哲学体系不能把它的乐观主义建立在对全能上帝无限仁慈的信心基础之上。

5. 行动型的决定论和宿命型的决定论

每一种历史哲学都是上文提到的¹⁶⁷那个流行观点的例证，所有未来事件都被事先记录在命运之书里。哲学家被授予一种特权，得以阅读这本书并向那些蒙昧的人揭示它的内容。

这类历史哲学中固有的决定论必须和指导人类行为并寻求知识的那种决定论区分开来。后一种被我们称之为行动主义决定论，是从每一个变化都是一个原因的结果、以及在原因和结果的序列之中存在规律性这种认识中派生出来的。不论迄今认识因果关系问题的哲学上的努力是如何地不令人满意，对人类思维来说，想象一个没有原因的变化是不可能的。人们没法不假设每一个变化都是由前一个变化引起的，并将导致未来的变化。尽管哲学家提出了很多怀疑，人类行为在生命的整体以及每一个方面，包括行为、哲学以及科学，都受因果关系范畴的控制。行动主义决定论给人们带来的教训是：如果你想达到一定的目的，你必须采取适当的措施，没有别的成功之路。

但是在历史哲学的背景中决定论意味着，无论你怎么试图避免，该发生的还是会发生。行动主义的决定论号召行动，并且尽一个人的身体和智力最大所

¹⁶⁵ Ibid., p. 55.

¹⁶⁶ [Marx, *Capital*, I, 387.]

¹⁶⁷ 参见第五章 决定论及其批评者 4 宿命与宿命论。

能，而历史决定论——我们称之为宿命论的决定论则破坏人们的意愿并造成消极和懒散。正如前文指出的¹⁶⁸那样，它和人天生要行动的冲动是如此相反，以致它从来就无法了解人们的心思并阻止人们行动。

在描述未来历史时，历史哲学家通常都把自己约束在描述宏观事件以及历史进程的最终结果上。他认为这种克制把他的猜测和研究细节以及不重要小事的普通占卜者的预言区分开了。在历史哲学家看来，这种小事是偶然的、不可预知的，他们不会为这些事自寻烦恼。他们的注意力唯一地指向人类整体的伟大命运，而不是那些无关紧要的琐事。

然而，历史进程是所有这些细小变化不间断进行的结果。一个声称知道最终结果的人必须也必然知道这些琐事。他必须要么一下子把所有结果一并通盘考虑，要么理解一个原则，能指挥其结果不可避免地通往预定的目的。精心描述其理论体系的历史哲学派作者把看手相的人以及读水晶球者视同无物，他们的自负和前资本主义时代批发商对零售者和小贩表现出来的傲慢鲜有区别。本质上，他们贩卖的是同一种可疑的学识。

正确理解的话，行动主义决定论绝不会和自由意志的观点不相容，它实际上是这个经常被曲解的概念的正确阐述。因为在宇宙中，在现象的连续与顺序之中存在规律性，并且因为人能够获得某些规律性的知识，而使人类行为在一定的边界内成为可能。自由意志意味着人能追求一定的目的，因为他熟悉决定世界事务变迁的某些规律。人可以从存在的某一个范围选择不同的替代物。他不像其他动物一样，不可避免、无以挽回地服从盲目的命运的安排。在一定范围限度内，他可以在无干扰情况下改变事件将会进行的路线。人是一个行动的生命，这也是他相对于老鼠和细菌、植物和石头的优越性之所在。在这个意义上，他使用了可能是不适宜的令人误解的术语“自由意愿”。

这个自由情感吸引力的认识，以及它所产生的道德责任的观点，和任何其它被冠以其名的事物一样，都是事实。和其它所有生命相比较，人从他的意志中看到了他自己的尊严和优越性，这种意志是坚定不移的，并且必须不向任何暴力和压迫屈服，因为人能在生与死之间选择，如果生命的保存只能以顺从无法忍受的条件为代价，人更宁愿选择死亡。只有人能为理想而死。在说“没有愿望，愿望就不会死去。”¹⁶⁹的时候，但丁心里想的正是这个。

人的生存和行为的一个基本条件是他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这一事实，而历史哲学的代表者，却冒称自己是全能的上帝，宣称一个内心的声音向他揭示了未来事物的知识。

¹⁶⁸ 同上。

¹⁶⁹ Dante, *Paradiso*, IV, 76: "The will does not die if it does not will."

第三部分 历史的认识论问题

第九章 历史个性的概念

1. 历史的终极已知

人类对知识的探求不能无止尽地进行下去，或早或晚，它都将无可避免地达到一个无法超越的极限。那时，人对知识的探求将面临一个终极已知，一个人类理性无法追溯为其它知识的知识。在知识发展的过程中，科学成功地把一些曾经视为终极的事物和事件追溯为其它知识。可以预料，这种情况将来还会发生。但是，总会有某些事物对人类思维来说是一种终极已知，它无法分析、无法缩减。人类理性甚至不能想象出能有一种知识不会遇到这种不可克服的障碍。对人来说，不存在全知者这回事。

历史学在涉及到这种终极知识时，将之归因于个性。单个人的特征，他的思想、价值判断以及受这些思想和价值判断指导的行为，无法追溯到它们本身可能是派生的事物的某物那里。为什么弗里德利希二世要入侵西西里？这个问题只有一个答案，那就是因为他是弗里德利希二世。尽管不是很方便，但习惯上，人们把一个知识追溯为另一个知识的精神过程称为“理性的”。于是，终极已知便也被称为是非理性的。不最终涉及这种非理性事实的历史研究将是难以想象的。

历史哲学要求避免涉及到个性和不合理性的事物。他们自称给所有历史事件提供了一个彻底的解释。他们真正所做的是把终极已知归到他们系统的两点上——它假定的开始以及它假定的结束。他们假设在历史的开端有一个不可分析、不可缩减的力量。例如黑格尔体系的精神¹⁷⁰或是马克思体系的物质生产力。并且他们又进一步假设这个历史原动力追求一个同样不可分析不可缩减的确定目的，例如大约1825年的普鲁士国家或是社会主义。无论一个人如何评价历史哲学的不同体系，很明显他们无法不涉及到个性和非理性的事物，他们只是把它转移到了他们解释的另一点。

唯物主义试图完全抛弃历史，所有人的思想和行为都应该被解释为一定生理过程的必然结果。但是，这不可能完全不涉及到非理性的事物。和历史一样，自然科学最终也会面临无法进一步的缩减为其它知识的某些知识，而这就是某种终极已知了。

2. 个人在历史中的作用

在历史哲学的背景中，除了一个原动力及其由计划所决定的事件必须进行的方式之外，没有给个性的涉及留下任何余地。在无法逃避的命运手中，所有人只是工具。无论他们做什么，他们行为的结果应当而且必然是上帝预定计划的一部分。

¹⁷⁰ Geist, 黑格尔哲学中的一种超自然力量。

假如拿破仑·波拿巴中尉在土伦行动¹⁷¹中被杀，历史上又会发生什么呢？恩格斯说：“另一个人会替代这个位置。”因为“一旦一个人成为必然，总能找到他。”¹⁷²对谁必然，对什么目的必然？显然是对物质生产力将要产生的社会制度，稍后的社会主义。物质生产力似乎总备有一个替代物在手边，就像一个谨慎的歌剧经理为防男高音患感冒准备了一个替角一样。如果莎士比亚幼年夭折，另一个人就会写《哈姆雷特》和《十四行诗》。但是，有些人会问，因为莎士比亚的良好健康而免除了替身上台顶替的苦差，这个替身将如何消磨时光？

这个问题被历史必然性拥护者有意搞乱了，他们把它和其它问题混为一谈。

回顾过去，历史学家必须说，如果所有条件保持原样，所有发生的事情都是不可避免的。在任何时刻，事物的状态都是紧接着的前一个状态的必然结果。但是在决定任何一个特定历史事务的因素中，都存在一些无法进一步追溯到比历史学家面临的个人思想和行为更远的因素。

当历史学家说，如果有些事情不同，法国1789年革命就不会发生时，他只是试图确立产生这个事件的力量以及各力量的影响。泰纳¹⁷³没有沉迷于无价值的猜测，如果他所称的革命思想和阶级思想学说没有被提出来，又会发生什么事情。他想给导致革命爆发以及革命进程的事件链中的每一个事件都分配它的相关性。¹⁷⁴

第二个混淆涉及到给伟人的影响划定界限。那些为理解能力迟钝的人而改编的历史简化叙述把历史当作伟人们功绩的产物来介绍。老霍亨索伦王室造就了普鲁士，俾斯麦缔造了第二帝国，威廉二世毁掉了它，希特勒建成了第三帝国也毁掉了它。从来没有一个严肃的历史学家认同这种胡说。无可争议的是，最伟大的历史人物扮演的角色实际上非常平凡。每一个人，无论伟大或渺小，都是在他那个时代的历史环境框架内生活并行动。这些环境是被先前时代以及他自己时代的思想 and 事件所决定的。泰坦（巨人）或许胜过每一个他同时代的人，但他却不是所有侏儒联合起来力量的对手。只有当一个政治家的计划顺应他那个时代的思想的风气时，也就是契合那些抓住了他的同胞心理的观点时，他才能成功。只有当他准备好引导人民走上他们想要走的、通向他们想要达到目标的道路时，他才能成为领导。一个对抗公众舆论的政治家注定要失败。无论他是个独裁者或是个民主官员，政治家必须给人民想要的东西，正如同商人必须供给消费者他们想要买的东西一样。

对新思考方式和新艺术以及文学模式的先驱者而言，情况又有所不同。那些不屑于从他的同时代人那里博取掌声的开拓者并不依赖他所处时代的思想，他完全可以赞同席勒笔下波沙侯爵的话：“对我的思想而言，这个世纪还没有成熟，我作为未来世纪的公民活着。”天才的成就也是根植在历史事件的序列之中，取决于前辈所取得的成就，并且也仅仅是思想发展中的一个章节。但是，它给思想的宝库增添了新的未知的事物，并且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被称作是创造

¹⁷¹ 1793年，法国保皇党人把土伦控制权交给了英国军队，土伦在英军的支持下反叛法兰西共和国，法军包围土伦。拿破仑时任炮兵指挥官。他在指挥攻破土伦的行动中受伤，但是成功地赶走了英军，占领了土伦。拿破仑因此晋升准将，并得到罗伯斯庇尔政权的青睐。

¹⁷² Letter to Starkenburg, Jan. 25, 1894, *Karl Marx and Friedrich Engels, Correspondence 1846-1895* (London, M. Lawrence, Ltd., 1934), p. 518. Letter to Starkenburg

¹⁷³ Taine Hippolyte Adolphe (1828-1893), 法国哲学家和历史学家，是实证主义的一名重要支持者，著有六卷本的《当代法国的起源》。

¹⁷⁴ Taine, *Les Origines de la France contemporaine*, I, Bk. III (16th ed. Paris, 1887), pp. 221-328.

性的。人类的真正历史是思想的历史，正是思想把人和其它生命区分开来。思想产生社会制度、政治变迁、生产的技术手段，以及被称为经济条件的一切。在探寻它们的起源时，我们不可避免地到达一个点，那时能宣称的只能是某人有一个思想，至于这个人的名字是否为人所知是次要的。

这个就是历史依附于个性概念的含意，思想是历史研究的终极已知。关于思想所能说的是它们发生了。历史学家可能指出一个新思想如何成为前辈思想的一部分，以及它如何被当作这些思想的延续和他们逻辑的继续。新思想不是从意识形态的真空中诞生的，它们从先前存在的意识形态结构中产生，它们是一个人的大脑对他先辈发展的思想做出的反应。不过，假设它们注定会出现，并且假设如果A没有给它们产生某个B，或者C应该完成了这个任务，那么这个假设将是个武断的猜测。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知识的局限迫使我们承认偶然性在历史中扮演了一个角色。如果亚里士多德幼年夭折，知识史就会受影响。如果俾斯麦死于1860年，世界历史将按不同的进程发展。只是无人知晓在多大程度上以及会有什么后果。

3. 群体思想的虚构

为了急于在历史中消除个人以及个人事件的特定意义，集体主义的作家采纳了一个虚构的事物——群体思想或社会思想。

在十八世纪末和十九世纪初，德国语言学者开始研究很早以前就被遗忘了的德国中世纪诗歌。他们采自旧手稿编辑的史诗大多数是法国作品的抄袭之作。这些史诗作者的名字是已知的，大多是为公爵和伯爵服务的勇武的战士。这些史诗不值得吹嘘。但是，有两部具有完全不同特征的史诗，具有很高文学价值的真正原创作品，远远超越了朝臣们的传统作品：《尼伯龙根之歌》和《古德龙》。前者是世界文学的伟大著作之一，并且是德国在歌德和席勒时代之前无可置疑的杰出诗歌。这些杰作的作者名字没能流传到后世。或许这些诗人属于职业娱乐人员阶层——这些人不仅被贵族瞧不起，而且还必须痛苦地忍受法律上的歧视。或许他们是异教徒或犹太人，而那时的神职人员是希望人们忘记他们的。无论如何，语言学家把这两本著作称为“人民的史诗”。这个术语对天真的人暗示的观点是：它们不是单个作家所写，而是“人民”所写。作者不详的流行歌曲也被加上了相同的神秘的作者身份。

还是在德国，在拿破仑一世战争随后的几年里，全面立法法典整理的问题被提出来讨论。在这场争论中，萨维尼¹⁷⁵领导的法学历史学派否认任何时代任何个人有制定法律的能力。他们宣称，就像人民的史诗和民谣一样，一个民族的法律是这个民族的自然的散发物，是这个民族的精神和特殊性质。真正的法律不是立法者武断地制定的，它们从民族精神中涌出并生机勃勃地繁荣着。

德国创造的这个民族精神理论，是一种反对自然律法以及对法国革命“非德意志”的精神等思想的有意识的反应。但是这个民族精神理论被法国实证主义者进一步发展，并被提升到一个全面社会理论的崇高地位。而法国实证主义者中的许多人不仅忠于革命领导人的最极端原则，而且还致力于用暴力推翻资本主义生产模式来完成“未完成的革命”。埃米尔·迪尔凯姆及其学派把群体

¹⁷⁵ Friedrich Carl von Savigny (1779 - 1861)，德国法理学家，19世纪影响最大的法理学家之一。

思想当成一个真实现象，当成一种清晰的、能思考能行动的力量来对待。在他们看来，历史的主题不是个人而是群体。

要纠正这些幻想，必须强调这一公理：只有个人才会思考和行动。在处理个人的思想和行为时，历史学家确立了以下事实：有些个人在思想和行动上互相影响比他们影响其他人以及受其他人影响更强一些。他观察到，劳动协作和分工在一些人当中存在，而在另一些人当中存在的程度小一些或完全不存在。历史学家使用“群体”这个术语来表示一个协作更紧密的个人集合。然而，群体之间的区分是随意性的。群体并不是一个像生物种类一样的存在论实体，不同的群体概念彼此交叉。历史学家根据他研究的专门计划选择那些决定把个人划分为不同群体的特征和属性，经过分组，使讲同种语言的人，或信仰同样宗教的人，或从事相同职业与职位相同的人，或同一个祖先的后裔可能成为一体。哥皮诺的群体概念与马克思的不同。简言之，群体概念是一个观念的类型，并且同样是源自历史学家对历史力量和事件的理解。

只有个人才思考和行动。每个人的思考和行动都受到他的同伴思考和行动的影响。这些影响是多种多样的。如果把一个单个美国人分派到一个群体，他的思想和行为是无法解释的。他不仅是个美国人，而且是某个宗教群体的成员，一名不可知论者或一个无神论者。他有工作，他属于一个政党，他受到从先辈那里继承的、在抚养中被灌输的传统的影响，受到家庭、学校、邻居的影响，受到他自己的小镇、州以及国家主要思想的影响。美国思想这种说法是一个极大的简化，每一个美国人都有他自己的思想。把单个美国人的任何成就以及美德，或任何罪行以及恶习归因于美国之类的群体是荒谬的。

大多数人是普通人，他们并没有自己的思想，他们只是接受者。他们不能创造新思想，他们重复他们听到的并模仿他们所看到的。如果世界上只有这些人，将不会有任何变化，也不会有任何历史。产生变化的是新思想和新思想指导的行动，使群体彼此区分开来的是这种创新的效果。这些创新不是群体思想完成的，它们总是个人的成就。使美国人民不同于其他任何国家人民的是无数不普通的美国人的思想和行为联合起来产生的效果。

我们知道发明并逐步完善汽车的那些人的名字，历史学家能写一部详尽的汽车发展史。可我们不知道那些在文明之初作出了最伟大发明，例如生火的人的名字。但是这种无知也不能允许我们把这项基本发明归于一个群体思想。总是某个人开始了一种做事的新方式，然后其他人模仿他的先例。习惯和时尚总是被个人开创，然后通过其他人的模仿传播开来。

在群体思想学派试图通过给神秘的民族精神赋予活性来消除个体时，马克思主义者决心一方面贬低个人的作用，同时另一方面把创新归于普通人。因为马克思观察到，技术批判史展示出没有一项十八世纪的发明是某个单个人的成就。¹⁷⁶这证明了什么？没有人否认技术进步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是一长串的单个人对其前辈的成就有所增加而完成的一个连续步骤的链条。如果完整地表述出来，每个技术发明的历史，都将追溯到人类早期穴居人最原始的发明。选择从任何稍晚的时候开始某项发明的历史，都是对整个事实的武断减裁。有人可能从麦克斯韦和赫兹开始无线电报的历史，但是有人也可能追溯到第一次电学试验或是任何一项必须在建造无线电网络前实现的早先技术成就。所有这些丝毫不影响这个事实：每一次进步都是个人做出的，不是由某种神秘的非个人的

¹⁷⁶ *Das Kapital*, I, 335, n. 89.

力量做出的。承认麦克斯韦、赫兹以及马可尼的贡献是在其他人早先做出的其它贡献的基础上做出的，并不会贬低他们的贡献。

要说明革新者和那些无法想象进行任何可能创新改进的、呆板和墨守成规的人们之间的区别，我们只需要查阅一下恩格斯最著名的书中的一段话就可以了。¹⁷⁷这里，1878年，恩格斯明确地宣布，军事武器“现在是如此的完美，以至于任何革命性影响的进步都不再可能了。”自此以后，“所有进一步的技术进步大体上对陆地战争都无关紧要了。在这一点上，发展的时代结束了。”¹⁷⁸这个自满的结论表明了革新者的成就所在：他完成了其他人认为不可思议并无法实行的事。

恩格斯，一个自认为是战争艺术专家的人，喜欢借用战略和战术来说明他的理论。他宣称，军事战术的改变并非机灵的军队领导提出的。它们是那些通常要比军官聪明的士兵的功绩。士兵凭借他们的本能发明了这些战术，不顾他们指挥官的阻力而应用到行动中去。¹⁷⁹

每一个否认“单个微不足道的个人”¹⁸⁰在历史中有任何作用的理论，最终都要把变化和进步归于本能的作用。在那些支持这种理论的人看来，人是一种有着生产诗歌、大教堂以及飞机本能的动物。每一项成就都是一种本能的自动创造。人被赋予了本能，尤其是为了这个创造的目的。人类有多少成就，就有多少本能。这个由无能者为了藐视优秀者的成就并吸引迟钝者的怨恨而发明的谎言，没有必要对它做批判性的检验。即使在这个拼凑理论的基础上，也无法否认具有写出《物种起源》这本书的本能的人和那些没有这种本能的人之间的区别。

4. 计划历史

个人为了产生特定结果而行动，他们成功与否取决于所采用的手段和同伴对他们的行为的反应。行动的结果常常和行动者期望达到的结果有很大的差别。一个人可行动的余地无论多么地大，能取得成功的余地总是很小的。没有人能通过他的行为在相当长的时期里一直引导事态的发展，更没有人能引导所有未来的事态的发展。

但是每一个行动都会给历史增加内容，能影响未来事件的进程，并且在这个意义上，成为一个历史事实。迟钝的人在日常生活最琐屑的活动同天才最令人吃惊的创新一样，都是一个历史知识。一成不变的重复的传统行为模式的集合，以习惯、风俗以及道德观念的形式，决定着事件的进程。普通人的历史角色在于为习俗的巨大力量体系做出了各自的微薄贡献。

¹⁷⁷ Engels' s Herr Eugen Dührings Revolution in Science (Anti-Dühring), (London, Lawrence & Wishart, Ltd., 1934).

¹⁷⁸ Ibid., p. 191. “[T]he weapons used have reached such a stage of perfection that further progress which would have any revolutionising [*sic*] influence is no longer possible.”

¹⁷⁹ Ibid., p. 193. “And we have seen in case after case how advances in technique, as soon as they became usable in the military sphere and in fact were so used, immediately and almost violently produced changes in the methods of warfare and indeed revolutionized them, often even against the will of the army command.”

¹⁸⁰ Engels, *Der Ursprung der Familie, des Privateigentums und des Staates* (6th ed. Stuttgart, 1894), p. 186.

历史是人创造的。个人有意识的行为无论大小，都决定着事件的进程，因为它是所有人交互作用的结果。但是历史过程不是个人所设定的，它是所有个人有意识行为复合的结果。没有人能计划历史，他所能计划并且付诸实施的是他的行为，他的行为连同其他人的行为构成了历史的过程。早期美洲清教徒移民也没有要建立美利坚合众国的计划。

当然，总有人为来世做计划。通常他们的计划很快就破产了。有时他们的建造物维持了很长的时间，但是其效果却不是建造者当初设想的。埃及国王的不朽坟墓依然存在，但它们建造者的意图可不是为了使它们成为现代埃及的旅游景点，也不是为现在的博物馆提供木乃伊。没有什么能比散落在地球表面的那些庄严的遗址更能证明人类计划的暂时局限性了。

而思想要比城墙和其他物质的人造物留存的时间更长。我们仍然欣赏古印度和古希腊的诗歌与哲学杰作，但是它们对我们的意义不再是它们对其作者的意义了。我们不知道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是否会赞成后世使用他们思想的用途。

为来世做计划，用一种稳定、刚性以及不变的永恒状态替代历史发展是某一类特别的文学作品的主题。乌托邦作者想要根据他自己的思想设置未来的条件，并且一劳永逸地剥夺其他人选择和行动的权利。只有一个计划，也就是作者的计划，应该被执行并且所有其他人应当被压制。这个作者（在他死后则是他的继承者）从此将单独决定事件的进程。这样便再也不会再有历史存在，因为历史是所有人交互作用的复合反应。超人独裁者将统治宇宙并使所有其他人沦落为他计划的棋子，他将像工程师对待原材料一样对待他们，他建造的方法有一个贴切的名字叫社会工程。

如今这种工程非常流行，它们使知识分子欣喜若狂。只有少数怀疑者发现它们所实行的是有悖人类本性的。但是它们的支持者自信通过压制所有的异议者能改变人类的本性。那时，人们会像预期中的蚁冢里的蚂蚁那样幸福。

但实质问题是，所有的人都准备向独裁者屈服吗？没有人有野心挑战他的至高地位吗？没有人提出和独裁者计划基本思想相异的思想观点吗？在经历了几千年的思想和行动的“无政府状态”之后，所有人都会沉默地屈服于一个或几个暴君的专治吗？

有可能在数年内，所有国家都将会采用全面计划和极权主义统治制度。反对者数量有限，并且他们的直接政治影响几近于零。但是，即使一个计划的胜利也不会意味着历史的终结。争夺最高位置的候选人之间将爆发残酷的战争，极权主义可能会消灭文明，甚至整个人类。当然，那时历史也将走向它的终结。

第十章 历史主义

1. 历史主义的含意

历史主义作为一种反对理性主义社会哲学的反应，是从十八世纪末发展而来的。针对启蒙运动不同作者提出的改革和政策，它提出了一个保存现有制度，有时甚至回归到已灭绝的制度的计划。和理性的假定相对，它诉诸传统的权威和过去岁月的智慧。它批评的主要目标是那些激发了美国和法国的革命以及点燃了其它国家的运动的思想。它的倡导者自豪地称他们自己是反革命的并且强调他们严格的保守主义。但是在后来，历史主义的政治取向发生了改变，它开始视资本主义和自由贸易（包括国内及国际在内）为最大的罪恶，并且和市场经济的“激进的”或“左翼的”敌人联合起来，一只手牵着好斗的民族主义，另一只手牵着革命的社会主义。只要历史主义仍然有政治上的实际重要性，它就是社会主义和民族主义的附属物。它的保守主义的主张则几近息亡，只是残存于一些宗教群体的教义里。

人们不断强调历史主义和艺术以及文学浪漫主义的同质性，这种类比是相当肤浅的。这两种运动在对过去岁月的情景以及过分地颂扬旧风俗和制度上有相同的口味，但是对过去的热情不是历史主义的本质特征，历史主义首先是一种认识论理论，并且也必须被如此看待。

历史主义的基本论点是这样一个命题：除自然科学、数学以及逻辑之外，若非历史提供的知识就没有知识存在。在人类行为的领域之中，现象和事件的连续与顺序不存在规律性。因此，试图发展一门经济科学并发现经济规律是徒劳的。处理人类行为、功绩以及制度唯一合理的方法是历史的方法。历史学家追溯每一个现象的根源，他描述人类事件中正在发生的变化。他不带任何偏爱和先入之见地着手处理他的资料，即关于过去的记录。历史学家在对这些资料作初步单纯的技术和辅助检查时，例如在确定一份真伪有争议的文件写作年代时，有时要利用自然科学的成果。但是在他展示过去事件的固有的领域，他不依赖任何其它知识学科。在处理历史资料时，他所借助的标准和一般规律正是从这个资料中提炼出来的，而不可以从其它来源借鉴这些标准和一般规律。

当狄尔泰¹⁸¹强调心理学在历史学家工作中起到的作用时，将这些过分的主张稍稍缩减到了一个更谦逊的限度。¹⁸²历史主义的拥护者接受了这种限制，不再坚持他们对历史方法的极端描述。他们只对谴责经济学感兴趣，对心理学没有怨言。

如果历史主义者坚持己见，他们就应该用经济史来替代在他们看来假冒的经济科学。我们可以暂且不论如果没有经济理论，经济史该如何被对待的问题。但即使这样也无法为他们的政治计划服务。他们要的是为他们的干涉主义和社会主义计划作宣传。对经济学的整体摈弃只是他们战略中的一项内容。这可以使他们免除因无法驳倒经济学家对社会主义和干涉主义毁灭性批评的尴尬。但是这本身并不能证明亲社会主义或干涉主义政策的合理性。为了证明他们非正

¹⁸¹ Wilhelm Dilthey (1833 -1911)，德国历史学家、心理学家、社会学家，诠释学者、哲学家，经验主义者。

¹⁸² 参见第十四章 历史学的认识论特色3关于历史学的特殊理解。

统的倾向，历史主义者提出了一个更加自相矛盾的理论，这个理论有不同的名字，诸如，现实主义或制度主义或伦理经济学，或政治科学的经济视角。¹⁸³

这些思想学派的大多数拥护者并没有费神给他们的程序提供一个方法论的解释，只有少数人尝试证明他们的方法。我们可以把他们的理论称为周期主义，把他们称为周期主义者。

他们尝试创立一个能用来证明反市场经济的政策为准经济学理论，而支撑此理论的主要思想是从实证主义那里借鉴的。作为历史主义者，周期主义者不知疲倦地谈论他们称作历史方法的事物，并且自称是历史学家。但是他们采纳了实证主义的基本原则，实证主义把历史贬为毫无用处和毫无意义的闲谈，并且想开创一门按照牛顿力学模式塑造的新科学以取代它。周期主义者接受了这个论点：可能从历史经验推导出一个后期规律，这个规律一旦被发现将形成一门新的——目前不存在的——社会物理学、社会学或制度经济学。

周期主义者对这个论点的看法只是在一个方面不同于实证主义者。实证主义者头脑中存在普遍有效的规律，周期主义者则相信每一个历史时期都有其自身的不同于经济史其它时期的经济规律。

周期主义者区分历史事件进程中的不同时期。很明显，赖以区分的标准是每一时期决定经济发展过程的经济规律的特征。这样，周期主义者的论证进入了一个循环，经济史的时期划分必须以每一个时期特殊的经济规律知识为先决条件，然而，这些规律又只能在不参考任何其它时期事件的前提下通过调查每个时期（发生的事件）来发现。

周期主义者对历史进程的描述是这样的：经济发展存在着按照一定次序彼此连接的不同时期或阶段；经济规律贯穿于这每一个时期并保持不变。但周期主义者对从一个时期转换到下一个时期没有作任何说明。如果我们假设这种转换不是一下子完成的，就必须假设在两个时期之间还有一个转换的时间间隔，相当于一个转换时期。那么，在这个间隔内发生了什么？哪种经济规律在中间起作用？这是一段没有规律的时间，抑或是一段有自己规律的时间？除此之外，如果假设经济存在的规律是历史事实并因此在历史事件的变迁中变化，那么，断言存在没有变化的时期即没有历史的时期便明显地与之相矛盾。

在当代，伪经济学中使用的“当前”时代这个概念中也暗含了相同的谬误。涉及最近时期经济史的研究被错误的标志为“当前”经济情况。如果我们认为某一段时间为“当前”，我们的意思是，对于一个特别的问题，在特定时期内其条件保持不变。因此，“当前”的概念对不同的行动领域是不同的。¹⁸⁴此外，从来就无法确定这种无变化会持续多久，因而也无法确定多少未来必须被包括其中。一个人能对未来发表的意见总是纯粹的投机性的预期。在“当前情况”的标题之下处理一些最近的过去情况属于用词不当。最多只能说：昨天的情况是如此，我们预计它们在未来一段时间里保持不变。

经济学研究的是在整个人类行为领域都有效的一种现象串联和序列中的规律性。因此它能够为阐明未来事件做出贡献，它能在人类行为学的预言范围之内进行预测。¹⁸⁵如果人们不接受一个经济规律必须在所有时代都有效的观点，那

¹⁸³For various other names suggested see Arthur Spiethoff in the Preface to the English edition of his treatise on "Business Cycles," *International Economic Papers*, No. 3 (New York, 1953), p. 75.

¹⁸⁴Mises, *Human Action*, 4th ed. 1996, p. 101.

¹⁸⁵Ibid., pp. 117-18. See below, p. 205.

么就不再有可能发现任何在时间变迁中保持不变的规律性。那时人们只能说，如果条件在一段时间保持不变，规律会保持不变。但是，它们是否真的保持不变只能在事后才知道。

诚实的历史主义者会说，不能断言未来的任何事情。没有人知道一定的政策在未来如何起作用，我们所知的是相似的政策在过去是如何起作用的。倘若所有的相关条件保持不变，我们可能预期未来结果不会和过去结果有太大不同。但是，我们不知道这些相关条件是否会保持不变。因此，对于“必然的未来”——考虑所有已知量的结果，我们不能做出任何预言。我们处理的是过去的历史，不是未来的历史。

许多历史主义者支持的一个教条声称，那些过去证明了的和社会经济发展的趋势，特别是那些在最近时期证明了的，在将来也会占优势。他们总结说，研究过去并以此揭示将来事物的形态。

把这个流行哲学所蕴含的所有形而上的思想搁置一边，我们只会意识到趋势是能改变的，它们在过去就一直变化，并且在未来也会改变。¹⁸⁶历史主义者不知道下一次变化什么时候会发生。他对趋势的声明只涉及过去，从不涉及未来。

一些德国历史主义者喜欢用他们的经济史时期划分和艺术史时期划分作比较。和艺术史处理延续的不同风格的艺术活动一样，经济史也处理延续的不同类型的经济活动。这个隐喻和其它隐喻相当。但是，用这个隐喻的历史主义者没有言及的是，艺术史学家只谈过去的风格，而没有提出关于未来艺术风格的理论。然而，历史主义者之所以对过去经济条件进行著述和演讲，只是为了从中得出关于必然导向未来经济条件的经济政策的结论。

2. 对经济学的摒弃

在历史主义者看来，经济学的基本错误在于它假设人总是自我中心的，并且唯一地追求物质福利。

据冈纳·缪尔达尔¹⁸⁷所说，经济学断言人类行为“唯一地被经济利益驱使”，并且认为经济利益意味着“更高收入和更低价格，以及，收入就业稳定、合理的休闲时间和益于令人满意的休闲环境、好的工作条件等等”的想法是一个谬误。人们无法通过简单地列举经济利益来完全解释人类的动机，真正决定人类行为的不是单纯的利益而是态度。“态度意味着个人或群体对实际或潜在的情况以一定方式反应的感情上的倾向。”“幸运的是许多人的态度和他们的利益并不完全一致。”¹⁸⁸

如今，声称经济学永远主张人只被对更高收入以及更低价格的追求而驱使的断言是错的，因为他们没能解决用途与价值概念这个明显的悖论，古典经济学家以及他们的追随者不能对消费者的行为给出一个令人满意的解释。古典经济学家实质上只涉及了为消费者服务的商人的行为，对他们而言，消费者的评价就是最终标准。当他们谈到在最廉价的市场上购买和在最昂贵的市场上出售

¹⁸⁶ Mises, "Trends Can Change," *Planning for Freedom* (South Holland, Ill., Libertarian Press, 1952), pp. 163-9. In later editions of this anthology (1962, 1974, and 1980) see pp. 173-9.

¹⁸⁷ Gunnar Myrdal (1898-1987), 瑞典经济学家、政治学家。他和哈耶克分享了197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缪尔达尔对“期望值”在价格形成中的作用的研究对斯德哥尔摩学派影响很大；他的部分思想后来被凯恩斯加以发展。

¹⁸⁸ Gunnar Myrdal, *The Political Element in the Development of Economic Theory*, trans. by P. Streeten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4), pp. 199-200.

的原则时，他们是在试图把商人放在买家承办商的位置来解释商人的行为，而不是把他放在花自己收入的消费者的位置。他们没有分析促使个人消费者购买和消费的动机。所以，他们也没有调查个人是否仅仅是为了填饱肚皮，或者是否为了其它目的，例如履行他们认为的伦理以及宗教义务而消费。当他们区分出单纯的经济动机和其它动机时，古典经济学家只提到人类行为的贪婪的方面，他们从来没有想要否认人同样也被其它动机驱使。

从现代主观的经济学观点看来，古典经济学的途径显得令人非常不满意。现代经济学把古典方法的最后追随者，特别是约翰·穆勒提出的方法论证明的论据也被视为完全错误而加以摒弃。根据这个蹩脚的辩解，纯正经济学只涉及人类事物的“经济”方面，只涉及财富生产现象，“只要这些现象不被对其它目标的追求而限制。”可穆勒说，为了恰当地处理现实，“这个主题的好为人师的作者会自然地在他的说明中结合纯科学的事实，在他的估计中采用尽量多的实际修正，这些给他的作品的有效性帮助最大。”¹⁸⁹就古典经济学而言，这毫无疑问推翻了缪尔达尔先生的主张。

现代经济学把所有人类行为追溯到个人价值判断。它从来就没有像缪尔达尔所指责的那样，愚蠢到相信所有人都追求更高的收入和更低的价格。为反击这个已经被重复了一百次却仍未被证明的指责，庞·巴维克已经在他对价值理论的第一个贡献里，一再反复地明确地强调，“福利”这个术语如同他在价值理论的说明中用到的一样，不仅指一般被称为自私自利的利害关系，而且还包括对个人显得合意的并且值得追求的任何事物。¹⁹⁰

在行动中，人们喜欢某些事物胜于另一些事物，并且在不同行为模式之间选择。使人喜欢一事物胜于另一事物的精神过程的结果被称为价值判断。谈到价值与对价值的评价，经济学会引用这种价值判断，无论它们的内容可能是什么。对迄今为止人类行为学发展最好的分支——经济学而言，无论个人像一个工会成员追求更高的工资，或者像一个圣人追求最佳状态而履行宗教义务，都是与之不相干的。多数人热心于获得更多的有形货物这一“制度上的”事实是经济史的一个常识，而不是经济学的一个理论。

历史主义的所有流派，包括德国和英国社会科学的历史学派，美国的制度主义，擅长西斯蒙第、勒普莱¹⁹¹以及凡勃伦的老手们，还有许多相似的“非正统的”流派都断然摒弃了经济学。但是他们的著作充斥着从关于不同行动模式效果的一般命题而来的推论。当然，不应用这种一般命题是不可能处理任何“制度”或历史问题的。每一个历史报告，无论它的主题相关的具体情况与事件是发生在一个遥远的过去抑或是昨天，它都无可避免地基于一定的经济理论。历史主

¹⁸⁹ John Stuart Mill, *Essays on Some Unsettled Questions of Political Economy* (3d ed. London, 1877), pp. 140-1.

¹⁹⁰ Bohm-Bawerk, "Grundzüge der Theorie des wirtschaftlichen Güterwerts," *Jahrbücher für Nationalökonomie und Statistik*, N.F., 13, (1886), 479, n. 1; *Kapital und Kapitalzins* (3d ed. Innsbruck, 1909), 2, 316-17, n. 1. Eng. trans. *Capital and Interest*, South Holland, Ill.: Libertarian Press, 1959, Vol. 2, pp. 121, 128-9, n. 6, p. 422, n. 7.

¹⁹¹ Pierre Guillaume Frédéric le Play (1806-1882) 法国工程师、社会学家、经济学家。

义者没有把经济推理从他们的论述中删去。在摒弃一个他们不喜欢的经济理论的同时，他们又借助另一些早就被经济学家推翻的谬误的经济理论来处理事件。

历史主义者说，经济学定理是空洞的，因为它们是一个预先推理的产品。只有历史经验才能引向现实的经济学。他们看不到历史经验总是复杂现象的经验，总是多样要素运行产生的复合效应的产品。不像自然科学把“事实”这个术语用于实验室实验中得到的结果，这种历史经验不能给观察者提供那种意义上的“事实”。（那些把他们的办公室、书房和图书馆叫做经济学、统计学或社会科学“实验室”的人是无望的糊涂虫。）历史事实需要在先前被接受的定理基础上被解释，它们不作自我评价。

经济学和历史主义之间的对抗并不涉及到历史事实，它涉及的是对事实的解释。一个学者在调查和叙述事实时可能会给历史提供一个有价值的贡献，但是他没有对经济知识的增长和完善做出贡献。

让我们再一次提到那个经常被重复的命题：经济学家称为经济规律的只是控制资本主义制度环境的原则，并且对不同组织形态的社会无效，特别是对将来的社会主义的事务管理不起作用。在这些批评者看来，只有那些贪婪的资本家才会为成本和利润烦恼。一旦为使用而生产替代了为利润而生产，成本和利润这两个概念将变得毫无意义。经济学的主要错误在于把这些规律和其它范畴视为在任何制度条件下决定行为的永恒法则。

然而，成本是任何一种人类行为的一项要素，无论个案的特殊品质可能是什么，成本都是行为者为了获得他想要获得的而放弃的那些事物的价值，是他附加给那些不能获得的满足中最急迫需要满足的价值，只因为他喜欢另一个胜于这一个。成本是为了一件事物付出的代价。如果一个年轻人说：“这次考试花了我一个和朋友在一起度过的乡村周末的成本”，他的意思是：“如果我没有选择准备考试，我会和朋友在乡村度过那个周末。”没有任何牺牲为代价获得的事物不是有价物品，而是免费物品并且同样不会是什么行动的目标。经济学不涉及到这些。人们不必在它们和其它满足之间作出选择。

利润是得到的商品更高的价值同为得到该商品牺牲的商品的较低价值之间的差值。倘若因为笨拙、失误、未能预料的情况或环境改变，这次行动致使得到了某物的同时，行动者附加给此物的价值比付出价格要低，这次行动便产生了损失。因为行为总是追求用一个行动者认为的更满意的状态来替代另一个他认为较不满意的状态，行为总是追求利润而从不追求损失。这不仅对市场经济中的个人行为有效，而且对一个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管理者同样有效。

3. 探索历史变迁的规律

一个广泛流传的错误混淆了历史主义和历史，尽管这两者毫无共同之处。历史是对过去时间和情况的呈现，是一个关于事实以及它们效果的声明。历史主义是一种方法论理论。

一些历史主义的学派公开宣称，历史是处理人类行为的唯一方法，并且否认一门通用人类行为的理论科学的恰当性、可能性和重要意义。其它学派把历史谴责为不科学以及荒谬透顶的，并且对实证主义者理论的消极部分显示出了一同情的态度，而实证主义者则寻求一门按照牛顿力学模式塑造的新科学，他们认为这门科学应该来自历史发展以及“动态”变化的历史经验规律。

自然科学在卡诺热力学第二定律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个宇宙历史进程的理论。自由能量做功的能力依赖于热力学的不稳定性，产生这种能量的过程是不可逆的。一旦不稳定系统产生的所有自由能量耗尽，生命和文明将会终止。根据这一认识，我们所知的宇宙显得像一个永恒变迁中逐渐消失的插曲，它朝着自己的毁灭方向前进。

不过推导出这个定律的卡诺第二定律本身不是一个历史的或动态的规律。和所有其它自然科学规律一样，它从对现象的观察中推导而出并得到了试验的证明，我们把它叫做规律。因为它描述了一个只要作用条件存在就会自我重复的过程，这个过程是不可逆的，并且依据这一事实，科学家推断出一旦所有的热力学不稳定性消失，它作用的条件将不再存在。

历史变迁规律这个概念是自相矛盾的。历史是一个以单独性质为特征的现象的序列，那些一个现象和其它现象的共同特征是和历史无关的。谋杀案共同的内容涉及到刑法、心理学以及杀人手法。作为历史事件，刺杀凯撒和谋杀法王亨利四世是完全不同的。一个事件对将来事件的发生的重要性是历史关注的内容。一个事件的这种结果是独特的，并且是不可重复的。从美国宪法的角度看，1860年以及1956年的总统选举属于同一类。对历史而言，它们是在事件变迁中两个截然不同的事件。如果一个历史学家比较这两次选举，那么他是为了阐明它们之间的区别，而不是为了发现主宰任何一次美国总统选举的规律。有时候人们就这些选举总结出某些经验规律，例如，如果经济繁荣，执政党就会获胜。这些规律是理解选民行为的一种尝试。没有人认为它们具有如自然科学规律本质逻辑特征一样的必然性和可论证的有效性，每个人都充分意识到选民可能会按不同的方式投票。

卡诺的第二定律不是研究宇宙历史的成果，它是一个关于每时每刻完全按这个规律描述的方式重复的现象的命题。依据这个规律，科学推导出关于宇宙未来的某些结论。这种推论出的知识本身不是一个规律，而是一个规律的应用。它是在一个描述据称在可重复以及重复事件顺序中不可动摇的必然性规律的基础上，做出的对未来事件的一个预言。

达尔文的自然选择原则同样不是历史发展的规律。它试图把生物变化解释为生物规律作用的结果。它只解释过去，没有预言未来的事物。虽然自然选择原则的作用可以被视为是长期的，但是不能推断出人必定不可避免地发展成一种超人。进化改变的路线可能引向一个死胡同，在那之后，完全可能没有进一步的变化或者会退回到早先的状态。

因为不可能从对历史变迁的观察中推导出任何普遍规律，“动态”历史主义的计划只能通过以下发现来实现：一个或多个个人行为学规律的作用必定不可避免地导致未来一定情况的出现。人类行为学及其迄今发展最完善的分支——经济学从来没有声称知道任何这一类的事情。而历史主义也因为它对人类行为学的摒弃，从一开始就失去了从事这个研究的机会。

针对未来历史事件说过的每一件无可避免地注定要实现的事情，都源自于根据历史哲学形而上学的方法精心制作的预言。预言的作者凭借直觉预测出原动力的计划，然后所有关于未来的不确定性便消失了。《启示录》的作者、黑格尔、特别是马克思，相信他们自己完全熟悉历史发展的规律。但是他们知识的源泉不是科学，而只是一个内心声音的启示。

4. 历史主义者的相对主义

只有当人们考虑到历史主义者追求的唯一目的，即否定理性主义社会哲学以及经济学已经确立的一切时，他们的思想才可以被理解。在这个追求中，许多历史主义者不惧接受任何谬误。因此，针对经济学家关于自然给予的人类福利所依赖的要素存在不可避免的稀缺性的陈述，他们提出了荒谬的断言——自然所给予的是丰富充足的。他们说，带来贫困和短缺的是不恰当的社会制度。

当经济学家谈到进步，他们是从行动人所追求的目的的角度来看待环境。在他们的进步概念里没有任何形而上学的东西。大多数人想要活着并且延长他们的生命，想要健康而远离疾病，想要生活舒适而不是生存在饥饿的边缘。在行为人的眼里，朝着这些目标前进意味着进步，反之则意味着退步。这就是经济学家所应用的术语“进步”和“退步”的含意。在这个意义上，他们把婴儿死亡率下降或成功地遏制传染病称为进步。

问题不在于这种进步是否使人们幸福。而在于相比另外的方式，这种进步使得他们更幸福。如果孩子存活，大多数母亲会感到更幸福；如果没有肺结核病，大多数人会感到比患病时更幸福。从他个人观点来看这个问题，尼采表达了他对“人满为患”¹⁹²的担忧。但是，他所蔑视的那些人并不这么想。

在处理人们行动中使用的的手段时，历史学和经济学一样，把那些适合达到目的的和那些不适合达到目的的手段区分开来。在这个意义上，进步是采用更合适的行动手段替代不太合适的手段。历史主义攻击这个术语说，一切事物都是相对的并且必须从它们时代的角度来看待。然而还没有历史主义的拥护者大胆地宣称驱魔也曾是一种医治病牛的合适手段。但是，历史主义者在对待经济学上就没有这么谨慎了。例如，他们宣称经济学对价格控制效果的讲授不适用于中世纪的情况。那些受历史主义影响的作者的历史著作正是由于摒弃了经济学而显得混乱。

在强调他们不想用任何先入为主的标准来评价过去的同时，历史主义者实际上试图证明“过去美好时光”政策是正确的。他们不用已知的最佳智力设备¹⁹³开始他们的研究主题，反而借助了伪经济学的谎言。他们坚持迷信改善买家情况的适当方法是颁布和执行低于潜在价格最高点的最高价格，而不受市场制定的潜在价格最高点限制。他们忽略了关于公平价格政策失败的客观证据和它的效果。而从使用这一政策的管理者的角度来看，此效果比他们试图改变的先前状态更加令人不快。

历史主义者堆积的对经济学家的空洞的指责之一，是所谓的经济学家缺乏历史感。他们说，经济学家相信只要人们熟悉现代经济学理论，就有可能改善早先时代的物质状况。现在毫无疑问的是，假如皇帝们没有采取货币贬值并且没有采取限制最高价的政策，罗马帝国的情况会受到极大的影响。同样明显的是，亚洲民众的贫困是专制政府把所有积累资本的努力扼杀于萌芽状态这一事实造成的。亚洲人，不同于西欧人，没能发展出一个能给大规模资本积累提供机会的法律和宪法体系。并且，大众在“商人的财富是其他人贫困的根源”这个古老谬误的驱使下，对任何时候统治者成功没收商人的财产总是拍手称快。

经济学家早已认识到思想的发展是一个缓慢、费时的过程。知识的历史是对人们一系列连续行为的叙述，这些人中的每一个人都给他前人的思想补充了

¹⁹² “much too many” 被尼采用来形容和超人（superman）相对的普通大众，尼采认为这些人通过超人的教导指引和优胜劣汰最终能成为一个更优更强的人种。

¹⁹³ 指经济学。

一些内容。阿布底拉的德谟克利特¹⁹⁴没能提出量子论，毕达哥拉斯和欧几里得的几何学和希尔伯特的几何学不同，这些都不奇怪。没有人想过一个伯里克利同时代的人能创造出休谟、亚当·斯密和李嘉图的自由贸易哲学，并能把雅典转变成一个资本主义的商业中心。

没有必要分析这个为众多历史主义者所持的观点：对许多民族的人而言，资本主义做法显得如此地令人厌恶以至于他们永远也不会采纳它们。如果真有这样的民族，他们将永远处在贫困状态。通往繁荣和自由的道路只有一条，任何一个历史主义者能在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反驳这个事实吗？

从历史经验无法推导出关于不同行为模式的效果以及一定社会制度的效果的普遍规律。在这个意义上，那个著名的格言是对的——历史研究只能告诉你一件事情，那就是从历史中什么也学不到。我们因此赞同历史主义者对以下无可争议的事实不给予过多关注的做法——如果没有生产资料私人所有制，那么就从来不会有一个民族能把自己提升到稍微让人满意的福利和文明的状态。不是历史学，而是经济学澄清了我们关于产权作用的思想。但是，我们必须完全否定一个在十九世纪作家中很流行的推理，即所谓在文明的原始阶段，私有产权制度不为人所知的事实是一个对社会主义有利的有效的论点。许多社会主义者例如恩格斯，从一个在未来将要扫除一切不如意事物并将把地球改造成天堂的社会的先驱开始，而最终实际上变成了一个回归属于那个遥远过去神话黄金时代的臆想中的幸福状况的鼓吹者。

历史主义者从来没有想过人必须为每一个成就付出代价。如果人们相信从将获得的事物上的收益大于牺牲其它某物带来的不利，他们就付出了代价。在处理这个问题上，历史主义采用了浪漫诗歌式的幻想方式，它为文明带给自然的磨损而落泪。在物欲横流的人们的贪婪毁掉自然风景的美丽之前，那些未被触摸的原始森林、瀑布、孤独的海滨是何等的美啊！浪漫的历史主义者沉默地忽略了森林被砍掉是为了获得耕地以及瀑布被利用是为了产生动力和光明。毫无疑问，兔子岛¹⁹⁵在印第安人的时代要比现在更具有田园风光。但是，它现在的状态能给数以百万的纽约人一个放松休闲的机会，这是其它地方无法替代的。如果没有考虑到人从“亵渎”自然中获得了什么，谈论原始自然的庄严美丽是毫无意义的。当参观者鲜有踏足的时候，地球的奇迹确实壮丽。有组织的商业旅游交通使得许多人得以接近这些奇迹。那个认为“不能独享这个山峰是多么地遗憾啊，入侵者破坏了我的享受”的人，没能意识到倘若不是商业提供了所需要的设施，他自己可能也不能到达这个景点。

历史主义者控诉资本主义的方法实际上很简单，他们把它所有的成就视为当然，却为了一些和它不可调和的乐趣的消失以及仍然可能损伤其产品的一些缺陷而谴责它。他们忘了，人类为了它的成就必须付出代价，必须欣然地付出代价，因为人们相信所得到的收获，例如平均寿命的延长，更值得追求。

5. 消融的历史

历史是一个变迁的序列。每一个历史情境都有它的个性，有它自己以区别于任何其它情境的特征。历史的长河从来不会倒流，历史是不重复的。

¹⁹⁴ 通常称德谟克利特，古希腊哲学家，以提出了物质的原子概念著称。

¹⁹⁵ 纽约布鲁克林最南端的一个半岛（曾经是一个小岛）。

陈述这个事实不是对人类是否从一个共同的人类祖先而来的生物学和人类学问题表达任何意见。这里，没有必要提及从类人灵长类到智人类的转变，是否只在一定时间以及地球表面的某个地方发生过一次，或者发生过几次并导致了不同原始种类的出现这一问题。确立这个事实也不意味着存在着文明的统一这种事物。即便我们假设所有的人是一个共同人类祖先的后代，现存的事实仍然是，生活资料的缺乏使得人们分散到全球各地。这种分散导致了不同群体的隔离。每一个群体都必须自己解决人的生活中的特有课题：如何继续为改善保证存活的条件而有意识的奋斗。这样不同的文明出现了。也许永远无法得知，一定文明的孤立以及彼此孤立到什么程度。但是可以确定的是，在数千年时间里存在一些类似文化孤立的案例，直到欧洲航海家和旅行者的探险最终结束了这种状态。

许多文明走进了死胡同，它们或者被外国征服者所摧毁，或者从内部瓦解了。在奇迹般的建筑遗迹旁边，它们建造者的后裔生活在贫困和无知中。他们祖先的文化成就、他们的哲学、技术，并且通常连他们的语言都已经被遗忘，于是人们又回到野蛮的状态。在有些情况下，消失的文明的文学被保存了下来，为学者重新发现，并影响了后来的人们和文明。

其它的文明发展到一定的点之后便陷入停滞，如同白芝浩所说，它们停止了。¹⁹⁶人们设法保存过去的成就但是不再计划给它们增加新的内容。

十八世纪社会哲学有一个坚实的信条——世界改良论。一旦导致古老文明没落的迷信、偏见以及错误让位给至高的理性，人类情形将会有稳定的改善，每一天世界都会变得更好，人类将永远不会回到黑暗时代。向福利和知识的高级阶段进步是不可抵抗的，所有的反动运动注定要失败。现在的哲学不再沉迷于这种乐观主义观点了，因为我们意识到我们的文明也是脆弱的。确实，人类在抵抗外来野蛮人的外部攻击上是有把握的，但是文明也有可能被内部的野蛮人从内部毁灭。

文明是人类努力的产品，是人们反抗危害他们福利的不利力量的成果。这个成果依赖于人们使用适当的手段，如果选择的手段不适合达到追求的目的，灾难就会发生。错误的政策能瓦解我们的文明，就像它们已经毁灭了许多其它文明一样。但是，无论是理性还是经验都不能担保我们无法避免选择错误的政策，并因此摧毁我们的文明的假设。

有一些把文明概念人格化的理论。在它们看来，文明是一种活的生命，它从无到有，繁荣一段时间，然后最终死去。无论对于肤浅的观察者来说显得是如何不同，所有的文明都具有相同的结构，它们应当也必然经历相同的连续阶段的序列。历史并不存在：被错误地称为历史的实际上是属于同一类型的事件的重复，如同尼采所说，永恒的重复。

这个观点很古老，可以追溯到远古哲学。维柯¹⁹⁷勾勒出了它的轮廓。在几个经济学家构建不同国家经济史对应方案的尝试中，它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它今日的盛行应归功于奥斯瓦德·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被稍许柔化、并因此而显得不一致之后，它成了汤因比¹⁹⁸仍在写作的宏篇巨著《历史研究》的主要

¹⁹⁶ Walter Bagehot (1826-1877) 沃尔特·白芝浩，英国商人、评论家，长期为英国著名杂志 *The Economist* 撰稿并曾担任该杂志主编。文中引文出自他的著作 *Physics and Politics* (London, 1872), p. 212.

¹⁹⁷ 维柯 (Giovanni Battista Vico, 1668-1744)，意大利哲学家。

¹⁹⁸ Arnold J. Toynbee 阿诺德·汤因比 (1889-1975) 英国历史学家和教育学家，他研究文明兴衰的循环类型，其最著名的著作是十二卷的历史研究 (1934-1961年)。

观点。毋庸置疑，斯宾格勒和汤因比都被广为流传的人们对资本主义的轻蔑而鼓动。斯宾格勒的目的明显是要预言我们的文明会不可避免地崩溃，虽然他没有受马克思主义的千年至福预言的影响，但他本人是一个社会主义者，并且完全处在社会主义对市场经济的污蔑的影响之下。他明智地看清了德国马克思主义者政策的灾难性的含意，但是，因为缺乏经济知识，并且甚至对经济学充满蔑视，他得出了结论：我们的文明必须在两个罪恶之间做出选择，任何一个都注定要毁灭它。斯宾格勒和汤因比的理论都清晰地显示出在处理任何人类关切的事物时忽视经济学会产生的可悲后果。确实，西方文明是颓废的，但是它的颓废恰恰存在于对反资本主义信条的支持上。

一种我们可以称为斯宾格勒理论的解释，把历史分解为单个实体（不同文明）生命段的记录。没有准确的术语告知我们，一个单个文明的特征标志是什么，同样我们也不知道如何把它和其它文明区分开来。关于这个基本问题，我们所知的全部都是比喻性的。一个文明像一个生物体，它诞生、成长、成熟、衰退，然后死亡。这种类比不能取代清晰的解释和定义。

历史研究不能把所有的事物一起处理；它必须分开并且细分全部的事件。从历史的整体切开单独的章节。这样做所采用的原则，取决于历史学家对事情和事件的理解方式、价值判断及其对行为的指导，以及行为和事件下一步进程的关系。几乎所有历史学家都赞同对不同的、或多或少孤立的民族和文明分别处理。对在一定问题的应用上，这个处理程序的意见分歧应该通过对每一个个案的仔细检验来决定。对于从历史整体内区分出不同文明的这一观点，并没有方法论上的反对理由。

但是斯宾格勒理论则是完全不同的东西。在它的背景中，一个文明是一个完形¹⁹⁹——一个完全的体系、具有鲜明特征的个体。决定它的起源、变化以及消亡的是源自于它自己特征的事物，不是构成历史进程的个人的思想和行为。实际上并没有历史进程，地球上，文明形成、存在一段时间，然后死去，就像每个植物种类的各种样本一样，出生、存活、然后枯萎。无论人做什么，和最终的结果都没有关系，每一个文明都必须衰败并死亡。

将不同的历史事件和各种文明史中的不同历史事件进行比较没有坏处。但是，无论怎样，断言每一个文明都必须经历一个不可避免的阶段序列是缺乏佐证的。

汤因比先生的理论自相矛盾，因而并没有完全剥夺我们文明的生存希望。他研究的全部并且唯一的内容是指出文明进程由周期性重复运动组成，但是他又加上了这句话，这“并不意味着这种进程本身和它们一样有相同的循环顺序。”在费力地指出了十六种已经消失的文明以及其它九种正在接近死亡的文明之后，他对第二十六种文明的未来表示出了一种模糊的乐观主义。²⁰⁰

历史是人类行为的记录。人类行为是人们为了用更令人满意的状况替代较不令人满意的状况所作的有意识的努力。思想决定什么状况是令人更满意的，什么是不够满意的，以及要改变它们需要采取何种手段。因此，思想是历史研究的主题。思想不是一成不变的库存货物，从事物的一开始就存在并且永不改变。每一个思想在一定的时间和空间交汇点上出现于人的大脑中。（当然，相

¹⁹⁹ Gestalt 心理学概念，完全形态，完形。

²⁰⁰ A. J. Toynbee, *A Study of History*, Abridgment of Volumes I - VI by D. C. Somervell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47), p. 254.

同的思想在不同的时间和空间点独立地出现于不同人的大脑中，这种情况一再发生。)每一个新思想的起源是一个创新，它为世界事务的进程添加了新的前所未有的东西。历史不重复自己的理由是，每一个历史状态都是思想作用的最最终局，而这些思想和那些在其它历史状态中作用的思想是不同的。

文明之所以不同于生命的生物学和生理学，在于它是思想的衍生物。文明的精髓是思想，如果我们要区分不同的文明，只能在决定文明的不同思想含意中找到这种“特殊的差异”。文明之间的不同正在于使它们成为文明的内容的性质上。在基本结构上，它们是一些独特的个体，而不是同一个种类的成员。这使得我们不能拿它们的兴衰和个人或动物生命中进行的生理过程相比较。在每一个动物体内，发生着相同的生理变化。胎儿在母亲的子宫中成熟、生产、生长、成年、衰老，然后走向相同生命周期的最最终局——死亡。文明则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作为文明，它们是根本不同且不能比较的，因为它们是受不同的思想促成并因此按不同的方式发展的。

若不考虑思想内容的合理性，是不能给思想分类的。在治疗癌症方面，人们有不同的想法。迄今为止，没有任何一个想法产生出了完全令人满意的结果。但是，这并不能证明“因此将来治愈癌症的尝试也会失败”这个推论。研究过去文明的历史学家可能宣称：那些从内部衰败的文明，作为它们基础的思想有问题。但是他不应该从这个事实得出结论，认为建立在不同思想上的其它文明也面临着灭亡。在动植物的体内有一种最终注定会分解它的力量正在发生作用。但在一个文明的“身体”里，没有发现这种力量，而文明无一不是特殊意识形态的结果。

在不同文明的历史中，寻找其生命期限内对应或相同阶段的努力同样是徒劳的。我们可以比较不同民族和文明的历史，但是这种比较不仅应该有相似性，而且还应该有差异性。发现相似性的热情导致作者忽略甚至故意隐瞒差异。历史学家的第一任务是处理历史事件，在尽可能完美的事件知识基础上的事后比较可能是无害的，有时甚至是有益的。研究资料的过程中甚至在研究之前的比较，即使不产生彻底的谎言，也会制造混乱。

6. 复古

总有人赞美美好的旧时光，并鼓吹回归到快乐的过去。被法律和宪法改革损害利益的人（对改革）进行的抵制，经常在要求重建旧制度（或大概的旧制度）²⁰¹的计划中得到具体化。在一些例子中，追求本质上有新内容的改革被当作恢复远古法律来推荐。《大宪章》在英格兰十七世纪反斯图亚特党派意识形态上起到的作用提供了一个突出的例子。

但是，是历史主义首先坦率地建议消除历史变化，并且回归到遥远过去那不复存在的环境中去。我们不需要考虑这种运动的狂热者，诸如要复活沃单²⁰²崇拜的德国人。有关这些复古趋势的调侃也不值得我们再作挖苦的评价了。（倘若有一幅显示汉诺威—科堡家族的成员化妆成在卡洛登战役²⁰³中参战的苏格兰

²⁰¹ 有的制度无法考证，只在传说中存在，有的旧制度缺乏记录，无法确认，所以说“大概的旧制度”。

²⁰² 沃单，Wodan，德国神话的主神。

²⁰³ Battle of Culloden, 1746年英格兰王子威廉（坎伯兰公爵）率领军队与詹姆士二世之孙查理·爱德华的支持者在苏格兰高地的卡洛登决战，坎伯兰公爵一方获胜，因其残酷对待战俘和被征服的苏格兰人，他被苏格兰人称为“屠夫”坎伯兰。因为威廉之父乔治二世同时也是汉诺威公爵，并且汉诺威和科堡家族有联姻关系，所以有汉诺威-科堡家族的人身着苏格兰人服装会让威廉大吃一惊之说。

部落人游行的杂志照片，将会使“屠夫”坎伯兰大吃一惊。）只有其中的语言学和经济问题需要关注。

在历史的进程中许多语言被淹没了，有一些则完全消失，没有留下任何痕迹。另一些在旧文献、图书以及碑铭中得以保存并能供学者研究。类似这些“死”语言——梵文、希伯来语、希腊语以及拉丁语，通过它们在文学作品中所表达思想的哲学和诗歌价值影响着当代人。其它一些只是语言学的研究对象。

在许多情况下，导致语言消失的过程仅仅是语言的成长和口头词的转换。一长串的轻微变化如此彻底地改变了语音的形式、词汇以及句法，以至于后代不再能阅读他们祖先留下来的文献。日常语发展成为一种全新的语言。只有那些受过特别训练的人才懂得旧语言。旧语言的死亡和新语言的诞生是一个缓慢和平演化的结果。

但是在许多情况下，语言变化是政治军事事件的结果。讲外语的人通过军事征服或通过他们文化的优越性获得了政治的或经济的霸权，那些讲本地语的人被降格到一个从属地位。由于他们在社会和政治上受到限制，他们的意见是什么以及他们如何表达意见变得无关紧要。重要的生意一律用他们征服者的语言来交易，统治者、法庭、教会以及学校只使用这种语言，它是法律和文学用语，旧的本地语只有未受过教育的平民使用。一旦这些下属中的人想要爬到一个更好的位置，他必须首先学习征服者的语言。本地语专属于那些最迟钝最没有雄心的人，它陷入了耻辱的地位并最终被遗忘。就这样，外语替代了本地方言。

在许多情况下，促使这种语言进程的政治经济事件具有专制的残暴和对所有反对者无情的迫害的特征。这种手段得到了前资本主义时代的一些哲学家和伦理学家的赞成，就像社会主义者借助它们，有时会赢得当代“唯心主义者”的赞扬一样。但是对于“正统自由主义教条主义者的虚假的理性主义的教条主义”，它们显得骇人听闻。后者的历史著作缺乏崇高的相对主义，它促使了自任的“现实主义”历史学家去解释和证明过去所有发生的、并且为继续存在的压迫制度辩解。（就像一个批评者责备地评述说，在功利主义者中间“旧的制度不会唤醒激动，它们只是偏见的体现。”）²⁰⁴人们不需要再作进一步的解释，为什么迫害和压迫受害者的后代用不同方式来评判他们祖先的经历，更不必解释为什么他们要废除那些仍然在伤害他们的过去专制的产物。在一些情况下，（因为）不满足于消除仍然存在的压迫，他们还计划取消一些不再伤害他们的语言上的变化，尽管这些变化的过程曾经是如何的有害和邪恶，但那都已经是遥远的过去了。这正是那些消除语言变化的努力所追求的。

爱尔兰提供了最佳的例子。外来者曾入侵并占领了这个国家，没收了土地所有者的财产，摧毁了它的文化，建立了一个专制政权，并且还尝试通过武力使人们皈依他们所鄙视的宗教信条。外来教会的建立并没有成功地使爱尔兰人放弃本地罗马天主教教义，但是英语还是取代了本地的盖尔方言。后来爱尔兰人一步一步地成功地控制了他们的外来压迫者，并最终获得了政治独立，此时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在语言上已经不再和英国人有什么区别了。他们说英语，并且他们的杰出作家写作英语作品，其中的一些已经成为现代世界文学名著。

这种情形伤害了许多爱尔兰人的感情，他们想要促使他们的同胞重新使用过去时代他们祖先所说的方言。没有什么公开反对这个目的的意见，很少有人

²⁰⁴Leslie Stephens, *The English Utilitarians* (London, 1900), 3, 70 (on J. Stuart Mill).

有足够的勇气公开反对一个受欢迎的运动，更何况，激进民族主义是今天仅次于社会主义最受欢迎的流行意识形态。没有人想冒被称为民族敌人的风险。但是，强大的力量正在默默地抵制这一语言改革。人们依附于他们所讲的语言，无论那些试图禁止它的人是外来暴君还是国内的狂热者。英语是当代文明中最重要的语言，现代爱尔兰人充分认识到了他们所占的这个优势，每个想要阅读许多重要书籍或想要参与国际贸易、世界事务以及伟大意识形态运动的人都必须学习英语。正是因为爱尔兰是一个文明国家，它的作家不是为有限的读者，而是为所有受过教育的人写作，这使得用盖尔语替代英语的机会很小。怀旧的伤感无法改变这些事实。

必须提到的是，爱尔兰民族主义的语言追求，受到十九世纪最广泛采纳的一项政治理论的鼓动。欧洲所有民族都接受的民族原则要求：每一个语言群体应该组成一个独立的国家，而且这个国家应该包括所有讲相同语言的人们。²⁰⁵从这个原则的角度看，讲英语的爱尔兰属于不列颠和爱尔兰联合王国，一个独立的爱尔兰自由联邦的单独存在是反常的。这个民族原则在欧洲享有如此大的声望，以至于一些想要组成自己国家的、但其独立又和这个原则不符的民族企图改变他们的语言，以根据这个原则证明自己的独立目标是正当的。这解释了爱尔兰民族主义者的态度，但并不影响已有的对他们语言计划隐含意义的评论。

一门语言并不是语音符号的简单集合，它是一种思考和行动的工具。它的词汇和语法根据它所服务的个人的智力做出相应的调整。一门活的语言通过活人说、写、读以及随着发生在那些使用者的大脑中的变化而持续变化。一门沦为废置的语言是死的，因为它不再变化。它反映的是已经过世的从前人们的精神，它对另一个时代的人们是无用的，无论这些人是否是曾经使用这种语言的那些人的生物学上的后代，或者只是他们的子孙。问题不在于那些表明有形物体的专用名词，这种专用名词可以用新词来补充，是那些抽象名词带来了无法解决的问题。人们意识形态的冲突的沉淀物，包括关于纯粹知识和宗教、法律制度、政治组织，以及经济活动等问题的思想，这些名词反映了他们历史的全部兴衰。在学习它们的涵义时，成长中的一代人被引入了他们必须生活和工作的精神环境之中，这种不同词的意义响应思想和条件的变化，因而处在持续的变迁中。

那些想要复活一门已经死亡的语言的人，事实必须上从它的语音元素基础上创造出一门新的语言，其词汇和句法应该同当前时代的情况相适应，和旧时代的那些语言完全不同。爱尔兰人祖先的语言对现代爱尔兰人没有用，现在爱尔兰的法律不能用古老的词汇来写；肖伯纳、乔伊斯以及叶芝也无法在他们的剧作、小说以及诗歌中应用盖尔语。人无法抹去历史，也无法回到从前。

把地方语言提升到文学语言的地位及思想行为的其它表现方式的计划和复活死方言不同。由于缺乏跨地区的劳动分工和原始的交通设施，当一个国家的不同地区之间交流很少时，就会有一个瓦解语言统一性的趋势。定居在一个地区的人们从口头语中发展出不同的方言，有时候这些方言会发展成一门独特的标准语言，就像荷兰语那样。在其它情况下，只有一种方言成为标准语，而其它的作为日常生活使用的方言，并不在学校、法庭、图书以及受过教育的人的对话中使用。例如，这种情况在德国就出现了，在那里路德以及新教神学家给了“萨克森大臣”的方言一个优势地位，从而把其它方言降低到一个从属地位。

²⁰⁵ Mises, *Omnipotent Government*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44), pp. 84 - 9.

在历史主义的影响之下，涌现出了一些致力于通过提升方言到标准语言来消除这个进程的运动。这些趋势最卓越例子是Felibrige²⁰⁶——一个为了恢复普罗旺斯语昔日曾享有的像奥克语²⁰⁷一样的显赫地位的计划。在著名诗人米斯特拉尔的带领下，Felibrige的支持者们明智地没有打算用方言完全替代法语。但是，即使是他们更节制的主张——创造一种新的普罗旺斯诗歌的前景也看不到希望。人们无法想象任何一部用普罗旺斯语来写成的现代法语名著。各种语言的方言在小说和剧本中被用来描写未受过教育的人的生活，在这种作品中经常有一种内在的不真诚。作者摆出屈尊的架势，把自己和那些他从来没有分享过精神状况、或者从来就对他们的精神状况不感兴趣的人放到同一水平上，他表现得像个屈尊给小孩子写书的成年人。没有一件当代文学作品能摆脱我们这个时代的意识形态的影响，一旦经受了这些意识形态学派的熏陶，作者便无法成功地伪装成一个单纯的普通人，再也无法采纳普通人的语言和他的世界观。历史是一个无法撤销的过程。

7. 经济史复古

人类历史是劳动分工逐步强化的记录。动物活在每个个体或者每个准家庭完全自给自足之中。任务分配下完成的工作比自给自足条件下个人孤立的努力有更高的产出，这一事实及人具有能理解这个真理的理性，使人与人之间的协作成为可能。要不是这两个事实，人可能永远是孤独的觅食者，在必然的自然法则驱使下彼此毫无同情及宽恕地竞争。在一个每个人都视所有其他人为严格有限食物供应的生物竞争对手的世界里，没有社会纽带，没有同情心、仁爱心以及友谊，也将没有文明存在。

十八世纪社会哲学一项最伟大的成就是揭示了来自劳动分工的更高生产率原则在历史中起到的作用。历史主义最猛烈的攻击对象是斯密和李嘉图的学说。

劳动分工原则及其推论——协作的作用，最终导向一个包括全世界的生产系统。就地理上的自然资源分配没有限制加工贸易的专业化和一体化而言，不受限制的市场²⁰⁸致力于那些在一个相对狭窄的专业化产品领域经营，但又是为全球所有人服务的企业的发展。从那些喜欢多的好的商品、不喜欢少的差的商品供应的人们的角度来看，理想的制度应该在于最大可能地让每一个专业集中生产。专业化生产的原则曾产生了诸如铁匠、木匠、裁缝、面包师，还有医生、老师、艺术家以及作家等专业人士，最终也将产生一个供应全人类以特殊产品的工厂。虽然上面提到的地理因素阻碍了这个趋势的全面发展，但国际劳动分工还是出现了，并且将继续发展直至地理、地质状况以及气候条件的极限。

通向劳动分工强化的每一步在短期内都损害一些人的个人利益。更有效率的工厂的扩张损害了较低效率的竞争者的利益，他们被迫退出这一行业。技术创新使那些依附过时与劣等技术的工人无法再谋生。任何进步给小企业和低效率的工人的短期既得利益都带来了不利的影 响，这并不是一个新现象。那些被经济进步损害的人要求享有保护他们不受更有效率对手的竞争的特权，这也不

²⁰⁶ 法语 Félibrige，是 1854 年由普罗旺斯作家米斯特拉尔 (Frédéric Mistral, 1830-1914, 1904 年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 等人发起的一个文学与文化组织，其主要目的是捍卫和提升普罗旺斯文学和普罗旺斯语。

²⁰⁷ Occitan, 也称 Lengua d'òc 或 Langua d'oc, Occitania 地区 (包括法国南部、意大利的 Occitan Valleys 以及西班牙的 Aran Valley 和摩洛哥) 的语言。

²⁰⁸ the unhampered market, 不受限制的市场, 是理想的自由经济条件下的市场, 现实世界中的市场总是受到这样那样的限制。

是一个新现象。人类历史是一段为了低效率的利益而在高效率的道路上设置障碍的长期记录。

习惯上，人们用“利益集团”来解释那些阻止经济进步的顽固势力。这个解释非常令人不满意。先不管创新只伤害到一些人的短期利益这一事实，我们应该强调它在给绝大多数人带来益处的同时，伤害的只是一小部分人的利益。面包工厂的确伤害到了小面包作坊，但是它完全是因为改善了所有消费面包的人的状况才伤害了这些小作坊。进口外国食糖和手表伤害了一小部分美国人的利益，但它对所有那些想吃糖和买手表的人来说是一个实惠。问题正在于，为什么虽然一项创新给绝大多数人带来了益处，但还是不受欢迎呢？

给予一个特殊行业部门的特权，在短期内对那些在这个部门的人是有利的。但是，它也同等程度地伤害了所有其他人。如果每个人都有相同程度的特权，他作为一个消费者所失去的和他作为一名生产者赚取的同样多。而且，每个人都由于被这些特权造成的所有部门的生产率下降这一事实所伤害。²⁰⁹就美国立法机构在抑制大公司的成功努力来说，所有人都受到了伤害，因为产品是以较高的成本在生产，而如果没有这个特权政策，那些以较高成本生产的工厂早就垮台了。如果美国像奥地利在反对大公司上走的那样远，普通美国人的经济状况不会好于普通奥地利人的经济状况。

不是利益集团在促使反对进一步强化劳动分工，而是一些所谓利益集团的欺骗性的观点在起作用。就像在任何其它方面一样，历史主义在处理这些问题时，也只注重那些对某些人短期结果上的不利，而忽视了对所有人的长期利益。它推荐措施，但是对因这些措施而必须付出的代价绝口不提。在汉斯·萨克斯和诗乐协会的时代，制鞋是多么的有趣啊！²¹⁰没有必要批判地分析这种浪漫的美梦。但是，在那些日子里，有多少人赤着脚呢？大型化工厂关注的事情是多么惹人讨厌啊！但是，对那些药剂师来说，在他们的原始作坊里有可能生产出杀死细菌的药物吗？

那些想让时光倒流的人应该告诉人们，他们的政策的代价是什么。如果你打算忍受后果，你可以拆散大公司。如果美国现在的收入税和财产税政策在50年前就被采纳，那些今天大多数美国人不愿意舍弃的新事物可能根本就不会出现，或者，即使出现，也将超出这个国家的大部分人的经济承受能力。宋巴特教授和托尼教授²¹¹这样的作者所描绘的中世纪的幸福图景只是幻想。托尼教授说，“获取持续无限制物质财富的增加”的努力，带来了“灵魂的毁灭和社会的混乱。”²¹²无需强调的事实是，有些人可能会觉得，如果一个灵魂是如此的敏感，以至于它意识到今天比在中世纪有更多的婴儿能在生命的第一年存活，并且更少的人死于饥饿就会毁灭，那么这个灵魂就值得被毁灭。给社会带来混乱的不是财富，而是诸如托尼教授之流的历史主义者对“经济欲望”的竭力诽谤。毕竟，是自然而不是资本家，给人们灌输了欲望并驱使他们满足欲望。宋巴特说，在中世纪集体主义制度中，例如在教会、城镇、农村公社、氏族、家族以

²⁰⁹ 参见第二章 知识与价值 3 经济学与价值

²¹⁰ 诗乐协会是14-16世纪德国城镇由艺人、手工业者和商人组成的游吟诗人行会性的组织。汉斯·萨克斯是纽伦堡的鞋匠，后来成为职业诗乐协会的会员，他也被认为是最有才能的和最著名的诗乐协会会员。诗乐协会在15、16世纪的德国城镇生活中起到了很大作用。

²¹¹ Werner Sombart (1863-1941), 德国经济学家、社会学家; Tawney Richard Henry (1880-1962), 英国经济史学家

²¹² R. H. Tawney, *Religion and the Rise of Capitalism* (New York, Penguin Books, n.d.), pp. 38 and 234.

及行会中，个人“就像果壳中的果实那样温暖和安全。”²¹³但是，对那个人口被饥荒、瘟疫、战争、对异教徒的迫害以及其它灾难反复骚扰的时期，这是一个可靠的描述吗？

确实有可能阻止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或者甚至回归到一个小企业以及更原始的生产手段盛行的境地。依照苏维埃警察模式组织的警察机构能办到很多事情。问题只是：那些已经建立了现代文明的国家是否愿意付出代价。

²¹³ W. Sombart, *Der proletarische Sozialismus* (10th ed. Jena, 1924), I, 31.

第十一章 科学至上主义的挑战

1. 实证主义和行为主义

区分自然科学和人类行为学领域的是它们各自借以揭示现象和构建理论的范畴体系。自然科学不知道关于终极原因的任何事情；调查和理论化完全是在因果关系范畴的指导下进行的。人类行为科学的领域是决心以及有意识地追求目的的势力范围；它是目的论的。

这两个范畴都被原始人借助，并且今天，在人们每天的日常思考和行动中都使用。最简单的技巧和技能暗含了通过对因果关系的初步研究所获得的知识，在人们不知道如何寻求因果关系的地方，他们转而寻找一种目的论的解释。他们发明了神和魔鬼，把一定现象归因于他们有目的的行为。一个神发出闪电和雷声，另一个神恼怒于人的一些行为，用箭射死冒犯者。一个巫婆恶毒的眼光使得女人不能生育，奶牛不出奶。这种信仰产生了一定的行为方式。取悦神的行为，献祭以及祈祷被视为平息神的怒气并避免神的报复的合适方法。魔法仪式被用来消除巫术。慢慢地，人们知道气象事件、疾病以及瘟疫的传播是自然现象，而且避雷针和防腐剂能提供有效的保护，而魔法仪式却了无用处。只是到了现代时期，自然科学才在所有的领域用因果研究替代了目的论。

实验自然科学的惊人成就促进了唯物主义形而上学——实证主义的出现。实证主义断然否认存在任何可用目的论研究的领域，认为自然科学的试验方法是做任何类型的调查唯一合适的方法。只有它们才是唯一的科学，而人类行为科学传统的方法是形而上学的，也就是，用实证主义的术语来说，是迷信的、带欺骗性的。实证主义教导说，科学的唯一任务就是描述并解释感官经验。它否认心理学的反省以及一切历史学科，它在对经济学的谴责上尤其疯狂。康德，绝非实证主义的创始者而仅仅是这个名字的发明者，提出了替代传统研究人类行为方法的一门新学科——社会学。社会学应该被称作社会物理学，因为它是按照牛顿机械力学的认识论模式塑造的。这个计划肤浅而且不切实际，以至于没有人为实现它做过认真的尝试。康德的第一代追随者转而求助于他们相信的社会现象的生物和有机解释。他们放任地沉溺于比喻性的语言，并且慎重其事地讨论这一类的问题：在社会“身体”里，什么应该被归类为“细胞间质”。当生物主义和有机主义的荒谬性变得明显之后，社会学家则完全抛弃了康德野心勃勃的主张，不再对发现一个社会变化的较晚规律有任何疑问。不同历史的、人种学的以及心理学的研究都被放到社会学的标签之下。其中许多出版物是肤浅和混乱的，有些则是可以被历史研究的不同领域接受的成果。另一方面，那些把自己关于历史进程的玄妙意义以及目的的武断的形而上学的语言称为社会学的人，其作品是缺乏任何价值的。因此，迪尔凯姆和他的学派用群体思想的名称复活了浪漫主义以及历史法学的德国学派——民族精神的古老灵魂。

尽管实证主义计划有了这次明显的失败，一场新的实证主义运动却已经兴起。它顽固地重复康德的所有谬误。曾经激发了康德的相同动机，又激发了这些作者。他们被一种怪癖的对市场经济及其政治必然的厌恶所驱使，反对民主政府，反对思想、言论以及出版自由。他们渴求极权主义、专制以及对所有异议者的无情压迫，当然，他们理所当然地认为他们自己或是他们的亲密朋友将被给予最高权威以及封杀所有反对者的权利。康德无耻地提倡镇压所有他厌恶

的理论。最引人注目的人类行为科学新实证主义计划的拥护者是奥托·纽拉特，他在1919年曾是昙花一现的慕尼黑苏维埃政权的著名领导人之一，后来在莫斯科同布尔什维克官僚进行过短暂的合作。²¹⁴自知他们不能针对经济学家对他们计划的批评提出任何站得住脚的论据，这些热情的共产党人就试图在认识论基础上统盘诬蔑经济学。

新实证主义攻击经济学的两个主要派别是泛物理主义和行为主义。这两种理论都声称用一种纯粹的人类行为的因果方法来替代目的论方法，后者被他们宣称是不科学的。

泛物理主义教导说，物理学程序是所有学科唯一科学的方法。它否认在自然科学和人类行为科学之间存在本质的区别。泛物理主义的口号“统一科学”背后就体现了这个意图。感官经验向某人传达物理事件的信息，也向他提供所有他同伴的行为信息。他同伴对不同刺激的反应方式和研究其它物体的反应方式没有本质的不同。物理学的语言是所有学科的通用语言，无一例外。但我们不能用物理学语言表达形而上学的废话。人相信他在宇宙中的角色不同于其它物体的角色是一种自大的主张，在科学家的眼里所有的事物都是平等的。关于知觉、意志以及追求目的的所有谈论都是空洞的。人只是宇宙中的一种要素，社会物理学和社会工程学这两门应用科学能用技术上处理铜和氢的相同方法处理人。

泛物理主义者可能承认人与物理学物体之间至少存在一个本质的区别。石头和原子的反应既不依靠它们自己的性质、特征及行为，也不依靠人的性质、特征及行为。它们无法改变自己，也不能改变人。在一个人是物理学家或工程师时，（人）至少和它们不一样。很难想象，在没有意识到工程师在不同可能的行为路线之间选择以及决心达到一定目的时，人们如何看待他的行为。为什么他要建一座桥而不是修一个渡口呢？为什么他建一座承载10吨的桥而把另一座桥建成承载20吨的呢？为什么他要决心建一座不会倒塌的桥呢？或者，大多数桥不会倒塌只是一个意外？如果人们把“有意识地追求一定目的”这一概念从处理人类行为的方法中剔除掉，那就必须代之以一个真正形而上学的观点，即某种超人的力量引导人们，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通向一个预定的目标：促使建桥者行动的就是“精神”预定的计划，或者是凡人被迫实行的物质生产力。

仅仅说“人对刺激做出反应，并根据他的具体环境调整自己的行为”，没有为我们提供一个满意的答案。针对英吉利海峡这一刺激，有人的反应是待在家里；其他一些人的反应则有通过划艇、帆船、蒸汽船来跨越，或者（在近代）很简单，游泳；有人乘飞机飞越它；也有人设计方案在它下面打隧道穿过它。把这些反应上的差异归结到环境上的差异，诸如技术知识的状态和劳动、资本货物的供给等等都是徒劳的。这些其它的条件同样也是从人类而来的，也只能通过技术的方法来解释。

在某些意义上行为主义的途径不同于泛物理主义，但是它和后者一样无望地试图以意识及追求目的以外的概念来处理人类行为。它将推理建立在“调整”这个口号的基础上。像任何其它生命一样，人根据他的环境条件调整自己。但是行为主义没能解释，为什么在相同的条件不同的人会以不同的方式调整自己。

²¹⁴ Otto Neurath, "Foundations of the Social Sciences,"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Unified Science*, Vol. 2, No. 1.

为什么在遭受暴力侵犯时一些人会逃离，而另一些人则抵抗？针对人类福利所依赖的一切稀缺的东西，为什么西欧各民族会以一种不同于东方民族的方式调整自身？

行为主义主张根据动物及幼儿心理学发展的方法来研究人类行为，它寻求调查反射作用和本能、自动作用以及无意识的反应。但是，它对建造了大教堂、铁路以及要塞的反射作用，对产生了哲学、诗歌以及法律体系的本能，对导致了帝国发展和衰退的自动作用，以及分裂了原子的无意识反应等什么都没有向我们解释。行为主义想要从外面观察人类行为，并且把它当成纯粹的对一定情况的反应来处理。它谨小慎微地避免提到任何意义和目的。然而，如果不分析相关的人在其中发现的意义，有一些情况就无法描述。如果避免涉及这个意义，也就忽略了明确决定反应模式的本质因素。因为这个反应不是自动的，而是完全依赖于个人的解释和价值判断；如果可行，他致力实现一个情形，相对于他不介入会发生的情势，他更喜欢这个情形。想象一下，一个行为主义者在描述一份销售报价的情况时却绝口不提交易各方附加在报价上面的含意！

实际上，行为主义愿意禁止研究人类行为并用生理学替代它。因为行为主义者从来没有弄清楚生理学和行为主义的区别。沃森宣称，生理学“特别对动物器官的功能感兴趣。．．行为主义，另一方面，在对这些器官的全部功能感兴趣的同时，本质上也对整个动物要做什么感兴趣。”²¹⁵然而，身体对感染的抵抗作用或者个人的生长与衰老这类生理学现象，当然是不能被称为器官的行为。另一方面，如果一个人想要把这样一个动作（不论是击打或是爱抚）称为整个人类动物的手臂行为运动，他的意思只能是，这样一个动作不能归于这个生命的任何一个单独部分。但是，若不是行为者（或那个产生意义和目的的无名事物）的意义和目的，这个必须归因于的某种事物还能是什么？行为主义断言它想预言人类行为。但是，如果不考虑讲话人附加给称号“你这个耗子”的含意，它便不可能预言一个人被另一个人用“你这个耗子”²¹⁶来搭讪的反应。

实证主义的两个派别都不承认人有目的地追求一定目标的事实。在他们看来，所有的事件都应该被解释成刺激和反应的关系。为反对这个僵化的教条主义，有必要强调，只是因为人类理性的不充分，才要求科学在处理人类行为领域之外的事件时摒弃目的论。自然科学必须避免终极原因，是因为它们无法发现任何终极原因，而不是因为它们能证明终极原因都是无效的。对所有现象的相互关联性和对现象的连续和顺序规律性的认识，以及因果研究有效且已扩大了人类知识的事实，并不能绝对排除终极原因运转于宇宙之中的假设。自然科学忽视终极原因以及唯一地专注于因果关系研究的理由是这种方法有效。根据科学理论设计的发明按照理论所预言的方式运行，从而为它们的正确性提供了一个实用的证明。另一方面，魔术装置不产生符合预期的结果，也就不能为魔术世界的景像作证。

显然，不可能令人满意地用推理证明，第二自我²¹⁷是个有意追求目的的生命。但是，为支持在自然科学领域唯一使用因果关系研究而提出的相同实际证据也能被提出，并用来支持在人类行为领域中唯一使用目的论方法。虽然把人当作

²¹⁵ John B. Watson, *Behaviorism* (New York, W. W. Norton, 1930), p. 11.

²¹⁶ rat 一般指卑鄙小人，you rat 是对人很严厉的指责。但是很亲密的朋友之间也可能用这个来开玩笑。

²¹⁷ alter ego, 通常是指人性格中不同于通常表现出来的那一面的性格，也叫个性中的另一面。

石头或老鼠一样来处理的想法行不通，但它是有效的。它不仅在知识和理论研究上有效，而且在日常应用中同样有效。

实证主义者暗地里认可了这个观点。他否认了他的同胞选择目的以及选择实现目的手段的权利。但与此同时，实证主义者声称自己有能力自觉地在不同科学程序方法间选择。一旦遇到了工程问题，无论是技术的或是“社会的”，他马上改变立场。他设计那些无法被仅仅解释为对刺激的自动反应的计划和政策。为了把行动特权保留给他自己一个人，他想要剥夺所有他同胞的这一权利。他是个实质的独裁者。

就像行为主义者告诉我们的，人可以被想象为“一个随时待命的装配好的生物机器。”²¹⁸但行为主义者无视这一事实，即机器按照工程师和操作人员安排的方式运行，人则本能地到处活动。像上面提到的，从“人类婴儿不论遗传，出生时和福特是一样的”这个观点开始，行为主义者提出用操作汽车的方式来操作“人类福特”。²¹⁹他的举止就像是整个人类的主人一样，并且应人类的请求、根据他自己的设计来控制 and 塑造人类。而他本人是高于法律的，是神派遣来的人类统治者。²²⁰只要实证主义对它自己的哲学和理论不加解释，也不说明源自它们的计划和政策，那么按照它的刺激反应计划，它便挫败了它自己。

2. 集体主义教条

现代集体主义哲学是古老概念上的现实主义理论的一个粗糙分支。它从现实主义和唯名主义之间的一般哲学对抗中分离出来，并且几乎没有注意到这两个学派之间持续的冲突。它是一个政治理论，并且因此使用了一个看起来不同于学术争论以及当代新现实主义中使用的关于共相²²¹的术语。但是它的核心教义和中世纪现实主义者的教义没有区别。它认为共相是一个客观真实的存在，甚至是一个高于个性的存在；有时，甚至断然否认个性的自主存在是唯一真实的存在。把集体主义从概念现实主义中区分出来的，正如哲学家所教导的，这不

²¹⁸ Watson, p. 269.

²¹⁹ Horace M. Kallen, "Behaviorism," *Encyclopaedia of the Social Sciences*, 2, 498.

²²⁰ Karl Mannheim developed a comprehensive plan to produce the "best possible" human types by "deliberately" reorganizing the various groups of social factors. "We," that is Karl Mannheim and his friends, will determine what "the highest good of society and the peace of mind of the individual" require. Then "we" will revamp mankind. For *our* vocation is "the planned guidance of people's lives." Mannheim, *Man and Society in an Age of Reconstruction*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40), p. 222. The most remarkable thing about such ideas is that in the thirties and forties they were styled democratic, liberal, and progressive. Joseph Goebbels was more modest than Mannheim in that he wanted only to revamp the German people and not the whole of mankind. But in his approach to the problem he did not differ essentially from Mannheim. In a letter of April 12, 1933, to Wilhelm Furtwangler he referred to the "we" to whom "the responsible task has been entrusted, to fashion out of the raw stuff of the masses the firm and well-shaped structure of the nation (denen die verantwortungsvolle Aufgabe anvertraut ist, aus dem rohen Stoff der Masse das feste und gestalthafte Gebilde des Volkes zu formen)." Berta Geissmar, *Musik im Schatten der Politik* (Zürich, Atlantis Verlag, 1945), pp. 97-9. Unfortunately neither Mannheim nor Goebbels told us who had entrusted them with the task of reconstructing and re-creating men.

²²¹ universal, 哲学术语, 和 individual (个性) 相对。

是处理的方法，而是所暗示的政治倾向。集体主义把方法论理论转变成了一个伦理主张，它告诉人们应该做什么。它区分人们应该忠诚的真正的集体实体和人们应该不加理睬的欺骗性的假实体。没有一个统一的集体主义意识形态，但是有许多集体主义理论。每一种理论都在赞美一个不同的集体主义实体并且要求所有的正派人都服从它，每一个宗派都崇拜自己的偶像而不能容忍所有的敌对偶像。每一个理论和宗派都规定个人要完全服从，因而都是极权主义的。

各种不同集体主义理论的排他主义²²²特征可以被简单地忽略，因为他们都有规律地从一般社会和个人之间的敌对开始。在这个对立中，只有一个包含所有个人的集体出现，因此不会出现多个集体实体之间的敌对。但是在进一步分析中，一个特殊的集体不为人觉察地取代了独一无二的大社会的全面景象。

让我们首先检验一下一般社会的概念。

人们之间彼此协作。这种协作产生的人际关系的全部被称为社会。社会自身不是一个实体，它只是人类行为的一个方面，它在人们行为之外不存在或存活，它只是人类行为的一个倾向。社会从不思考或行动。思考和行动中的个人组成了被称为社会关系和事实的一个关系和事实的综合物。

这个问题被一个数学比喻弄得很混乱。人们问，社会仅仅是个人的总和，或大于个人的总和，并因此是一个被赋予独立真实性的实体？这个问题是荒谬的。社会既不是个人的总和，也不大于个人的总和，或小于个人的总和。数学概念不适用于这个问题。

那个同样空洞的问题带来了另一混乱，社会是否在逻辑上以及时间上先于个人存在？社会发展和文明发展并不是两个截然不同的过程，而是一个相同的过程。灵长类的一个种类在生物学上超越纯粹的动物存在，并且最终转变成原始人，而这意味着最初的基本社会协作已经发展。智人出现在地球事件的舞台上，既不是作为孤独的觅食者也不是群居动物的一员，而是作为一个有意识地和他的同伴协作的人。只有在于同伴的协作中，他才能发展语言这个思考不可或缺的工具。我们甚至无法想象，一个理性的生命完全生活在孤立之中，而不和他的家庭、氏族或部落成员协作。人作为人必然是一种社会动物，某种程度的协作是他的本性的一个基本特征。但是，意识到这一事实不能证明把社会关系当成关系之外的事物，或者把社会当成一个独立的、在个人行为之外或高于个人行为的事物这种做法是正确的。

最终，生物体的比喻带来了误解。我们可以把社会比作一个生物有机体。这种比较的基础是这样一个事实：劳动分工及协作在生物体内的不同器官间存在，同样也在社会的不同成员之间存在。但是导致植物结构功能系统和动物身体出现的生物进化是一个纯粹的生理学过程，其中找不到任何细胞做出的有意识活动的迹象。另一方面，人类社会是一种智力和精神的现象。个人在和他们同伴的协作中，并没有丧失他们的个性。他们仍然有采取反社会行动的权利，并且会经常使用这一权利。这一权利总是存在于身体结构中的每一个细胞里。但是个人本能地选择把自己融入社会协作的方式。人有思想并追求所选择的目标，而身体的细胞和器官缺乏这种自治。

格式塔心理学²²³热情地抵制联想心理学²²⁴的心理理论，它嘲笑“从来没有人观察到的感官马赛克”，并宣扬“如果想在宇宙的完全性里揭示宇宙，分析必

²²² particularist, 排他主义者

²²³ Gestalt psychology 格式塔心理学：认为心理的、心理社会的和行为的现像是难恢复的经验结构，不是从感觉和反应之类的知觉因素简单相加推论出来的

须停留在具有功能现实的整体上，无论它们的大小。”²²⁵无论人们如何看待格式塔心理学，很明显，它和社会问题完全没有关系。显然，没有人观察过整个社会。能被观察到的总是个人的行为。在解释个人行为的不同方面时，理论家提出了社会的概念。在理解“部分的属性构成整体的属性时，不会有任何疑问”²²⁶。没有一种社会属性是在社会成员行为中找不到的。

集体主义学说把社会和个人放在对立面相比较，并且否认后者有任何“真正”的现实性，把个人仅仅视为难以控制的叛逆。个人这个罪恶的卑鄙小人，厚颜无耻地选择他卑微自私的利益，而无视伟大的美好社会的崇高利益。当然，集体主义者只把这个崇高归于公正的社会偶像，而不是那些冒牌货。

但是，谁是冒牌货，谁是真命天子？上帝保佑我们——那完全是另一个问题了。

当集体主义者赞美国家时，他所指的并非每一个国家，而只是他所拥护政权的那个国家，无论这个正统的国家是否已经存在或是将被创立。对古代奥地利的捷克民族统一主义者和联合王国的爱尔兰民族统一主义者而言，维也纳政府和伦敦政府所代表的国家是篡位者。尤其显著的是马克思主义者的术语，马克思对霍亨索伦王室的普鲁士国家有强烈的敌意。为了清晰地表达他想要看到的全能极权的国家不是统治者在柏林的那个国家，他把他计划中的这个未来国家不叫做国家，而是叫做社会。这只是文字上的创新。因为，马克思追求的是，通过把对所有经济活动的控制权转移到一般称为国家或政府的社会强制和压迫机构上来，从而废除个人主动行为的任何影响。这个骗局成功地欺骗了不少人。即使到今天，仍然有容易上当的人以为国家社会主义和其它类型的社会主义有什么区别。

社会概念和国家概念的混乱来自于黑格尔和谢林²²⁷。习惯上把黑格尔主义分为两个学派：左派和右派。两派的区别只在于这些作者对普鲁士王国以及普鲁士联合教会教义的态度。这两派的政治信条本质上是相同的，他们都鼓吹政府全能。还是一个左派黑格尔主义者——费迪南·拉萨尔，他最清晰地表达出了黑格尔主义的基本论点：“国家是上帝。”²²⁸黑格尔本人要更谨慎一点，他只是宣称，“创建国家是上帝在世间的进程”，并且在设计国家时，人们应该思考“那个观点”²²⁹。

集体主义哲学家没能认识到创建国家是个人的行为。立法者、那些通过武力执行法律的人、以及那些屈从法律和警察规定的人用他们的行为构成了国家。只有在这个意义上，国家才是真实的。离开了这种个人行为就没有国家。

3. 社会科学的概念

²²⁴ associationism 认为联想是一切心理活动的基本原则的一种心理理论

²²⁵ K. Koffka, “Gestalt,” *Encyclopaedia of the Social Sciences*, 6, 644.

²²⁶ *Ibid.*, p. 645.

²²⁷ Schelling Friedrich Wilhelm Joseph von (1775-1854): 德国理想主义哲学家，其关于自我、自然和艺术的理论对浪漫主义产生了影响，在一定程度上预示了存在主义。

²²⁸ Gustav Mayer, *Lassalleana*, *Archiv für Geschichte der Sozialismus*, 1, 196.

²²⁹ Hegel, *Philosophy of Right*, sec. 258.

集体主义哲学否认存在个人以及个人行为这一类的事物，认为个人仅仅是缺乏真实性的幻影，是一个由资本主义辩护者的伪哲学捏造的虚假图像。因此，集体主义否认人类行为科学的概念。在它看来，处理那些传统自然科学涉及不到的问题，唯一合理的方法是由他们所称的社会科学提供的。社会科学被期望用来处理群体活动。在他们的背景里，个人被认为只是群体的一个成员。²³⁰但是这个定义暗示，存在一些人并不是作为群体成员行动的行为，而这些行为也因此引不起社会科学的兴趣。如果是这样，那么很明显，社会科学只处理被武断挑选出的整个人类行为中的一小部分。

在行动中，人应该且必然在不同的可能的行动模式中选择。因为把他们的分析只限制在行为的一类中，社会科学提前就放弃了用调查来决定个人选择一定行为模式的思想的尝试。他们不能处理在实际情况中，驱使一个人决定更愿意以一个群体成员的身份而不是以不同方式行动的价值判断。同样，他们不能处理促使一个人以A群体成员而不是以非A的任何一个群体成员行动的价值判断。

人并不只是一个群体的成员，并且也不单独地以某个群体成员的身分出现在人类事物的场景中。就社会群体而言，必须牢记的是，一个群体的成员同时也是其它一些群体的成员。群体间的冲突并不是完全地整合了人群之间的冲突。它是个人思想中不同利害关系之间的冲突。

构成成员身分的是一个人在某个具体情况下的行为方式，因而成员身分不是严格的、不可更改的事物。在很多情况下它会变化。同一个人一天中可以完成不同的行为，每一行为都可以使他有资格成为一个不同群体的成员。他可以为他教派的基金捐款，并投票支持一个在许多基本问题上反对那个教派的候选人。过一会儿他又可以作为工会成员行动。另一时间他又可作为宗教团体的成员，或是作为一个政党成员，或作为语言或种族群体的成员，如此等等。他还可以作为一个为了挣更多钱的个人，为了让他的儿子上大学的人，为了买房子、买车，或买冰箱的人。实际上，他总是作为一名个人在行动，也总是追求他自己的目的。在参加一个群体或以一个群体成员的身份行动时，和不涉及到群体时一样，他追求实现他个人的愿望。他可能为了寻求灵魂的救赎或获得心灵的安宁加入一个宗教团体。他可能加入工会，因为他相信这是获得更高工资或者避免被其他工会会员肉体伤害的最佳办法。他可能加入一个政党，因为他期待这个政党纲领的实现会给他自己和他的家庭带来更令人满意的境况。

所以在忽略个人的其它活动的同时，处理“作为群体成员的个人活动”²³¹是毫无意义的。群体活动本质上且必然是为了达到个人目的而组成群体的个人的活动。社会现象无一不是发源于各种个人行为。创建一个群体活动的是个人所追求的一定目的以及这些个人的信念——相信在这个群体内协作是一个达到追求目的的适当方法。一个群体是集结了人们愿望以及如何实现这些愿望的手段的观点的产品。它根植于个人价值判断以及个人所持的对一定手段预期效果的观点里。

要恰当并且完全地研究社会群体，人们应该从个人行为开始着手。不分析构成群体并使它存活和运行的意识形态，就无法理解群体活动。那种不研究人

²³⁰ E. R. A. Seligman, "What Are the Social Sciences?" *Encyclopaedia of the Social Sciences*, 1, 3.

²³¹ Seligman, loc. cit.

类行为的所有方面就论及群体活动的观点是荒谬的。没有一个和人类行为科学领域截然不同的领域能被所谓的社会科学研究。

促使那些人提出建议要用社会科学来替代人类行为科学的，其实（当然）是一个特定的政治计划。在他们的眼里，社会科学就是为了要消灭个人主义的社会哲学而设计的。社会科学的拥护者发明并且普及了刻画市场经济的术语，作为一个无计划因而无秩序的制度，市场经济中每一个人都一心要实现自己的计划，而“计划”这个术语是为一个机构的设计而保留的，它在政府的警察权力支持下或者就是政府的警察权力，阻止所有的公民实现他们自己的计划和设计。人们很难高估这个术语产生的联想在塑造我们这个时代的政治原则中所起到的作用。

4. 群众现象的本质

一些人相信社会科学的目标是研究群众现象。他们对研究个人特性没有特别兴趣，而是希望通过研究社会集合体揭示一个真正科学特征的信息。对这些人而言，传统历史研究方法的主要缺点是它们只涉及个人。按他们所想，他们认为统计学很精确，因为它可以观察并记录社会群体的行为。

实际上，统计学记录的是被武断挑选出来的群体成员的个人特性。无论科学家设立一个群体的决定原则是什么，记录的特性主要归诸于组成群体的个人，而且只是间接地归于群体。群体的个人成员是观察的基本单位，而统计学提供的是组成群体的个人行为的信息。

现代统计学追求的是，通过测量统计学上确立的量值的相关性而发现它们之间的恒定联系。在人类行为科学领域内，这个方法是荒谬的。这已经被一个事实清晰地证明了：人们计算出的许多高数值的相关性系数，但又确实不能显示两个群体事实间有任何联系。²³²

社会现象和群众现象不在个人现象之外，也不在个人现象之上。它们不是导致个人现象的原因。它们要么是个人协作的产品，要么是类似行为的产品。后者可能是独立的，也可能是模仿的。对于反社会行为也是如此。一个人故意杀死另一个人，同样地，这只是一个人类行为，并且在一个假象的（无法实现的）没有人与人之间协作的状态下，它没有其它意义。在一个社会协作阻止杀人（被这个社会的法律严格决定的情况除外）的状态下，它则可能成为一种犯罪，即谋杀。

通常称为群众现象的是一定个人现象的经常重复和循环。命题：在西方，面包是一件群众消费品。这意味着，在西方绝大多数人每天都吃面包。他们并不是因为它是群众消费品才吃面包。面包是一件群众消费品是因为实际上每个人每天都吃一片面包。从这个观点看，人们也许会感激加布里埃尔·塔尔德的努力，他把模仿和重复形容为社会发展的基本要素。²³³

社会科学的拥护者批评历史学家把注意力集中在个人的行为上，而忽视了多数人、绝大多数人以及群众的行为。这个批评是欺骗性的。那些研究基督教义以及不同教会和教派传播的历史学家，研究导致一体化语言群体出现事件的

²³² M. R. Cohen and E. Nagel, *An Introduction to Logic and Scientific Method*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1934), p. 317.

²³³ G. Tarde, *Les lois de l'imitation*, 3d ed. Paris, 1900.

历史学家，及处理欧洲对西半球殖民化的历史学家，和处理现代资本主义兴起的历史学家，并不会忽视多数人的行为。然而，历史的主要任务是指出个人行为对事物发展进程的联系。不同的个人以不同的方式影响历史的变化。有构思新思想和设计新思考和行动模式的先驱；有引导人民走他们想走的道路的领袖，以及追随领袖的无名的群众。没有先驱和领袖的名字也就不可能书写历史。基督教历史不能无声地忽略掉圣保罗、路德、以及加尔文，十七世纪英格兰历史也不能不分析克伦威尔、米尔顿，以及威廉三世的作用。把产生历史变迁的思想归于群众精神是武断的形而上学先入为主的表现。智力创新，一个被康德和巴克尔正确地认识到的历史研究的主题，并不是群众的功绩。群众运动并非为一些无名小人物而是被个人发起的。我们不知道那些在早期文明史中完成了最伟大功绩的人的名字，但是我们可以确定的是，那些早期的技术和制度创新不是群众一刹那间灵感突现的结果，而是到那时为止超越了他们同胞的一些个人的成果。

不存在群众精神，也不存在群众思想，只存在多数人认可的先驱和领袖，人们模仿他们的行为。暴民和人群也只在头目的指挥下行动。构成群众的普通人的特征就是缺乏主动性。他们并不被动，他们也行动，但是他们只在教唆者的鼓动下行动。

社会学家对群众现象的强调以及他们对普通人的偶像化是“所有人在生物学上是平等的”这个神话的衍生物。无论造成个人之间存在先天差异的是什么，它仍被后天环境维持着。假如所有人均能受益于良好的教育，这种差异将不再出现。这个理论的支持者无法解释如下事实：相同学校毕业生之间存在差异，而许多自学成才的人远远超越了最著名大学的博士、硕士以及学士。他们看不到教育不可能传递给学生超过他们老师的知识。教育培养信徒、模仿者以及墨守成规者，而不是新思想的先驱和创造性的天才。学校不是进步和改良的苗圃，而是传统和一成不变的思想模式的温室。创造性思维的标志是它藐视它所学到的一部分，或者至少给它增加一些新东西。如果把先驱的功绩追溯到他从他老师那里得到的教育，则完全是一种曲解。无论学校训练如何地有效，如果没有不凡的人向前超越他们的老师的智力极限，它都只会产生停滞、正统以及死板的墨守成规。

在对历史和文明发展意义的理解上，最彻底的错误莫过于把注意力都集中到群众现象上并忽略个人以及个人的功劳。不分析群众现象暗含的思想就无法正确地处理群众现象。而且也不会有新思想从群众虚构的大脑中迸发出来。

第十二章 心理学和人文心理学

1. 自然心理学和人文心理学

许多人认为心理学是社会科学的基础，甚至相信它包含了社会科学的全部。

只要心理学采用生理学的实验方法，这些主张显然就难以获得承认。在实验心理学不同学派的实验室里研究的问题，并不比其它学科更多地涉及到人类行为科学的问题。其中的绝大多数甚至对人类行为学、经济学，以及历史学的所有分支毫无用处。实际上，从来没有人尝试过要展示自然主义心理学的发现是如何应用于以上任何一门学科的。

而“心理学”这个术语也用在其它意义上，它表示对人类情感、动机、观点、价值判断以及意志的认识，这些认识是每个人在日常事务行为中不可缺少的能力，也是诗歌、小说以及戏剧作者以及历史学家同样不可缺少的能力。现代认识论称历史学家的这种精神过程是对人类行为历史科学的独特理解。它的作用有两方面：一方面，它确立了在一定价值判断的驱使下人们从事一定的行为并且使用一定的手段来获得他们追求的目的这一事实；另一方面，它试图评价行为的效果和效果的程度以及它对事件进一步发展的意义。

这种对历史学科特有的理解并不是专门为历史学家所用的精神过程，它被每个人用在在和他同伴的日常交往中。它是所有人际关系都使用的一种技巧。儿童在托儿所和幼儿园里会使用它，商人在生意场，政客和政治家在国家大事中都使用它。所有人都盼望获得关于其他人的价值判断和计划的信息，并正确地评价它们。人们通常把这种对其他人思想的洞察称为心理学。因此，他们说一个销售员应该是一个好的心理学家，而一个政治领导应该是一个群众心理学方面的专家。术语“心理学”的这种通俗用法，不能和任何一个学派的自然主义的心理学混淆。当狄尔泰和其他认识论学家宣布历史学应该建立在心理学的基础之上时，他们所想的是心理学这个术语的世俗或通常的含义。

为了避免混淆这两个完全不同的学科带来的错误，有必要把术语“心理学”保留给自然主义的心理学，并且把关于人类价值判断和意志的知识称为“人文心理学”。²³⁴

²³⁴ Some writers, for instance, Santayana, employed the term “literary psychology.” See his book *Scepticism and Animal Faith*, ch. 24. However, the use of this term seems inadvisable, not only because it was employed in a pejorative sense by Santayana as well as by many representatives of naturalistic psychology, but because it is impossible to form a corresponding adjective. “Thymology” is derived from the Greek *Thymós*, which Homer and other authors refer to as the seat of the emotions and as the mental faculty of the living body by means of which thinking, willing, and feeling are conducted. See Wilhelm von Volkman, *Lehrbuch der Psychologie* (Cohen, 1884), I, 57-9; Erwin Rohde, *Psyche*, trans. by W. B. Hillis (London, 1925), p. 50; Richard B. Onians, *The Origins of European Thought about the Body, the Mind, the Soul, the World, Time, and Fate* (Cambridge, 1951), pp. 49-56. Recently Professor Hermann Friedmann employed the term *Thymologie* with a somewhat different connotation. See his book *Das Gemüt, Gedanken zu einer Thymologie* (Munich, C. H. Beck, 1956), pp. 2-16.

人文心理学一方面是自我反省的衍生物，另一方面，是历史经验的沉淀物。它是每个人从和他同伴的交往中学到的东西。它是一个人就人们评价不同情况的方式，就他们的愿望和要求以及他们实现这些愿望和要求的计划所知道的东西。它是一个人生活和行动的社会环境的知识，或者对历史学家而言，是通过研究特殊资料了解的一个不熟悉环境的知识。如果一名认识论学家宣称，历史学必须建立在人文心理学这类知识之上，他只是表达了一个公认的真理。

在自然主义心理学完全不涉及人类思想、判断、愿望、以及行为时，人文心理学的研究领域恰好是这些现象。

自然心理学和生理学作为一方面，人文心理学作为另一方面，两方面的区别可以借用精神病学的的方法得到最佳说明。传统的精神病理学和神经病理学涉及到神经和脑疾病的生理学方面。心理分析涉及到它们的人文心理学方面。它调查的对象是和生理学上的刺激相冲突的思想以及对目的的有意识的追求。思想促使个人压制某些自然本能，尤其是性冲动。但是压制它们的尝试并不总是完全成功。冲动并没有被消除，只是转移到了一个隐蔽的地方，并且会伺机报复。它们在深处对个人的有意识的生活和行为施加了一个扰乱的影响。心理分析治疗设法通过让患者充分意识到这种冲突来消除这些神经的麻烦。它用思想来治病，而不是用药物或外科手术。

心理分析处理影响人类行为的非理性因素，这是一种习惯断言。为了避免混乱，需要对此断言作出解释。人所追求的所有终极目的都超越了理性的批判，价值判断既不能被推理证明，也不能被证伪。术语“推理”和“合理性”总是只能用于衡量为达到终极目的所选择的手段的适宜性程度。在这个意义上，终极目的的选择总是非理性的。

性冲动以及保存自身生命力的欲望是人的动物本性固有的。如果人只是一种动物，而并非同时也是进行价值判断的个人，他就总是会屈服于当时最强的那个冲动。人的杰出之处在于这一事实：他有思想，并且在思想的指导下，在各个不调和的目的之间进行选择。他还在生与死，进食与挨饿，交媾与节欲之间作选择。

早先，人们倾向于假定精神病人的反常行为完全没有任何意义。弗洛伊德证明，看起来毫无意义的精神病人的行为原意是为了达到一定的目的。精神病人想要的达到的目的可能和那些正常人奋斗的目的不同，而且在多数情况下，精神病人采用的手段并不适合实现他们的目的。但是，选择的手段并不适合达到目的这一事实并不能证明一个行为就是非理性的。

在追求目的的时候犯错误是一个普遍的人类弱点。一些人比另一些人少犯错误，但是没有一个人是无所不知、而且永不犯错误的。不能把失误、低效率以及失败这三者和不合理性相混淆。通常射击者总是想击中目标，如果他没能击中目标，他并不是“失去理性”，他只是个糟糕的射手。选择了错误的方法医治病人的医生没有失去理性，他可能只是个不称职的医师。过去尝试采用魔法仪式来增加收成的农夫，和现代多施化肥的农场主同样都是在理性地行动。根据他的（错误的）观点，他做了适合他目的的事情。

精神病人的特征同样不是他使用了不合适的手段这一事实，而是他无法和正常人面临的冲突做斗争。生活在社会中，个人被要求压制内在的动物本能。我们可以暂时不管侵略的冲动是否是这些天生欲望之一。毫无疑问，社会生活和放任满足性动物的习性是不相调和的，或许有比现实社会所采用的方法更好的管理性行为的方法。事实上现在采纳的方法——无论用什么方法——对一

些个人的思想施加了过多的压力。这些男男女女茫然不知所措地面对一些幸运儿能克服的问题。他们的两难境界和窘迫使他们成为精神病人。

针对理性主义哲学，有人提出了许多欺骗性的反对理由。不同的十九世纪思想学派完全曲解了理性主义理论的精髓。为了反对这些曲解，必须认识到，十八世纪古典理性主义只是在涉及一些次要并且附带问题时是有缺陷的，但这些次要缺陷会轻易地导致无辨别力的批评家迷失方向。

理性主义的基础论点坚不可摧。人是一种理性生命，也就是说，他的行为受理性支配。命题“人行动”同另一命题“人渴望以更适合他的情况替代较不适合他的情况”是等价的。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必须使用合适的手段。正是他的理性使他能够找出达到他选择的目的的合适手段。

此外，理性主义还正确地强调，人们就选择终极目的上存在一个广泛的全体一致的认识。除了可以忽略的极少数例外，所有人都想保存他们的生命和健康，并且改善他们生存的物质条件。正是这个事实决定了人们之间既存在协作又存在竞争。但是，在处理这一点时，理性主义哲学家犯了严重的错误。

首先，他们假定所有人都被赋予相同的推理能力。他们忽略了聪明人和愚人的区别，甚至先驱天才和简单墨守成规的广大群众之间的区别。后者最多会支持伟大思想家提出的理论，但是多数情况下他们无法理解这些理论。在理性主义者看来，每一个健全的成年人都有足够的智力理解最复杂的理论。如果他没能做到，过错在于他所接受的教育，而不在于他的智力。一旦所有人都享受了完美的教育，大家将会和最杰出的智者一样聪明和明智。

理性主义的第二个错误在于它忽略了思想错误的问题。多数理性主义哲学家没能看到，即使是诚实的人，真诚地专心于寻求真理，也有可能犯错误。这种先入之见阻止了他们公正地对待过去的意识形态和形而上学理论。在他们看来，他们不赞成的理论可能仅仅是蓄意的欺骗促成的。他们中的许多人把所有宗教都驳斥为邪恶的冒名顶替者有意欺骗的产品。然而，这些古典理性主义的缺陷不能作为现代反理性主义对理性主义猛烈抨击的借口。

2. 人文心理学和人类行为学

人文心理学与人类行为学 and 经济学没有特殊的关系。认为现代主观经济学——边际效用学派是建立在“心理学”之上或和它密切相关的流行信条是错误的。

价值判断这个行为是一个人文心理学现象。但是人类行为学和经济学并不涉及到价值判断的人文心理学方面。他们的主题是根据行动者的选择行动。具体的选择是评价行为的衍生物。但是，人类行为学并不关心，在一个人的灵魂、思想或大脑中发生的、在A或B之间产生一个明确决定的事件。它认为宇宙的本性规定人在不调和的目的之间选择是理所当然的，它的对象不是这些选择行为的内容，而是它们的结果。它不关心一个人选择什么，只关心他选择并且服从所做出选择的事实。就决定选择的因素来说，它是中性的，并且不妄称有检视、修改，或更正价值判断的能力，它是价值中立的。

为什么一个人选择水而另一个人选择酒，这是一个人文心理学（或者，在传统术语上，心理学的）的问题。但是，它不是人类行为学和经济学所要关注的。人类行为学以及它迄今发展最完善的一部分——经济学的主旨是行为，它所关注的不是推动人追求一定目的的动机。

3. 人文心理学作为一门历史学科

在今天被称为“心理学”的这门学科的意义，心理学是一门自然科学。就（本书）一篇研究人类行为科学认识论的论述而言，提出用什么把自然科学的这个学科从普通生理学区分出来这个问题，不是我们的任务。

心理学在人文心理学的意义上是一门历史学科，它的知识源自历史经验，我们将会后面的章节涉及到自我反省这个问题。目前，我们只要强调这一事实，人文心理学对其他人选择的观察以及对观察者自己选择的观察，都必然总是以历史经验的方式涉及过去的。在这个领域，不存在能产生类似于自然科学所认为的实验确立事实的方法。人文心理学所能告诉我们的就是过去特定的人或人群曾以一定的方式评价并行动，他们在未来是否以同样的方式评价并行动还不能确定。关于他们的未来行为的所有断言都是以对人类行为科学历史分支的特殊理解为基础的猜测性的预言。

在这一点上，个人的人文心理学和群体的人文心理学没有区别。所谓民族心理学和群众心理学也是历史学科。所谓国家“特征”，最多是那个国家过去成员显示出来的特性。现在还不能确定，这相同的特性是否在将来还会显示。

所有的动物都有自我保存的本能，它们抵抗对它们生存有害的力量。如果受到攻击，它们会自卫、反击或溜之大吉。在观察不同动物种类的基础上，生物学能够预言，每一个种类的健康个体在遭受攻击时反应的方式。但针对人的行为无法做出这种绝然的预言。确实，绝大多数人被自我保存的动物本能所驱使。但是也存在例外。受某些思想指引的有些人会选择抵抗。也有些人因绝望而放弃尝试抵抗或逃避。在事件发生之前，无法确知一个人会如何反应。

回顾往事，历史分析试图告诉我们，结果可能和真实的情况并没有什么区别。当然，结果总是起作用的因素的必然产物。但是不可能从人文心理学实验确定地推导出人（无论是个人或个人群体）的未来行为。所有的基于人文心理学知识的预言都是对未来的特殊理解，就像每个人日常在他们的行为中所做的一样，尤其是政治家、政客以及商人。

人文心理学的成就是一个详细阐述了人类特性的目录。此外，它能建立以下事实：某些过去显现的特性通常和某些其它特性联系在一起。但是，它从来不能以自然科学的那种方式预言，它从来不能预先知道不同的因素在一定未来事件中能发挥多大的作用。

4. 历史与虚构

历史设法按照它们真实发生的样子来描述过去的事件，它追求忠实的再现。它的真实概念和什么是曾经的真实相一致。

史诗以及戏剧描述，从人文心理学的观点出发认为是真实的东西，而不管所讲的故事是否真的发生过没有。我们要研究的不是作者想要通过他的作品带来的效果，也不是它的形而上学、美学，以及道德的内容。许多作者写作的目的仅仅是为了娱乐大众，另一些人则有更大的雄心。在讲述故事时，他们设法暗示一种关于人的命运、生与死、人类成就与苦难、成功与挫折的普遍观点。他们的观点和科学以及哲学相差甚远。科学在描述和解释宇宙时完全依赖理性和经验，它避开无法公开通过逻辑（在这个术语最宽的意义，包括数学和人类行为学）和经验方法证明的命题，它分析宇宙的部分，而不就事物的整体性发表任何陈述。而哲学设法在科学铺设的基础上建立一个全面的世界观。在追

求这个目标的奋斗中，它感觉自身不会与任何有充分根据的同时代的理论相抵触。因此，它的途径也被理性和经验所限制。

诗人和艺术家则以另一种心情处理事物和问题。在处理宇宙的单个方面的时候，他们总是从整体上把握。叙述和描述，对个体事物以及特别事件的描绘，对他们而言，只是一种手段。他们工作的本质特征是超越预言、图案以及色彩。它在无法言表的感情和思想里激活创造者以感动读者和观众。当康拉德·费迪南特·迈耶尔²³⁵描述一个罗马喷泉以及赖内·马利亚·里尔克²³⁶描述一只笼中的豹子的时候，他们不只简单地描绘了现实，他们也抓住了宇宙的一刹那。在福楼拜的小说里，包法利夫人的悲哀故事并不是主要的关注对象，主要关注的是要远远超出了这个可怜女人的命运的事物。最忠实的摄影和一名艺术家的肖像画相比有根本的不同。同样，表现文学和艺术作品特色的不是它对事实的写照，而是它用以揭示宇宙某个方面的方式以及人们对待它的态度。同样，成就艺术家的不是经验或知识之类的东西，而是他对人类存在及命运问题独特的反应，它是“体验”一种纯粹的对他所处环境和他经验的个人反应。

诗人和艺术家要传达一个信息，但是这个信息要借助不能言表的感情和思想。正是因为它是无以言表的，所以无法以清晰的方式表达出来。我们从来不知道那些我们在欣赏他们作品时所经历的“体验”，是否正是他们创造它时经历过的。因为他们的作品不只是一种交流。除开它所传达的东西之外，它激起了读者和观众的感情及思想，而这些是可能不同于它的作者的感情的思想的。诠释一支交响乐、一幅画或是一部小说都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解释者最多设法告诉我们他对作品的反应。他无法确切地告诉我们，创造者的用意是什么，或者其他可能会有什么感觉。即使是创造者本人评论他自己的作品，就像在标题音乐²³⁷时一样，这种不确定性还是存在。没有语言可以描述无以言表的东西。

历史和小说的共同之处，是两者都是建立在人类思想知识的基础之上。他们对人文心理学经验施加影响，他们处理的方式是对人类价值判断、人们对他们自然和社会环境挑战的反应方式作特殊的理解。但是，过后他们的方式就不同了。历史学家必须讲述的都完全表述在他的研究报告中，他向读者传达所有经他确立的事实。他的信息是公开的。没有什么会超越他的书本的内容，只要有能力的读者都能读懂。

可能会发生这种情况，或许自然科学研究也会有这种情况，历史研究引发了一个人的大脑中无法言表的、对宇宙整体的思想以及观点，这是整体性移情理解的标志。但是，这并不能改变历史学家工作的性质和特征。历史无条件地探索真正发生过的事实和事件。

而小说可以自由地描写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件。就像人们所说，作者创造出一个想象的故事。他可以自由地背离事实，应用于历史学家作品的对真相的检验并不适用于小说家的作品。然而，他的自由也是有限度的。他不能随心所欲地违抗人文心理学经验的教导。小说和戏剧并没有要求讲述的事情必须是真实的，它们甚至于完全不必要发生。它们可以引入异教的偶像、仙女、行为和一样的动物、幽灵以及其它的幻想元素。但是，一部小说或剧本的所有角色，

²³⁵ Konrad Ferdinand Meyer (1825-1898), 瑞士诗人。

²³⁶ Rainer Maria Rilke (1875-1926), 生于捷克布拉格, 被誉为最伟大的德语诗人之一。

²³⁷ “program music “absolute music” 相对的一种音乐形式, 前者的目的是通过音乐描绘的场景、图画或气氛来激发听众非音乐的和想象。

应该按照一种人文心理学上可以理解的方式表演。在史实和戏剧作品中用到的真理和谬误的概念，指的是人文心理学的可信性。作者可以自由地创造戏剧人物及剧情，但是他决不能试图发明一种新的人文心理学，不同于源自对人类行为的观察的心理学。

小说和历史一样，不涉及一般人、抽象人或普通人²³⁸，而是个人以及单独事件。然而，即使这里也存在一个历史和小说之间显著的差异。

历史所处理的个人可能并且经常是个人群体，而且它所处理的单独事件是影响这种个人群体的事件。单个人成为历史学家感兴趣的对象，主要从他的行为对一群人施加的影响或他作为整个个人群体的范例代表的角度。历史学家对其他个人并不感兴趣。但是对于小说作者，同样地，总是只有个人才有价值，无论他对其他人的影响如何，也不论他是否被视为有代表性。

这一点在十九世纪下半叶形成的一些文学理论中被完全误解了，这些学说的作者被同时代历史方法的变化误导了。以前的历史学家主要写那些伟人和国家大事，现代历史学家转向思想、制度、以及社会环境。在科学的声望远远超过文学的声望时，实证主义狂热者嘲笑小说是一种无用的消遣，小说作者设法通过把它描绘成一门科学研究的分支来证明自己的职业是正当的。在左拉看来，小说是一种描述性的经济学和社会心理学，应该建立在对特殊条件和制度一丝不苟的探究上。另一些作者走得更远，他们声称在小说和戏剧中应该只论述阶级、国家以及种族的命运，而不是个人的命运。它们将社会统计报告和一个“社会”小说或戏剧混为一谈。

按照自然主义美学原则撰写的书和剧本是拙劣的。杰出的作家无一不是只在口头地敷衍这些原则。左拉本人在使用他的原则时是非常谨慎的。

小说和戏剧的主题是个人的生活、感觉以及行动，而不是那些匿名集体的全体。环境是作者描绘人物的背景，它是人物通过运动和行动所反应的外部事物的状态。没有哪一部小说或戏剧的主人公是一个诸如民族、国家、阶层或一个政党的抽象概念。人，只有人，才是文学永恒的主题——那些活着并行动的真实个人。

先验科学包括逻辑、数学和人类行为学的理论，以及自然科学建立的实验事实可以在不涉及到作者人格的情况下被检验。在处理欧几里得几何学时，我们并不关心欧几里得这个人，并且可能忘记他曾经存在过。历史学家的作品必然为历史学家对涉及问题的特殊理解所影响，但是仍然有可能只讨论暗示的问题，而不涉及到它们来自于一个特定的作者。但在处理小说作品时不允许这种客观性。一部小说或戏剧总是比情节需要的要多一个男主角。它也是作者的信条，而且关于此主角的讲述并不比故事中的人物少，这揭示了他内心最深处的灵魂。

故有时会有人断言，小说中的真理比历史中的真理更多。就小说或戏剧被视为对作者思想的揭露来说，这当然是正确的。诗人总是写他自己，总是在分析自我的灵魂。

²³⁸ P. Lacombe, *De l'histoire considérée comme science* (2d ed. Paris, 1930), pp. 35 41.

5. 合理化

对人的人文心理学分析是历史研究的本质，它传达了我們所能知道的所有关于终极目的以及价值判断的知识。但是，正如上面已经指出的，它对人类行为学没有帮助，并且在涉及为达到追求的目的而使用的手段时也用处不大。

关于手段选择，重要的是他们达到追求的目的的适当性，没有其它评价手段的方法。有合适的手段和不合适的手段，从行动者的角度看，选择不合适的手段总是错误的，是不可原谅的失败。

历史被赋予借助人文心理学以及特殊理解²³⁹来解释这种错误源由的使命。因为人是易犯错的，并且寻找恰当的手段是非常困难的，所以人类历史进程大体上呈现出一连串的失误和挫折。以我们今天的知识状态回顾过去，我们有时很容易贬低过去的时代，并且吹嘘我们当今时代的效率。然而，即使是“原子时代”的饱学之士也难免会犯错误。

选择手段以及行动中的不当，并不总是由错误的思考和无能造成的。挫折经常是在选择目的时犹豫不决的结果。在不同的不可调和的目标之间摇摆，行动者在事务的处理中举棋不定，优柔寡断使他不能向着一个目标前进。他时进时退，一会儿向左，一会儿又向右。政治、外交以及军事史上充满了这种在国家大事处理中犹豫不决的行为。弗洛伊德已经指出，在个人日常生活中，潜意识中被压制的欲望在遗忘、错误、口误、笔误以及意外中表现出来。

一个不得不向其他人证明他对事情的处理是正当的人经常借助借口。他把他偏离程序中最合适的道路的动机并不归因于实际促使他的原因，而是其它。他不敢承认他的真实动机，因为他知道他的批评者不会把它作为一个充分的理由来接受。

合理化是心理分析给制造借口来证明行为者的行为动机正当的名称。无论行为者是否愿意承认他的真实动机，或许他没有意识到一种被压制的欲望在指挥他的行动，他都会通过给他的行为附加上能为他的超我²⁴⁰所接受的理由来掩饰潜意识的冲动。他不是有意识地欺骗和撒谎，他自己也是他的错觉和痴心妄想的受害者。他缺乏直视现实的勇气，因为他朦胧地猜测到认识真实事态可能会是不愉快的，会破坏他的自尊，并削弱他的决心，所以他不愿意在超出一定界限后再分析问题。这当然是一个相当危险的态度，从不受欢迎的现实中退回到一个更让人高兴的虚构的幻想世界，在这个方向上再前进几步就会导致精神错乱。

然而，在个人的生活中存在一些限制，以阻止这种合理化过于猖獗并造成大的破坏。正是因为合理化是一种多数人的普遍行为，当它不存在的时候人们保持警惕的甚至怀疑态度。有些人总是随时准备揭露他们邻居的狡猾企图，以支撑他们自己的自尊。最巧妙构筑的合理化故事也无法长期抵挡住揭露真相者的反复攻击。那些为了社会群体的利益而提出的合理化则完全是另外一回事，那种合理化可以长盛不衰，因为它没有受到群体内部的批评，而来自外部的批评则被当作明显的偏见受到拒绝。历史分析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研究政治意识形态所有领域中的各种合理化的表现。

²³⁹ the specific understanding, 参见下文第十四章 3 关于历史学的特殊理解。

²⁴⁰ superego 超我：弗洛伊德理论中自我的一部分，由父母和社会道德标准的内在化而形成，审查并约束自我。通常为无意识的，由自我理想和良心组成。

6. 反省

内省者和反内省者的激烈争论涉及自然心理学，但不影响人文心理学。反内省者学派推荐的方法和程序都不能传达人文心理学探索现象的任何信息和知识。

作为一个作价值判断和行动的自我，每个人都知道价值判断和行动的意义。他意识到在对环境不同状态的认识上他不是中立的，他喜欢一定的状态胜于另一些状态，并且倘若他被给予了这种干涉的条件，他会有意识地努力以一个他更喜欢的状态去替代一个他较不喜欢的状态。无法想象，一个健全的人会缺乏这种见识。同样也很难想象，一个缺乏这种见识的生命能够通过任何经验或教育来获得它。价值和行为的范畴作为第一种先验的基本要素出现在每一个人的思维中。如果没有这些范畴的预先知识，没有一门科学应该或可以动手处理这些涉及的问题。

只是因为意识到了这些范畴，我们才确实知道了内涵的含意，并且掌握了解释其他人活动的关键。这个意识使我们在外部世界中得以区分两个单独的领域——人类事务的领域和非人类事物的领域，或者终极原因的领域以及因果关系的领域。这里我们的任务不是处理因果关系。但我们必须强调，终极原因的概念并不来自经验和对外部事物的观察，它呈现在每个人的思维中。

需要反复强调的是，不包含追求目的的涵义，就不能做出关于人类行为的声明或命题。行为的概念就是表示目的的，如果不涉及有意识地追求所选的目的，就没有任何意义和内涵。不借手段和目的的范畴，在人类行为领域就不会有任何经验。如果观察者不熟悉他所观察行为的人的意识形态、技术、以及疗法，观察者就会弄不清观察对象的行为头绪。他看到人们跑来跑去、挥手，但是只有当他开始发现他们想要达到的目的的时候，他才开始理解他们为什么有那些行为。

如果实证主义者使用术语“内省”指的是“Paul runs to catch the train”这个句子中的最后四个词表达的意思的这种陈述，那么我们应该说没有一个健全的人不在每一次思考时都使用内省。

第十三章 历史研究的意义与作用

1. 为什么需要历史学

在实证主义哲学家眼中，数学和自然科学研究是为行动做准备的。技术证明了实验者劳动的价值，但找不到类似支持历史学家采用的传统方法正当性的证明。实证主义者说，他们应该放弃他们不科学的文物研究，而转向研究社会物理学或社会学。这个学科将从历史经验中提炼出规律，这种规律将会为社会“工程”提供物理规律，即那种提供给技术工程的相同服务。

在历史主义哲学家看来，研究历史给人提供路标，指示他必须经历的道路。一个人的行为只有适应发展的趋势才能获得成功，而发现这些趋势的路线是历史的主要任务。

实证主义和历史主义的破产，重新提出了历史研究的涵义、价值以及用途问题。

一些自封的唯心主义者认为，借助对知识的饥渴，所有人或者至少是高层次的人可以令人满意地回答这些问题。然而问题在于，如何在驱使语言学者调查一个非洲部落语言的对知识的饥渴和刺激人们窥探电影明星私生活的好奇心两者之间划一条界限。许多历史事件使一般人感兴趣是因为，听、读或看它们在舞台上或银幕上演出能给他愉快，有时也可能有惊恐的感觉。大众贪婪地研读报纸对犯罪和审判的报道，并不是被兰克²⁴¹的那种急切所驱使，兰克是想知道事件真实发生的样子。煽动大众的激情将是心理分析的对象，而不是认识论。

唯心主义哲学家把历史作为一种仅仅为了“知道”而存在的知识的理由，没能考虑到这一事实，即存在某些并不具有知道价值的事物。历史的任务不是记录所有过去的事物和事件，而只是记录那些具有历史意义的事物和事件。因此有必要找到一种标准，使从一般事物中筛选出有历史意义的事物成为可能。而这从一个满足于知道某事的单纯事实的理论的角度是无法办到的。

2. 历史环境

行为中的人面临一定的环境，他的行为是对这个环境带来挑战的反应。他评价这种环境可能对他自己产生的影响，然后进行选择并且为达到他选择的目的而行动。

只要这个环境可以被自然科学方法完全地描述，而通常自然科学也提供了一个使个人能够做决定的解释。如果一处管道泄漏被诊断出来了，多数情况下，采取的相应行动方式是清楚的。在完整地描述一个情况要求涉及应用自然科学原理之外的东西时，求助于历史是难免的。

人们经常认识不到这一点，因为他们被这一个幻觉所欺骗，以为在过去和将来之间，存在一个延伸的可以被称为“现在”的时间空间。如同我曾经指出的²⁴²，这种“现在”的概念不是一个天文学或精密计时学的概念，而是一个人类

²⁴¹ 兰克 (Leopold von Ranke, 1795—1886)，德国十九世纪最重要的历史学家。也是西方近代史学的重要奠基者之一，他主张研究历史必须基于客观地搜集研读档案数据之后，如实地呈现历史的原貌，他的这种史学主张，被称作兰克学派。

²⁴² Mises, *Human Action*, 4th ed. 1996, p. 101. 同时参见本书第十章

行为学的概念。它指的是使一定类型行为的可行条件的延续。因此对不同的行动领域，它的含义也不同。而且，永远不可能事先知道还有多少没有经历的未来时间将会被我们今天所称的“现在”包括在内，而这个只能在回顾时才能确定。如果一个人说“目前，鲁里坦尼亚王国和勒普泰尼亚王国的关系是和平的”，这也无法确定稍后的回顾记录是否将把我们今天所称的明天包括进目前这段时间。这个问题只能在稍后才能回答。

不存在目前事态的非历史分析这回事。对目前的检验和描述必然是以刚刚过去的时刻为结尾的历史记录。对目前的政治和经济状态的描述无可避免的是对产生目前状态的事件的描述。如果，在商业上或政府中，一个新人刚刚掌权，他的首要任务便是弄清楚直到最后一刻都发生了什么事情。政治家和商人都是通过研究过去的记录来了解目前的状况。

历史主义正确地强调了这个事实：为了在人类事务领域了解某事物，人们必须熟悉它过去发展的方式。历史主义者致命的错误在于，相信这个对过去的分析本身传达了关于事物必须经历的未来路线的信息。历史记录提供的是对情况的描述，反应取决于行动者给情况附加的含意，取决于他想达到的目的，也取决于他为达到目的而选择的手段。1860年，在联邦的许多州都存在奴隶制度。有关这一制度的一般历史以及在美国的特别历史中最仔细忠实的记录中，都没有绘制出未来国家对奴隶制度的政策。在开始大规模生产前夕，福特发现的汽车制造和销售情况并没有预示在这个商业领域应该做什么。历史分析给出了一个诊断。只要有有关目的选择，反应便是被价值判断、被人类行为学和技术提供的可供人支配的整个知识体决定的。

且让那些想否认前述声明的人着手描述任何一种哲学、政治、战场、股市、个人商业企业领域的目前情况，而不要提及过去吧。

3. 远古历史

一名怀疑者可能会反对说，就算某些历史研究是对目前事物状态的描述，但并非所有历史调查都是如此。人们可能承认，纳粹历史促使人们更好地理解目前政治和意识形态形势中的不同现象。但是，关于蜜特拉神（波斯神话中的光明之神）崇拜、古代卡尔迪亚王国（古巴比伦人的一个王国），或者埃及王国早期王朝的书对我们目前的忧虑有什么特定意义？这种只是文物研究，是好奇心的显示，它们是无用的，是对时间、金钱和人力的浪费。

这种批评是自相矛盾的。一方面他们承认，目前状态只能被对产生这个状态的事件的完全叙述所描述；另一方面，他们预先宣称某些事件不可能影响导致目前状态事件的进程。然而，这个否定的陈述，只能在仔细检验过所有可利用的资料之后才能做出，而不是预先建立在某些草率结论的基础上。

一个事件发生在一个遥远的国度、远古的时代，这一事实本身并不证明它对目前没有影响。发生在三千年之前的犹太人的事情和十九世纪下半叶发生在美国印第安人的事情相比，前者对数百万基督教美国人的生活产生了更大的影响。目前在罗马教会和苏联的冲突中，有些因素可以追溯到源自一千多年前的东西方教会的大分裂。如果不提基督教从一开始的整段历史，这个分裂是无法调查清楚的；研究基督教应以对犹太教以及各种对它产生影响的迦勒底、埃及人等的分析为先提条件。在历史中不存在这样一个点，在这点上，我们可以在没有忽略任何重要因素的情况下，就完全满意地停止调查。文明是否应该被视为一个连贯的过程，或者我们是否更应该区分出众多的文明，这些都不影响我

们的分析。因为在这些自治的文明之间存在思想的相互交换，其程度和重要性必须通过历史研究来确立。

一个肤浅的观察者可能会想，历史学家只是重复他们前任已经说过的，最多只是偶尔润饰一下描述的细节。实际上，对过去的理解总是在不断地变化中。一名历史学家的成就在于把过去以一种新视角的理解展示出来。历史变化的过程是被决定人类行为的思想的不间断的转化所促使的，或者更应该说是存在于决定人类行为的思想不间断的转化中。在这些意识形态的变化中，那些涉及到对过去的特殊历史理解的思想扮演了显著的角色。将较后时代和较前时代加以区分的，除其它意识形态变化以外，也是对前面时代理解的一种变化。不断地检验和重塑我们对历史的理解，这是历史学家为我们所称的时代精神所做出的贡献。²⁴³

4. 伪造历史

因为历史不是一种无用的消遣，而是一门最有现实重要性的研究，人们一直热衷于伪造历史证据并且对事情的发展说假话。在真实发生过的事情上欺骗后代，并且用编造的谎言来替代忠实的记录，这种勾当常常始自那些自身在历史事件中发挥了积极作用的人，并且在事件发生之时就已经开始了，有时甚至还在事件发生之前。对历史事实撒谎以及销毁证据，对许多政治家、外交家、政客以及作者来说是管理公共事务和著述历史中的一个合理的一部分。历史研究的主要任务之一是揭露这种不真实。

造假者常常是被这样的愿望所驱使，他们想从那些他们热切地想要赢得支持（或至少中立）的人们的道德准则观点来证明他们自己或政党行为的正当性。如果从事件发生时代的道德观点看，涉及的行为并不显得招人反对，而只是受造假者那个时代道德标准的谴责，那么这种粉饰就是相当荒谬的了。

伪造者和撒谎者并没有给历史学家探求真相的努力制造什么重大障碍，对历史学家来说，更困难的是避免被欺骗性的社会和经济理论误导。

历史学家在处理记录时已经具备了他在逻辑、人类行为学以及自然科学领域获得的知识。如果这种知识是有缺陷的，那么他对材料的检验和分析将受到损害。由于作者没有掌握足够的经济学，过去八十年的经济和社会历史文献中的很大一部分是无用的。历史主义者认为历史学家不需要熟悉经济学并且甚至应该抛弃经济学的论点毁掉了几代历史学家的工作。更具有破坏性的是历史主义施加给另一些人的影响，这些人声称他们的出版物描述了近年来经济研究的各种社会和经济情况。

²⁴³ Sometimes historical research succeeds in unmasking inveterate errors and substituting a correct account of events for an inadequate record even in fields that had up to then been considered fully and satisfactorily explored and described. An outstanding example is the startling discoveries concerning the history of the Roman emperors Maxentius, Licinius, and Constantinus and the events that ended the persecution of the Christians and paved the way for the victory of the Christian Church. (See Henri Grégoire, *Les Persécutions dans l' Empire Romain* in *Mémoires de l' Académie Royale de Belgique*, Tome 46, Fascicule 1, 1951, especially pp. 79 - 89, 153 - 6.) But fundamental changes in the historical understanding of events are more often brought about without any or only slight revision of the description of external events.

5. 历史与人文主义

实用主义哲学认识到知识的重要性，因为它给人以力量并使人易达到目标。从这个角度出发，实证主义把历史作为无用之物加以摒弃。我们已经设法证明，历史为行动人提供的服务，使他理解了他必须在其中行动的环境。我们已经设法给历史提供一个实用的理由。

但是，在历史研究中远不止这个。它不仅提供预备政治决策不可缺少的知识，而且它开启了理解人类本性和命运的思维。历史研究增长智慧，它正是那个常常被曲解的概念——自由教育的本质。它是人道主义最重要的途径，是区分人与其它生命存在的特定人类所关注的知识。

新生儿从他的祖先那里继承了生物物种特征。他没有继承人类存在的意识形态特征——学习和认知的欲望。每个新生人都必须通过后天学习得以区分文明人和野蛮人的东西。掌握人的精神遗产需要漫长艰辛的努力。

个人文化不仅仅是对目前科学、技术以及公民事务状态的熟悉，也不仅仅是熟悉书本、绘画、旅行经验以及参观博物馆。个人文化是对那些把人类从一个纯粹动物存在的迟钝程序中唤醒成一个理性及思考生命的思想的消化吸收。通过分享早先时代遗留下的所有最好的传统来自我人性化是一种个人努力。

历史的实证主义毁谤者声称，专注于过去的事情转移了人们在人类的主要任务——改善未来环境上的注意力。这是最不恰当的指责了。历史回顾过去，但是它得出的教训涉及未来事物。它不宣扬懒惰的寂静主义，它激励人仿效前辈建功立业。它对人们要说的就像但丁的尤利塞斯对他同伴的讲话那样：

想一想你们的根源，你们生来不是行尸走肉，而是要追寻美德和知识。²⁴⁴

黑暗时代并不黑暗，因为人们专心于研究古代希腊文明留下的智慧宝藏。而只要这些宝藏还被深埋隐藏，那些时代就是黑暗的。一旦它们重见光明并开始激发最先进的思想家的思维，它们就为今天所称的西方文明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备受批评的术语“文艺复兴”中肯地强调了古代遗产在所有西方精神特色发展中所起到的作用。（文艺复兴的开始是否应该比布克哈特²⁴⁵设定的时间早几个世纪，这个问题不是我们这里所关注的）

最先开始研究古人的野蛮征服者的子孙真诚地敬畏不已。他们认识到他们以及他们同时代的人都面对着他们自己无法提出的思想。他们情不自禁地把希腊和罗马古典时代的哲学、文学以及艺术视为不可超越的。在他们眼里，除了古人铺就的道路，没有其它通向知识和智慧的道路。对他们而言，把一个精神成就归结到当代带有贬低的意义。但是慢慢地，从十七世纪以后，人们意识到西方成熟了，并且创造了它自己的文化。他们不再哀叹一个艺术与知识的黄金时代的消失、或者无可挽回地逝去，也不再把古代杰作作为模仿（但是永远无法达到，更不用说超越的）的榜样。他们开始用逐步改进的思想替代了先前持有的逐步退化的思想。

²⁴⁴ *L' Inferno*, XXVI, 118-20. In the translation by Longfellow: Consider ye the seed from which ye sprang; Ye were not made to live like unto brutes, But for pursuit of virtue and of knowledge.

²⁴⁵ 雅各布·布克哈特 Jacob Burckhardt (1818-1897) 瑞士艺术史和文化史学家。

在这个教导现代欧洲了解自身价值、并产生现代西方文明自立的智力发展过程中，历史研究是极为重要的。人类事务的进程不再被视为仅仅是野心勃勃的王子和军事领袖为了权力、财富以及荣誉的争斗了。历史学家在事件的变迁中，发现了除那些通常所称的政治军事之外的其它力量的作用。他们开始把历史进程当作是被人要求更好的欲望所驱使。他们在对价值判断、对政府和改革者追求不同目的的评价上分歧很大。但是，他们几乎一致地相信，每一代人主要关切的是使他们祖先留给他们的条件更令人满意。他们宣布朝着公民事务的更好状态前进是人类奋斗的主旋律。

忠实于传统对历史学家来说，意味着遵守人类行为的基本规则，也就是要不断为改善条件而奋斗。它不是指保留不合适的制度和坚持那些早就被更合理的理论驳斥了的学说，也不意味着对任何历史主义观点的让步。

6. 历史与侵略性民族主义的兴起

历史学家应该在它的研究中利用可支配的所有其它学科的知识。这种知识的缺乏会影响他的工作结果。

如果我们只把荷马史诗单纯地看作历史叙述，由于神学或神话被用作解释和说明事实的缘故，我们不得不把它们断定为不令人满意的。王子和英雄之间的个人及政治上的冲突，瘟疫的传播，气候条件，以及其它意外事件都被归因于神的干涉。现代历史学家摒弃了这种把世俗的事件追溯到超自然原因的做法，他们避免了可能明显和自然科学教义相冲突的命题。但是他们经常忽略经济学，并且忠于有关经济政策问题的站不住脚的理论。许多人坚持新重商主义，一种几乎无一例外地被当代政党和政府采纳的、并在所有大学教授的社会哲学。他们赞成重商主义的论点——一个国家的收益是其它国家的损失，除非其它国家受损，没有国家能受益。他们认为在国家之间存在不可调和的利益冲突。许多甚至大多数历史学家都从这个观点来解释一切事件。在他们的眼里，国家之间的暴力冲突是自然赋予的不可避免的敌对状态的必然结果。这种敌对状态不能够通过任何国际关系的协商得以消除。他们认为，那些提倡完全自由贸易的人、曼彻斯特或自由放任的自由主义者是不切实际的，没有看到自由贸易伤害了任何采取这一政策的国家的切身利益。

毫不奇怪，一般历史学家分享了他同时代人的这种谬误和误解。然而，并不是历史学家而是反经济学家提出了国际冲突的现代意识形态和侵略性的民族主义，历史学家只是采纳并应用了它。并非特别显著的是，他们在自己的著作里站在自己国家的立场上并且设法证明它的要求和主张是正当的。

历史书籍，特别是那些关于自己国家的历史论述，要比经济政策方面的小册子对普通读者更有吸引力。历史学家的读者要比贸易支付差额、外汇管制等一类问题的著作作者的读者要多。这说明了为什么历史学家经常被认为是我们时代好战精神复苏以及（作为其结果的）战争最主要的煽动者。而实际上，他们只是普及了伪经济学家的教义。

7. 历史与价值判断

历史的研究领域是行为以及指挥行为朝向一定目的的价值判断。历史涉及价值观，但是它本身并不评价。它从不受影响的观察者的角度来看待事件。当

然，这是客观思想和科学探索真理的特征性标志。真理是指什么是或者曾经是，不是一个既不是也不曾经是，但是会更符合真理寻求者愿望的事态。

在本书的第一部分就寻求绝对和永恒价值的无效性已有论证，这里无须冗述。在提供价值标准能超越凡人当时宣称并且又被其他凡人当时否认的个人判断方面，历史不比其它任何学科强。

有的作者断言，处理历史事实而不表达价值判断在逻辑上是不可能的。在他们看来，人们不进行一个又一个的价值判断就不能就这些事情发表任何相关意见。例如，如果人们处理压力集团或卖淫之类的现象，就必须意识到这些现象本身“可以说是价值判断构成的。”²⁴⁶现在，确实许多人使用“压力集团”这类的术语，并且几乎每个人以一种价值判断的方式使用“卖淫”这个术语。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这些术语所指的现象是价值判断构成的。Geoffrey May把卖淫定义为“为了利益上的动机，一种惯常的或间歇的或多或少随意的性结合职业”。一个压力集团是追求获得立法上对这个群体成员利益有利考虑的一个群体。不论在单纯使用这种术语或在提到这种现象时暗示什么，都没有价值判断存在。认为历史如果要避免价值判断的话就不能谈到残酷，这种观点是不对的。²⁴⁷《简明牛津辞典》对“残酷”的第一个解释是“对别人的痛苦冷漠或感到高兴”。²⁴⁸这个解释的客观性和不带任何价值判断，不逊于同一本辞典对虐待狂的解释“以嗜好残酷为标志的性变态”。²⁴⁹和一个精神病学家使用“虐待狂”这个词描述一个病人的情况一样，历史学家可以用“残酷”来描述一定的行为。可能会就什么产生痛苦和什么不会产生痛苦发生争论，或者在一个具体例子中是否痛苦的造成是因为它带给了行动者快乐或者其它原因。这些皆与确立的事实有关，而不是做出价值判断。

历史关于价值判断的中立性问题不能和试图伪造历史记录的问题混为一谈。一直有历史学家热心地把他们自己国家军队输掉的战争描述为胜利，并且为他们自己的人民、民族、政党或信念要求得到一切他们认为有价值的东西，而为他们开脱一切他们认为令人不快的东西。为公立学校准备的历史教科书以相当天真的狭隘和沙文主义为标志，我们无需思考这种无意义的事情。但是必须承认，即使对最尽职的历史学家避免做价值判断也可能带来一定的问题。

作为一个人以及一名公民，历史学家在许多他时代的争斗和冲突中是有立场（非公立）的。把历史研究中科学的冷漠和世俗利益的党派偏见结合统一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是那是能做到的，并且一些杰出的历史学家已经那样做了。历史学家的世界观可能会影响他的工作，他对事件的陈述可能会混杂出卖他的感情和愿望并且泄露他的党派倾向的评论。然而，如果研究的一般要点没有受到影响，对科学历史避免价值判断的假设并没有被偶尔表达出的历史学家偏好的评论损害。如果作者谈到他自己国家或党派的一名无能的军队指挥官，说此将军“不幸地”不能胜任自己的职责，他并没有辜负他作为历史学家的责任。只要他的遗憾不影响他对产生这种破坏性事件的报道，历史学家完全可以为古希腊艺术的杰作被毁坏而恸哭。

²⁴⁶Leo Strauss, *Natural Right and Histor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3), p. 53.

²⁴⁷Strauss, p. 52.

²⁴⁸3d ed., 1934, p. 273.

²⁴⁹Ibid., p. 1042.

“不带价值判断”的问题也应该与被选择用来解释事实的理论问题区分开来。在处理可用的资料时，历史学家需要其它学科，如逻辑、数学、人类行为学以及自然科学提供的全部知识。如果这些学科自身教授的知识有缺陷，或者如果历史学家从各专家持有的数个相冲突的理论中选择一个错误理论，那么他的努力将被误导，他的工作将失败。有可能他选择一个站不住脚的理论是因为他有偏见，并且这个理论最适合他所在政党的精神。但是，接受一个错误理论经常可能仅仅是无知的结果，或者它比更正确的理论得到了更多的支持者这一事实的结果。

历史学家中不同意见的主要源头在于，对所有作为基础来构建他们陈述的其它学科的教义上的分歧。在一个早期相信巫术、魔法以及魔鬼对人类事务的干涉的历史学家眼里，事物具有与在不可知论历史学家眼里不相同的一面。新重商主义的国际收支理论和美元短缺理论给出了一幅目前世界环境的图画，这幅图画和从现代主观主义经济学家的角度对环境检视给出的图画大不相同。

第十四章 历史学的认识论特色

1. 自然科学中的预言

自然科学有两种预言未来事件的模式：整体预言和统计预测。前一种说：*b*伴随*a*发生。后一种说：在所有例子中，*x%*的情况*b*伴随*a*发生；在 $(100 - x)\%$ 的情况下，非*b*伴随*a*发生。

这两种预言都不可以被称为是绝对的。两者都是建立在经验之上，经验必然是关于过去事件的。只有在“永恒统一在自然现象的连续与顺序中存在”这一假设的帮助下，它才能被用于预言未来事件。至于这个先验的假设，自然科学继续扩大归纳——从过去观察到的规律性推断在将来事件中有相同的规律性。

扩大归纳是自然科学的认识论基础。各种机器和装置均依照自然科学定理设计，并以一种预期的方式运行和工作，这一事实为相关理论和归纳方法都提供了实践上的证明。然而，这种证实同样也仅仅是针对过去的，它没有排除如果有一天，迄今为止不为我们所知的因素可能会产生使我们的知识和技术技巧完全混乱效果的可能性。哲学家必须承认凡人没有办法获得关于未来的确定知识。但是行为人没有任何理由重视自然科学逻辑和认识论上的不确定性。它们在人类不停歇的生命努力中提供了唯一可用的精神工具。它们证明了自己的实际价值。因为对人来说没有其它通向知识的途径，他没有选择的余地。如果他想要活下来并且让他的生命更惬意，他必须接受自然科学作为通向技术和治疗学成功的指导。他必须表现得好像自然科学的预言是真理一样，或许不是永恒的、无可动摇的真理，但至少是人类行为能计划规定的一段时间里是真理。

自然科学宣布他们发现的那种确信并不仅仅建立在这个好像上，它也来自主体间性²⁵⁰以及作为自然科学原料和它们推理出发点的经验的客观性。对外部物体的理解是这样的：在所有能够意识到它们的那些人当中，能够很容易地就理解的性质达成共识。在不能带来最终决定的指示器读数方面，不存在分歧。科学家可能在理论上存在分歧，但他们在被称为纯粹事实的确立方面从来没有持久地意见分歧过。至于某一物体是铜还是铁，或者它的重量是两磅还是五磅，这方面不会有争论。

如果认识不到关于归纳、真理以及数学概率演算的认识论讨论的重要性将是荒谬的。然而，这些哲学专题论文没有促进我们分析自然科学的认识论问题。关于自然科学，人类行为科学认识论必须牢记的是，它们的定理虽然从经验、也就是过去发生的事情中提炼而来，但是却一直被成功地用于设计未来行为。

2. 历史与预言

在逻辑方面，用于自然事件领域中最精细的调查程序和每个人日常生活的寻常逻辑没有什么区别。科学逻辑和任何个人借以在他行动前沉思或事后衡量

²⁵⁰intersubjectivity (主体间性) is something which is shared by two or more subjectivities. 参见 <http://en.wikipedia.org/wiki/Intersubjectivity>

它们效果的逻辑是相同的，只存在一个推理并且唯一被人类思维能够理解的逻辑。因此，只有一类自然科学可以经受得住对现实经验逻辑分析的批判检验。

就像只有一种逻辑思维的模式，只有一个对所有人都有效的人类行为学（并且，同样只有一个数学）。就像没有人类思维无法分辨的 A 和 $\neg A$ ，同样也没有区分不出手段和目的的人类行为。这个区分意味着人在作价值判断，也就是说，他喜欢 A 胜过喜欢 B 。

对自然科学，知识的界限是终极已知的确立，这意味着，一个无法追溯为它是其必然结果的另一事实的事实。对人类行为科学，终极已知是行为者的价值判断和产生这些价值判断的思想。

正是这一事实排除了使用自然科学方法解决人类行为问题的做法。在观察自然时，人们发现在物体对刺激的反应中存在一种不变的规律性。人们会根据它们的反应模式对事物进行分类。一个具体事物，例如铜，是其它同一类样本按照相同方式反应的某物。因为这个反应模式是已知的，所以工程师知道他预期的铜的将来反应是什么样的。这种预知，尽管有前面提到的认识论上的保留，被认为是绝对的。假如，只在一个例子中并且只在一个时刻这些反应的模式改变了，那么我们所有的科学和哲学、我们所有的文明马上就会遭到质疑。

区分人类行为科学的是如下事实：不存在这种关于个人价值判断的预知，不存在关于在这些价值判断影响下他们将追求的目的的预知，不存在关于他们为达到追求的目的而采用的手段的预知，也不存在关于他们行为的效果的预知，因为它们并非完全能被自然科学所传达的知识因素所决定。我们对这些事物略有所知，但是我们源于它们以及关于它们的知识，在范畴上不同于那种实验自然科学提供的关于自然事件的知识。我们可以把它称为历史知识，倘若这个术语不易于被曲解成只用于或主要用于阐明过去事件。然而它的最重要的用途是为预知未来条件以及为设计必然总是致力于影响未来条件的行为提供服务。

在一个国家的国内政治领域发生了某事，参议员 X ，一个绿党的显著人物，将会有什么反应？许多消息灵通人士可能对参议员的预期反应持有一个意见。或许这些意见中的一个将被证明是正确的。但是，也有可能他们中一个都不对，参议员以一种任何人都没有预见到的方式做出了反应。然后，在衡量参议员反应方式产生的效果时，又产生了一个相似的两难境界。这第二个困境不会像第一个那样被解决，参议员的反应一为人所知，第一个困境就得到了解决。而历史学家对某些行为产生的效果可能会争论数个世纪之久。

传统认识论唯一地关注自然科学的逻辑问题，并且甚至完全不知道人类行为学领域的存在，它只试图从偏狭教条的正统观点来处理这些问题。它指责所有非实验自然科学的科学为落后的。按照他们的说法，这些落后的科学还在忠实地使用过时的哲学和形而上学的愚蠢方法。它混淆了通俗表达中的历史及实际日常行为的可能性和数学概率演算中使用的可能性的概念。而最终，社会学出现了。它承诺从历史经验发展出一门较新的“社会学”的科学，以真正的科学替代历史学家的垃圾以及空洞的闲话。

这种对历史方法的轻视首先激起了狄尔泰、然后是文德尔班、李凯尔特、马克斯·韦伯、科若斯以及科林伍德的反对。但他们的解释在许多方面是令人不满意的。他们被历史主义许多方面的初级错误所迷惑。除了科林伍德之外，所有人完全没有认识到经济学的独特认识论特征。他们在提到心理学时也很模糊。前四个人还带有沙文主义偏见，这在泛德主义时代，甚至导致最杰出的德国思想家也贬低他们所称的西方哲学的教义。但是事实上，他们在阐明历史研

究认识论特征问题上相当成功。他们永远摧毁了那些因为历史是“历史”不是“社会物理学”而批评历史的认识论理论的威信。他们揭露了寻求历史变迁或历史生成归纳规律的无意义，不可能按照物理学家预言铜的反应那样的方式预言未来历史，他们使得历史有了自我意识。

3. 关于历史学的特殊理解

人类行为学，一门优先的人类行为科学，更明确地说，它迄今为止发展最完善的部分——经济学，在其领域提供了一个对所记录的过去事件的完美解释，以及对期待的一定类型未来行为的效果的完美预期。这种解释或预期都不能就行为者个人价值判断的实际内容和质量告诉人们任何东西。这两者的先决条件都是：个人价值判断和行动；并且他们的法则都是独立、并且不受这个价值判断和行动的特殊性所影响。这些特征代表了人类行为科学的终极知识，这也就是所谓的历史个性。

然而，在自然科学和人类行为领域的终极已知之间存在着重要的差异。一个自然的终极已知是、或者说暂时也就是在其他人的发现它是某个别的终极已知的必然结果之前，一个人类反思的停止点。它就是它的样子，这就是人能针对它所说的全部。

但是，人类行为的终极已知、个人价值判断以及它们导致的行为是不同的。它们是终极已知，因为它们不能追溯到把它们作为必然结果的另外的事物。倘若情况并非如此，它们也就不能被称为终极已知。但人类行为的终极已知，不像自然科学的终极已知，不是一个人类反思的停止点。它们是一种特别反思模式的开始点，也是对人类行为历史科学特殊理解的开始点。

如果实验者在实验室确立了一个事实，这个事实至少在当时不能追溯到另一个它可能作为派生物的事实，那么对这个问题探究就到此为止。如果我们面对一个价值判断以及作为其结果的行为，我们可以设法理解它们是如何在行为者的思维中产生的。

这种对人类行为的特殊理解就像每个人在他的人际关系以及行为中所做的那样，是一个不应该和自然科学以及个人在纯粹技术或者治疗活动中所用的任何逻辑方案混淆的精神程序。

这个特殊理解追求对其他人的行为的认知。它在回顾中问：他在做什么，他在追求什么？他追求这个特定的目的意味着什么？他的行为的结果是什么？或者针对未来询问类似的问题：他会选择什么目的？为了达到它们，他会做什么？他的行为的结果会是什么？

在实际生活中，这些问题很少被单独提到，它们通常都和其它涉及人类行为学或自然科学的问题联系在一起。认识论注定要促成的范畴的区别是我们智力运转的工具。真实事件是复杂现象，并且只有当每一个可利用的不同工具被用于恰当的目的时，思维才能领会它。

需要特殊理解的主要认识论问题是：一个人怎么能具有任何关于其他人的未来价值判断和行为的知识？处理这个问题的传统方法，一般被称为个性的另一面的问题，或“理解陌生或外来的事物”，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它把注意力放在领会其他人“目前”、或更确切的说，是过去行为的含义上面。但是每一个行为人所面临的任务在与他同伴的所有关系上并不涉及过去，它只涉及未来。去了解其他人的未来反映是行为人的首要任务。关于过去价值判断及行动的知识，虽然是不可缺少的，但只是为达到这个目的的一种手段。

很明显，这个给人提供某种程度上预见其他人未来态度的能力的知识，不是一种优先的知识。人类行为的优先学科——人类行为学，并不涉及价值判断的实际内容，而只涉及人的评价和随后根据他们的评价采取行动的事实。我们关于价值判断实际内容所知的东西都可以单纯地从经验中推导出来。我们有其他人过去价值判断及行为的经验，而且我们也有自己的价值判断及行为的经验。后者通常被称为反省。为了把它从实验心理学区分开来，在第一章提出了人文心理学这个术语²⁵¹来指称处理人类价值判断和思想的学科。

狄尔泰强调了人文心理学在精神或伦理科学，在处理人类思想、观点、价值判断、以及它们在外部世界运作的科学中的作用，当然他用的是心理学这个词。²⁵²追溯狄尔泰的观念到更早的作者那里不是我们的任务。毫无疑问，他从前辈那里获益甚多，尤其是从大卫·休谟那里。不过，对这些影响的检验应该留给研究哲学历史的专著。狄尔泰的主要贡献，是指出了他所提到的那类心理学在哪些方面同自然科学存在认识论和方法论上的区别，并因此也不同于实验心理学。

4. 人文心理学经验

人文心理学经验是指我们所知的关于人类价值判断、它们所决定的行为以及这些行为在其他人那里引起的反应。正如前面所提，这种经验来自于内省或与其他人的交流，来自我们在各种人际关系中的行动。

和所有的经验一样，人文心理学经验也必然是一种关于过去发生事物的知识。因为本书已经在前面部分充分澄清了这一理由，所以不能给它赋予自然科学赋予实验结果的那种意义。我们从人文心理学经验中学到的东西从来不具备自然科学里所称的一个实验方法确立的事实所具有的那种重要性。人文心理学是一个历史学科。

因为缺少任何更好的工具，如果我们想要预计其他人的未来态度和行为，就必须借助于人文心理学。从我们通过观察我们同伴以及与他们打交道过程中直接获取的，或通过读到、听到间接获取的一般人类行为学经验，以及我们在早先与相关个人或群体的接触中获得的特殊经验出发，我们设法对他们的未来行为形成一个看法。很容易看到，这种预计同一个工程师设计建造一座桥的计划的基本区别是什么。

人文心理学知道的无非是人被不同的天生本能、各种激情、以及不同的思想所驱使作预测的、个人设法剔除那些在考虑的具体例子中明显不起任何作用的因素。然后，他在剩余的那些因素中进行选择。

通常把这种预测描述为或多或少的可能，并且把它们和曾被称为是确定并且依然被认为是确定的自然科学的预测相比较，而不熟悉逻辑和认识论问题的人在进行着这种比较。先搁置那些后面的问题，我们必须强调关于未来人类行为的预测的可能性和涉及数学概率演算的概率范畴之间没有任何共同之处，前

²⁵¹参见第十二章 心理学和人文心理学 1 自然心理学和人文心理学

²⁵²See especially Dilthey, *Einleitung in die Geisteswissenschaften*, Leipzig, 1883. See also H. A. Hodges, *The Philosophy of Wilhelm Dilthey* (London, 1952), pp. 170 ff.

者是案例概率，而不是类别概率。²⁵³为了避免混淆，有必要把案例概率称为可能性。

在对未来事件的特殊理解中，通常两种次序的可能性需要确定。第一种指需要列举可能或已经对问题结果的出现产生影响的因素；第二种指这些因素中的每一个对结果出现的影响。很容易看到，正确和完全的列举运行因素的可能性大大高于把适当的参与程度归于每一个因素的可能性。然而，一个预测的正确与否取决于对这个后者的评价正确与否，预测的不确定性主要在于这第二个问题的复杂性。它不仅是预测未来事件中的一个使人相当为难的问题，同样也是历史学家反省中的难题。

对政治家、政客、将军或企业家来说，知道所有可能参与决定一个未来事件的因素是不够的。为了正确地预测，他们必须同样正确地预计，每个因素贡献的数量以及它的贡献生效的时刻。并且，以后历史学家在回顾中分析和理解这个案例时，将不得不面临相同的困难。

5. 现实型和理想型

自然科学把外部世界的事物按照它们对刺激的反应分类。因为铜是以一定方式反应的某物，所以铜这个名称不能用于以不同方式反应的另一个物体。通过确定了一个物体是铜这个事实，我们就可对它的未来行为做出预测：铜不可能是铁或氧。

在日常生活以及技术和治疗行动中，同样也在历史中，人们使用“现实型”概念，也就是根据完全可定义的特征区分人或制度的类别概念。这种分类可以用人类行为学、经济学、法学、技术以及自然科学的概念为基础。例如，它既可以用一个特定区域的居民，也可以用被赋予特殊法律特征——即意大利国籍，或者一个特定的语言群体来指意大利人。这种类型的分类是独立于特殊理解的。它指向所有这个类别的成员共同的某事物。从术语的地理意义上说，所有的意大利人都受涉及他们国家的地理或气象事件的影响。所有的意大利公民与涉及到他们国籍的人的法律行为有关。从术语的语言意义上说，所有意大利人都能够彼此互相理解。一个人符合这三个内涵之一被称为意大利人时，其中的意义也就是如此。

另一方面，一个“理想型”的特征标志是它暗示了某个涉及评价和行动的命题。如果一个理想型指人，它意味着在某个方面这些人以一种统一或相似的方式评价并行动。当它意指制度时，意味着这些制度是统一或相似评价与行动方式的产物，或者它们以一种统一或相似的方式影响评价和行动。

理想型是在理解事件进程的一定模式的基础上构建并使用的，无论是为了预测未来或是为了分析过去。在涉及美国选举时，人们提到意大利人的选票，含意是指意大利血统选民的投票在某种程度上受到他们出身的影响。很难否认这样的一个群体的选民的存在，但是，人们在两个问题上分歧很大——这一群体的公民数量和多大程度上他们的投票是被他们的意大利意识形态所决定。正是这种关于相关意识形态的力量不确定，这种无法找出并测量它对这个群体的个人成员的思想带来的影响，才刻画出了理想型的特点，并由此把它和现实型区分开。理想型是一个理解的概念上的工具，它提供的服务完全取决于一

²⁵³参见第五章 决定论及其批评者 6决定论与统计学

定理解模式的易服务性。理想型不能同道德或政治上“应该”的类型混淆，后者我们可以称之为“应该型”。马克思主义者主张所有的无产阶级必须以一种特定的方式行动，纳粹也对所有德国人做出了类似的声明。但是这两者都无法否认他们的宣言作为一个关于“什么是的命题”是站不住脚的，因为有偏离这些党派分别所称的无产阶级的和德国人的行为模式的无产阶级和德国人存在。在宣布他们的权威声明时，他们真正所想的是一个道德上的义务。他们的意思是：每一个无产阶级应该按照党的纲领和它的法定解释者宣布的无产阶级的方式行动；每一个德国人应该按照民族党认为的纯正德国的方式行动。那些没有按照规定做的无产阶级或德国人被打上了叛徒的标记。应该型是属于伦理学和政治学的术语，不属于人类行为科学认识论。

此外，还必须把理想型和具有相同名称的组织区分开。在研究十九世纪法国史时，我们经常会遇到提及耶稣会士和共济会的情况。这些术语可能是指这些名字的组织的行为。例如，“耶稣会的修道会开了一所新学校”或者“共济会分会为救济经受火灾的人们捐赠了一笔钱。”或者他们所指的是理想型，指这些组织的成员以及他们的朋友在一定的方面按照一定的耶稣会或共济会意识形态的影响行动。一场被修道会或共济会分会组织、指挥以及资助之类政治运动，同那些在修道会或共济会分会被视为典型代表的意识形态的鼓动下的行动是有区别的。第一个命题不涉及到特殊理解，它只与能通过研究纪录以及听取证词被确认或否认的事实有关。第二个断言是关于理解的，为了形成一个关于它的适当性或不当性的判断，人们必须分析思想与理论以及它们对行动和事件的影响。分析马克思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对我们当代人思想状况和行为的影响，研究不同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政府政党以及阴谋集团的行为，这两者之间存在方法上的基本区别。²⁵⁴

一定的理想型为行为人努力预计未来事件以及历史学家分析过去提供服务，它取决于导致构建理想型的特殊理解。要质疑一个理想型解释一个特定问题的有效性，人们必须批评涉及的理解模式。

在涉及拉丁美洲的情况时，理想型“将军”可能会有些用处。一直具有特定意识形态的潮流在某些方面决定了一些（不是全部）在政治中变得重要的军队领导人扮演的角色。在法国，流行的思想也或多或少地决定了将军们在政治中的位置以及卡芬雅克、麦克马洪、布朗热、贝当以及戴高乐这些人的角色。但是在美国，使用一个政治家将军或政治中的将军的理想型没有任何意义。没有美国意识形态会把军队当作一个不同于并且对立“平民”人口的独立实体。因此，军队中不存在政治的团体精神，它的领导在“公民”中也没有独裁威信。当了总统的将军不仅在法律上而且在政治上都不再是军队的一员。

²⁵⁴在作为一个有组织实体的共产党或一个共产主义政党与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之间是有区别的。在涉及当代历史及政治时，人们往往不能认识到许多人并不是一个政党组织的成员——“登记的”或交会费的成员——也可能，不论是完全地或在一定程度上地，受到这个政党意识形态的影响。特别是在衡量共产主义思想的支持者或德国纳粹的支持者或意大利法西斯的支持者时，这种错误会导致严重的混乱。此外，有必要认识到，有时一种意识形态也会影响那些自认为完全不受它影响的人或那些甚至认为自己是它的死敌并一直在与之激励斗争的人的思想。纳粹在1933年的成功归因于以下事实：在纳粹自己采纳社会主义纲要的基本原则的同时，绝大多数德国人，甚至那些给马克思主义政党、天主教枢机党以及各种“资产阶级”小派别政党投票的人都忠于激进的侵略性民族主义。如果保守党（更不用说“自由党”）没有实际上认可社会主义思想。英国也不会走社会主义道路。

提到理想型，过去的历史学家以及未来的历史学家，也就是行为学人应该永远不会忘记在自然科学对象的反应和人的反应之间存在基本的区别。人们正是希望这一区别能在谈到思维和物质、自由和意志，以及个性的敌对时带来缓解。理想型可以轻易地简化使人迷惑的多种多样的人类事务的处理。在使用它们时，必须警惕任何一类简化带来的缺陷。

人类生活与行为的丰富多彩和复杂多变是概念和定义无法完全捕捉的。总有一些未被回答或甚至无法回答的问题，有些问题的答案超越了即使是最伟大的大脑的能力极限。

第四部分 历史的进程

第十五章 历史的哲学解释

1. 历史哲学和历史的哲学解释

绝不能把给历史提供一个哲学解释的尝试和任何形形色色的历史哲学系统相混淆。这种尝试并不在于致力发现人类历史进程正走向的目标。它们设法引入在决定历史事件进程中发挥重大作用的缓和因素。它们涉及个人以及群体追求的目的，但是它们避免就目的和历史进程整体的意义或一个人类预定的命运发表任何意见。它们不依赖直觉而是依赖对历史的研究，并且设法通过引证历史事实来证明它们解释的正确性。在这个意义上，它们可以被称为是分析论证的和科学的。

介入关于某一流派的历史哲学优缺点的讨论是无意义的，一种历史哲学必须被整体接受或整体摒弃。逻辑理由或事实引证既不能用于对历史哲学的辩护，也不能用在对其的驳斥中。没有推理问题与之相关，有关的仅仅是相信或不相信。有可能在数年内整个地球都会屈从于社会主义，即使这种情况发生了，也绝不是对马克思主义那一类历史哲学的确证。社会主义不会是“符合无情的自然法则”、“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规律的产物，它恰恰是钻入人们头脑中的思想和多数人分享的信念的产物——对他们而言，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对人们更有益。

历史的哲学解释会被政治宣传滥用。然而，要把一个理论的科学核心和它的政治改编和变型分开是不困难的。

2. 环境主义

环境主义是一种把历史变迁解释为人们生活环境产物的理论。这个理论有两个不同的分支：物理或地理环境主义和社会或文化环境主义。

前一理论断言，人们文化的本质特征是地理因素造成的，物理、地理以及气候条件和一个地区的动植物群落决定这个地区居民的思想行为。在他们理论的最极端的陈述中，人类地理学作者热心地把种族、国家以及文化之间的所有差异都追溯为人们所处的自然环境的作用。

这个解释的内在误解在于，它把地理视为积极的因素而把人类行为视为消极的因素。然而，地理环境只是人随着出生被带入的环境的一个组成部分；环境使人感到无所适从、并促使他尽可能地用他的理智和身体力量去消除这种不安感。地理环境一方面提供行动的刺激，另一方面，它既能提供在行动中利用的手段，也给人类的改良努力设定了不可逾越的限制。它提供刺激而不是反应。地理环境提出了任务，而人不得不找到解决的办法。人生活在一定的地理环境中，并被迫根据这个环境的条件来调整他的行为。但是，他调整自我的方式，他采取的社会方法、技术的以及道德的调整手段，不是被外界物理因素决定的。北美大陆既没有产生印第安土著的文明，也没有产生欧洲血统美国人的文明。

人类行为是人对生活条件施加的刺激做出的有意识的反应。因为他所生活的和激起他行动的环境因素在全球不同区域各不相同，所以文明中也存在地理

的差异。荷兰渔夫的木鞋对瑞士山区人没有用处。皮大衣在加拿大是实用的，但是在塔希提岛就没那么重要了。

社会和文化环境主义的理论仅仅强调人类文明必然地存在连贯性这一事实。正成长的一代人并没有从根本上创造一个新的文明，他们只是进入了前辈们已经创造的社会文化环境中。个人生来就初在一个被地理、历史、社会制度、道德观念以及意识形态所决定的特定的历史日期。他每天必须面对由他同时代人的行为引起的这个传统环境结构的改变。他并不只是简单地活在世上，他生活在一个划定了界限的环境中。在他的行为中，他既被这个环境所特有的一切促进，也被牵制。但是人不被环境决定。

环境主义理论所包含的合理性在于，认识到了每个人都生活在一定的时期、一定的地理空间，并在这个环境决定的条件之下行动。环境决定了人所处的形势但不决定人的反应。对相同的形势，会有不同的可以想得到的并且可行的反应模式。选择其中的哪一种则取决于人们的个性特点。

3. 平等主义对历史的解释

绝大多数生物学家认为人只有一个种类。所有民族的人都可以彼此通婚，并且生产具有繁衍后代能力的子女²⁵⁵，这一事实被当作人类在动物学上的统一性的证据。然而，在智人种类下存在许多变种，这使得区分亚种或种族成为必要。

在不同的种族成员间存在相当大的身体差异。在相同种族、亚种族、部落或家庭，甚至兄弟姐妹，以及非同卵孪生子成员之间也存在显著的、但不那么重要的差异。每个人从出生起就已经在身体上不同于所有的其他样本，他的不同是通过自己的个人特征塑造的。但是无论这些差异如何巨大，它们并不影响人类思维的逻辑结构。那些提出“不同种族的逻辑和思维是范畴上相异的”这一论题的不同思想学派，连最细微的证据都拿不出来。

在科学地对待个人间的天生差异以及他们在生物和生理遗传上的差异问题上，政治偏见一直在粗暴地干涉和扭曲人们的观点。行动主义心理学主张，人之间的所有心理特征差异是环境因素造成的，它否认所有身体施加给精神活动的影响。它认为通过使人类生活的外部及教育条件相等，可以消除个人间的所有文化差异，无论他们的种族或家庭从属关系是什么。观察结果与这些断言相抵触。这表明在身体结构和精神特征之间存在某种程度的相关性。个人从他的父母那里继承、并且从他的父母的祖先那里间接继承的，不仅有他身体的特殊生物学特征，而且也还有一个限定他的精神成就和他人格的精神力量的构造。有些人天生被赋予某些类型活动的的能力，而另一些人则完全缺乏这种天赋或较少地拥有它。

行为主义理论被用于支持平等主义变种的社会主义纲领。平等主义社会主义攻击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古典自由主义原则。在它看来，存在于市场经济的收入和财富的不平等是在它们的源头上，并且它们的社会重要性同那些存在于身分社会的不平等没有区别。不平等是篡夺和侵占的结果，是独裁暴力带来的对大众的剥削的结果。这个暴力的受益者组成了一个统治阶级，国家作为其工具强制地镇压被剥削者。把“资本家”从“普通人”中区分出来的，是因为他加入了这个肆无忌惮的剥削团伙。成为一个资本家唯一品质要求的是邪恶。列

²⁵⁵ 生物学上许多不同种的动植物都可以杂交产生后代，但是这种后代一般不具有繁衍后代的能力。

宁说，资本家的工作就是记账、控制生产和分配，以及这些已经“被资本主义简单化到极点，以至于它们已经成了监视、记录、以及发收据的非常简单的操作，任何一个能读写并且知道算术的头四项定律的人都可以胜任”的事情。²⁵⁶因此，和工业革命前夕贵族地主的身份特权相比，“资本家”的“财产特权”是同样不必要的，因此也是寄生性的。通过建立了一个欺骗性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以及保留了所有特权中最不公平的私有制，资产阶级愚弄了轻信的人民并抢夺了革命果实。

这个理论已经在一些早期作者的作品里隐约地出现过，被卢梭和巴贝夫推广普及，又被转化成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理论，用于从篡夺的观点来解释整个人类历史进程。在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的背景里，身份和阶级区分的出现是一个必然，也是物质生产力发展不可避免的历史结果。统治阶层和阶级的成员对压迫和剥削行为并不承担个人责任，他们在道德上并不低于那些被他们奴役的人。他们只是被神秘的命运挑选执行一个社会上、经济上以及历史上必然任务的人而已。因为物质生产力的状态决定每个人在完成历史进程中的角色，他们的角色就是完成他们既定的使命。

但是，在马克思和恩格斯涉及他们时代历史问题或政治问题的那些著述中，对人类事务的进步有着相当不同的描写。那里，他们无保留地支持关于“剥削者”天生道德败坏的流行理论。人类历史看起来是一个从原始村落社会的幸福环境开始，逐步被自私个人的贪婪破坏，道德逐渐败坏的进程。土地的私人拥有是原罪，它逐步带来了所有折磨人类的灾难。仅仅是邪恶才使一个“剥削者”提升到比他同胞高的地位。在三卷《资本论》里，不择手段是提到的“剥削者”要求具有的唯一品质。被马克思视为实现社会主义的先决条件的技术进步和财富积累，也被描述为神奇物质生产力自然发展的结果。“资本家”没有因这些成就得到任何好评，这些恶棍所作的就是剥削那些有权利获得物质生产力运作成果的人。他们为自己窃取了“剩余价值”，他们仅仅是寄生虫，人类可以不需要他们。

这个平等主义观点的历史解释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官方哲学。它假定一个自动的历史发展程序，会趋向改进生产技术方法、积累财富并且提供提高大众生活标准的手段。回顾西方资本主义在过去的一两个世纪的发展，统计学家看到了一个生产力上升的趋势，于是高兴地猜测这个趋势将会继续下去。在他们看来，历史发展的趋势是高于人类行为的事物，是一种“科学”地建立的不被人和社会制度影响的事实。因此旨在最终消除诸如收入和财富不平等的当代的税收立法制度，不会对社会造成任何伤害。

平等主义的理论明显和生物学以及历史确立的所有事实相违背。只有这个理论狂热的党羽才会认为天才和笨蛋之间的差别是完全由后天的影响造成的。假定文明、发展和进步发源于某种神秘因素——在马克思哲学中，这种神秘因素是物质生产力的作用，这种神秘因素以某些观点在人的大脑中同时持续产生的方式塑造着人类思想，这是一个荒谬的神化。

有许多关于人与人之间不存在差别的空谈。但是从来没有按照平等主义原则来组织社会的任何一种尝试。平等主义小册子的作者与平等主义党派的领导用他们的行为否定了他们空谈的原则。平等主义信条所起的历史作用，是替最卑劣的专制压迫形式作掩饰。在苏维埃俄国，平等主义被宣称是官方主要信条

²⁵⁶ Lenin, *State and Revolution*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1932), pp. 83 f.

之一。但是，列宁死后被神化，而斯大林在世时，就受到了自罗马帝国衰退之后从没有一个统治者受到过的崇拜。

平等主义的神化没有解释过去历史的进程，他们无法分析经济问题，并且在计划未来的政治行动中也没有作用。

4. 历史的种族解释

不同种族发展的文明是不同的，这是一个历史事实。在早期，无需尝试区分高级和低级文明就可能确立这一事实。人们可以声称，每一个民族都发展了符合它的愿望、需求以及理想的文化。民族的特征在它的成就中找到了合适的表达。一个民族可能会模仿其它民族发展的成就和制度，但是它并不想完全抛弃它自己的文化模式而以一个进口的外来制度来取代它。如果在两千年前，希腊罗马人和中国人彼此都知道了对方的文明，这两个民族可能都不会承认对方文明的优越性。

但是我们的时代就不同了。非白种人可能会仇恨和鄙视白人，他们可能会密谋破坏并乐于对自己的文明作夸大的赞扬。但是，他们渴望西方的物质文明、科学、技术、治疗手段、行政以及工业管理的方法。许多他们的发言人宣称，他们只想要模仿西方的物质文化，并且只想在不和他们本土的意识形态相冲突或危及他们宗教信仰及习惯的限度内模仿。他们没有看到，接受被他们贬称为单纯的西方物质成就和保存他们的传统习俗、禁忌以及他们惯有的生活方式是互相冲突的。他们沉浸在幻想之中，以为他们的民族可以借鉴西方的技术而获得更高的生活水平，却不用首先经历一场剥离他们祖先传下来的世界观和习俗的“文化战争”。社会主义理论使他们更加确信这一错误，因为社会主义理论也没能认识到西方的物质和技术成就是理性主义、个人主义以及功利主义哲学的产物，并且如果集体主义和极权主义原则用社会主义替代了资本主义，这些成就就都会消失。

无论人们怎样评价西方文明，事实上所有的民族总是带着嫉妒看待其成就，他们想要复制它们，并因此含蓄地承认了它的优越性。正是这种状态产生了关于种族差异的现代理论及其政治衍生物——种族歧视。这种种族差异的理论认为一些种族在追求那些所有人共同的目标上比另一些种族更优秀。所有人都要抵抗不利于保存他们生命、健康和福利的因素的作用。不可否认的是，现代西方资本主义在这些努力中做得最为成功。它空前地延长了人们的平均寿命并提高了生活水平。它使得那些在过去每个地方、并且如今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之外仍然是只为极少数人有权接触的人类高级成就——哲学、科学、艺术开始向平民开放。抱怨者可能会谴责西方文明的物质中心主义并可能断言它只满足了一小撮粗俗的剥削者。但是他们的哀叹不能抹杀事实，数百万的母亲因为婴儿死亡率的下降而更幸福。饥荒消失了，传染病得到了抑制。普通人享有比他们的祖先或他们非资本主义国家的同时代的人更令人满意的生活条件。并且，一种实际上使每个人都能享受到由杰出大师指挥的交响乐团演奏的贝多芬交响曲的文明，不应该被当作一种纯粹的物质文明而遭到摒弃。

某些种族比其它种族在文明的发展上更成功，这是一个无可辩驳的关于历史经验的陈述。作为一个对过去发生的事情的摘要，它完全可以断言现代文明是白人的成就。然而，这一事实的确立，既不能证明白人在人种上的自大是正确的，也不能为种族歧视辩护。

许多人以他们的祖先或亲戚取得的成就为骄傲。知道他们属于一个在过去曾取得杰出成就的家庭、宗族、国家或种族，能给一些人一种特别的满足。但是这种无害的虚荣很容易转变成对那些不属于同一杰出群体的人的轻蔑，并试图羞辱、凌辱他们。那些在和有色人种接触中表现傲慢狂妄的西方国家的外交家、士兵、官僚和商人没有任何资格吹嘘西方文明的功绩。他们并不是这种文化的制造者，他们的行为反而败坏了这种文化。“本地人与狗禁止入内”这种标志中所包含的傲慢毒害了未来时代的民族关系。不过，我们在分析种族理论中不需要涉及这些可悲的事实。

历史经验证明了这一宣言：在过去，一些白种人的分支发展了一种超越其它种族成员的文明。但它并没有证明任何关于未来的陈述，也不允许我们假设白种人血统的这一优越性将会在未来延续下去。从历史经验里，不能作出任何能和自然科学在实验室实验确立的事实基础上，作出的概率预测相类似的可能性预言。在1760年，如果一个历史学家宣称，西方文明的主要成就是拉丁文的，并且英国和德国没有做出什么贡献，他可能还是正确的。在那时候，认为德国科学、艺术、文学、哲学以及技术和其它一些国家的成就相比还微不足道是允许的。人们完全可以说，那些在这些领域取得杰出成就的德国人，其中最重要的有天文学家哥白尼²⁵⁷、开普勒以及哲学家莱布尼茨。只是因为他们的完全吸收了非德国人的成就才能取得成功，因此他们在智力上并不属于德国，并且他们在很长时间内没有德国追随者，而那些首先认识到他们理论的重要性的人大多数也是非德国人。但是，如果有人根据这些事实推断德国在文化上是劣等的，并且在未来应该远远排列于法国和英国之后，则他的结论将会被以后的历史证伪。

这些今天被视为文化上落后人种未来行为的预言只能由生物学来作出。如果生物学发现了非白人种族成员某些解剖学特征抑制了他们的智力能力，人们才能斗胆做出一个预言。但是至今，生物学没有发现任何这种特征。

本书的任务不是研究种族理论的生物问题。因此应该避免对种族纯洁和种族通婚等引起争议问题的分析。同样，调查种族主义政治纲领的优点也不是我们的任务。本书只涉及人类行为学和经济学。

所有在历史经验上就种族问题能说的可以归结为两点。第一，人类不同生物种类的主要区别在群体成员的文明成就上得以反映；第二，在我们这个时代，某些白人种族分支取得的主要文明成就，被绝大多数其他种族成员视为比他们这些种族成员各自取得的标志性文明要更吸引人。

5. 西方文明的世俗主义

一个有关现代文明的、几乎被普遍接受的解释区分了精神和物质方面。这种区分是可疑的，因为它不是源自对事实的冷静思考，而是来自于怨恨。每个种族、国家或语言群体吹嘘它的成员在精神方面的成就，而于此同时承认它物质方面的落后。它假定在文明的这两个方面没有什么联系，而精神方面比“单纯”的物质更崇高、更值得，更应该被赞扬，并且对物质进步的关注将会阻止一个民族对精神事物投入更多的注意力。

²⁵⁷ We need not go into the question whether Copernicus was a German or a Pole. See Mises, *Omnipotent Government*, p. 15.

这些都是十九世纪那些急于在他们的国家复制西方成就的东方民族领导人的观点。对西方文明的研究使他们下意识地轻视他们本土的制度和意识形态，并使他们感到自卑。他们依靠那些把西方文明贬低为纯粹物质主义的理论来重新取得心理平衡。那些渴望西方资本建造的铁路和工厂的罗马尼亚人和土耳其人，通过提高他们自己国家的精神文化来自我安慰。当然，印度人和中国人更有理由夸耀他们祖先的文学和艺术。不过，他们似乎从来没有想到，曾经在哲学和诗歌上创造辉煌的他们的前辈同他们之间已经相隔了几百年。并且，在这些著名祖先的时代，他们的国家在物质文明上并不亚于（如果不是领先的话）任何同时代的国家。

在近几年里，把西方文明贬低为纯粹的物质主义的理论，几乎被产生这个文明的所有国家一致接受了。它使得欧洲人在比较美国的经济繁荣和他们自己国家的当前状况时感到安慰。它在美国社会主义者把美国资本主义描述成人类的祸根的努力中，充当了一个主要论据。社会主义者极不情愿地承认了资本主义给人民带来了丰富的物质成就，因为马克思预言的大众日益严重的贫困被事实雄辩地证伪了，他们又设法通过把当代文明描述为一种纯粹的物质主义和欺诈来挽救他们对资本主义的诋毁。

一些自以为在从事宗教事业的作者发起了对现代文明的恶意攻击。他们严厉斥责我们时代的世俗主义，他们哀叹一种生活方式的逝去。从前，他们可以使我们有信仰，我们不会专注于追求世俗的野心，而是把严格地履行宗教责任放在首位。他们把所有的罪恶归于怀疑主义和不可知论的传播，并热情地倡导回归到久已逝去的正统时代。

很难找到一种比这个反世俗主义更彻底地歪曲历史的理论。总有一些虔诚的人，内心纯洁，献身于一种值得嘉许的生活。但是这些真诚信徒的虔诚与确立的信仰体系之间没有任何共同之处。关于在现代个人主义哲学和现代资本主义之前的时代，政治和社会制度充满了真正的基督教精神的说法只是一个神话。福音书的教导没有决定政府对宗教的官方态度。相反，是那些现世统治者——独裁国王和贵族寡头，但有时也有造反的农民和城镇暴民——把宗教转变成一种衰落的实现政治抱负的工具。

对于真正的信仰，没有什么比对异议者无情的迫害、宗教圣战及战争的恐怖更加不相容的了。从来没有一个历史学家否认，在十六世纪受宗教改革神学家批评的教会和十八世纪启蒙运动哲学家攻击的教会里基本找不到基督精神的存在。

开创了现代资本主义的个人主义和功利主义意识形态同时也给人们的信仰渴望带来了自由。它粉碎了当权者用以强加自己的信条予他们臣民的借口。信仰不再是通过治安官和刽子手来强制执行的对信条的遵守。它是一个人在自己良心的指引下自发信奉为自己信念的东西。现代西方文明是现世的，但是，正是它的世俗主义，及在宗教上的不关心，才给了真正的宗教感情自由表达的机会。那些今天在自由国家里，敬神的人不是受世俗权利的驱使，而是被自己良心的感动。为和他们信仰的规则一致，他们无意于逃避世俗权力的惩罚，而决心寻求救赎与内心的安宁。

6. 反世俗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摒弃

反世俗主义拥护者对现代生活方式的敌意，可从他们把资本主义批评成一种不公正的制度中得到证明。在社会主义者以及干涉主义者看来，市场经济阻

止了技术成就的充分利用，并因此妨碍了生产的发展，限制了生产的商品以及可供消费商品的数量。在早期，这些资本主义的批评家并不否认：在所有人中平均分配社会产品，将很难给大多数人的物质条件带来改善。在他们的计划中，平均分配处于次要地位。他们认为，他们许诺给所有人的繁荣和物质的极大丰富，将来自于从所谓资本家自私的桎梏中解放出来的生产力。他们建议的改革的目的，是用一种更有效率的生产制度代替资本主义，并因而开创一个所有人都有丰富的财产的新时代。

而今，既然经济分析粉碎了社会主义和干涉主义对资本主义谴责的错误观点和谬误，他们又设法用另一种手段来挽救他们的纲领。马克思主义者提出了社会主义不可避免性的理论，而干涉主义者则步他们的后尘，鼓吹倾向政府对经济越来越多地干涉这种不可逆转的趋势。很显然，这些拼凑之物的目的，仅仅是为了掩饰他们理性上的失败，并且为了把公众的注意力从社会主义政策和干涉主义政策的灾难性后果上转移到其它的地方。

类似的动机也促使了那些为了伦理和宗教原因而提倡社会主义和干涉主义的人。他们认为审查涉及到的经济问题是多余的，并且他们设法把对市场经济优缺点的讨论，从经济分析领域转移到他们所称的一个更高的层面。他们把资本主义作为一种不公正的制度加以拒绝，并把社会主义或干涉主义作为一种和伦理或宗教原则相符合的制度加以提倡。他们说，用一种生产率、利润以及对福利的物质关切和物质产品的丰富供应的观点来看待人类事务是可耻的，人应该为正义奋斗而不是为了财富。

倘若这种论证模式公开给贫困赋予一种内在的伦理价值，并且完全谴责任何在单纯的生存水平之上提高生活标准的努力，那么它在逻辑上才是连贯一致的。科学不能反对这种价值判断，因为价值判断是作出判断的个人的终极选择。但是，那些从伦理和宗教角度来拒绝资本主义的人并非喜欢贫穷胜于喜欢富裕。相反，他们告诉他们的追随者，他们想要提高人们的物质福利。他们把资本主义不给大众提供（他们相信的）社会主义或干涉主义能提供的那种程度的富裕视为它的主要缺陷。他们对资本主义的谴责以及他们对社会改革的建议暗示了一个命题，也就是社会主义或干涉主义将会提高、而不是降低普通人的生活标准。因此，这些资本主义的批评者们懒得去审查一下经济学家提出来批驳他们的理由，就完全支持社会主义者和干涉主义者的教条了。他们发现，马克思社会主义者和干涉主义世俗政党原则的唯一缺点就是他们对无神论或世俗主义的投入。

很明显，物质福利是在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或者干涉主义制度下才能得到最大的发展，这个问题只能通过对每一种制度运作的详细分析才能下定论。而这正是经济学所作的工作。因此，研究这些问题而不充分考虑经济学的意见是没有道理的。

假如伦理和信仰告诉人们，他们应该更好地利用资本主义带来的富裕，假如它们设法劝导信徒用更好的消费方式代替大吃、大喝以及赌博的恶习，假如它们谴责撒谎和作弊，并且赞扬纯洁的家庭关系和对贫困人的慈善中蕴含的道德观，则这些都是合理的。但是，谴责一种社会制度并推荐另一种制度，而又没有完全研究这两种制度的经济后果是不负责任的。

在任何伦理理论或任何以十诫为基础信条的教义中，都找不到可以证明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谴责正当的理由，正是这种制度使资本主义国家人口倍增，并为大众提供了人类历史上最高的生活标准。从宗教的观点看，婴儿死亡率的

下降，平均寿命的延长，对瘟疫和疾病的有效对抗，饥荒、文盲以及迷信的消失，同样也做出了对资本主义有利的证明。教会为经济落后国家大众的贫困而哀叹是正确的。但是，当他们认为除了无条件地采纳大公司追求利润的制度，也就是满足多数人需求的大规模生产之外还有其它的途径可以消除这些可怜人的贫困时，就大错特错了。

一个负责任的伦理学家或牧师在充分熟悉有关物理、化学以及生理学之前，不会考虑介入到技术或治疗方法的争论之中。然而他们中的许多人认为在经济学上的无知并不妨碍处理经济问题。他们甚至还以无知为荣。他们认为，社会经济组织的问题应该被唯一地从一种预想的公正的观点来看待，而不应该考虑他们所称的“卑劣的”物质主义相对舒适生活的利害关系。他们推荐一些政策，拒绝另一些政策，并且从来不屑于考虑若采纳他们的建议所必然产生的后果。

这种对政策后果的忽略，无论是被拒绝的政策还是受推荐的政策都是荒谬的。因为反资本主义的伦理学家和基督教支持者，并不是从纯粹的幻想出发关心社会经济组织。他们寻求对现有状况的改革，是因为他们想取得一定的效果。他们所称的资本主义的不公平，是它导致了普遍贫困和匮乏的所谓事实。他们倡导改革，照他们所想，改革会消除贫困和匮乏。因此，从他们自己的价值判断和他们自己急于达到目标的角度看来，他们在仅仅提到他们称为更高标准的公正和道德、以及忽视对资本主义和反资本主义两者政策的分析上是自相矛盾的。他们所称的不公正的资本主义和反资本主义的措施，只是很武断的术语而已，因为它们和这些经济政策的效果完全没有关系。

事实上，那些把资本主义作为一种与伦理和信仰原则相对立的制度来批判的人，不加鉴别地轻松地接受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全部经济教条。和马克思主义者一样，他们把所有的罪恶——经济危机、失业、贫困、犯罪以及许多其它不幸，都归因于资本主义制度的运行，并把每一件令人满意的事物——在资本主义国家更高的生活标准、技术进步、死亡率下降等等都归给政府和工会的作用。他们无意中支持了所有的马克思主义原则——仅仅是出于偶然，不包括它的无神论。哲学伦理和宗教向反资本主义教条的归降，是社会主义和干涉主义宣传的最大胜利。它注定使哲学伦理和宗教堕落为寻求毁灭西方文明势力的纯粹附庸。伦理学家和宗教人士把资本主义称为不公平的，并且宣称废除资本主义将建立起公正，这为社会主义和干涉主义的事业提供了一个无比宝贵的支持，并把他们从无法用分析推理来反驳经济学家对他们计划的批评这个最大的困境中解脱出来。

必须重申，按照哲学伦理或基督信条原则，我们没有理由将一个成功地提高了社会全体成员物质条件的经济制度驳斥为“本质上是不公正的”，却冠以另一种必将传播贫困和饥饿的制度以“公正”的称号。评价任何经济制度必须仔细分析它给人民福利带来的效果，而不是仅借助一个不考虑这些效果的武断的关于公正的概念来进行。

第十六章 当今趋势和未来

1. 自由趋势的逆转

自十七世纪以来，哲学家在研究历史的本质内容时开始强调自由和奴役的问题。他们对这两者的概念相当模糊，主要是从古希腊政治哲学借鉴而来，并且受到对日耳曼部落情况的流行解释的影响，那些部落的入侵毁灭了罗马西方帝国。在这些思想家看来，自由是人类的初始状态，而君主统治只是在人类历史进程的晚期才出现。在扫罗王权开始的圣经故事中²⁵⁸，他们找到了理论的依据，也找到了对王权政府特征标志相当反感的描述。他们断定，历史发展剥夺了人不可剥夺的自由的权力。

启蒙运动的哲学家几乎一致否认世袭王权的主张，并且推荐共和制的政府。王室警察迫使他们在表达观点时比较谨慎，但是大众还是能体会到他们的言外之意。在美国和法国革命前夕，君主制在人们心中已经丧失了传统的地位。英国，这个当时世界上最富有最强大的国家享有的巨大威望，暗示了在两种不可调和的政府原则之间的妥协，它在大不列颠联合王国运行得相当令人满意。但是欧洲大陆的土生王朝并没有打算默默地退缩到一个单纯的无实权的礼仪性地位，就像大不列颠的外来王朝最终接受的那样，虽然是在进行了一些抵抗之后。他们因为鄙视尚博尔伯爵²⁵⁹所称的“革命的合法国王”的角色而失去了王位。

本世纪末，在自由主义的鼎盛时期，认为倾向民治政府的趋势是不可抵抗的这种观点占据了主流。即使是那些提倡恢复君主专制、贵族身份特权以及审查制度的保守派也或多或少地确信，他们在为注定要失败的事业而奋斗。黑格尔，这个普鲁士专制主义的拥护者，发现通过把历史定义成“自由意识的进步”来为普遍接受的哲学理论耍耍嘴皮子是有好处的。

但是之后，一代新人出现了，他们否定所有的自由运动理想，像黑格尔一样，他们毫不掩饰对“自由”这个词虚伪地尊敬背后的真实意图。穆勒（John Stuart Mill）虽然同情这些自称的社会改革者的原则，但还是把他们——尤其是康德的计划打上了破坏自由的标志。在这些新极端分子的眼里，人类最邪恶的敌人不是暴君，而是那些驱逐了他们的“资产阶级”。他们说，资产阶级用宣布自由、法律之下平等以及代议制政府的虚假口号来欺骗人民，资产阶级真正决心做的是不顾一切地剥削绝大多数的诚实人。民主实际上是金钱民主，只是掩饰资本家无限制的专政的幌子。大众所需的不是自由和参与政府事务的管理，而是人民的“真正朋友”（或无产阶级“先锋”，或有神赐能力的领袖）

²⁵⁸ 圣经记载，以色列人是与神立约的民族，只有耶和华神才是他们的王，以色列人在扫罗之前没有世俗的王，也没有国家。《撒母耳记上》8-10章记载了以色列人请求先知撒母耳给他们立王的过程。以色列人的王权来自神，王是神治理百姓的仆人，王和百姓仍须敬拜耶和华神。扫罗因为多次违背神的旨意，后被大卫所替，大卫建立了以色列人的第一个王国。

²⁵⁹ 昂利·夏尔·斐迪南·马里·丢当内（Henri Charles Ferdinand Marie Dieudonné）（1820-1883），尚博尔是他的城堡名，波旁王朝继承人。他在1830年七月革命后曾（8月2日）短暂宣布为法王，但国民议会于8月9日判定，王位由奥尔良派继承人路易-菲利普Louis-Philippe继承。尚博尔从此流亡，但一直没有放弃他的王位要求。1870年，法国在普法战争中失败后，保皇党人在国民议会中占了多数，他们支持尚博尔重返王位，但是，因为尚博尔坚持要把三色旗恢复为波旁王朝的鸢尾旗，所以法国最终未能恢复波旁王朝统治。到1883年尚博尔死后，人们已经不再支持君主制。因此有人把尚博尔戏称为法国的华盛顿，因为倘若不是他，法国的共和制不会实现。

的无限权利。宣扬社会主义革命的书籍或小册子的读者，都会认识到它们的作者追求的不是自由而是无限制极权的专制。但是，只要社会主义者还没有掌权，他们就急需“财阀”自由主义的制度以及自由法案为他们的宣传服务。作为反对党，他们不得不利用议会论坛提供给他们而引起公众注意的机会，也不能不利用言论、信仰和出版的自由。因此，他们虽犹豫，但也不得不把自由及公民权利等纳入到临时纲领中。而一旦掌权，他们将坚决废止这些内容。因为，就像布哈林在俄国被布尔什维克征服之后宣布的，任何一种不以为所有人要求自由的方式，为工人运动向资本家要求自由都是荒谬的。²⁶⁰

在苏维埃统治的初期，他们无意掩饰他们对民主政府和公民自由的厌恶，并且公开歌颂他们的独裁手段。但是，到了三十年代末期，他们认识到不加掩饰的反自由纲领在西欧和北美不受欢迎。因为担心德国重整军备，他们想和西方建立友好关系，他们突然改变了对民主、宪法政府和公民自由这些术语（不是思想）的态度。他们宣布了“人民阵线”的口号，并且和敌对的社会主义派别结成联盟。而直到那时，这些派别还被称为社会叛徒。俄国有了宪法，而全球所有奴性的三流作家均称赞此宪法为历史上最完美的文献，尽管它以一党制原则为基础，并且否认了所有的公民自由。从那时起，最野蛮专制的政府开始声称自己享有“人民民主”的称号。

十九和二十世纪的历史，使人对启蒙运动哲学家的期望和言论丧失了信心。各民族并非行进在通向自由、宪政、公民权利、自由贸易、和平以及各个国家友好相处的康庄大道上。相反，趋势却是滑向极权主义和社会主义。并且，再强调一次，有人断言这个趋势是历史的最终阶段而且不会被其它的趋势所取代。

2. 财富与收入平等意识形态的兴起

从远古开始，普通人的生存哲学就毫无疑问地接受了身份差异的事实以及服从那些掌权者的必要性。人的主要需求是不受其他的人以及人类群体的恶意攻击，只有当他不受敌意攻击的时候，才能采集食物、建造房屋、抚养家庭，简言之，才能生存。生命是在一切事物中的首选，而且对于遭受掠夺攻击的人们来说，为保存生命付出任何代价都是值得的。在他们看来，即使做奴隶，活着也比被杀死要好。那些受到仁慈主人庇护的奴隶是幸运的，但是即使忍受一个苛刻的领主也比完全没有人保护要好。人生来是不平等的，有些人既强壮又聪明，而有些人既软弱又笨拙。后者没有选择，只能屈服于前者，并把自己的命运和一个强大的宗主联系在一起。先知宣称，上帝安排了这种方式。

这就是推动了弗格森²⁶¹、圣西门和斯宾塞所称的军国主义，而今天被美国作家称为封建制度的社会组织意识形态。当为军阀作战的武士们开始意识到领主权力的保存依赖于他们这些武士的勇敢，并自恃于这一点，要求参与国家事务管理时，这个意识形态的威信就开始下降。贵族这个主张导致的冲突，产生了注定会质疑并摧毁身份和等级区别的社会必要性的思想。平民问，为什么贵族享有我们没有的特权和权利？难道国家的繁荣不是依靠我们的劳心劳力才实

²⁶⁰ Bukharin, *Programme of the Communists (Bolsheviks)*, ed. by the Group of English Speaking Communists in Russia (1919), pp. 289. 为所有人要求自由只是为工人运动（布尔什维克夺权运动）要求自由的借口。

²⁶¹ Adam Ferguson (1723-1816) 亚当·弗格森（1723-1816年）18世纪苏格兰启蒙运动的主要思想家之一，主要著作《文明社会史论》（*An Essay on the History of Civil Society*, 1767）、《论历史的进步和罗马共和国的终结》（1783）。

现的吗？难道国家事务只和国王和男爵有关，而和我们中的绝大多数人无关么？我们交税，我们的儿子在战场流血，但是当国王和贵族代表们开会决定我们的命运时，我们没有发言权。

没有合理的论据反对这些第三等级（平民）的主张。保留源于一种早已废弃的军事组织的身份特权是不合时宜的。王室法庭及“良好社会”针对普通人实行的歧视，仅仅是一种妨害他人合法权利的行为。但是在军队、外交以及公务上，轻蔑对待那些非贵族血统的人会引起灾难。法国王室军队在贵族傻子的领导下被击溃，虽然许多法国平民后来在大革命和帝国军队中证明他们的出色。英国外交、军事以及海军成就，显然是部分地因为它实际上向所有的公民开放所有的职业这一事实。攻破巴士底监狱以及废除法国贵族的特权，在全世界受到了精英们的欢呼，在德国有康德、歌德、席勒以及其他精英。在维也纳帝国，贝多芬写了一首交响乐，以向击败了奥地利部队的大革命军队指挥官表示敬意，然后，当听说他的英雄推翻了共和制政府时，他又陷入了深深的痛苦中。自由、法律之下人人平等以及宪法政府的原则，在所有西方国家毫无异议地被公众思想所接受。人们相信，在这些原则的指导下，人类正向着一个公正和繁荣的新时代前进。

然而，平等的概念没有一个完全一致的解释。对所有的支持者，它意味着废除身份和阶层特权，以及废除对“较低”阶层、特别是对奴隶和农奴的法律束缚。而有人还主张消除财富和收入的差异。

为理解这个平等主义意识形态的起源和力量，人们必须认识到，它是受一个在全世界几千年来激发过改革运动以及乌托邦作者的纯学术作品的思想——平均土地所有权这一思想的再次风行而激发的。所有折磨人类的罪恶被归结为一些人窃取了比养活他的家庭所需的更多土地的事实。庄园主丰富充裕的必然结果就是无土地者的贫穷。这种不公正被视为犯罪、抢劫、冲突以及流血的原因。在一个完全由能在自己家庭（不多不少地）生产他们家庭所需物品的农民组成的社会，所有这些危害都将会消失。在这样的国家，不存在诱惑。个人或国家都不会觊觎理应属于别人的东西。暴君和征服者都不会存在，因为侵略或征服都不值得，因而将会有永远的和平。

平均分配土地是鼓动古罗马德格拉古兄弟²⁶²、一再扰乱所有欧洲国家的农民起义、各种新教宗派以及耶稣会士在他们著名的印地安社区（现在的巴拉圭）的农业改革所追求的纲领。这个乌托邦的魔力诱惑了许多最高尚的大思想家，其中包括托马斯·杰弗逊。它影响了社会革命党的纲领，这个党派吸引了帝俄时期的绝大多数人。它是今天数以亿计的亚洲、非洲以及拉丁美洲那些十分荒谬地得到了美国外交政策支持的人的纲领。

然而，平均分配土地的思想是个致命的幻想，它的实施将会把人类带入不幸和饥饿，并将在事实上消灭文明本身。

在这个纲领的背景中，不存在除了根据各地特殊地理条件的地区性专门化之外的任何劳动分工的可能性。一旦始终如一地执行到它的最终结果，这种安排甚至没有医生和铁匠。它没能考虑到在经济发达国家土地生产力的目前状态是劳动分工（提供工具、机器、化肥、电力、汽油以及许多其它增加生产的数量以及提高产品质量的事物）的结果这一事实。在劳动分工的制度下，农场主

²⁶² 格拉古兄弟改革，格拉古兄弟分别当选前 133 年及前 123 年、前 122 年的保民官，并各自在任期内领导了一场以平分土地为内容的改革。

并不种植他个人或家庭可直接利用的东西，而是集中种植那些他的土地相对最适宜种植的、最有利可图的作物。他在市场出售产品，然后购买他和他的家庭所需要的商品。一个农场的最佳规模不再和农场主的家庭大小有任何关系。它是被以下技术因素决定的：单位投入的最高可能产出。和其他企业家一样，农场主为利润而生产，也就是他种植社会每一个成员最急需需要的作物以供消费，而不是他和他的家庭单独能直接用于自身消费的作物。但是那些渴望平均分配土地的人，顽固地拒绝关注这些经几千年发展得出来的结果，还梦想把土地利用回复到很久以前就荒废的一个状态。他们愿意把整个经济史逆转，无论后果如何。他们无视这个事实：在他们推崇的土地占有和使用的原始方式下，我们的星球只能养活今天人口的一小部分，即使这一小部分也只能以一种比现在低得多的生活水平生活。

可以理解，落后国家的无知乞丐除了获得一块土地外，想不出任何其它的方式来改善他们的状况。但是，他们的幻想被那些发达国家自称为专家代表所支持就是不可原谅的了，而这些人最应了解什么样的农业环境才能使人民生活繁荣昌盛。落后国家的贫困只能通过工业化来消除，并且工业化对农业的必然结果是，土地利用从直接满足农场主的家庭利益被供应市场需求所取代。

那些享受着所有劳动分工下生活便利的人们，同情和支持今天以及过去的土地分配计划，并且这些计划根本没有任何在无情的自然给予状态方面的现实基础。它更是一种浪漫幻想的结果。在衰退中的罗马的腐败社会中，被剥夺了任何公共事务管理的参与机会之后，人们无聊而困惑，陷入了对自给自足的农民和牧羊人简单生活想象出来的幸福幻想之中。在法国旧制度下更空虚、腐败和无聊的贵族，则找到了一个他们选择性地称为乳牛农场的消遣。而现在的美国百万富翁把务农作为一项业余爱好，它的额外好处是它的成本可以抵减应付的收入税。这些人把农业不怎么当作一个生产部门，而是更视之为一个分配部门。

在贵族的公民特权被取消的时候，可以拼凑一个看起来合理的没收贵族土地所有权的借口。封建土地权是对贵族所有者补偿他们过去所提供的、以及将来要提供的军事服务的王室礼物。它们提供了支持国王武装随从的收入，并且，分配给单个臣下的土地大小取决于他的等级和在军队中的地位。但是，随着军事条件的变化以及军队不再由封臣组成，土地分配的主要制度变得不合时宜。地主们不再提供服务，没有理由让他们还占有作为报酬的土地收入。这样看起来收回封地是合理的。

从贵族借助用来捍卫他们身份特权的理论观点来看，这种论证无法驳斥。他们坚持传统权力，指出他们的先辈为国家所提供服务的价值。但是既然他们自己显然不再提供这种必不可少的服务，那么可以正确地推断，作为对这种服务的报酬而接受的福利就应该被取消，这包含了撤回土地赠予。

然而，从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观点看来，这种没收是一种对经济发展延续性的不必要的危险的破坏。所需要废除的是所有那些庇护低效率经营者不受更高效率的人的竞争的法律制度，后者可以利用土地更便宜地生产出更好的商品。那些贵族的土地从市场和消费者的最高权力中撤出来的法律，例如限定继承权以及对平民通过购买而获得的法律限制必须被废止。这样，市场的最高权力，将会把土地的控制权转移到那些知道如何以最有效率的方式提供消费者最迫切需要商品的人的手中。

不受乌托邦主义者的影响，经济学家把土地视为生产的一个要素。他们从所有人正确理解的利益层面要求土地，像所有其它物质生产要素一样，应该被最有效率的企业家所掌握。经济学家对农场规模没有任何武断的偏好，在他们看来，确保最大效率利用的规模就是最佳规模。他们并不被“农业应雇佣尽可能多的人口才符合国家利益”这个神话所愚弄。相反，他们充分认识到如果能避免在农业及其它生产部门浪费人力，将不仅对国家的其它部门有利，而且也对那些农业部门的人有利。由于技术进步，物质财富的增加应归于足够生产出所需的所有农业产品的人力在整个人口中的比例持续下降。从长期发展来看，试图干涉越来越降低的农业人口和非农业人口比例将会降低生活标准。用于生产所需的所有数量的食物和原料的人口在总人口中占得比例越小，人类就越繁荣。如果“反动”这个术语具有任何意义的话，那么通过特殊手段保存那些在市场竞争中不能坚持下去的小规模农场的努力，肯定应该被称为是反动的。他们倾向于用较低的劳动分工替代较高的劳动分工，因此会减慢或完全停止经济进步。还是让消费者自己来决定最符合他们利益的农场规模吧。

经济学家对农业乌托邦的批评非常不受欢迎。不过，他们意见的影响还是暂时遏止了改革者的热情上涨。只是到了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一种以小农场主为主、或者甚至完全为小农场主经营的农业理想重新获得了在今天世界政治中的地位。

平均分配土地理想为人们接受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铺设了道路，从而使平均地权的伟大历史作用和政治重要性也得到显现。马克思社会主义者在理论上反对它，并且提倡农业的国有化。但是，他们利用“平均分配土地所有制”的口号，来作为一个煽动经济不发达国家大众的工具。对这些国家的未受过教育的农村人口而言，“经济社会主义化”毫无意义。但是当政客们以富农和大地产拥有者的土地来许诺他们时，他们所有的嫉妒和仇恨的本性便被唤醒了。在罗斯福执政期间，美国政府的亲共产主义分子和美国媒体宣称中国“左派”不是共产党，而“仅仅是农村改革者”。就苏维埃的中国代表采用列宁的妙招——通过采取最流行的口号和隐藏自己的真实意图来开始社会主义革命而言，他们是正确的。今天我们从所有经济落后国家，看到了土地没收与重新分配计划是如何成为最有效的苏维埃宣传手段的。

这个计划很明显不适合西方文明的国家。工业化国家的城市人口不会被这种农业改革的前景所诱惑。它对资本主义国家大众思想的恶劣影响在于，它对财富和收入平等的纲领给予了同情。因此，它使得那些必然导致完全社会主义的干涉主义政策大获人心。强调这一事实并不是说，任何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政权都将会带来收入的平等。它只是指出，使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流行的不仅是它们将会给每个人巨大财富的虚幻信仰，而且还有每个人将会得到同样的、一样多的虚幻的期待。嫉妒当然是人类最深的情感之一。

那些煽动他们的同胞以及外国人，嫉妒和仇恨并激烈地要求财富和收入平等的美国“进步人士”，并没有看到这些思想在世界的其它地方是如何解释的。其他国家的人用同样的嫉妒和敌意看待所有美国人，包括工人，就像典型的美国工会成员看待那些收入超过他自己收入的人一样。在外国人的眼里，当美国纳税人花费数十亿美元改善别国条件时，仅仅是受到良心不安和恐惧的驱使。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以及许多欧洲国家的公众舆论，看待这个外援制度就像社会主义煽动家看待富人给慈善机构的捐款一样，认为那不过是一点用于贿赂穷人、并阻止他们取回本来属于他们自己东西的小钱。建议他们的国家应该站

在和美国一起，反对俄国的政治家及作者、还有那些不多的有勇气为资本主义辩护并批判社会主义的美国人一样，他们并不受同胞的欢迎。在霍普特曼的戏剧《织工》（最有影响的德国反资本主义文学作品之一）里，当一个商人的妻子意识到人们的表现就好像富有是一种罪恶时，她震惊了。除可以忽略的少数人之外，今天每个人都乐意把这种对财富的谴责当成是应该的。这种思想状况注定了美国外交政策的厄运，美国因为它的繁荣而被谴责和仇恨。

平等主义意识形态的几乎无可争议的胜利完全抹煞了其它所有政治理想。受嫉妒驱使的大众，一点也不在乎那些被煽动者称为“资产阶级”的人所关心的信仰自由、思想自由、出版自由、人身自由是什么。他们渴望社会主义领导者许诺他们的人间天堂。和这些领导一样，他们确信“清除资产阶级”将会把他们带回伊甸园。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如今他们把这个计划称为*自由纲领*。

3. 人类理想状态的幻想

在提到过去时，所有寻求在人类历史进程变化顺序中发现某种趋势的理论都无法就历史确定的事实达成一致意见，并且他们预言未来的尝试已经被稍后的事件无可辩驳地证明为失败。

大多数这些理论以提及一个人类事务的完美状态为特征。他们或者把这个完美状态放在历史的开始，或者放在结束，或者既在开始又在结束时。因此，历史在他们的解释中呈现为一种逐步堕落或逐步进步，或一个时期的逐步堕落再紧跟着一个时期的逐步进步。根据这些理论的一部分，完美状态的思想根植在宗教思想和教条中。然而，分析这一问题涉及的神学方面不是世俗科学的任务。

很明显，在一个人类事务的完美状态中，不存在任何历史。历史是变化的记录。但是完美的概念恰恰暗示了没有任何变化，因为一个完美状态只能转变为一个较不完美的状态，也就是，任何改变只会破坏这个状态。如果人们把这个完美状态只放在假定的历史的开端，也就是声称在历史时代之前是一个没有历史的时代，而且一天某些事物扰乱了这个最初时代的完美而开创了历史时代。所以如果人们假设历史趋向一个完美状态的实现，也就是断言历史将会在某一天结束。

不断地争取用更令人满意的条件替代较不令人满意的条件是人的本性。这个动机刺激人们的精神活力并促使他们行动。在一个完美体系中的生活将会把人还原为一个纯粹的植物生命。

历史并非从一个黄金时代开始。原始人生活的条件在后来时代的人眼里是相当令人失望的。他被无数的危险包围，而这些完全不（或者至少不在同等程度）对现代人构成威胁。和后人相比，他极端地贫困和野蛮。假如他有机会利用任何我们时代的成就，例如疗伤的手段，他将会非常高兴。

人类也不可能达到一个完美状态。一个没有目标无所牵挂的状态，是理想的而且也是人类能达到的最幸福的状态，这种观点充斥了乌托邦文学。这些计划的作者描绘了一个不需要进一步变化的社会，因为所有的事物都已经达到了可能的最佳状态。在乌托邦里，再也没有任何理由为进步而奋斗，因为一切已

经完美，历史被带到了终结，今后所有人将幸福无比。²⁶³这些作者从来没有想过，他们急于通过改革造福的人，或许对什么是他想要的什么是不想要的会有不同的意见。

近来，从对经济学程序的粗糙曲解中，诞生了一个新的完美社会图像的复杂版本。为了处理在市场环境下变化的影响，根据这些变化调整生产的努力以及利润和损失的现象，经济学家构建了一个假设的（尽管无法达到的）图像。在这个图像中，生产状态总是完全适应了消费者可以实现的愿望²⁶⁴，而且无论怎样都没有进一步的变化发生。在这个假想的世界里，明天和今天没有什么不同，不会有失调出现，而且也不需要有任何企业家行为出现。商业活动不需要任何进取心，它是一个神秘的类似本能驱动的机器人操作的自动过程。对经济学家（并且，在这个问题上，对讨论经济问题的普通人也是一样的）来说，除了同一个编造出来的稳定的以及没有变化的世界相比较外，没有别的办法理解真实的、持续变化的世界正发生的事情。但是，经济学家完全明白，苦心经营一个均匀运转经济的图像仅仅是一种智力工具，在人生活的、被迫行动的真实世界里并没有它的对应物。他们甚至并不怀疑任何人可能不能理解他们概念的纯粹假设和辅助的特点。

然而，有些人误解了这个智力工具的意义和重要性。在从力学理论借来的比喻中，数理经济学家认为均匀运转的经济系统常态是静态、均衡的，而任何相对“均衡”的偏离则为非均衡。这种语言表述暗示了某种缺陷存在于以下事实中：真实经济中总是存在着非均衡，并且“均衡状态”从未实现过。这种仅仅存在于想象中的不受干扰的假设“均衡”状态看来是最理想的现实状态。在这个意义上，有些作者称在变化的经济中总存在的竞争为不完全竞争。事实上，竞争只能存在于一个变化的经济中，它的功能正是为了消除非均衡，并且产生一种达到“均衡”的趋势。在“静态均衡”状态里不存在任何竞争，因为在这个状态下，竞争者无论如何也找不到一个介入点，为消费者提供能比现有的更好地满足他们需求的商品。正是“均衡”的定义暗示了在经济体系中任何地方也没有失调，因此也就没有采取任何行动消除失调的必要，没有企业家的活动，也没有企业家的利润和损失。正是因为没有利润才促使数理经济学家认为没有

²⁶³在这个意义上说，马克思也应该被称为一种乌托邦主义者。他也致力于追求一种历史将停滞的状态。因为，历史在马克思的解说中，就是阶级斗争的历史。一旦阶级和阶级斗争消失，将不再有历史。确实，《共产党宣言》只是宣布了所有至今（到那时为止）的社会历史，或者，就像恩格斯后来补充的更为准确，原始共产主义的黄金时代解散后的历史，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因此不排除在建立社会主义太平盛世之后可能出现一些新历史内容的解释。但是，马克思、恩格斯以及他们门徒的其他著作，没有提供任何迹象表明这种新型的历史变化——本质上根本不同于先前的阶级斗争的历史变化，有可能应运而生。一旦实现共产主义高级阶段，每人的需求都得到了满足，还能期望有什么进一步的变化？马克思在他的科学社会主义和被他打上空想社会主义烙印的早先那些作家的计划之间制造的区别，不仅有社会主义共同体的性质和组织，而且也包括期望实现这个共同体的方式。那些被马克思贬为乌托邦的人构造了一个社会主义天堂的设计，并试图说服人们实现它是非常值得的。马克思摒弃了这一程序。他假装发现了历史发展的规律，根据这一规律社会主义的实现是必然的。他看出了空想社会主义者的缺陷——他们乌托邦的特征在于他们把社会主义的实现寄希望于人民的意愿，也就是，他们在有意识的行为这一事实上，而他自己的科学社会主义则宣称社会主义通过物质生产力的发展将要来临，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²⁶⁴ the realizable wishes, 相当于现代经济学中“有效需求”这一概念。

受到干扰的静态均衡状态是一个理想状态，因为他们受到一个先入为主观点的启示：企业家是无用的寄生虫，而利润是不正当的收益。

“均衡”的狂热者也被“均衡”这个术语的人文心理学内涵所迷惑。流行的一个关于人的精神的均衡概念是模糊的，并且如果不引入武断的价值判断就无法详细说明。关于这种精神或道德均衡所能说的全部，就是它不能促使一个人采取任何行动。因为行动的前提条件就是存在让人不舒服的事物，它唯一的目地只可能是消除这种不舒服。均衡和完美状态的这种类似是明显的。完全满足的个人是没有目标的，他不行动，他没有思考的动机，他的日子花在从容不迫地享受生命上。这种神仙似的生活是否理想可以留待以后讨论。这里可以肯定的是，生活中的人永远不能达到这种完美和均衡的状态。同样可以肯定的是，在真实生活的不完美中，极度备受苦难的人们会梦想着彻底实现他们的全部愿望。这点解释了人在感情上赞美“均衡”、并且谴责不均衡的由来。

然而，经济学家绝不能把这个人文学的“均衡”概念同虚构的静态经济模型的用途混为一谈。这个虚构的模型提供的唯一服务，是行为人以显著的方式开始无休止的奋斗以及最大可能地追求他们条件的改善。对未受影响的科学观察者，他对于不均衡的描述中，不存在任何引起反感的事物。只有假的数理经济学家狂热的亲社会主义的热诚，才把一个纯粹的逻辑经济学的分析工具转变成为一个善的以及最理想状态的乌托邦景象。

4. 持续进步趋势的神话

对历史的现实主义的哲学解释，必须避免涉及到人类事务完美状态这一幻想概念。现实主义解释唯一能着手的基础是这样的事实：和所有其它的生命存在方式一样，人受到保存他自己的存在、以及尽可能地消除他感到的任何不安因素的本能驱使。绝大多数人是从这个观点出发来评价他必须生活的环境的。把他们的态度嘲笑为物质主义²⁶⁵（从伦理学涵义）是错误的。道德家们用他们鄙视的对纯粹物质主义欲望的满足反衬那些对更高尚目标的追求，只是那些追求都是以一定程度的物质福利为前提的。

正如前面已经指出的²⁶⁶，关于智人的一元起源或多元起源的争论，对历史并没有什么重要意义。即使我们假设所有人都是一个灵长类群体的后代，只有这个灵长类群体进化成了人类，我们仍然必须考虑到这一事实：人类在很早时期就分散到地球表面的各处，打破了这个起源的统一状态，这个整体被分成或多或少的各个孤立部分。在数千年的时间里，这些人各自过着自己的生活，彼此之间很少或者没有交流。而最终，现代市场和交通手段结束了各个人类群体之间的孤立。

声称人类的发展从它的初始条件到目前状态遵循了一定的路线是对历史事实的歪曲。在历史事件的演替中，既不存在统一性也没有连续性。如果历史学家或哲学家不那么武断地装作知道人类奋斗的尽头应该是什么样的，就更不能允许用生长和衰退、进步和退步、改善和堕落来形容历史的变化。何种文明为优，何种为劣，何种超好，何种更糟，人们并没有达成共识。

²⁶⁵ materialism 此处译作“物质主义”

²⁶⁶ 参见第十章 历史主义 5 消融的历史

对现代资本主义文明取得的物质成就，人类几乎具有一致的评价。绝大多数人认为这个文明带给普通人更高的生活水平，是非常值得赞许的。在少数并且人数持续下降的顽固的禁欲者群体之外，很难发现有人不希望他们自己、他们的家庭和朋友能享用西方资本主义物质用品。如果从这一点来看，人们声称“我们”取得了超过前人的进步，那么他们的价值判断是和多数人是一致的。但是，如果他们假定我们所称的进步是一个必然现象，而且在事件的进程中总有一个规律使得这个意义上的进步永远进行下去，他们就大错特错了。

为了反驳这种认为好像有一个自动运行的、通向进步的固有趋势的理论，没有必要提到那些紧接着物质进步时期就是物质衰退时期或停止时期的古老文明。无论怎样，都没有理由假设，一个历史发展的规律必然朝向物质条件的改善运行，或那个最近有效的趋势会在将来也继续下去。所谓的经济进步是资本货物的积累超过了人口增长的结果。如果这种趋势被进一步的资本积累的停滞或资本缩减替代，也就不再存在这个术语意义上的进步。

除了最顽固的社会主义者之外，每个人都认为，在过去两百年发生的史无前例的经济条件的改善是资本主义的一项成就。最轻描淡写的说，假定在一个不同的社会经济组织下持续经济进步的趋势会继续下去是“为时尚早”²⁶⁷。社会主义的鼓吹者把所有为了显示“社会主义制度由于无法构建任何形式的经济计算所以将会完全瓦解生产制度”而提出的经济学贬为不妥当的。即使社会主义者不理睬其他人对社会主义的经济分析这一做法是正确的，这也没有证明通向经济进步的趋势将会或者可以在社会主义的政权下继续下去。

5. “经济”自由的压制

一种文明是一定世界观的产物，并且它的哲学从它的每一个成就中得到自我证明。人类创造的史前古器物可能被称为物质的，但是，在生产活动安排中采取的手段则是智力的，是思想在决定应该做什么以及怎么做的结果。所有文明的分支因为它充满意识形态的精神才显得生机勃勃。

西方社会的标志性哲学是个人主义，正是它在过去一个世纪里的一贯苦心经营才改变了所有的社会制度。它认为思想无论好坏，都源自个人的大脑。只有少数人被赋予了构思新思想的能力。但是，因为政治思想只有被社会接受时才会产生效果，所以它取决于那些自己不能提出新的思考方式的大众，通过他们来批准或否定先驱者的创新。无法保证这些追随者和墨守成规的大众将会明智地利用他们被授予的权力，他们可能会拒绝那些能给他们带来益处的好主意，而支持那些会严重伤害他们的坏点子。但是，如果他们选择了后者，也不全是他们的错。错的同样也是那些有益事业的先驱者们，因为他们没能以更吸引人的方式提出他们的思想。人类事务的良性发展最终不仅依赖于人类种族产生那些先驱思想家的能力，而且还依赖于人类多大程度上产生那些通报者和传播者的能力。

人们可能哀叹于这一事实：人类的命运竟然被事实上并非一贯正确的人的思想所决定。不过这种遗憾并不能改变现实。事实上，人类的卓越之处正在于他有选择善恶的权利。神学家赞美上帝给予人类在美德和罪恶之间作选择的判断力时，考虑的恰恰是这一点。

²⁶⁷ “在一个不同的社会经济组织（非资本主义制度）下，持续经济进步的趋势会继续下去”这个假设是毫无根据的。

把作最终决定的权力转交给一个或少数几个人的专政，无论这些人如何优秀，并没有消除“大众的无能”²⁶⁸的固有危险。希望独裁将总是和正义的事业站在一边是一种幻想。那种设法遏制先驱者改善他们同胞命运的努力正是专制的特征。专制政府的最高目标是阻止会危及它自身最高地位的任何创新。正是它的本性把它推向了极端保守主义——保持原状的倾向，而不考虑为了人民的福利如何迫切需要做出改变。专制反对任何新思想以及臣民的任何自发性行为。

可最后，即使最专制的政府用尽残忍和野蛮的手段也无法对抗新思想。最终，赢得多数人支持的意识形态总会获胜，并且对暴君的统治釜底抽薪。然后，许多受压迫的人将会起来反抗并推翻他们的统治者。然而，这可能只会缓慢地发生，并且，与此同时可能会对公共福利造成无可挽回的损害。另外，革命必然意味着对社会协作的极大干扰，在公民内部制造不可调和的裂缝和仇恨。被称为宪法制度、民主政治以及民治政府的优越性和价值，就在于它们使得行政方式和政府人员的和平更替成为可能。只要存在代议制政府，就不需要通过革命和内战来推翻不受欢迎的统治者和废除他的制度。如果当权者和他们的处理公共事务的方法不再让国家的大多数人满意，他们就会在下一次选举中被其他人和其它制度所取代。

个人主义哲学以这种方式推翻了专制主义理论——正是这种理论给予了王子和暴君天堂般的特权。个人主义哲学以个人被造物主授予的不可分割的权利反对被神选定的国王所谓的神授权利。与国家意图执行正统并消除它所认为的异端邪说的主张相对立，它赞扬信仰的自由。与顽固地保留因时间流逝而不合时宜的旧制度相对立，它诉诸于理性。因此，它开创了通向繁荣的自由和进步的时代。

十八、十九世纪的自由主义哲学家没有想到，会有一种新的意识形态出现，它将完全摒弃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原则，并宣布个人完全服从于一个父亲般权威的监护之下，是最理想的政治行为目标，也是历史的最高尚的结局以及上帝造人时所考虑的所有计划的最终目的。不仅休谟、孔多塞以及边沁，而且甚至包括黑格尔和穆勒（John Stuart Mill）都会拒绝相信，如果他们的同时代人预言，在二十世纪的法国和盎格鲁—萨克逊人国家，大多数思想家和科学家会为一个政府制度而津津乐道，而这个制度在无情迫害异议者和热心剥夺个人自发性活动的所有机会方面使以往任何暴政都黯然失色。如果有人告诉他们，废除自由、废除公民权利以及废除以被治理者的同意为基础的政府将被称为解放，他们会认为这个人是疯子。然而，所有这一切都已经发生了。

历史学家或许能理解这个意识形态上的极端而且突然的变化，并给出一个人文心理学的解释。但是这种解释绝对不能证明哲学家和经济学家对产生这场运动的伪理论的分析与批评是错误的。

西方文明的基本原理是和个人自发行为牢牢联系在一起的。总是存在遏制个人首创精神的努力，但是迫害者和检察官的权力并不是绝对的，它无法阻止希腊哲学及其罗马分支的兴起或现代科学与哲学的发展。受生来就有的天赋驱使，先驱者们在所有的敌意和反对的干扰下仍然完成了他们的任务。革新者不

²⁶⁸ The masses' incompetence, 大众的无能，源于John Stuart Mill，他在*On Liberty (1859)*以及*Thoughts on Parliamentary Reform (1859)*均表达了对“collective mediocrity”（集体的平庸）的担忧，他认为，代议制政府内在的最大危险在于政府可能被一群“低智商的人”所控制。

需要等待任何人的邀请或命令。他可以完全自愿地向前迈进一步而不顾传统习惯。在思想领域，大体上西方总是能享受到自由的恩惠。

而后，随着商业领域的个人解放，作为一个哲学新分支成就的经济学产生了。那些知道如何通过改进生产方式来使他们的同胞致富的企业家被给予了施展才能的权利。资本主义满足大众需求的大规模生产的商业原则使得丰饶之角²⁶⁹也能为普通人享用。

为了正确评价西方自由思想的影响，我们必须比较西方和那些从来没有领会过自由意义的地方的主要情况。

有些东方民族，在现代西方文明代表的祖先还没有脱离原始野蛮的时候就发展了哲学和科学。有充足的理由相信，希腊天文学和数学通过学习早先的东方成就获得了它们发展的最初动力。后来，当阿拉伯人从他们占领的国家获得了关于希腊文学的知识之后，在波斯、美索不达米亚以及西班牙，一种值得瞩目的穆斯林文化开始繁荣起来直到十三世纪，而阿拉伯学问不比同时代的西方成就逊色。但是，后来就像以前在中国、印度以及东方基督教势力范围发生的一样，宗教正统坚定地执行一致性，给穆斯林国家的所有智力活动和独立思考画上了句号。另一方面，正统的力量以及对异议者的迫害无法使西方科学和哲学缄默，因为自由和个人主义精神在西方已经强大到足以在所有迫害中存活下来。从十三世纪起，所有的智力、政治、以及经济创新都在西方发生了。直到几十年前，东方通过与西方的接触而受益。在历史记录中，哲学、科学、文学、技术、政府以及商业方面的伟大人物几乎没有一个是东方人。在西方思想开始渗入之前，东方经历了停滞和僵硬的保守主义。东方人自己认为，奴隶、农奴、贱民、殉夫或裹脚之类的风俗、野蛮的刑罚、大众的苦难、无知、迷信以及无视卫生并没有任何过错。因为不能理解自由和个人主义的意义，今天他们仍痴迷于集体主义的计划中。

虽然这些事实广为人知，但今天，数以百万计的人仍然热衷于支持权威人士的计划，用它来取代每个人自治的计划。他们渴求奴隶制度。

当然，极权主义的拥护者会抗议说，他们想废除的“只是经济自由”，并且所有“其它自由”将会保持不变。他们没有意识到，把人类生活与活动的经济领域和非经济领域区分开来是他们谬误中最严重的。假如有一个全能的权威具有给每个人分派他必须执行任务的权利，这个人便不具有任何自由和自主权，他只有在严格服从和饿死之间选择。²⁷⁰

为了决定一个年轻人是否应该有在知识或艺术领域学习并工作的机会，编制计划的当局可能会召开专家委员会。但是，这种方式只能培养类似鸚鵡学舌似的重复旧观点的门徒。它会把那些不同意已接受的思维模式的创新者挡在门外。假如创新的发明人需要从那些他打算在理论和方法上背离的人那里得到授权的话，将不会有任何创新出现。黑格尔不会给叔本华或费尔巴哈授权，或者卢梭²⁷¹也不会授权马克思或卡尔·门格尔。如果最高计划组织机构最终决定了哪些书要出版，谁在实验室作实验，以及谁画画或雕塑，还有在技术方法上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变更，那么将不会有任何改善或进步出现。作为个体的人在统治者手中只是一个棋子，他们在“社会工程”中是被摆弄的个体，就如同被工

²⁶⁹ horn of plenty, 也称 cornucopia, 希腊神话, 丰饶之角, 哺乳了宙斯的山羊的角, 后来脱落并装满了水果。在神话中, 它装满其主人希望得到的任何东西

²⁷⁰ Hayek, *The Road to Serfdom* (London, 1944), pp. 119 ff.; Mises, *Socialism*, p. 538.

²⁷¹ 卢梭 (Jean-Jacques Rousseau, 让·雅各·卢梭) (1712—1778), 法国启蒙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文学家。

程师用来构建房屋、桥梁和机器的材料一样。在人类活动的每一领域，一项创新就是一个挑战，这不仅针对一切墨守成规者以及传统方法的专家和实践者，而且也针对那些在过去自己也曾是创新者的人。创新最初遇到的主要是顽固的反对。这种障碍在经济自由的社会能被克服，它们在社会主义制度中则是无法逾越的。

个人自由的本质在于有机会背离传统的思维和行为方式。由一个确立的权威来做计划则排除了个人计划的机会。

6. 未来的不确定性

关于历史的一个突出事实就是，它是在发生之前没有人能预测的一连串事件。那些用著作促使了法国革命的英国和法国哲学家，还有热情欢呼这伟大转变第一步的所有西方国家的思想家和诗人，既没有预见到恐怖统治，也没有预料到巴贝夫和他的追随者会迅速解释平等原则的方式。那些用理论粉碎了前资本主义时代限制经济自由方法的经济学家和通过经营开启了工业革命的生意人，既没有预料到自由企业所取得的史无前例的成就，也没有想到那些从资本主义获利最大的人对它反应出的敌意。那些接受威尔逊总统“让世界变成民主的温床”政策为万灵药的理想主义者没有预料到结果会是怎样的。

预言历史之中的内在谬误在于，预言者假定支配人的观点只有那些他们已经知道的，不存在他们不知道的观点。黑格尔、康德和马克思（仅仅列举这些占卜者中最受欢迎的）从来没有质疑过自己的全知全能。他们中的每一个人都完全相信他就是那个被选中的人，有远见地指挥全人类事务的神秘力量选择他来最终完成历史变化。自此以后，没有任何重要的事情会发生，人不再有任何思考的需要。对未来的人来说，只有一个任务——按照天意的使者设计的规则来安排所有的事物。在这个方面，穆哈默德和马克思之间，审查官和康德之间没有什么区别。

所幸，在西方，到目前为止，稳定和僵化的倡导者们没能消除掉个人天生爱思考和对任何问题都使用理性尺度的倾向。针对那些宣称准确知道为人类预备的未来的理论，历史与哲学只能如此断言，仅此而已。